

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书

救亡先驱录

共产党抗战英杰

石魁 史立成 编著



前 言

中国近代史里，特别伟大光辉的一页，当属中华民族全民的抗日战争。

伟大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早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我国东北时，共产党便提出全民抗战的主张，发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广泛发动民众抗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大规模侵华，共产党抛弃前嫌，以国家民族为重，促成国共合作，并将其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

全国抗战一开始，即区分为正面战场（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解放区战场）。太原武汉相继失守后，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日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一面鏖战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一面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誓死抗战到底。敌后解放区军民，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九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与日伪军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为中华民族建树了丰功伟业！

今年八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为具体生动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形象地刻画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威力和作用，为讴歌和宣扬敌后军民的功绩和高贵品质以缅怀先烈，教育后人，我们特意献上这部专门记述共产党人抗日英烈们战斗事迹的书——《共产党抗战英杰》。

这部书收入的抗日英雄传记，记述了上百名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和风采。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指战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60多万人中的优秀代表。里面有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的爱国老人续范亭，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方志敏，新四军军长叶挺；有血战疆场的抗日名将左权、彭雪枫、杨靖宇、赵尚志、吉鸿昌和中共热河省工委第一任书记陈镜湖；有平型关大战的拚刺英雄连连长曾贤生、阳明堡火烧日军飞机24架的英雄营长赵崇德，百团大战中打响第一仗的团长谢家庆，善打夜战近战的团长叶成焕、丁思林、郭征；有亲手击毙日军少将的东北抗联副师长姜克智，威震茅山的新四军苏南挺进支队司令廖海涛；还有巾帼楷模赵一曼、李林、铁道游击队长洪振海，白洋淀雁翎队勇士邱芝科，爆破大王马立训，民兵队长刘傻子，港澳地区抗日英雄刘黑仔和青年诗人陈辉等英雄事迹，也记载在书中。

英烈们的高尚品德和行为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国主义精神放射出奇光异彩。他们为祖国未来和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永远与民族共存，与日月同辉。

今天，我们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光辉的事业，需要无数英雄、模范、先进人物带领群众继续艰苦奋斗，需要全国人民，海内外同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团结一致，振兴中华。

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教导，配合《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全国的贯彻实施，

特意为大家奉献这部书，愿它成为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重要读物。

共产党抗战英杰传记，由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组织撰写，记述真实，事迹感人。经过史立成、石魁同志整理加工，文字更精萃，思想更深刻。著名编辑家、韬奋奖获得者黄涛同志对本书编写工作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五十年过去了，人们对抗战英杰可能淡忘了。追忆英杰，学习英雄，将激励祖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奋勇向前。抗日英杰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万世流芳！

编者

1995年1月

共产党抗战英杰

长城内外建伟业 ——记陈镜湖烈士

陈镜湖，字印潭，号小秋，化名李铁然，曾用名陈龙川、陈士秋。1901年出生于热河省建平县（今属辽宁省）哈巴沁南井村一户农民家庭。8岁开始在本村私塾读书，后入建平县高等小学。他勤奋好学，记忆力强，于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

当时，段棋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大大小小的军阀，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配下，长期割据争斗，互相抢权夺地，造成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19年，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后，陈镜湖参加了直隶一中的“学生救国团”，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向省公署请愿、示威游行和街头宣传讲演等活动，是“南下宣传团”的骨干。同年9月，他同韩麟符组织了与“觉悟社”齐名的“新生社”。

1920年秋，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镜湖的觉悟有了显著提高，一边刻苦地学习，一边参加了平民小学的义务教学，每天授课两小时，帮助解决贫苦家庭出身子女读书的困难。

1922年8月，陈镜湖考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班，攻读政治和外语。1923年初，陈镜湖等南开同学成立“向明学会”，学习社会主义新思想，同时创办了《天津向明学会半月刊》，对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兴起，特别是“二七”大罢工发生后，孙中山决定实行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提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鉴此，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陈镜湖又在这年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陈镜湖被选为直隶省代表，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派往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并在冯玉祥西北军宋哲元部任支队长。他先后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开展工作，向当地蒙、汉族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唤起他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王公贵族的压迫，并在党的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王公贵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侵略中国和压榨蒙汉人民的罪恶行径。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起义”）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参加国民革命，将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简称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陈镜湖先后任国民军热河民军司令、骑兵旅旅长。为了扩大民军队伍，陈镜湖带人回到家乡，组织武装力量。当他回建平时路经叶柏寺，离家只有十几里，却没有顾得上回家看望父老和妻室儿女。他又从建平到围场、多伦等地扩充民军，为消灭封建军阀而辛勤奔走。他尤其注意严肃军纪，经常教育士兵“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同时，严格约束自己，和士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饭菜，按规定付饭费。因此，他受到群众和士兵的欢迎和爱戴。

同年12月30日，孙中山扶病到达北京后，李大钊召开会议，讨论了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问题。陈镜湖等人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派，作为孙中山的北上特派宣传员，赴热河积极开展工作。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时，陈镜湖代表热河省参加祭奠，并出席了国民议会促进会代表大会。

1925年初，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建立四个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以加强党对内蒙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陈镜湖被派任中共热河工委负责人，同时以热河省国民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热河省国民党部的工作。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在承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承德市中、小学和师范近千名学生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周年大会上，陈镜湖登台讲演，痛斥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罪行，大呼“猛醒吧，睡狮！觉悟吧，中国！”声泪俱下，全场群情激昂。

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在张家口召开工农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组成同盟中央委员会，李大钊当选为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副书记，陈镜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时，由中共领导编成“内蒙古特别民军”，陈镜湖任第二骑兵纵队司令。不久，该纵队改编为骑兵旅，随军加入国民军，在热河同张作霖奉军作战。

1926年8月，内蒙古特别民军退入包头；9月17日，参加了冯玉祥“五原誓师”，部队改称“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采取李大钊“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行动方针，命陈镜湖率部随宋哲元部西进援陕，经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攻打反动的“讨赤”联军，后出任陕西蒲城县长。期间，他体恤民瘼，将群众担负的粮税减少三分之二，受到群众的欢迎。

1927年4月，陈镜湖作为内蒙古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当全国革命在南方和北方胜利发展的时候，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急剧右转。特别是1927年6月10日至11日冯玉祥、汪精卫郑州会议，和6月19日至21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政治态度大逆转，在自己的辖区和军队里，配合蒋、汪进行“清党”、“分共”，于6月底、7月初将刘伯坚、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在这样情势下，陈镜湖被迫辞去县长职务，离开陕西，只身回到北京，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从这年4月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北方各级党组织不断遭到破坏，陈镜湖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他和刘刚（原内蒙特委领导成员）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苏联，找到共产国际，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不久，陈镜湖回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恢复、整顿内蒙特委，于同年9月组成新的特委，他担任书记，改名为李铁然，继续组织和发动蒙、汉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一年多中，他向中共中央写了《内蒙党报告》、《内蒙特委致中央的信》、《内蒙特委书记李铁然报告》、《内蒙古一般政治状况分析》等十余份材料，为中共中央指导内蒙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31年7月，日寇在我国东北制造“万宝山惨案”，杀害无辜农民，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热河等地人民纷纷组织了“惨案后援会”进行声援。陈镜湖亲自到围场县，具体指导“后援会”的工作。同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立即以内蒙特委的名义，向蒙汉各族人民发出了“团结全国各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并将“惨案后援会”改称“民众抗日后援会”，一面尽力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一面注意分析形势，不失时机地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1932年末，陈镜湖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内蒙特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组织抗日武装打击日寇，并发表了《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会后，他

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为后来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3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准备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陈镜湖根据党的指示，迅速带领一部分同志从围场奔赴张家口，协同冯玉祥组织长城内外各旗县武装民团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出任同盟军总司令部参议。5月12日，陈镜湖带领参谋、警卫员从张家口乘汽车到张北点验抗日武装队伍，途中遭到反动民团的袭击。在战斗中，陈镜湖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33岁。

（根据刘景恩、李久荣《陈镜湖烈士传略》整理）

抗战我何惜此头

——记吉鸿昌烈士

吉鸿昌，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民族英雄。他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

吉鸿昌从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走过了许多艰辛曲折的路程。

1913年8月，西北军冯玉祥部到河南郾城招兵。一个宽脸庞，大眼睛，体格魁梧的青年，跟在一行青年的后面，挨个接受体格检验，一下就被选中，当了一名士兵。他就是吉鸿昌，当年18岁。

吉鸿昌，幼名恒立，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扶沟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后在杂货行当过学徒。他性格刚强，能吃苦耐劳，当兵后打仗勇敢机智。1915年秋，冯玉祥部回驻长安（今西安），每日早晨操练前，冯玉祥总要坐在司令台上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有一天早晨，冯玉祥又这样问士兵。话音刚落，只听得吉鸿昌大声喊：“我们是洋人的军队！”顿时，全场骇然。冯玉祥很震惊，命卫兵将他带到台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答道：“听洋人的话，替洋人打仗，信洋教，为啥不是洋人军队？”冯玉祥又问：“你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怕洋人吗？”吉鸿昌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干么要怕洋人？”冯玉祥很赞赏，问其姓名，即令释去。次日，部队取消神甫制，又挑选精壮士兵数十人，成立学兵连，让吉鸿昌赴该连学习。

1917年，冯玉祥成立手枪队，吉鸿昌被提拔为手枪队的连长。1921年提升为营长。1924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奉军15万，进兵山海关，直系军阀吴佩孚命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迎战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面对前唯死路，后无生计的绝境，倒戈回师，于10月22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起义”），23日在北苑决定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转向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道路，“誓将为国为民效用”。1925年春，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同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都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长。当时，冯玉祥在张家口国民军总部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取名新材）大院开办了营以上军官轮训班，学习三民主义。吉鸿昌在这里结识了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侠父、陶新畲等，开始接受革命道理。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重振军威，组织国民军联军，并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时任五旅旅长的吉鸿昌率部为西北军先锋，从兰州出发，首先赶到西安外围，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于11月27日打败刘镇华镇嵩军，终于解除西安之围。五旅编为第十九师，吉鸿昌任师长。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出师潼关，数路东征，同南方北伐军呼应，夹击奉军。吉鸿昌率部取洛阳，克矾县，强渡黄河，占领新乡，一路打了许多胜仗，十九师被誉为“铁军”，吉鸿昌成为西北军有名的闯将。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急剧右转，特别是6月10日至11日冯玉祥、汪精卫郑州会议，6月19日至21

日蒋介石、冯玉祥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转向反苏反共，在其所辖区和部队中“清党”“送客”，将一大批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吉鸿昌由于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十九师暗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因而十九师番号被撤销，吉鸿昌被调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1928年秋任三十师师长，奉命赴甘剿匪。

1929年夏，吉鸿昌率部进入宁夏，任宁夏省主席。蒋介石想拉拢吉鸿昌，用飞机给他空投了“第九路军总指挥”的委任状。吉鸿昌气愤地撕毁委任状，说：“蒋介石和我们算是哪一门子亲戚？”他在自己的像片上写道：“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整顿军队，把原佟麟阁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第七军合编为第十军，自任军长。他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决心为民兴利除弊。这年年底到1930年初，第十军缩编，恢复第十一师，吉鸿昌重任师长。

从1930年4月起，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在河南、山东交战，十一师被调往前线作战，打破了吉鸿昌开发西北的梦想。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下野，其部队被蒋介石改编成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三十师师长，调往河南信阳。

这年底，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派遣吉鸿昌率部移驻潢川，进攻光山，商城一带的红军。吉鸿昌对于“剿共”虽然反感，仍然服从了命令，参加了对苏区的进攻。在与红军作战中，部队遭到挫败，这引起了他的深思：红军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他化装秘密进入苏区调查，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回部队后，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蒋介石派特务冷欣任二十二路军高级参议，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吉鸿昌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在苏区周围绕圈子，编造假捷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冷欣的密报，急调陈诚等十几个师的兵力逼近吉部。吉部决定在潢川马上起事。但遭到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等人的反对，起义计划失败。1931年8月，吉鸿昌被解除兵权、令其“出国考察”。他将要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请缨杀敌，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9月23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船，离开上海。

吉鸿昌先后到日本、欧美十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写成了《环球考察记》。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后，即乘船回国。于2月28日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按照党的指示，他北上天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8月，他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打算收集旧部，倒戈投奔红军。但不料原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或收买，或改编。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三十师一个团奔向苏区。但在中途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起义失败，只有吉鸿昌和少数人突围，进入苏区。在黄安县（今红安县）长冲，他们受到沈泽民，徐海东等人的热情接待。不久，吉鸿昌经上海秘密回到天津，组织抗日军队。他毁家纾难，拿出6万元购买武器弹药，同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电全国，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就任同盟军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以及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吉鸿昌率部出张家口大境门，到达张北县，于当日午后3时克复康保县城，缴获日伪军大批马匹及军用品。是时，日伪两军主力盘踞沽源、宝昌，严密布防。吉

鸿昌奉命率部冒连绵阴雨，忍饥挨饿，长途跋涉，向宝昌推进，于7月1日同伪军展开激战。吉鸿昌命令部队在合围宝昌之敌的同时，对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晓以大义，许多伪军士兵携械来归。薄暮时分，3000名伪军弃城北退多伦，同盟军一举收复宝昌、沽源，俘获甚众。

吉鸿昌在给总部的电报中表示：“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7月5日，他在沽源附近的大柳树村召集同盟军前线主要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进击多伦日军。7日，各路同盟军直捣日伪在热察的军事重镇——多伦。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他吟诗抒怀：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然而多伦城池坚固，敌人火力猛烈，同盟军进攻受阻。吉鸿昌赤裸膀臂，手提大刀、盒子枪，亲率敢死队匍匐前进，爬城3次。10日夜，吉鸿昌暗遣副官及精兵40余人，扮作客商，分批潜入城内，其中大部分扮成回民，分住城内五所清真寺中。12日子夜，同盟军乘天色黑暗，敌机敛迹之际，全线猛攻。吉鸿昌袒臂大呼，率部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潜入城内的士兵鸣枪响应，内外夹攻，与敌军巷战肉搏3小时，终于收复了沦陷72天的多伦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点，因而中外震惊，举国欢腾。至此，同盟军收复察东4县，自己阵亡312人，击毙日伪军千余人。全国各爱国抗日团体，以及朱正桥、蔡廷锴、李烈钧、程潜、蒋光鼐、李济深等力主抗日的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函贺多伦的收复，并踊跃捐助慰劳。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汉奸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相勾结，阴谋扑灭察哈尔的抗日烈火，命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围剿”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与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然而，在南京政府的高压逼迫下，抗日同盟军处境已相当困难，冯玉祥被迫于8月4日下野。

9月底，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下遭判失败。

吉鸿昌在押往北平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初，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秘密赴上海，王世英代表中共临时中央和吉鸿昌谈话，秘密举行了吉鸿昌的入党仪式，同年5月，吉鸿昌出面在天津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立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及“大同盟”内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他在天津法租界霞飞路40号住宅，成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不久，这里的活动被特务发现，他又在国民饭店开了房间，做为联络点。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枪击，臂部受伤，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11月14日，他被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关进五十一军陆军监狱。中共组织多方营救吉鸿昌，他的旧部一些官兵准备在吉鸿昌押往北平途中劫持囚车。吉鸿昌得知后，要求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1月22日，他被秘密地押解到北平。

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时，吉鸿昌大义凛然，把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的讲堂。何应钦问“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吉鸿昌义正辞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当问

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们党的主义和政纲而奋斗。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劳动群众、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说我们党是‘危害民国’，试问你们又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为了保护民国。”

11月24日，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走上刑场。就义前，他在刑场上用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了气壮千古的诗句：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写毕，他喝令敌人：“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并冲着执刑的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死，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的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怎样打死我。”他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1984年，在纪念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河南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事迹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

（据穆欣、胡华的文章整理）

披肝沥胆救中国

——记方志敏烈士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从东北伸向我华北地区。山河破碎，国难日深。1934年7月1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庄严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1月决定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方志敏伫立赣东北地区的高山之上，俯视着壮丽的山河，不禁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写文章表达自己要“从崩溃毁灭中，救出中国，从帝国主义恶魔的生吞活剥下，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而不惜“我这一条蚁命”。

方志敏1899年农历7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九区漆工镇塘湖村一个农民家庭。他8岁进私塾读书，5年后因家境不济，回乡一面劳动一面刻苦自学。1916年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五四运动的爆发，深深地触动了方志敏的心弦，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之中。1920年方志敏来到南昌南伟烈学校读书，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22年他只身到上海，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组织派他到江西工作，1923年3月在南昌经赵醒农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里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生命都交给了党。”

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方志敏在南昌等地组织农民进行减租和抗捐斗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选为江西省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长。1927年10月，他领导弋阳、横峰两县农民暴动。弋横地区纵横百里，到处红旗漫卷，捷报频传。当时赣东北各地传遍这样一首歌谣：“湖塘塌塌岭，出了方志敏。领导共产闹革命，都是为穷人。”后来他创建赣东北红军，攻占景德镇，转战各地。1933年，他代理闽浙赣省党委书记兼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方志敏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现在国难当头，中央任命他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他立即领导指战员誓师出征，奔向抗日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挥师北上，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振奋了民族精神。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不顾民族危亡，竟调集十几万军队包围抗日先遣队。

方志敏不畏强敌围追堵截，率领部队沿途给敌军以狠狠打击。在一个多月里，从赣东北打到长江的黄山脚下，占领了安徽的太平、泾县等地。1934年12月中旬，抗日先遣队到达谭家桥一带，遭到多我7倍之敌的围攻。方志敏指挥部队英勇反击，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敌众我寡，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牺牲，乐少华，刘英身负重伤。当时，战局的发展对我军极为不利，方志敏果断地率领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

1935年1月中旬，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了敌人一道道围堵，迂回到赣东北的怀玉山区。在过敌人封锁线时，遭敌突然袭击，部队被打成两截。前一截800多人在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率领下，冲出封锁线回到了根据地。后一截主力部队，因刘畴西、王如痴指挥失当而被敌人重重包围。当方志敏冲进封锁线重新找到部队时，队伍只剩下2000多人，被敌军14个团包围在很小的狭长地区。方志敏立即把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千方百计与敌人周旋。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部队始终未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最后只剩下 80 余人，并且已经七天没有吃饭。部队处于绝境，方志敏心如刀绞。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与敌人拼一死战。由于叛徒的出卖，1935 年 1 月 24 日，方志敏在怀玉山密林中不幸被捕。

方志敏被捕后，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劝降，用“接风”酒宴、金钱美女来软化方志敏的斗志，方志敏不屑一顾。敌人劝方志敏“悔过”，方志敏表示“笃信共产，至死不渝”。敌人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把方志敏押上大堂审讯，方志敏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痛斥国民党的滔天罪行。敌人软硬的办法失败后，只好给方志敏戴上十几斤重的脚镣手铐，并对他鞭笞、铜烙，方志敏虽几经昏死，却毫不屈服。

2 月 2 日，敌人把方志敏押到南昌监狱。

在狱中，方志敏仍然念念不忘党的工作。他利用敌人要他写“供词”的纸和笔，不顾身体虚弱和咯血，在昏暗的牢房里抓紧时间写作。他立下誓言：“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从春到夏，方志敏用自己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写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的序言、《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几十万字文稿，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化成血写的文字，献给党和人民。

在狱中的一天，方志敏偶然从敌人包东西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毛泽东领导红军在贵州遵义地区歼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八个团的消息，兴奋得通夜难眠。于是，他在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地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蒋介石见方志敏坚贞不屈，下了“秘密处死”的命令。1935 年 8 月 6 日清晨，方志敏慷慨激昂地高呼着口号，走向刑场……

方志敏虽然壮烈牺牲了。但他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功绩，率军北上抗日的精神，用血写下的雄文，永留人间！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张知、舒毅撰写）

南满抗日先驱者 ——记李红光烈士

1932年春，在通往吉林省呼兰镇的崎岖山路上，出现了7个骑马人。他们走出一道山口时，最前面的那匹黄骠马，一声长嘶，减慢了速度。李红光就骑在这匹马上，他勒住马缰，眺望远处山脚下呼兰镇内上升的炊烟，招呼6名战士：“目的地快到了，就在这里换换打扮吧。”

他个头不高，面庞清瘦，眸子很亮，那线条分明的嘴角，为他平添了一分早熟和刚毅。他于1910年出生在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丹洞的一个贫农家庭里，1918年，正在读书的李红光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随着父母来到中国吉林省伊通县。李红光咀嚼着受奴役受压迫的苦味渐渐长大了，对家人说：“我们朝鲜祖国沦陷了，第二故乡中国也受日本鬼子凌辱，此仇不报我愧对这两个祖国啊！”1930年，李红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斗争。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奉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组成磐石县第一支抗日武装——由他任队长的7人“打狗队”。

看看日头快要落山了，李红光换上一件羊皮袄，又拿了顶旧毡帽往脑门上扣，袖着手吆喝道：“狗皮牛皮黄狼子皮，好皮色卖个好价钱，家有存货别耽搁，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

李红光牵着马，带着几个伙计打扮的战士，朝山下走去。他们要去的呼兰镇是吉林省中南部半山区磐石县的一个重镇。日伪军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所谓“保民会”，扶植当地的汉奸恶霸在村屯中筑土堡，设路障，公开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群众骂他们是“二鬼子”、“日本人的狗”。李红光组织的这支“打狗队”，就是专门对付这些“狗”的。这天夜间，他们把呼兰镇几条“狗”捉住了。

李红光就这样常带着战士，以收皮货为掩护，走村串户动员群众抗日，同时伺机出击掏“狗窝”。打狗队在不长时间里消灭了50多个汉奸走狗。

1932年4月3日，李红光等同志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在磐石县蛤蟆河子地区召开上千人的反日群众大会。李红光站在土台上，高声说道：“今天公审，是群众对汉奸的公审，是正义对邪恶的公审。乡亲们说，对这些家伙咋处理？”

黑压压的会场里响起了一阵炸雷般的怒吼声、痛骂声，还夹杂着呜呜的哭泣声。经过公审，处决了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狗”。

会后，李红光趁热打铁，率领群众举着红旗，拿着棍棒，扛着锹镐，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示威游行，而后把吉海铁路老爷岭一段的铁轨，全翻到了河里，还烧掉了枕木和沿线的电杆、电线，破坏了桥梁。

轰动整个东北的蛤蟆河子暴动后，李红光的“打狗队”队员剧增，武器也多了。1932年5月，经中共磐石县委批准，“打狗队”改名为“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游击队成了南满抗日的革命火种。

1933年初春。一场大雪过后，李红光和两名战士从密营出发，乘马爬犁接来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杨靖宇。

杨靖宇是他的上级，也是他的兄长和密友。杨靖宇到来，着手将磐石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杨靖宇任政治委员。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他随杨靖宇在南满各地点燃抗日烽火。

有一次，日军的一个中队带着两个连的伪军向游击队根据地“讨伐”。李红光说：“敌人比我们多几倍，武器又好，我们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我们不在正面同敌人硬拚，而是待敌人疲劳时，进行骚扰，伺机歼灭它。”这一作战方针得到杨靖宇和队员们的赞成。

敌人来到游击队的住地后，一连两天都没有看到游击队的影子；然而到了晚上，游击队十几个战斗小组轮流在鬼子宿营地周围放冷枪，使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到了第三天午夜，接到反日会员报告：敌人已经出发，伪军在两头，日军在中间。

李红光在左右山头各埋伏一部分队员，主要是喊话攻心。中间山头部署主力，他亲自指挥，集中力量消灭日军。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李红光鸣枪为号，两边山上一齐向日伪军开了火。两头的伪军乱成一团。当中日军嚎叫着往山上攻，被游击队打死不少。等日军攻上山头，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了。游击队这样不断打击日伪军，并在胜利中壮大到 300 多人。

1933 年 9 月，磐石游击队与几支抗日武装汇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师参谋长。独立师成立大会开得很热闹，李红光指挥大家唱起了歌：

周旋在大森林，出没于青纱帐：
我们战斗在南满战场；
出敌不意，英勇顽强，
我们的队伍越战越强……

1935 年 5 月，金达莱一簇簇一团团绽开了。一天，李红光按杨靖宇的指示，率领第一师师部少年连和五团共 200 多人向西出征，准备去本溪、桓仁等地扩建骑兵队。队伍行至兴京县橙厂东面的老岭，突然遇到从橙厂方向开来的 200 多名日伪军。双方不期而遇，激战了 4 个多小时，各有伤亡。正当李红光举着望远镜指挥战斗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他的胸膛，他沉重地倒下了……战斗结束后，战士们把李红光的遗体抬到宿营地。

李红光牺牲时年仅 25 岁。毛泽东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在长白山密林里，杨靖宇悲痛地说：“李红光是难得的将才，他的死是我军的重大损失！”南满人民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成立了“李红光支队”。这支队伍继承李红光的革命精神，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梁平、陈伟力撰写）

碧血映日天地红 ——记赵一曼烈士

蜀中巾帼富英雄，
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
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
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
珠河亿载漾东风。

这是郭沫若在1962年4月9日为纪念和歌颂赵一曼所题写的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章。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一超，赵一曼是到黑龙江省珠河抗日游击区工作时的化名。她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2月进入宜宾城里女子中学，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参加领导宜宾地区学生运动，先后当选宜宾学联常委、宜宾妇委主席、宜宾学联妇协党团书记。这年底，经党组织同意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入伍生总队政治女生大队。1927年9月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同学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回国，先后在上海、江西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赵一曼等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1932年秋天，她到哈尔滨担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以后又兼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1933年4月2日晚上，她领导电车公司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她的文学素养也很好，为启发工人、妇女们觉悟，她常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在总工会办的刊物《工人事情》上发表。

1934年春天，哈尔滨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总工会党团书记曹在去一个秘密地点开会时不幸被捕，牺牲在狱中。赵一曼的处境也很危险。满洲省委决定，让她去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县（今尚志县）赵尚志所在的抗日游击区工作。

7月间，赵一曼化装成农村妇女，由派往游击区的工人老魏和医生张险涛陪同，一起去珠河。

当时抗日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地方党组织通过关系，从伪军手里买了十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但由于盘查紧，运不出来，县委的同志们都很着急。这时，担任县委委员、妇女会负责人的赵一曼主动要求去完成这一艰险的任务。她带着一姓沙的姑娘，化装成走亲戚的样子，进了珠河城。接上关系后，赵一曼到街上转了一圈，观察情况，想着对策。这时有一辆拉大粪的车慢慢悠悠地走过来，她猛然心一动，眼睛也亮了，暗自在心里说：“有办法了！”她赶忙回到住处，与地下党的同志进行研究。他们把武器弹药用油纸油布包好，找了一辆大粪车，把东西放在粪厢里。赵一曼和沙姑娘与粪车相距几十

此句指明末清初四川省石柱县抗击过清兵的女将秦良玉，是与赵一曼烈士相比拟也。郭沫若又解释说：秦良玉和赵一曼不能划等号，因秦良玉有消极的一面，打过农民起义军。

步，跟着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城门。

赵一曼还想方设法去缴敌人手里的枪。当时在通往帽儿山车站的公路上，每隔五六里路就有一个警察哨所，每个哨所有五六个警察，有一部电话互相联系，赵一曼带着几个人一夜之间就机智地解决了几个哨所，缴枪 20 多支。

1935 年 1 月，哈东抗日游击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赵一曼随第三军一部分队伍来到滨绥铁路北侯林乡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她担任铁北区委书记。她动员铁北区青壮年农民组织起一支 20 多人的武装自卫队，打击日伪军。

一天，日军一个小队到铁北区的关门嘴子来“讨伐”。赵一曼把自卫队埋伏在敌人必经的山路旁。中午，日军从珠河县城向铁北区奔来。她等敌人走进伏击圈，大喊一声“打！”自卫队的快枪、土枪一齐开火，日军官从马上摔下来，敌兵大乱。她挥动驳壳枪，带领队员猛扑上去，把敌人杀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兵，缴枪 20 多支。

赵一曼在铁北区创建的这支游击队，常配合第三军的主力部队作战。有一次，三军一师二团被两个营的伪军包围，激战了半天也突不出去。赵一曼得到消息后，带领游击队赶到，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打乱了敌人，二团立即组织反击，胜利突围。

这年秋天，赵一曼按县委决定，把游击队编入第三军新二团，自己兼任二团政治委员，王惠桐为团长。

1935 年 11 月 14 日，她与团长带 50 名战士在珠河西安山屯一带与敌周旋。不料被坏分子向敌告密。15 日晨，他们被日伪军包围。赵一曼发现两个日军军官在指挥进攻，便喊另一个战士：“瞄准那两个举刀的家伙。你打右边的，我打左边的！”“啪！啪！”两个鬼子官身子一仰，滚下山去。

夜色降临，赵一曼和王团长组织部队突围。她先掩护王团长带大部队突出去了。尔后，她带几个战士战斗到最后才决定转移。赵一曼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借爆炸烟雾，趁势滚下山谷……

这场血战，二团共击毙日军古谷清一大尉等日伪军 30 多名。二团损失也很大。赵一曼左手腕负伤滚下山谷后，为铁北区委宣传部长周伯学、战士老于、妇女会员杨桂兰和交通员刘福生等 5 人会合，到小西北沟一个窝棚里养伤。6 天后，他们的行踪被特务发现。11 月 22 日晨，伪珠河县警务科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带 30 名警察偷偷摸到小西北沟来。他们来不及转移，立即射杀敌人。战斗持续两个小时，赵一曼左大腿骨被敌弹打中，不幸被捕。

敌人千方百计、软硬兼施，要赵一曼屈服。她忍受敌人折磨和伤痛，至死不屈，亦不暴露姓名和身份。

敌人为了得到重要“口供”，于 12 月 13 日夜里，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第一病房（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并派南岗警察署管内邮政街派出所警士董宪勋、范迪民等，进行监视治疗。

经过爱国医生张柏岩三个多月的治疗，赵一曼的腿伤好转，已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敌人见她伤好，为了便于审讯，于 1936 年 4 月上旬，把赵一曼从人多的大病室换到单人的第 6 病房第 2 号室。赵一曼感到这个环境很有利，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同情者。

赵一曼经过精心挑选和深入的说服教育工作，争取到看守警察董显勋和女护士韩勇义的支持。

为早日脱离虎口，赵一曼和小董、小韩在病室里进行了多次密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由于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市内出租汽车又不去外县，董宪勋特到轿房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

6月28日午后，韩勇义交给董宪勋一部分钱雇车、雇轿。当晚9时，他俩把赵一曼背出医院后门，坐上雇来的小汽车，开到郊区文庙附近。赵一曼又坐上了已经等在那里的小轿子，由5名轿夫抬着，在大风雨中向东奔去。途中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过了阿什河，于第二天早晨来到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董无策家里。由董无策帮助，当夜他们又坐上该村爱国群众魏玉恒的马车，奔往游击区，寻找地方组织。

6月29日晨，敌人发现赵一曼不见了，伪哈尔滨警察厅立即撒开人马四处搜查。他们知道赵一曼腿伤未好不能行走，必定得坐车，于是对汽车、马车加紧盘查。折腾了一天，找到了载过赵一曼的白俄司机，接着又查到小轿铺子的轿夫，知道了赵一曼的去向，于是连夜追捕。

6月30日晨，赵一曼她们走到离游击区只有20多里地的李家屯附近，不幸被敌人追上，赵一曼又落入敌人魔掌。

她被带回哈尔滨后，关进警察厅的拘留所里（今东北烈士纪念馆院内）。警察厅特务科的日本大特务、特高股长、警佐林宽重（外号林大头）亲自出马审讯赵一曼。凶手们施用了各种酷刑，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董宪勋受刑过重死于狱中；韩勇义在被审讯期间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敌人对赵一曼进行了一个月的审讯和调查，什么也没得到。7月末，伪滨江省警务厅决定把赵一曼送回她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凌晨，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的火车，她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心情反而更加平静。敌人的一份“报告”曾有如下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一曼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感人情景：“在押送的途中，她虽然感觉到死亡迫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宁儿写一封信，从押送的职员处要了纸笔，写了遗言。

珠河城里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沿路高唱《国际歌》《红旗歌》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热泪，心中燃烧着对日寇的怒火。马车来到小北门的刑场，两个特务来架她，她推开了。她移动因伤痛而艰难的脚步，迎着灿烂的阳光向前走去。她举起右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一阵杂乱的枪声中，党的忠诚女儿、杰出的爱国者、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了。她以31岁的年轻生命和壮烈的战斗历程，谱写了一曲光辉的生命之歌！（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温野撰写）

宁死不屈女军工 ——记安顺花烈士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午，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一带的山峦和树林里，一位年轻的朝鲜妇女，在蜿蜒的山道上踏着厚厚的积雪“咔、咔、咔”地赶路。她，就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缝纫队队长安顺花。

冰封的山道，行走困难。寒冷的天气，给人增添了阴郁的气氛。安顺花的耳畔又响起了团政委送行时说的一段话：“战争将越来越严峻而残酷。根据‘分散扎营，保存力量’的原则，部队将向南转移，进入原始森林。团党委考虑到缝纫队都是女同志，没有作出统一转移的要求。你到队上可以动员大家先回家，等情况好转再回来。如果队员们决意随队转移，一定要做好转移的准备工作……”

“回家？我的家在哪里？”安顺花一阵寒颤，脚步也放慢了。此刻，她平生第一次认真地想起自己的家来了……

她1909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瑞川郡农家。15岁时，父亲将她嫁给李凤珠为妻。婆家也一贫如洗，她和丈夫一家离乡背井，从朝鲜来到中国吉林省，当了琿春县东炮台的佃农。然而，日本侵略者也在蹂躏着中国东北大地，她们暂时的栖身之地也不安宁。

1930年10月，安顺花和丈夫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会”，组织上让夫妻俩担负通信联络工作。次年1月，她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名朝鲜籍女党员。1932年4月，安顺花的丈夫李凤珠被党组织调到金区党委工作。敌人加紧了对她及其一家的监视，处境很危险，组织上决定她到烟区游击队去。她毅然带着公婆和两个孩子投奔了游击队。

1934年4月，安顺花带领的缝纫队跟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开始了艰辛的军工生活。从琿春到汪清，从金仓到宁安，频繁的转移，紧张的生产，历尽千辛万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次，只有8位缝工的缝纫队接受了两天内赶制几十套军装的任务。又赶上敌人的大扫荡，只好把缝纫机搬进芦苇荡里。她带领大家泡在一尺多深的冰冷的水中争分夺秒地战斗，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带在身边正在发烧的不到一岁半的小儿子。突然，苏醒过来的小儿子大声地啼哭起来。糟糕！日本鬼子在芦苇荡外巡逻，暴露了目标就什么都完了。她为了缝纫队的安全，立即拿块破布把孩子的嘴堵起来，低声地说：“你要把日本鬼子喊来呀！”后被同伴金贞善发现，把破布掏了出来，但孩子终因疾病和堵塞过久，离开了人世……

她是一个富有感情的女性，爱丈夫，疼孩子，孝顺老人。但强烈的军工责任感，使她坚强地压制着悲痛感情。那是烟区大捷的日子里，部队人员大增，上级要她们缝纫队一周内完成500多套军衣。虽然缝纫队也增加了不少工人，但要按时完成任务困难很大。正在这时，家中捎信说公公病重，二儿子因没有鞋子穿冻伤了脚。同伴们劝她做双鞋，顺便回去看看，可她说：“新入伍的抗联战士等着衣服穿，我怎能回家呢？”她照样投入了紧张的生产。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走东家，串西家，发动老百姓协助缝纫队赶制军装，还动员了不少男战士帮助缝扣眼。结果，任务按期完成了，可家中的噩耗也传来了：在一次大扫荡中，公公、婆婆和二儿子都被敌人杀害了，她在中国的家也不复存在了！

想到这里，安顺花的眼睛模糊了，连出现在眼前的缝纫队驻地几乎辨不

清了。

“安姐回来了！安姐回来了！”姐妹们像往常一样，向她们的队长问个不停。她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团党委关于随主力向原始森林转移的命令。

“安姐！没有缝纫队，抗联战士穿什么？光着屁股冻死啊？你还是带着我们随部队一块走吧！再苦也吓不倒我们……”

“安姐！你这个朝鲜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什么都不怕，难道我们中国人有脸当怕死鬼吗？你就放心地带着我们走吧……”

安顺花望着姐妹们，所有的担忧与悲伤全没有了。她含着热泪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我的好姐妹，让我们拧成一股绳，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吧！我相信胜利是一定会来到的。”

明天就启程了，姐妹们劝安顺花去团卫生队，向她在卫生队担负领导工作的丈夫李凤珠告别。当晚，夫妻见面，安顺花从丈夫口内得知了大儿子李柱浩和收养他的大娘，昨天被日寇杀害了。安顺花如雷轰顶，头晕目眩，两腿发软。半晌，才不顾一切地扑向丈夫怀中，叹息自己不幸的命运……

她结婚15年了，经历了四次分娩的痛苦。可两年内四个儿女就都在抗日的艰苦环境中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了（小女儿也是在一次反讨伐中死去）……

安顺花心疼儿女，痛恨日本强盗；默默悼念儿女，决心抗日到底。

她把明天随部队向原始森林转移的事告诉了丈夫。丈夫安慰她，鼓励她，捡了一些药物包好，递给她。她向丈夫默默地点点头，忍痛含泪而别。

回到缝纫队，军工姐妹们已进入出发前短暂而宝贵的梦境。安顺花再次仔细地检查了一捆捆布匹和缝纫工具，便在昏暗的烛光下摊开那张印制粗糙而发黄的地图，用手指仔细地在上面缓缓移动，用哭干了泪水的红肿眼睛认真地辨别着上面的山岗、森林、村落和敌人的据点……

清晨，天还没有怎么亮，山峦和丛林仍然被浓厚的雾霭笼罩着。一支由几十名女军工组成的缝纫队，踏着冰霜出发了。走在这支队伍前面的正是队长安顺花。缝纫队小心翼翼地前进。夜幕降临了，山野变得异常寂静。安顺花率领的缝纫队同严寒、饥饿、疲劳搏斗了整整一天后，终于在宁安县头道沟安营扎寨。

此时，是她们安全工作的时机。她们不顾疲劳地布置了生产场地。半个小时之后，缝纫机开始转动，裁剪员在平坦的石板上开始剪裁，染整员架起了铁锅开始染布。安顺花是个多面手，处处都有她忙碌的身影。论剪裁，她是队里当之无愧的技术权威。无论男女战士，无论体型是否特殊，只要在她跟前一站，就可裁一套合体的衣装。

由于她工作出色，她的名字被列入东北抗联的军工史册，她领导的缝纫队被誉为“出色的缝纫队”。

1937年3月26日清晨，哨兵跑来向安顺花报告：敌人来了，她立即组织大家把粮食、布匹、弹药和缝纫工具，埋藏在两米多深的山涧积雪下面，然后向山顶撤退。

大约九点钟，天飘起雪来。大雪给她们行军带来困难。敌人的喊叫声越来越大，枪弹打在树干上，枝条乱飞。安顺花完全了解眼前的处境，要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已是十分困难了。在这万分紧急之时，她毅然决定引开敌人，保存缝纫队。

安顺花命令大家继续向山顶撤退，自己向另一个小山坡的一片丛林跑去。队员们不愿丢下自己的队长。尽管她严厉命令她们快撤走，裁剪员金贞

善还是决意留在她身边。她俩故意露一点目标吸引敌人，来到丛林一片洼地向敌人开了枪。随后跑向另一片丛林深处。日寇终于朝她俩追来了。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贞善。安顺花拖着金贞善奋力向前爬行，在一颗“美人松”下将她掩埋在一个小坑里。安顺花继续和鬼子周旋。当她看见几个鬼子在不远的空地上嚎叫时，扣动了扳机。可是，枪膛里的子弹已经打完了。她把枪埋进雪地后，直奔东南方的一座岩洞。

没跑多远，敌弹打中了她的双腿。她来不及包扎，使出全身力气朝前爬行，鲜血染红了雪地。

呼呼的寒风，像一把软钳子似地夹住了安顺花的双腿，她实在无力动弹了，躺在刺骨的雪地上昏了过去。

“把这个活共产党带走！”一阵野兽般的喊叫和狞笑声，使安顺花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一看；周围是一群张牙舞爪的敌人。一个汉奸拿张画像对着日寇比划着说：“她就是缝纫队队长安顺花。”

敌人把安顺花带到缝纫队的营棚前，进行轮番地惨无人道的审讯。

“衣服埋在哪儿？只要你说出来，保你一条命。”汉奸们吼叫。

“你们是中国人的败类，活着还不如一条狗！”安顺花怒斥道。

日本军官乱吼几声，几个鬼子和伪军把安顺花的头发使劲撕扯。那波浪一样卷曲的头发一把把散落在雪地上……

日寇见安顺花只字不吐，恶狼般撕掉她的上衣，残忍地砍掉了她的双手——这双为人民革命军战士做过无数件军装的灵巧的手，迸溅着鲜血，落在雪地上……

安顺花再次苏醒过来时，残忍的日本军官吼叫：“军衣埋在哪儿？”安顺花面无惧色，两眼冒出愤怒的火星。日寇疯狂地叫起来：“钉木楔子，送她上西天！”

刽子手们挥舞着削好的木楔子，扑向安顺花。一根，两根，三根，四根……直钉向安顺花的胸部和腹部。

一棵青青的挺拔的长白山美人松折断了，倒在冰封的雪地里。

两天后，安顺花的同伴们来到了她的身边。她们不忍看被强盗糟踏后的惨状：她苍白的脸像大理石，双眉由于极度痛苦而紧紧地皱着，冰霜染白了她的眉睫，几缕轻柔的卷发在寒风中抖动，四根木楔子竖在她僵硬的腹部……她仰卧雪地，仿佛沉睡在梦中，两眼直直地盯着南方那片高高的天空。在那个方向，有她的亲人……

同伴们给安顺花穿上新装，盖上了一面缝纫队的队旗，缓缓地把她抬到埋过缝纫机和军装的土坑里，默默地安葬了她们永生难忘的领头人。这位年仅29岁的朝鲜籍抗联战士，从此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30年后的一个春天，朝鲜劳动党抗日战绩考察团来到中国。在深情地寻找安顺花踪迹的人群中，有一位鬓发斑白的将军。他就是考察团团长、安顺花的丈夫李凤珠。

这位老将军步履沉重地来到安顺花英勇就义的丛林里，伫立良久，沉浸在深长久远的追忆寻觅之中，仿佛又看见那张蜡黄消瘦的瓜子脸，那血迹斑斑的躯体；又听见了那温婉而沙哑的声音，那轻微而沉静的呼吸……

安顺花的名字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成为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情谊的见证！

（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稿李来梓撰写）

“猛子”威震平型关 ——记曾贤生烈士

曾贤生，地道的庄稼汉出身。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那当儿，他就是游击队长刘亚楼的警卫员；后来参加了名震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的大战，他腰插驳壳枪，身带大刀片，是伏击部队——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五连连长，外号“猛子”！那次战斗中，八路军以身殉国的英烈中，他是职务最高的一位抗日民族英雄。那年秋天，卢沟桥战事爆发，国民党守军在日寇的疯狂进犯下南退。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等战略城市和雁北13县，时间不长就被日寇占领了。日本侵略军气势汹汹，一面沿津浦、平汉两条铁路南下，一面重兵进犯山西。

这时，由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改编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战员背负着人民的希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9月中旬，开入晋北五台山区。沿途逃难的老百姓站住了。大家自动组织起来，聚集在车站、村头和路边，烧茶送水，慰问上前线杀鬼子的部队。

一群东北流亡学生走过来，听说曾贤生是一连之长，拉着他的衣袖就哭诉起日寇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暴行来。有个学生泣不成声地说：“求求大家，一定要为惨死的爹娘报仇雪恨呀！”

目睹河山破碎、难胞流离失所的惨况，曾贤生持枪举臂，领着全连庄严宣誓说：

“请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放心！我们八路军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为同胞手足报恨雪仇，不消灭日寇决不罢休！”

9月23日上午，一一五师师部在上寨村小学的土坪上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师首长讲话说：根据侦察，日本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已经占领灵丘，正企图西窜，会同大同南下之敌夺取太原。各种迹象表明，鬼子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一线移去。从地形上看，自平型关口到灵丘的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窄山沟，长约二三十里。敌人一旦进来就很难出去。我们师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这一天险，在这一带地区，埋伏一支神兵，布置一条口袋，给日寇一个打击。等这条毒蛇全部钻进夹山公路的葫芦套以后，出其不意，从侧后袭击，截头，断尾，打伏击，全部、干净彻底消灭这股敌人！

曾贤生兴奋极了。大会刚散，他便同指导员一起召开党支部大会，代表全连向营、团党委递交请战书，坚决要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五连。为了表示决心和意志，他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铿锵的誓言：“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

当晚，连队随主力奔赴相距平型关只有30多里的冉庄，进行战前准备。这时，上级党委决定曾贤生所在的团为全师伏击部队的第一梯队，曾贤生的五连为断绝鬼子退路的后卫连。

杨勇副团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头说：“猛子啊！如果说我们伏击部队是把尖刀的话，那么，你们后卫连就应该是这把尖刀上的刀尖。”

战前，曾贤生把20多个五大三粗、勇武超群的战士组织起来，每人发一把大刀，几颗手榴弹，编成一支敢于冲锋陷阵的大刀队。他搬来石头，同他们一起磨刀，一起研讨战斗方案。

24日深夜，师部下达了秘密进入白岩台一线埋伏的命令。曾贤生接到通知，立即率连队随团队紧急出动。天空乌云密布，大地一片漆黑，荒凉冷清的秋夜死一般沉寂，只听战士们沙沙的脚步声在快速流动。突然，迎面吹来冷嗖嗖的山风。一道闪电劈过，头顶响起隆隆的雷声。立时，滂沱大雨倾泻而下。更为糟糕的是，在此秋末时分，山西北部常常雨后成雪，气温骤降。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山区雨量过大过急，险恶的山洪竟猛然暴发，眨眼之间，泥沙乱石随着洪水汹涌咆哮而下。曾贤生当机立断：“全连注意！把枪支子弹袋挂在脖子上，以班为单位，手拉手快速通过激流！”

军情紧急，命令如山。战士们胳膊挽着胳膊，你挽着我，我扶着你，互相拉着拽着冲过洪流。鞋冲丢了，脚碰伤了，人们仍奋勇争先。经过大半宿艰苦跋涉，全连于25日凌晨到达指定地段，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隐蔽阵地，抢修好了战斗工事。

这时，全师主力也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十余里沟道东南侧的山地一线埋伏完毕。指挥部又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一个高地，以便断敌后路，造成两面夹击之势。

天边微微露出曙光，秋雨悄然而止。拂晓，日军8架飞机低空掠过，上午，远处山沟里渐渐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曾贤生和战友们立刻警觉起来。往下看，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辎重部队和后卫部队，在日本旗引导下，分乘100余辆4轮大卡车和载重汽车，浩浩荡荡直奔狭谷而来。200多辆装载军用物资的大车，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群，在一队骑兵的护送下，也尾随其后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远远望去，车水马龙黑压压、密麻麻连成一片，挤满了10多里长的狭窄山谷。

敌人越来越近了。俯瞰下去，日军旗子上的“武运长久”几个黑字已清晰可辨。汽车里和马背上的日本兵，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黄大衣，脚踏大皮鞋，有的手执三八大盖枪，有的斜背枪支，脸上一副骄傲狂妄神态。

曾贤生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他吐了口唾沫：“呸，先别神气，好戏还在后头哩！”

薄雾散去，天色渐朗，云影山光笼罩着战地上空。进犯的4000余名日寇已全部钻进八路军预伏部队的口袋阵内。这时，团通信员利用沟沟坎坎的掩护跑来，说：“团首长命令你们，收紧口袋底，不许日寇一兵一卒逃出伏击圈。”

“是！”

师指挥所发出总攻命令！曾贤生高举驳壳枪，一跃而起：“目标——干河滩敌人后卫车队，冲啊！”

截头，断尾，打伏击的战斗开始了！五连战士犹如猛虎捕食扑下山去。机枪弹、手榴弹雨点般飞向敌群。伏击部队所有轻重武器这时也一齐开火。长蛇似的敌阵，一下被切成若干小段。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山炮的轰鸣声，英雄健儿们的呐喊声，惊天动地震撼山谷。但见硝烟弥漫，火光冲天，10多里长沟，瞬息间成了一条烈焰熊熊的火龙。汽车上的鬼子，猝不及防，一个个连滚带爬地跌下车来，逃的逃，躲的躲，哭的哭，嚎的嚎。

一小队鬼子见势不妙，妄图夺路而逃。他们凭借山沟以北有利地形，集中机枪火力将五连压住，冲到最前头的一些战士不幸倒下了，曾贤生的右小臂也突然中弹挂彩，鲜血浸湿了他的衣袖。日军指挥官张牙舞爪，又督促士兵向五连发起反冲锋。曾贤生顾不得伤痛，命令一班从左侧坡地迂回上去，

封锁住敌人退路。一阵手榴弹爆炸后，敌人的机枪哑巴了，两次反扑都被五连英雄们击退。

这时，曾贤生眼瞅敌人 20 多辆卡车连在一起，几百名鬼子挤成一堆，其中还有将级军官，正是集中火力歼敌的大好战机。他一声怒吼：“机枪——手榴弹打！”

一阵巨响，敌人被炸得车仰马翻，尸横遍野。但见人挤人，车碰车，马踏马，炮撞炮，日本兵挤成一堆，乱糟糟拥作一团。敌人阵势就像被烈火烧着的野蜂窝，被沸水浇着的蚂蚁群，闹哄哄，乱腾腾。日本兵们丢盔卸甲，狼狈不堪。

可是，几十名受过武士道精神熏染的敌人，拼命负隅顽抗。几个官佐也舞动指挥刀在后边督战。鬼子们端着刺刀，组成一列人墙，咿哩哇啦地吼叫着，向五连勇士们挤压过来。

面对残敌的拼命气焰，曾贤生手举枪响，首先撂倒了挥舞日本旗的一名少佐；又倏地把驳壳枪往腰间一插从背后拔出大刀。

一声长啸：“大刀队——上！”

勇士们听见口令，剑眉倒竖，虎眼圆睁，人人用足了力气，个个抡圆了臂膀。一霎时，刀飞、影闪、杀声雷鸣，削铁如泥的大刀片，纷纷对准鬼子们的脖颈和后脑勺猛砍下去。手端步枪的健儿们龙腾虎跃，同敌人展开了刺刀见红的殊死搏斗。一场恶战，只杀得鬼子兵鲜血喷溅，人头落地。

曾贤生夺过一把三八大盖枪，同敌人厮杀在一起。几个鬼子围着他团团乱转，哇哇怪叫。曾贤生虎威大震，左右刺杀，一气劈倒了近前的几个鬼子。

不料，这时后面又上来 3 个敌人。三把带血的刺刀同时伸向曾贤生前胸。曾贤生横眉冷对，铛铛两下拨开两把刺刀，猛一个有力的突刺，左边的鬼子应声倒下了。说时迟，那时快，曾贤生回身一刺，右边的鬼子也被刺中心脏，嚎叫了一声瘫倒在他脚下。第三个鬼子慌忙跳到曾贤生背后；曾贤生一见急忙猫腰，缩小形体转身迎敌，不想脚下闪失，鬼子的刺刀穿进了他的小腹。他强忍巨痛，身躯用力往前一挺，不等对方拔出刺刀便“杀——”地一声咆哮，抡起枪托，瞄准鬼子脑门儿狠狠砸去。当下，鬼子脑浆迸裂，血花飞溅，呜呼哀哉了。伏击战进入白热阶段，拼杀越来越激烈。勇士们刺刀卷刃了，便用枪托狠砸日寇头颅；枪杆劈断了，便拳打脚踢，用牙撕咬，死死缠着敌人，严惩敌人。仅仅 20 多分钟，河滩里的几百名日本官兵全被五连勇士们消灭。然而，五连也死伤惨重，牺牲过半。

平型关大捷的捷报传向四面八方。此役共歼灭日军 1000 余人，缴获步枪 1000 余支，机枪 20 余挺，击毁汽车 100 余辆。这是全国抗战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打扫战场的时候，人们望见曾贤生一手紧握枪杆，一手捂着小腹，虽已气绝身亡，仍然怒目灼灼，死盯着惨死在他刀下的鬼子。战友们还发现：在他那军衣口袋里，那张用手指蘸着鲜血题写的决心书中尚紧紧地包裹着没来得及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何畏撰写）

飞兵夜袭阳明堡 ——记赵崇德烈士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里，记载着一次震惊中外的特殊战斗和一位智勇兼备的民族英雄，这就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出征抗日第一仗——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战斗和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指挥员——七六九团三营营长赵崇德。

赵崇德是河南商城余子店人，1914年4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他带的部队善于奔袭夜战，常取得以智克敌、以少胜多的战果，上级曾授予他们“以一胜百”的锦旗。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赵崇德担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营营长，9月誓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0月16日，七六九团急行军进抵山西省原平县东北、阳明堡以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以战斗姿态展开，寻机对日军作战。

陈锡联团长遵照刘伯承师长在行军途中的指示精神，部队部署就绪之后，各级领导分头进行敌情侦察、社会调查以及走访后撤国民党军的活动。在部队进行备战的同时，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从滹沱河顺河南下百里便是忻口。敌机不断向忻口方向飞来飞去，经过调查证实，去苏龙口以北十多里的滹沱河以西阳明堡西南有座飞机场。此机场是阎锡山1935年开始筹建，1937年9月建成，土质跑道，设备简陋，飞机的燃料和弹药，均贮存在机场附近的下班政村。被日军占领后经过抢修扩建，作为向崞县、原平、忻口和太原出击的临时机场，是日军后方基地和空中转运站。

10月19日早饭后，陈锡联团长以及各营的指挥员，都化装成老百姓，从驻地出发，沿着滹沱河的山沟向机场方向隐蔽前进，实施现地侦察。他们登上山顶，从望远镜里，将阳明堡机场内飞机的位置、四周的地形、工事的构筑、进出的道路、守军的营房，及每一个目标，都侦察得清清楚楚，一一记在本子里，标在地图上。此外，还从一位从机场逃出的劳工口里，了解到有关阳明堡机场内外的许多重要情况。

中午，陈团长召开作战会议，经研究决定当机立断，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夜袭阳明堡机场，打它个稀巴烂！拔掉这个‘钉子’！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任务，由三营担任，赵崇德营长具体指挥。

接着，他又布置一营配合三营行动，破坏崞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桥梁，阻击增援之敌。二营（欠七连）为团预备队，随团指挥所行动，并以八连破坏王董堡方向之公路、桥梁，确保三营侧后安全，团属迫击炮连、机枪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随时准备支援三营战斗，团指挥所和团预备队，配置在苏龙口北侧地区。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上述作战方案。随后，陈团长下达了夜袭阳明堡机场的作战命令。

下午，汪乃贵副团长带领三营的营连干部，化装成机场民工，对机场内外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进一步查明：24架飞机分三排，每排8架，停放在机场东南侧停机坪上，前两排飞机体积小，估计是战斗机，后一排体积大，可能是轰炸机或运输机。机场的防御工事，均为土木结构。敌守卫部队大部

集结在机场西北侧防区，在停机坪的东侧有几间简易房，时有飞行员进出，估计是值勤飞行员休息的地方。机场的四周和停机坪附近均设有固定哨位，进出飞机场通道的哨卡筑有简易工事，警戒很严。

三营各连的军事民主会上，战士们发言踊跃。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是两个字：一个是“烧”，一个是“炸”。最后，决定采用把几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放进飞机驾驶舱里爆炸的办法，并进行了模拟试验，效果良好。

10月19日，夜深人静，月色朦胧。陈团长一声令下，全团所属部队分别向预定目标开进。三营十连、十一连的战士们都装备了自己捆绑好的集束手榴弹，紧随赵营长快速前进。部队顺利渡过滹沱河后，成战斗队形展开，悄悄地抵近飞机场。

先头部队剪开铁丝网，巧妙地干掉了哨兵，摸进了机场。机枪连按预定方案，迅速抢占了有利位置。十连的一、三排以迅猛动作向机场西北角扑去，消灭掩蔽部里的敌人。赵营长率领十连二排和十一连，直奔机场东南侧的机群，炸毁飞机。

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接近机群，在黑暗中隐约可见长长的三大排飞机停在那里。各爆破组正向机群运动时，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日军哇啦哇啦的喊叫声，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枪声。原来是十连一、三排与敌人遭遇了。就在这一瞬间，赵营长率领的爆破部队向机群发起猛烈攻击，冲向机群，杀向敌兵！顿时，整个机场枪声大作，爆炸声轰鸣，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赵营长面对这场特殊战斗，沉着冷静，一边指挥爆炸飞机，一边指挥消灭敌人。

爆破部队与守卫机群的日寇绕着飞机拼杀起来。八路军采取分割战术，将敌各个击毙。被惊醒的在机场值勤的驾驶员拼命冲向机群，有的被击毙，有的爬上飞机，盲目开火。固定在飞机上的机枪不但发挥不了威力，反而打中了前排的飞机。而隐蔽在飞机下的战士，可以左右射击机舱里的敌人，在消灭了守卫机群和舱里的敌人之后，各个爆破组敏捷地跃上了飞机，迅速地砸碎驾驶舱玻璃，准确地将一捆捆手榴弹扔进一架架飞机舱里。战士们愈战愈勇，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我再报销它一架！”十一连机枪班长老李，轻伤不下火线，攀上一架飞机，端起机枪向驾驶舱猛扫。打了一阵子，他放下机枪，举起小铁锹狠砸机翼。战前他说过，要砍一块飞机尾巴给老乡们见识见识，正砸得起劲。赵崇德跑来高喊：“老李，砸什么？快爆炸！”接着他大声喊着：“同志们，狠狠地炸！全部、彻底炸它个稀巴烂！”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全部飞机被炸毁起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熊熊烈火映红了机场四周，滚滚浓烟弥漫了机场上空。爆破组对飞机进行爆炸的时刻，一群敌人嚎叫着从隐蔽部冲出来。八路军战士面对凶残的日军，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白刃格斗，杀退了敌人的几次反扑，保证了爆破敌机任务的顺利完成。激战一小时，24架飞机全部炸毁，机场地面设施全部摧垮，歼灭机场守卫日军100余人，至此，三营胜利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赵崇德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向指定地区转移。就在他指挥部队后撤时，残敌仍不断地向八路军射击。同志们为了营长的安全，再三劝他先行撤离，他坚持不肯先走，就在这时，他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倒在地上，大家把他扶起来，准备抬上担架，他用尽力气说：“不要管我，同志们快撤，快……”话没说完就合上了眼睛……

日军驻阳明堡的香月师团出动装甲部队紧急增援机场，在途中遭我打援

部队的猛烈阻击。当增援的敌人在其炮火掩护下赶到机场时，八路军早已胜利撤出战斗。摆在侵略者面前的是被焚毁的 24 架飞机的残骸、百十个日军的尸体和缺胳膊少腿的伤兵！

后人写诗传颂：

万里长城万里长，
雁门关下古战场，
阳明堡里烧怒火，
倭寇飞机一扫光！
七六九团英雄多，
誓死捍卫我中华，
出征抗日第一仗，
功在千秋赵崇德！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巴夫撰写）

神兵伏击雁门关 ——记胡觉三烈士

胡觉三是湖北省洪湖地区人。他的家境不算富裕，但还过得去。他在少年时代只读过几年书。

从1928年起，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领导湘鄂西的工农群众，开始了创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武装斗争。洪湖苏区就是其中的根据地之一。胡觉三从贺龙和红军的身上看到了力量和希望，于1931年报名当上了红军战士。1932年，由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以及我党内部“左”倾路线的错误，致使蓬勃的洪湖苏区垮了，胡觉三跟着红军部队仓促离开了家乡和亲人，转战到了湘鄂边。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胡觉三自从参加红军后，在短短的三四年里，逐步学会了打仗，学会了带兵，学会了做群众工作。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殊死的斗争使他迅速成长起来。当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时，胡觉三已经是红六师的一名优秀的连队政治指导员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将士请缨出征，部队进行了改编。胡觉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三营十一连政治指导员。1937年9月3日，部队从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从陕晋交界的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进入山西后，一二师改乘火车向北开进。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丢了雁北地区，退至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内长城设防，以求凭借长城关隘和国防工事挡住日军。阎锡山在代县雁门关以南10公里的地方设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但是，不论是古代的长城还是现代的工事，都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阎锡山在日军的威逼下，于10月上旬，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当一二师赶到宁武一带时，这里已经成了敌后，一二师遂担负起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策应忻口会战的任务。

10月的二天，七一六团开进被日军劫过的宁武县城。站在古城楼下，胡觉三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街头、树上到处是同胞的尸体，有的身首分离，有的肠子被掏出；女人大都赤身裸体，有的被剝去乳房，有的被剖出胎儿；最惨的是小孩子，有的被挑在刺刀尖上摔得脑浆迸流，有的被撕成了两半。

胡觉三带着全连，小心翼翼地死从死人缝中穿过，走进居民院内，看到的又是一番惨景：有的老头、老太太跑不出去，双双缢在屋梁下，有的一家人躲进贮存秋菜的地窖里，结果被活活埋在里面。炊事班要烧水做饭，发现每一口水井都填满了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小孩和奸污后遭杀害的女人们的尸体。好端端的一座古城，几乎被残暴的日军斩尽杀绝，变成了一座血城、死城。

胡觉三一边领着战士们帮助宁武城的老百姓掩埋亲人的尸体，一边组织大家控诉日军的暴行，激发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各班排纷纷求战，战士们发誓说：“要叫我碰上日本鬼子，非亲手杀死他几个，讨还这笔血债不可！”

不久，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向七一六团下达了在雁门关地区袭扰、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的任务。团部即率第三营整装出发，向雁门关疾进。

雁门关坐落在山西省代县西北的雁门山上，自古以来就是内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塞。这里北临大同，南抵太原，西接宁武、偏关，东连紫荆关、倒马关，可直达北平及华北平原，有“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之说。历史上，雁门关总是来敌必犯之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著名的抗辽将领杨业任代州刺史时，曾驻守雁门关，屡败前来进犯的辽军。1937年10月，攻入山西的日军正在凭借山脚下的一条公路继续南侵。

经过两天急行军，七一六团插到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驻下，侦察情况，寻找战机。在群众帮助下，七一六团很快查明了日军汽车过往的规律：自从忻口战役打响后，几乎每天都有日军车队经雁门关地区南来北往，少则几十辆，多则几百辆，从大同向忻口运送兵员和弹药，从忻口向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据此，团里计划在雁门关南山脚下的黑石头沟伏击日军的汽车队。

为了打好抗日第一仗，团部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进行研究和动员。团长贺炳炎简要地介绍了敌情。从兵力上看，这次伏击作战，团部只带来了第三营和团属特务连、迫击炮连，人数不占优势；从装备上看，我军略差一些；从士气上看，日军长驱而入，气焰正盛，而我军指战员也早就憋足了劲要同日军较量较量。因此，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战。

团政治委员廖汉生询问了各连的请战情况后，指示说：要把口军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掀起一个杀敌复仇的热潮。

听了政委的话，胡觉三腾地站起来，脸色铁青地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十一连！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

翌日拂晓，团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带着干部去黑石头沟勘察了地形，把各连任务布置下来。

回到连里，胡觉三和连长宋发富传达了上级指示和战斗方案，作了战前动员，提出了战斗口号：“打好抗日第一仗，为宁武同胞报仇！”

10月18日凌晨，部队披着星光从老窝村出发，沿着羊肠小道隐蔽地进入黑石头沟。此沟北高南低，沟底净是被山洪冲积的乱石，沟南端是一座石拱桥，公路顺沟穿过。部队就埋伏在沟西的山上，十一连靠近石拱桥，负责扼住“咽喉”部位，断敌退路。

胡觉三和连长宋发富安排好各班排的伏击位置，把全连的轻机关枪集中摆在山头，而后下到各班排逐个地检查战斗准备情况。胡觉三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战士们：“这是对日作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威风来！”战士们的情绪都很高，手榴弹揭开了盖，子弹压进了枪膛，刺刀拔出了鞘，许多同志还把当红军时用的大刀背了来，在阵地后面埋锅做饭的炊事员们也全部上了阵地，他们说：“打鬼子，人人有责。这是第一次同日军交手，不参加，心里不好受！老大哥部队在平型关战斗中让鬼子吃了大苦头，这回也叫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看到战士们斗志这么高，胡觉三放心了。按照以往打仗的习惯，胡觉三主动向连长宋发富提出：“你来指挥全连，我下到突击排去。”说罢。他背起大刀，拎着手枪，到了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三排阵地。

上午10时左右，北面公路上腾起尘土，隐隐约约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据山顶观察哨报告，约有百十辆汽车像长蛇一样从南边开来。过了一会儿，日军车队拐过石拱桥，缓缓地爬上陡坡，进入我军伏击地段。这些车是从忻口前线来的，车上载着不少伤兵和死尸，还有一些担任护卫的武装士兵，车头

上架着机枪，日军士兵哇啦哇啦地叫着，如人无人之境。

胡觉三看到敌人狂妄的样子，怒火中烧。身边的战士们也都是怒目圆睁，摩拳擦掌。胡觉三示意大家沉住气，等待统一号令。

“打！”随着贺炳炎团长一声怒吼，山上我军阵地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喷射着密集的火网。骄横的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在其“后方”会突然遭到猛烈的打击，汽车有的被打着了火，有的一头栽进沟底的乱石滩，开车的司机丢了方向盘，车上的伤兵不顾死活地往下滚。

胡觉三把手枪一挥：“同志们，跟我来！”带领突击排首先跃出山头阵地，如猛虎一般顺着山势扑了下去，上了公路，一下子把日军压在沟里的汽车底下。日军在一阵混乱之后，很快清醒过来，伏在车底下用机枪向山上扫射，我军冲锋队伍中不时有人被打倒，滚下山坡，但这丝毫不能挡住冲锋的势头。胡觉三带领着战士们，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冲到汽车前，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日军又从车下钻出来，一个个眼睛瞪得血红，嘴里呀呀地嚎叫着，端着刺刀作拼死的抵抗，胡觉三见到敌人那副狰狞的面孔，复仇的热血一下子涌上来，迎着敌人的刀锋冲上去。战士们有的用大刀砍，有的用枪托砸，还有的抱住敌兵肉搏。车前车后，敌我双方杀作一团。

战斗中，胡觉三发现本连三排的一个战士被3名日本兵围住，3把刺刀把他逼得无处可退，防不胜防，处境十分危险。胡觉三手提大刀冲过去，乘敌不备，从后面劈倒一个，接着刀光一闪，又砍翻了另一个，剩下的一个日本兵也被那个战士刺死了。胡觉三勉励了那个战士，转身跑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大部分日军被消灭了，只剩下少数还在顽抗。胡觉三扫视了一下战场，忽然看到一个日本兵龟缩在车下，他大喊了一声：“缴枪不杀！”迈步上前正要抓活的，被那家伙一枪打中了胸膛。

胡觉三身子一歪，栽倒了。身旁的战士立刻击毙了那个日本兵。

连长宋发富赶来扶住胡觉三，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指导员，醒醒！”

胡觉三抬起头，吃力地说：“坚决地打！为宁武老乡们报仇！”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指导员的死，更加激怒了十一连的全体同志们，大家高喊着“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扑向残敌。

战斗将要结束时，又从北沟口驶来一队运送兵员、弹药的汽车。领头的十几辆车又遭到我警戒分队一顿猛揍，后面的敌军匆忙弃车，登上左侧山头，向在沟里出击的我军冲过来，使我军伤亡骤然增多。团首长原定伏击目的已经达到，遂令部队上山，边打边撤。伤员们都被背了出来，胡觉三等牺牲同志的遗体没能抢运出来，留在了浓烟滚滚的黑石头沟里。

这一仗，我军击毁敌军车20多辆，毙伤敌300余名，切断了敌从大同至忻口的公路交通运输线。据战后群众反映，日军南北两个车队在黑石头沟一直折腾到天黑才开走，并在挨揍的地方竖了个木牌，哀悼亡魂，警告过往车队提防八路军的袭击。

在伏击战斗中，我军亦有几十名同志壮烈牺牲，胡觉三所在的十一连伤亡最大，全连只剩下17个人。胡觉三和诸烈士的英勇牺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取了对日作战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证明了一条真理：日本帝国主义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迎选撰写）

天福威海举义旗 ——记理琪烈士

1937年12月15日夜。文登县沟于家村里，中共胶东特委扩大会议热烈进行，油灯下，大家兴奋异常。特委书记理琪向大家传达了省委关于在胶东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大家争相发言，展开认真讨论，经一番酝酿，最后决定以1936年“——四”昆嵛山暴动后保存下来的一支游击队为基本力量，12月24日在天福山举行起义。

天福山，位于文（登）、荣（成）、威（海）三边地区，周围群山环抱，方圆几十里。这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是我党联络文、荣、威三县革命力量的枢纽，是发动起义的理想地方。

做出起义的决定后，理琪便同特委其他同志一起，迅速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在隆冬的夜晚走这村跑那村，一边发动群众，一边检查准备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大雪埋没了道路，返回沟于家村的时候，他不小心掉进深沟的雪窝里，爬上来挣扎着回到住处，冻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理琪原名游建铎。1908年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1925年入党。1937年12月24日，他带领胶东特委和领导起义的几位负责同志，踏着寒霜，在黎明前登上了天福山。不久，保存下来的昆嵛山游击队赶来了，其他各地参加起义的队伍也冒着寒风赶到了，胶东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到来了。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给雄伟美丽的天福山披上了万道金光。山顶庙前的旗杆上，绣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字样的火红大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理琪站立红旗下代表胶东特委讲话。他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讲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和山东省委指示，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奋起抗战。他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人们欢呼雀跃。“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深山峡谷震荡。

天福山起义后，特委将起义队伍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第一大队，令其以武装宣传队的名义立即深入到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天福山起义如春雷惊醒了胶东大地。各地群众相继揭竿而起，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在莱阳，中共县委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组成抗日武装，编为三军第九大队；在即墨，共产党员袁超以少先队为基础，吸收留散在县内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员举行起义，编为三军第七大队；蓬莱拉起的队伍编为三军二路；黄县组建的队伍编为三军四路。胶东到处燃起抗日的烈火。

在胶东具有战略地位的威海，历史上多次受帝国主义入侵，那里的人民有着反侵略的革命传统，著名的甲午海战就发生在那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威海人民早已群情激奋，纷纷要求抗日。天福山等地武装起义的消息传来，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更似待燃干柴。而国民党威海当局及驻军，却处于战降不定的混乱局面。理琪和特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威海的形势，认为发动威海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遂决定在威海举行起义，并制定了利用国民党当局内部矛盾，推动进步人士支持抗战，争取海军教导队中立，反对亲日分子投降，依靠群众力量举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之，理琪带领特委的同志们火速赶赴威海。

一到威海，理琪便投入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中。他找起义骨干谈

心，抓紧各种准备。之后，又深入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上层，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给国民党海军教导队作了“团结抗日”的报告，亲自同国民党专员孙凤玺进行谈判，晓以民族大义和利害，终于使孙凤玺答应，在我们保护他安全离开威海的条件下，暗中给我们以枪械支援。

1938年1月15日，以党组织的一部分力量为基础，加上进步师生，联合市郊农民，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配合下，举行了威海起义。起义人员打开专员公署的军械库，取出大批枪械弹药，起义部队迅速占领威海，逮捕了勾结日寇的亲日分子。

威海起义后，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理琪任第三军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

随后，第三军西进牟平抗日前线。

1938年2月，日军3000多人自青岛北侵，占领了烟台，接着又占领了牟平城，在牟平建立了伪政权，这时，理琪带领第三军到达了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村。理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趁敌立足未稳，迅速攻打牟平城。

经过一夜急行军，2月13日拂晓部队抵达牟平城外。理琪已先派便衣侦察进到城里，在里面设置了内线接应。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军会如此迅速袭击他们，所以城里毫无戒备。理琪带干部们观察了地形，作了战斗部署；部队分成三路，一路主攻南门，一路进攻东门，另一路到西门外担负烟台方面的警戒任务。

一声令下，南路队伍猛打城门，占领了城楼，随即沿大街两侧直逼伪县政府，东路队伍攻到东关，驻守那里的40名伪军未经接战即后撤，战士紧追不舍，将其人枪全部俘获。两路攻城队伍在伪县政府门前汇合，理琪亲率战士们冲进伪县政府，把伪县长及一批伪官员拖了出来。接着，又分兵直扑伪县公安局和商会，经一小时战斗，牟平城被我军收复，共俘敌100余人，缴枪近百支。

上午10时许，第三军部队撤出牟平城，理琪和几个负责同志带领20余人到城南三里远的雷神庙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牟平离烟台30公里，有公路相通。烟台的日军得知我军攻下牟平，出动陆军及海军陆战队，还以空军相配合，迅速向牟平增援。由于三军刚成立，缺乏作战经验，担任后卫警戒的部队没能及时发出警报和有效地阻止敌人，结果，天刚过午，敌人包围了雷神庙。

雷神庙是一座四合院，有正殿、东西厢和南侧厅，四周是砖石围墙。庙外三面为开阔地，北面为一村庄，村后便是通向牟平的大道，敌人就是从村后向雷神庙包围的。午后，会议刚刚做出转移的决定，在庙外站岗的战士发现敌人已接近庙门，当即鸣枪报警。在南侧厅开会的领导人迅速冲出庙外，庙宇周围已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在这危急时刻，理琪迅速指派人据守庙房，封锁大门、夹道，沉着地指挥部队抵抗。他冒着弹雨来回奔走，一面指挥还击，一面号召全体同志坚守阵地，节约子弹，保存力量，坚持到黄昏。在他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下午3点左右，敌人发起了更猖狂的进攻。由于敌人数倍于我，火力强，我军伤亡渐重。理琪腹部连中三弹，肠子流出体外，倒在血泊中。几个同志赶来照顾他，他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命令大家不要分散精力，赶快对付敌人。直到生命垂危，他还竭尽全力，断断续续地对大家说：“要……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

天渐渐黑了。敌人放火烧了南侧厅，我守卫在南侧厅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东、西两厢。火越烧越大，形成一道火墙，一时间，熊熊的大火倒成了抗日健儿们一道坚固的防线。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侧厅墙倒屋塌。正在这时，从东北方向传来了我增援部队的枪声，突围的时机到了。

“同志们，援军到了，冲啊！”不知是谁一声大喊，随着一阵激烈射击，同志们背着理琪突围了。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击日军的第一枪。这次战斗从午后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毙伤日寇 50 余人，有力地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大大鼓舞了胶东人民的抗日斗志。在这次战斗中，理琪因伤势过重，献出了生命，时年 30 岁。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张清训撰写）

身先士卒一虎将 ——记叶成焕烈士

1938年4月18日，朱德总司令专程从八路军总部赶到山西省榆社县郝北村，向一位烈士的遗体告别。这天，八路军一二九师为这位烈士举行隆重的人葬仪式。烈士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穴后，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手握铁锹，铲起第一锹黄土，覆盖在灵柩上。接着，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旅长陈赓和干部战士代表，依次铲土，垒起了一座新坟。

这位烈士，就是叶成焕。

叶成焕是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吴河村人，1914年10月19日生，1929年15岁时参加革命，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红军中历任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多次率领部队打硬仗，打苦仗，立战功，是四方面军里一员著名战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把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仍沿用八路军番号）。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时23岁的叶成焕由师政委改任团长。

从红军改为国民党军队序列，叶成焕感情上总觉得别扭。他禁不住常从怀里把那顶破旧的八角帽摸出来，深情地抚摸着……

叶成焕是一位党性观念很强的人，他很快地理解了国共合作抗日的伟大意义，于同年9月20日，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太行山一带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带领七七二团随旅部向太行山地区挺进。

10月19日，叶成焕率七七二团到达平定县城以东的石门口。当时，日寇第二十师团、一九师团正在猛攻晋东著名关隘娘子关，并已占领娘子关东南旧关等重要阵地；其主力一部经九龙关、测鱼镇等处，向正大路南侧山地西犯。该线国民党曾万钟军一部和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已被日军围困在旧关以南山地，娘子关告急，晋东前线形势十分危急。三八六旅陈赓旅长命令叶成焕带七七二团隐蔽集结于井隆南15里之于家沟，伺机而动。

21日夜，天黑得像涂了墨。在红军时就常使用夜战的叶成焕，考虑与敌初战，决定抓住这个好时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派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三营，进入地形复杂的长生口设伏。由井陘西犯的日军约一个中队，一进入长生口，就被猛烈的手榴弹炸得人仰马翻，失去了还手之力。这一仗，经1个多小时的激战，毙敌四五十人，打胜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头一仗。

经过几次交锋后，叶成焕对日本鬼子活动的特点有了了解，利用其骄狂麻痹的心理，又率部于10月26日至28日天内，在河北省井陘县测鱼镇通往平定的七亘村连续两次设伏，出奇制胜，以小的代价取得了歼敌250余人的战绩。

11月2日，敌十二师团一三五联队经黄岩底向昔阳进犯。叶成焕按照陈康旅长的命令，率七七二团占领巩家庄以东高地，准备伏击敌人。当日下午，敌人在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扼守的凤居阵地前受挫，向黄岩底河滩一带溃逃。

在敌人翼侧高地的叶成焕，观察到敌人队形不整，人员密集，后退慌张，便果断地放弃原来伏击计划，命令部队集中火力，向后退之敌实施火力突袭。霎时，枪声骤起，打得敌人东躲西藏。鬼子军官驱赶士兵冲击，然而，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终究抵不住子弹的袭击，不一会工夫，日军官兵约有300人

倒地毙命。

七七二团初上太行山，在叶成焕指挥下，接连打了长生口、七亘村、黄岩底几个漂亮仗，打出了“老二团”的威风。

刘伯承、邓小平继长生口诱伏战之后，于1938年3月，安排了一个更大的打击敌人的计划：以“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令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为左翼队，袭击黎城，引诱潞城的敌人来援；以三八六旅为右翼，在潞城与潞河村之间的神头岭地区设伏，歼灭由潞城向黎城增援之敌。

根据勘察，陈赓旅长在神头岭地区给日军布置了一个“口袋”：以七七二团埋伏于邯（郸）长（治）公路以北、神头以东高地及安南岭西北高地，实施主要突击；由辽县、黎城、涉县一带的游击队和民兵组成的补充团设伏于对面的鞋底村一带。

3月15日，天发亮了。叶成焕从望远镜里看到公路上尘土飞扬，敌人快要接近埋伏区。他立即向设伏部队发出命令：“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战士们设伏在距大路仅20多公尺远的工事里。9时许，日军第十六师团部队并带第一八师团辎尾部一个辎重队，前来救援黎城，前后是步骑兵，大车队居中拉了几里长。敌先头部队进至神头村集结休息，派出骑兵搜索分队向七七二团一营埋伏地点搜索。眼看敌人骑兵就要踩到战士头上了……

部队伪装严密，敌人对眼前不远的工事根本没有发现。

不一会工夫，敌人的大队人马终于大摇大摆地钻进了八路军布好的口袋里。

这时的叶成焕，喊了声：“开始攻击！”顷刻间，战士们从工事里、草丛里跳出来，把一排排手榴弹朝公路上的鬼子砸去。随着震天撼地的爆炸声，神头岭区周围硝烟腾空而起，黄土裹着弹片四面横飞。日本军的队形一下子变成了一条狂跳的火龙。

“冲啊！”“杀呀！”战士们端起明晃晃刺刀，漫山遍野地扑向鬼子。

就在敌我双方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一阵喊杀声从天而降，埋伏在申家山的七七二团二营冲过来，将敌人切成数段。失去指挥的鬼子四处奔逃，被八路军战士一一围歼。这时，有一股残敌约300多人窜入神头村。

叶成焕见状，立即按旅长的命令先派一个排向敌人出击，随后他亲率一个连扑向神头村。于是，叶成焕指挥八连同约300个鬼子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拉锯战。

在神头村，残敌顶不住八路军战士的猛打猛冲，被全部消灭了。

神头岭伏击战，八路军一二九师共歼日军1500余人。对于这一战，日军一八师团一个伍长在《阵中日记》里描述了日军失败的惨状：“……一八师团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直觉难过。”

1938年4月15日黄昏，陈赓旅长命令七七二团以一部兵力攻袭武乡城。

占领武乡的3000多日本鬼子，在城里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扰得惶惶不安。他们在八路军攻击前，仓皇弃城沿武（乡）襄（垣）大道向长乐村逃窜。

陈赓旅长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七七二团、六八九团在左，七六九团和预备队，尾左路之后，沿浊漳河北岸与南岸的山地追击日军。叶成焕依照陈赓旅长的命令，指挥七七二团先行。

途中，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敌人先头部队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延附近，马庄只有少数后卫部队。此时，七七二团已到达白草延对岸的郑峪

村、张庄以北高地，与七七一团两岸平行。叶成焕心想：这是急袭敌人的有利战机，若等敌人过了长乐村再打就晚了。叶成焕与随团行动的陈赓旅长研究后决定：不待后续部队赶到，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

16日拂晓时分，战斗在长乐村周围展开了。日军的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的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狭窄的河滩小路上、无法展开。敌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向七七二团发起了轮番冲击，企图占领要点，威胁八路军部队的侧后。叶成焕命令特务连抢先占领要点，集中火力对爬上半山腰的鬼子猛扫，打垮了鬼子的冲锋。

战至中午，敌一五联队3000余人由辽县经蟠龙赶来增援，向我主阵地实施反击。炮火十分猛烈，阵地笼罩在浓密的烟尘之中。这时，叶成焕来到最前沿指挥战士们消灭敌人。

激战两个小时以后，辽县的敌人又派出千余人来增援。

一二九师首长认为眼下要全部消灭这股敌人没有多大把握，为巩固已得的胜利，决定以七六九团和六八九团各一部兵力在前线布成游击网，阻击和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

叶成焕按照师、旅首长的命令，及时组织部队撤离战斗，而自己却跟着撤在最后的排。他边往后撤，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敌人的援兵冲到沟下了，通信员提醒他说：“团长，你站在高坡上危险，赶快走吧！”

“等一等再走，我在这儿看得清楚。”叶成焕没有动。

一颗敌弹“嗖”的从他衣袖穿过，他没有在意，嘴里骂了一句。第二颗子弹带着尖叫声飞过来，打中了他的头部，他倒下了。师长刘伯承得知叶成焕负伤后，来到担架前，俯身抱着叶成焕的头，连声喊着：“成焕，成焕哪……”但是叶成焕再也不能回答他敬爱的师长的呼唤了，刘伯承悲痛的眼泪，滴在了叶成焕苍白的脸上……

4月18日凌晨1时30分，叶成焕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24岁。

长乐村战斗，歼日军2200余人，是一二九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这次战斗，使日军一八师团遭到沉重打击，不到半个月，各路敌军纷纷溃退，八路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全部赶出晋东南地区。

全国解放后，叶成焕烈士的遗骨被迁到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王树林、尹龙玉撰写）

转战太行建功勋

——记周建屏烈士

周建屏 1892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倘圩村。18 岁时参加云南新军，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历任班、排、连、营、团长。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出滇入川，战桂征粤，一次次民主革命的失败，使他对军阀间混战厌恶和不满。1923 年 9 月他离开滇军，返回原籍江西省金溪县双扩镇左源村。1925 年他到赣州的杨如轩师任辎重营营长，后任师部少校参谋。北伐军进入湖南，周建屏倍受鼓舞，决然离开赣州，投奔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随军攻克南昌。

这时候，共产党员朱德任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早在滇军中，周建屏就在朱德部下任职，听说朱德来到南昌，他立即去拜见老上级。久别重逢，一席长谈，朱德给周建屏指明了方向。一天，他向朱德倾吐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27 年春季，经朱德介绍，周建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 8 月 1 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随部队南下至广东潮汕地区遭敌人围攻失利，他辗转到达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1929 年，党中央派他到赣东北地区去。那里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苏区缺少军事指挥员。他化名改装前往，途经江西省都昌县时，与中共都昌县委取得了联系，参加领导 8 月 23 日的汪家墩武装起义，创造了赣东北红军第一大队。10 月，周建屏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1930 年 6 月，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等在弋阳县芳家墩以红一团为主扩军成立红军独立师，随后发展为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红十军转战闽赣广大地区，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周建屏任主力红军二十四师师长，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指挥部队取得了会昌湾塘岗战斗歼敌半旅的胜利。1935 年 1 月，红二十四师在突围中伤亡惨重，3 月上旬，在安远山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三团 100 余人会合，随后又与广东兴宁特委联合成立军政委员会，周建屏担任副主席。

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周建屏率领部队爬山穿林，昼伏夜行，与敌人周旋，以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由于环境恶劣，身体虚弱，周建屏终于病倒了。这年 5 月，他与陈正人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潜往上海治疗，病愈后，他在党组织安排下，于 1936 年到达延安，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科科长、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

1937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的山坡上，阳光灿烂，举行红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一队队刚换上新军装的红军队伍，慷慨激昂，引亢高歌：

同胞们，向前走，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用我们的血和肉，
去拼掉敌人的头。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同胞们，向前走！
莫退后，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就在这次誓师大会后，中央军委任命陈光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旅长，周建屏为副旅长，率领部队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这年11月，周建屏和刘道生到滹沱河两岸开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周建屏任四分区司令员。他刚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就来到太行山东麓。

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建屏带来了一个教导营，开进平山县的洪子店。在这里，教导营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深入敌后各个村庄，去做发动、组织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周建屏亲自带一个工作队，自称“班长”。没过几天，周围不少村庄相继组织起抗日自卫队。周建屏决定奔袭王田村，拔掉敌人驻在该村的随军医院，给鬼子一个下马威。他派人通知附近的几个工作队，马上集中起来合成一个排，同时挑选了30名胆大体壮的自卫队员协同作战。同志们都劝司令员留在岭上指挥，谁知他却来到村前。这是他的老习惯，常在战斗部署完了以后，便到前沿去指挥，跟战士们一起战斗。

第二天，鬼子援兵赶来时，除了30多具尸体和一些断腿缺胳膊的伤员，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和游击队早无踪影。从此，八路军转战太行的消息在晋察冀传开了。

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洪子店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鬼子听到这个消息，立即由石太线调来1000多人，企图袭击洪子店，一举消灭四分区机关。周建屏立即请示上级，调来三四四旅两个团，由他统一指挥，埋伏在辛庄西的西凉山上；教导营也趁着黑夜，悄悄地开上了辛庄东山。

骄横的鬼子挺着胸脯，扛着三八枪。朝辛庄扑来。当日军全部进入两山之间的一个谷地里时，周建屏一声令下，霎时，响起急风暴雨般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打得鬼子人仰马翻，鬼哭狼嚎。1000多鬼子除小部分逃跑外，其余被消灭。胜利的捷报传开，太行山区的军民个个扬眉吐气。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在四分区管辖的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抗日的热情十分高涨，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很快就成立起3个区队，到处打击敌人。各村的自卫队、儿童团也很活跃，站岗放哨，骚扰敌人。进犯洪子店的日军，连遭八路军的袭击，日夜提心吊胆，役几天就撤回了平山城。

分区的发展促进了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一个有3营兵力的地方武装——联庄会，在周建屏的耐心教育下，与分区3个区队进行合编，统一归四分区领导。抗日力量在敌后的太行山区，滹沱河两岸，得到迅猛发展，逐步成为晋察冀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平山县的西柏坡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周建屏30年戎马生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身上留下7处枪伤。在敌后的艰苦环境中，为创建抗日根据地，日夜操劳，积劳成疾；除了伤病复发，还染上了脊髓炎。可他仍然照常走家串户，号召民兵参军参战，动员妇女积极支前，有空还为孩子们讲革命故事。有时腰脊疼得厉害，他总是咬咬牙，挺一会儿，又继续工作。

1938年3月，周建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四分区只有一个医疗队，

药品很缺乏，分区不惜代价想方设法从敌占区购进药品。晋察冀军区还派来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专门为他医治，但病情不见好转。6月13日下午3时，周建屏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对守候在身旁的分区政委刘道生、专员邵式平等生死与共的战友说：“我参加过打3个皇帝（宣统、袁世凯、张勋）的斗争，直到我加入共产党，才算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我虽然没有看到全中国解放，但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到那时候请代我向根据地的人民问候！”

（南京军区政治部、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稿赵水泉撰写）

八女英魂照千秋 ——记冷云等八位女烈士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 1938 年 11 月 4 日在深山密林中写的日记里，确切地记录了发生在当时、后来名闻中外的抗联“八女投江”的史实。

这八位女英雄是：冷云、杨贵珍、安顺福（朝鲜族）、胡秀芝、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朝鲜族）。带头人是共产党员、抗联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冷云。

冷云原名郑致民、郑香芝。1915 年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1931 年至 1935 年在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加入抗联第五军。

可歌可泣的“八女投江”的壮举，发生在 1938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当时，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为了冲破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所属部队四、五军向黑龙江省西南的五常地区进行远征，以便和在吉林地区活动的抗联第一路军及第二路军所属的第十军打通联系，开辟新的游击区。

5 月间，二路军所属的第四军、第五军开始集结行动，由于不断遭到敌人的阻击，直到 6 月下旬才克服重重困难，到达远征集结地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五军妇女团也奉命参加此次远征。

7 月 2 日，西征军袭击了牡丹江岸的三道通小镇，缴获了一部分给养和武器弹药。接着由四道河子向西进，经过 300 多里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越过老爷岭，于 7 月上旬进入苇河县境。冷云和妇女团的女同志与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战胜许多困难。7 月 12 日，妇女团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之后，随五军一师西征。

8 月间，西征部队进入苇河、五常县境后，遭到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空中有飞机侦察、扫射轰炸，地面有 3000 多日伪军进行围攻，我军伤亡很大。在这种险恶形势下，五军一师剩下的 100 多人，决定返回牡丹江下游刁翎地区寻找军部。这时原有 30 余人的妇女团，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大部分牺牲了，只剩下指导员冷云、王惠民和李凤善等 8 名同志，最大的 23 岁，最小的才 13 岁。她们跟随部队，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衣服和鞋子早破烂不堪了，没有粮食吃，就以野菜、野果、树皮和河沟里的鱼虾、蛤蟆等充饥。

10 月下旬的一天夜里，这支队伍露宿在刁翎县境（今林口县）内三家子屯附近乌斯浑河西岸柞木岗山下的河滩上。准备从这里过河，再绕道去克斯克山里，寻找五军军部。深秋季节，冷风阵阵，寒气逼人，有些水坑已结成薄冰。为了取暖，分散地燃起了十几堆篝火，围着取暖休息。长期的饥饿行军和战斗，人们极度衰弱、疲乏，一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冷云等 8 名女同志围着靠近河边的火堆休息，大家互相偎依着用体温取暖，有的抓紧时间缝补衣裳。13 岁的小战士王惠民，身体瘦弱，经不住这寒夜的冰冷，蜷曲着身子，瑟瑟发抖，冷云怜惜地把她搂在怀里。这个小战士的父亲参加抗联第五军在军部任军需副官，家里房屋被日军烧毁，她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到处躲避日伪汉奸的追捕，1937 年她 12 岁就参加了五军妇女团。她参军不久，她爸爸在战斗中牺牲了，她更加仇恨敌人，也更加坚强了。她经常给伤病员和群众唱歌，进行宣传。她最爱唱的一支歌是“口出东方分

外红，曙光照满城，大家快觉醒，看行鬼子多奸凶，国家人民全叫它坑。”那个长得很秀气的杨贵珍，当时才18岁，她是刁翎东柳树河子人。1936年冬天，抗联五军妇女团活动到柳树河子时，她参加了部队。她在家时没有名字，参军后，大家认为她参军不易，很宝贵，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贵珍，在部队里她进步很快，1937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冷云她们围火休息的时候，日本密探、大特务葛海禄从附近的样子沟下屯到上屯去找情妇作乐，他在岗梁上望见西山河滩有几簇火光在闪动。凭着他为敌人当走狗的反动嗅觉，判定这火光必定是露营的抗联队伍，跑回下样子沟向日本守备队报告。驻刁翎日军司令熊谷大佐当即命令所属各部和伪军赫团，约计千余人，连夜向我抗联五军一师的露营地扑来。

第二天拂晓，抗联队伍整装待发。关师长命令会泅水的师部参谋金世峰带领8名女同志先行渡河。他们走到河边，见乌斯浑河在涨水，河中波浪滚涌，发出哗哗的吼声。

洪水已吞没了原先渡河道口，金参谋先下河试探深浅往前游，让冷云带领7名战士随在后边。冷云她们正要下河，突然枪声大作，潜伏的日伪军见抗联队伍起程，发动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在河滩上，仓促应战，地形很不利，于是边还击边向西边密林地带转移，而冷云等8名女战士却被隔在了河边。

冷云见大队突围西走，为了掩护大队快些撤走，便让战友们隐蔽在柳条丛后边，说：“向敌人射击！把敌人火力引过来，让大队冲出去！”

“是，让大队冲出去！我们牺牲了也值得！”7名女战士异口同声地回答。八支长短枪一齐向敌人开火。她们从侧面一打，敌人顿时慌乱起来，怕腹背受击，一部分敌人立即转过身来向河边还击。敌人火力分散了，我大队趁势冲了出去，进入了密林。

已突围的大队领导人，发现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大队突围，仍据守在河边，牵制敌人的火力，处境非常危险，于是李团长又率队折转回来，向敌人进行反击，想杀开一条血路，把冷云等8名女同志接出去，但已失去战机。敌人用凶猛的炮火控制住山口，反击队伍伤亡很大。这时冷云她们对着远处齐声高喊：“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要紧！”

敌人集中火力向冷云她们据守的河岸阵地猛扑过来，步步逼近，企图活捉她们。敌人的算盘打错了，冷云等8位女战士，虽然人少力单，使用的又都是轻武器，弹药也不足，但她们却有着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沉着地向敌人还击，杀伤了十多个日伪军。

敌人一时摸不清柳条丛里的底细，没敢再发动冲锋，只趴在地上继续射击，子弹在八女的头上呼啸着飞过。

天亮了。冷云抬起头，向四周扫视。她们所在的地势很不利，河岸上光秃秃的，他们隐身的柳条丛也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削平了，那些能够遮身的荒草，有几处被炮火烧着，冒着浓烟向四处蔓延；身后是百多米宽的大河，卷着巨浪，向北奔腾流去；河对岸是大、小关门嘴子山，山上经霜的柞叶，在晨咸的照射下红彤彤的，像无数面血染的战旗。

敌人连连用迫击炮向河边射击，河边的荒草燃烧得更炽烈了，这时敌人又发起了冲锋。冷云大喊一声：“打！狠狠地打！”她们一边向冲上来的敌人猛射，一边又投出几颗手榴弹。敌人又退却了，暂时停止了进攻。

冷云看看战友们，见黄桂清、郭桂琴负了伤，急忙撕下自己的衣襟，和

杨贵珍一起给她俩包扎。安顺福、胡秀芝、李凤善、王惠民正脱下自己的衣服扑打着烧向身边的大火。冷云命令架起负伤的战友，借着荒草燃烧的浓烟，迅速地撤到河边土坎下。

她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只剩下两颗，战友有的负了伤，怎么办？前面是凶恶的敌人，背后是汹涌奔腾的大河，她们8个人都不会泅水，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被俘或战死。

冷云对大家说：“咱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现在只有趟水过河。能过去，就找到军部继续抗日，战斗到底；过不去，就跟乌斯浑河水永生吧！”

“指导员说得对！咱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过河！”安顺福大姐坚决地响应。

“对！过河！”同志们齐声回答。这时，敌人发现河边只有几个抗联战士，恶狼似地冲了上来，不住地嚎叫着：“你们跑不了啦，赶快投降！”“捉活的！捉活的！”

“下河！”冷云站起来，把空匣枪插进腰里，她和杨贵珍把最后两颗手榴弹奋力扔向冲上来的敌人。战友们互相搀扶着下到河里。突然，从对面远处飞来一串机枪子弹，王惠民身子一歪倒下了，冷云刚要去抱她，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肩头，胡秀芝赶忙把她扶住，安顺福抱起小王朝前走。原来河东岸小关门嘴子山头被日军抢占，他们用机枪封锁江面。

冷云用手捂着伤口说：“走！”胡秀芝搀扶着冷云，杨贵珍和李凤善背起负伤的小黄和小郭，大家手挽着手，高唱着《国际歌》，向河心走去。“……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水深浪急，寒流刺骨，悲壮的歌声回荡在乌斯浑河的上空。日军看见只是几个女兵，把他们上千的人马拖在河边三四个小时，还打死了十数名日伪兵，真是气得心肝肺疼。日军乔本队长狂叫：“打！统统地死了死了的有！”

子弹呼啸着从女战士们的头上、身边飞过，她们忽而倒在水里，忽而又挣扎起来。这时敌人的一颗迫击炮弹在她们的身边爆炸，掀起一股巨浪，水面上再也看不见女英雄们的身影，再也听不见低沉的歌声，只有奔腾的浪花，汹涌的波涛，向远处的牡丹江流去，流去……

凶狠的日军熊谷大佐，摇晃着大脑袋哀叹：“中国，连女人死都不怕，中国的灭亡的不了！……”

1982年，中共林口县委、县政府在乌斯浑河东岸的小关门嘴子山坡上，建立起雄伟的烈士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抗联老战士、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亲笔颂词：“八女英魂，光照千秋。”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温野撰写）

毙日将星饶河滩

——记姜克智烈士

在著名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黑土里，安葬着无数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的忠骨。其中有一位击毙日军少将日野武雄的年轻指挥员，他就是抗联第七军第一师副师长姜克智。那是1938年9月下旬的一天，姜克智带着19名警卫战士，从同江一带返回饶河小西山抗联七军军部汇报工作。代理军长崔石泉一见到姜克智，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原来军部刚刚收到一份从抚远县城来的情报，近日伪满洲国军政部的日本高级官员日野武雄（少将军衔）一行到抚远视察，将于9月27日乘船到饶河县小佳河参观“模范集团部落”。这真是一次歼敌的好机会，可是这时七军主力部队都远在同江、富锦一带，军部只有少数警卫部队和一支刚组建起来的全是十四、五岁的少年连。姜克智了解情况后想了想，提出在半路伏击的方案，经过和崔石泉反复研究，决定以七军一师警卫战士为主，吸收部分少年连成员，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连夜急行军赶往饶河。崔石泉授命姜克智具体指挥这次伏击战。1938年9月27日，天还没有亮，姜克智带着小部队下了山。崔石泉代军长也跟随小部队一起行动。秋天的大平原上，一丛丛芦苇，一片片庄稼，正好掩护了小部队的行踪。当天下午，部队赶到了预定的伏击地点——饶力河边的西风咀子。姜克智派出哨兵封锁了河边的渔亮子，然后选择一块河湾边的高地，命战士们迅速构筑掩体隐蔽起来，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活动。

9月28日清晨，河面上传来隆隆的机器声，“小鬼子的汽艇过来了！”战士们霎时来了精神，人人瞪大了眼睛，手指抠上扳机。姜克智传下口令，“听我的枪声为令，不准擅自开枪！”

汽艇上果真是日军少将日野武雄一行。汽艇甲板上堆着沙袋，两挺机枪指向两岸，准备随时射击，他们一路平安到达小佳河，在小佳河渡过了平静的一夜后，便相信这一带已是“治安肃整的模范地区”。待从小佳河返程时，日野武雄一行便放松了警惕。甚至有几个人悠闲地在甲板上观赏两岸的景色。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河面上的薄雾开始消失，汽艇越来越近，甲板上日军的嬉笑声可闻。汽艇通过第一道埋伏点后，姜克智一声枪响，河面上立即响起密集的枪声，汽艇甲板上的几名敌人当即毙命，其他的鬼子在汽艇内顽抗。汽艇想夺路逃走，怎奈河湾急，河道窄，汽艇左突右闯，不久便搁浅了。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快投降！”只见从船舱里出来一个高举双手的中国人，他说自己是船工，并向战士们暗示舱里还有敌人。两个小战士跳上甲板，向舱里连扔两枚手榴弹。爆炸声过后，一切归于平静。这次战斗只用了十几分钟，全歼船上日军39人，日军少将日野武雄被击毙。姜克智所率的小部队无一伤亡，还缴获敌人短枪27支、轻机枪一挺和许多子弹。战斗一结束，姜克智带队迅速撤离现场，绕道返回军部密营。当敌人闻讯赶到时，留给他们的仅仅是一艘冒着烟的破船和39具尸体。

1938年10月12日、伪满《大同报》刊载消息，哀叹“满洲国国防将星殒落一颗”。日本侵略当局决不会想到，这个摘取他们“国防将星”的人几年前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姜克智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少年时跟父母逃荒“闯关东”，来到黑龙江唐林县（当时属吉林省）杨岗定居务农。“九·一八”事变后，姜

克智积极为当地驻防的抗日自卫军送粮，送草，打杂工。1933年1月，他组织一伙青年，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与日伪军作战。1934年2月，中共饶河中山县委创建的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成立，姜克智率队汇入了这支大队。1935年9月，中共吉东特委将一些抗日武装合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四军，饶河大队为该军第四团。这年姜克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3月以后，四团发展为四军的二师，同年成立抗联第七军。姜克智在七军先后任排长、连长、团长、副师长。他参加和直接指挥战斗几十次，歼敌200余人，屡立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进行“讨伐”。姜克智率七军一师在同江、富锦地区打击敌人。一天，日军400多人偷偷向一师逼近，姜克智带领部分队伍先敌抢占了卧虎山西面唐家油坊附近的五顶山。

五顶山海拔不高，但山势陡峭，除一侧与卧虎里山相连外，三面是水草甸子，易守难攻。姜克智决定利用五顶山吸引这股敌人，以保护师部密营。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成群结队地向抗联战士的阵地进行轮番攻击。战斗从上午10时开始，直到傍晚，敌人还未能攻上山头，阵地前留下了不少死尸和来不及运走的重伤兵。

夜幕降临。姜克智率部队从山西面草甸子安全转移。不料转移途中，一颗流弹击中他头部，壮烈牺牲。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军区政治部组稿龚惠撰写）

宁死不屈中华魂 ——记范筑先烈士

1937年11月，日军进逼黄河北岸。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匆匆南逃，曾两次命令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撤退到黄河以南。范筑先经过再三考虑，拒绝南撤。在聊城专署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上，他朗读了通告全国的电文：“……筑先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毗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和武装民众，与日寇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辞。”全国各大报纸纷纷登刊这一通电，各界爱国人士对范筑先坚持鲁西抗日给予极大的声援。

范筑先，原名金标，字竹仙，河北省馆陶县南彦寺人，1881年出生在一户贫农家庭。青年时代，经常奔波贩粮于临清、朝城一带，以吃苦耐劳、憨厚倔强名闻乡里。后因家乡遭水灾，无法生活，遂离家从军，于1904年在天津马厂北洋军陆军第四镇当一名备补兵，后当副兵、正目。由于他勤学苦练，被送到天津北洋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深造，毕业后回原部队任哨官。他深感民族危机严重，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遂逐渐萌发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立志富国强兵，建立民国，拥护孙中山发动的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1912年，他加入国民党后，在中央陆军第四师当连长。1913年随部移驻沪杭线一带，曾任炮兵营长、补充团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八旅旅长等职务。

那时，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大大小小的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支配下，长期割据争斗，互相抢权夺地。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范筑先厌恶军阀混战，于1925年抛弃高官厚禄，退居上海，改名“竹仙”。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范筑先毅然复出，投入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更名为筑先，被任命为高级参议、汉中镇守使署参赞。1930年，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任冯玉祥部第一路军参谋长。冯部失败后，范筑先返回山东，从事地方政务，任韩复榘第三路军少将参议。1933年，调任山东省沂水县县长、临沂县县长。在任期间，生活俭朴，关心民众，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被调离临沂时，老百姓夹道欢送，说他做官清如水，明如镜。1936年底，范筑先升任山东省第六区（鲁西北聊城）行政督察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聊城县县长。

范筑先在旧军政界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正直廉洁、爱国爱民的好作风，他对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丧权辱国的行径极表愤懑，但怎样挽救民族危亡？思想上不免有些茫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只有团结抗日，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1937年4月，周恩来委派彭雪枫到山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范筑先几次要求中共山东省委派干部到聊城协助工作。省委派共产党员姚第鸿到聊城，被范筑先任命为专署秘书。

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临清至高唐一线，聊城告急。范筑先临危受命，担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长官，肩负起鲁西北抗日斗争的重任。但韩复榘在日军强攻下，为保存实力，急令范筑先率第六区军政人员撤退到黄河北岸的齐河渡口待命。

范筑先退到齐河渡口，仍时刻惦念着聊城方面的情况。在共产党员姚第鸿、张维翰等人的建议下，他在齐河官庄召开部属紧急会议，讨论是留守还

是撤退问题。有人主张立即渡河南撤，也有人主张暂驻齐河，坐观形势。姚第鸿、张维翰则力主回师聊城，发动鲁西北人民抗战，并说：“鲁西北人民是不愿作亡国奴的，只要我们回去抗战，老百姓会拥护的。”此言正合范筑先抗日救国之心。他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走，何颜对全国父老。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于是，他立即派人回聊城作坚持抗战的宣传动员，安定民心，并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表示他坚决留在黄河以北抗战。

一个月之后，日军进逼黄河北岸。韩复榘第二次命令范筑先率部队撤退到黄河以南。范筑先与中共山东省委驻部代表张霖之促膝交谈，共同分析鲁西北的形势和前途。张霖之一再向范筑先表明中共愿与他合作抗战到底的诚意。范筑先连连点头说：“我是鲁西北人，往哪里退呢？一定要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坚持鲁西北抗战。”当夜，他写了“裂毗北视，决不南渡”的通电，发向全国。

12月，济南沦陷，鲁西北国民党的各级政权相继解体，政府官员纷纷南逃。范筑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依靠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青年，很快建立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先重新建立了县一级的政府机构，其中有聊城、莘县、范县、寿张、冠县等20多个抗日政府，并任命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县长。在范筑先的支持下，各县都建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群众团体，出版了《先锋》、《战地》、《山东人》、《抗战日报》等抗战报刊。“落后的、黑暗的鲁西北变成了先进的、光明的鲁西北”。

当时，鲁西北有土匪和地方民团20余股力量，有的百余人，有的数千人，筑寨据守，扰乱社会。而范筑先部下仅有一个保安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刚刚建立。许多人看到这种局面，劝范筑先用武力解决这些土匪和民团。范筑先断然拒绝说：“我们是全民族抗战，应当协力救亡，有血气的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我们要用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使他们成为抗日的力量。”他骑着自行车，来到驻武城的齐子修部做说服工作，齐部是国民党溃兵。范筑先到这里，齐子修以为范要用武力吃掉他，便摆开阵势，刀枪林立，杀气腾腾。而范一见齐子修就说：“你们这点人马，跑来跑去，还不叫鲁西北的民众吃掉吗？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关头，你们正是为国效劳的时候，不要乱跑了，随我抗战去吧！”几句话说得齐子修无言以对，遂同意范筑先收编为抗日游击第三营，由齐子修任营长。接着，又收编了盘踞冠县的土匪武装韩春河部，编为抗日游击第六支队。仅半年光景，就收编和成立了35个支队、3路民军，约6万余人。

范筑先要求这些部队按八路军方法建军，每个支队都派政治工作人员，普遍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还经常派人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所在地南宫，进行参观学习。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坚持持久抗战，范筑先亲自主持举办了军事干部训练班；又成立了政治干部学校，由范筑先兼任校长。他邀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担任教员和政治指导员。学员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式的短期训练后，大多数被充实到各级抗日政权和游击部队中，成为鲁西北抗战的骨干力量。

范筑先多年戎马控俯，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9月，他亲自指挥过大小战斗近百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使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7年11月，日军一个骑兵侦察队窜入堂邑一带活动。范筑先立即派

部队截击，并亲自带几十个人赶到聊城梁水镇埋伏，全歼了入侵的日军。

在收复范县的战斗中，年近花甲的范筑先曾率部两次攻入日军据守的县城。1938年3月，在第一次攻占县城后，敌调兵增援，架炮向抗日部队阵地轰击，范筑先率部在一座小庙前与敌对峙，炮弹落在他面前，溅了满身的泥土，他面不改色，一动也不动；又一发炮弹将屋顶掀起，他仍站在庙前沉着指挥，组织反击，再次攻入县城，歼灭许多日军。

1938年5月，千余名日军由济南猛攻濮阳，范筑先率部还击，毙敌百余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7月，他又率部在东阿县黄庄设伏阻击日军运输队，击毁敌汽车30余辆，毙敌数十名，缴获满载大米的汽车13辆。

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范筑先率部阻击了增援的日军土肥原师团。为了牵制济南的日军增援武汉，范筑先又组织了济南战役，一度占领济南西郊之张庄兵营，逼近济南商埠的纬七路。就在这次战斗中，他的次子、青年挺进大队长范树民壮烈殉国。噩耗传来，范筑先仍镇定地慰问部队，鼓励挺进大队的队员们继续战斗。他说：“抗日是长期的，不流血牺牲怎能换来胜利呢？”他又命20岁的二女儿范树馄继任挺进大队长。他劝慰夫人武治国说：“树民为国牺牲，是咱范家的光荣。不然，别人怎么会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呢？”不久，他又将长子、长女、三女都送到延安抗大学习，表现了他忠于民族解放事业，誓死抗日救国的爱国精神。

范筑先曾派人到武汉，与中共中央在武汉的领导人取得联系，希望派人到鲁西北工作。中央很快派原红军师长袁仲贤等军事干部到鲁西北。范筑先高兴地说：“现在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像八路军那样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发动民众，我们定能坚持鲁西北抗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由延安到鲁南，途经聊城时，向范筑先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信中对范筑先与共产党真诚合作，坚持敌后抗战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范看信后，紧握黎玉的双手，连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人格极高尚的人。感谢共产党的关怀，感谢毛先生的关怀。”这年10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通过了《鲁西北抗战行动纲领》、《战时经济政策》和《整军方案》等文件，作为鲁西北地区的施政准则。会议还决定将30多个支队整编为4个纵队，范筑先兼任第四纵队司令。

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也引起了山东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不安，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到聊城，向范筑先提出了十多条无理要求，范筑先都严辞拒绝了，他说：“我们是良心抗战。我这么大年纪，胡子都这么长了，还有什么野心！”沈鸿烈公开的目的没有达到，就秘密活动，不久连续发生拉拢收买六区抗日武装等事件。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后，即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调集大批部队，在飞机、装甲车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自济南经东阿进攻鲁西北根据地的首府——聊城。范筑先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布署战斗任务，准备运用包围战术，歼灭敌人。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和破坏，使这一计划落空了。

1938年11月4日，日军将范筑先部600余包围在聊城。范筑先率部应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15日，日军在得到大批增援部队后，强行攻城。范筑先站在东城门楼亲自督战，双方血战多时，范筑先左臂负伤裹伤再战，又被敌机枪打断左腿。在敌众我寡情况下，城门被日军攻破。范筑先以民族大

义为重，不愿被敌人俘虏，举起手枪自戕殉国，时年 58 岁。

1938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为范筑先举行了追悼大会。1953 年清明节时，聊城党政军民举行隆重的移灵仪式，将范筑先及其次子范树民的遗骸移葬于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梁星亮）

艰难百战牡丹江

——记王光宇烈士

王光宇，又名王兴，吉林省德惠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王光宇正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一中的地下党、团组织较活跃，王光宇入校不久即加入了共青团，全力投入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6月，王光宇经组织批准，和同窗挚友陈明亚（陶净非）参加了中共宁安县委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宁安工农义务队，当了一名普通战士。

宁安工农义务队，是从失败了的反日救国军中脱离出来的一支抗日队伍，报号“平南洋”。宁安县委派共产党员于洪仁到该队工作，逐步建立了党、团组织，并将抗日较坚决的队长李荆璞吸收入党，部队改称“宁安工农义务队”。中共宁安县委为改造、建设这支抗日武装，派王光宇、陶净非在队里配合党、团组织，向士兵们宣传抗日形势，教唱抗日歌曲，帮助青年士兵学文化，代年长战士写家信，因而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尊重。由于他工作出色，于1933年底被秘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宁安工农义务队成员复杂。1934年后，宁安工农义务队连续打了几次胜仗，缴获不少战利品，按规定全部归公。此事引起了队内几个中下层小头目的不满，他们留恋过去那种打着抗日旗号占山为王的日子。1934年8月的一天早上，部队正在宁安县唐头沟宿营，几个小头目以要求发饷为名，煽动部分士兵包围大队部，开枪打死了副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于洪仁，收缴了党、团员的枪支，并把大队长李荆璞捆绑在队部门口的树上。

变故突发，情况危急。当时，党支部处于瘫痪状态，混在士兵中的王光宇已打定主意，要设法救出大队长，保住这支抗日队伍。他和陶净非商量了一下，便分头到士兵中做工作。不一会儿，全队士兵都聚集到队部门口。王光宇在人群中高声地说：“大队长一直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没干过对不起大家的事，快放了大队长！”士兵们也喊道：“咱们是为了抗日来当兵，为什么要害抗日的带头人？”“日本鬼子要抓大队长，你们这不是帮日本鬼子的忙吗？”那些先前被裹挟来的士兵，也转而要求释放李荆璞。几个坏头目退入队部商量对策，王光宇、陶净非毅然闯入队部，代表全队弟兄为大队长说情。几个坏头目见屋外都是荷枪实弹的战士，不得不答应士兵们的要求。王光宇2人出来后，迅速为李荆璞松绑，低声通知他赶快离开。当人群散去后，几个坏头目又带人抓李荆璞时，李已带着20多名党、团员和骨干转移了。

王光宇等人的机智、勇敢，为党保存了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火种。不久，以李荆璞为大队长的一支新的宁安工农义务队又活跃在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

1935年2月，以宁安工农义务队为基础，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王光宇任五军一师一团政治委员。1936年2月，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王光宇任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率领二师一部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一带。

1936年春，王光宇任五军二师师长时，率二师四、五团游击于穆棱、林口一带。此时，牡丹江至林口段铁路已建成通车，敌人开始利用它运输兵员、物资。王光宇决定在铁路上搞一次行动。

5月20日清晨，王光宇带领部队到林口附近的五河林北面的朱家、仙洞一带。这里是山区，铁路在山腰间蜿蜒穿过，是个伏击敌人火车的理想地段。

王光宇下令扒掉几十米铁轨，然后将部队隐蔽于两侧。半晌午，敌人一列货车开过来了，司机发现铁——m 一路被扒后紧急刹车。这时，抗联的战士们有的向机车扔手榴弹，有的集中扫射押车日军，只用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击毙日军士兵 16 名，缴获两挺机枪和许多子弹，大米。5 月 25 日，王光宇又率部在三道河子颠覆敌火车一列，打死日军少佐、上尉以下 6 人。当敌人调来大部队沿铁路线“扫荡”时，王光宇又率部转向密山、勃利一带活动了。一个月后，王光宇又率部出现在依兰刁翎，成功地伏击了二道河子伪军的运输队，击毁敌人汽车 4 辆，全歼押车伪军 30 余人，缴获步枪 30 支、机枪 1 挺和一大批棉布、粮食和其他日用品。

1937 年 2 月 21 日，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方正县洼洪河第九军军部召开会议，决定集中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军，于 3 月间联合攻打依兰县城，以阻止日本侵略者在方正、依兰、富锦、勃利各地推行“集团部落”、“坚壁清野”、“经济封锁”的政策，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军械、弹药。3 月 19 日，攻打依兰县城的战斗打响后，遇到敌兵顽抗，攻城部队转入支援伏击日军援兵的战斗。21 日，双河镇 400 余名敌兵出援依兰，当行至新卡伦附近，第五军二师师长王光宇指挥的第五、第八军打援部队进行伏击，击毙敌兵 220 余名，缴获迫击炮 3 门，轻机枪 7 挺，步枪 136 支，弹药甚多。

7 月，王光宇率二师为骨干组成的“下江远征队”，由依兰东进宝清，与抗联第三军四师、第六军一师、第四军、第七军相互配合，取得许多胜利。8 月，王光宇率第五军警卫旅向宝清运动，途中在太平川伪装成日军“讨伐队”，打进反动地主李家大院。群众称赞五军二师是“神武救国救民之师”。

11 月 30 日，王光宇被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调到抗联四军任副军长后，率领四、五军各一部，共百余人，游击于富锦、宝清一带。一天，他们在宝清活动时，突然被数百名日军骑兵“讨伐队”的包围。王光宇沉着指挥，终于突破敌围，还毙伤敌 40 余人。12 月 28 日，王光宇又指挥第四军及第五军二师一部共百余人，袭击桦川县聚宝山伪警察署和伪警备队。王光宇一面部署兵力，佯作强攻姿态，一面利用内线提供的情况展开政治攻势，很快瓦解了敌人，顺利地解除了全部伪警察的武装，缴获步枪 143 支，手枪 6 支，轻机枪 1 挺，子弹万余发，此外还有军马、服装粮食等物资。不少伪警自愿参加了抗联部队，后来成为五军二师游击团的骨干力量。

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密营里的粮秣供应十分困难。王光宇看到伤员和大家一样喝土豆汤，吃干菜窝窝，心里很着急，便带领几个战士到山沟里摸哈蟆，给伤员煮着吃。王光宇的手被冰碴划得满是血痕，十个指头冻得像个胡萝卜。

一天晚上，王光宇找来 12 名战士，商量出山搞粮食的事，几乎一夜未睡。次日一早，他就带队出山了。天正下着大雪，他们走了 100 多里才弄到一些粮，每人背着 30 来斤粮食往回走。这时大雪已经封山，王光宇背着粮食在最前面为大家踏雪开路。他开玩笑地说：“我要是掉进雪窟窿，你们可得把粮食给我背回去！”半路上，大家坐下休息，衣衫单薄，又冷又饿，但谁也没提出做点饭吃。背粮队伍中，密营的伙食长老孙头年纪较大，身体较弱，休息时睡着了，这一睡再也没有醒来。王光宇亲自掩埋了老孙头，坚持把他背的粮食背在自己身上，仍在队前踏雪回到密营。伤员们都激动地哭了，说：“有王副军长这样的好带头人，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1938 年后，在黑龙江东部三江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各部，进入了异

常艰苦的斗争阶段。敌人调集 6 万余正规部队，对三江地区实行分割包围，重点“讨伐”，企图将抗联部队“聚而歼之”。

1938 年 5 月 27 日，王光宇和四军军长李延平率四军西征部队踏上征途。经过一个多月边筹粮、边战斗的艰苦行军，到达牡丹江岸与五军西征主力会合。经过混合编组休整后，穿越 300 里无人烟的高山密林，7 月 8 日突然出现在苇河县楼山镇。

在攻打楼山镇战斗中，王光宇率奋勇队负责穿插突破。镇内驻有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由白俄组成的铁道守备中队和数十名伪警察。7 月 12 日拂晓，王光宇率奋勇队出敌不意地攻入镇内，将敌人分割包围。激战中，白俄守备队长带着几个队员挥刀扑向王光宇。王光宇临危不乱，闪身躲过刀锋，反手一枪，子弹穿过白俄队长胸膛，又打进他身后另一个敌人的脑袋。“王副军长一枪打死俩白毛！”成为西征途中的美谈。

部队自楼山向珠河西进途中，几乎天天作战，断粮断炊，王光宇始终坚定地率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向五常进军。

12 月末，王光宇到达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和抗联十军某部会合后不久，在一次遭遇战中受重伤，未能突出敌围而壮烈牺牲，年仅 26 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龚惠撰写）

天地能知忠烈心 ——记涂正坤烈士

1939年8月1日，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万余人，在中共中央机关礼堂悼念在平江惨案中殉难的涂正坤等烈士。会场正中悬挂着中共中央送的挽联：

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先古今憾；
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等党和军队领导人都送了挽联、挽诗。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

涂正坤，原名正生，1877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镇谢江乡贫苦缝工家庭。1925年，他参加罗纳川在平江嘉义地区开办的平民夜校，并以缝纫为掩护，发动纸业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地主豪绅作斗争。这年5月，他由罗纳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涂正坤率领平江农民暴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历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兼作战分区政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长期坚持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他与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傅秋涛、邓洪等人领导和指挥了多次反“清剿”的残酷斗争，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湘鄂赣根据地仍保存下来近500名党员干部、390多名红军战士。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反革命策略，一面与中共中央谈判合作抗日，一面密令国民党军队继续“清剿”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湘鄂赣省傅秋涛、涂正坤等领导人，密切注意形势的变化，研究党的政策，一方面向群众和国民党人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政策，一方面积极做好与国民党谈判的准备。

1937年2月，涂正坤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党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这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以傅秋涛为主席，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为委员的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

谈判开始前，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利用叛徒孔荷宠等前来“招抚”收编。涂正坤和傅秋涛等严厉警告他们：叛徒来“招抚”，我们就杀，给其以有力的回击。7月18日，湘鄂赣省委派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等，与国民党第五十师一名旅长、一名团长、一名副团长、平江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人，在平江嘉义镇关帝庙进行了谈判。谈判中，傅秋涛、涂正坤等严正驳斥了国民党方面所宣扬的“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一个主义（三民主义）”的谬论，解决了一般性的问题。正在这时，党中央派赖传珠、李涛来湘鄂赣省委，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7月20日，傅秋涛、涂正坤等到浏阳，与国民党五师师长岳森进行正式谈判。当谈到释放政治犯和集中红军游击队等实质性问题时，岳森提出提交名单等条件，企图事先杀掉中共方面的人员，并趁红军部队集中之际聚而歼之。涂正坤和傅秋涛洞察其奸，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机智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双方商定：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在浏阳建立红军游击支队的办事处；红

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红军游击支队的经费问题，尚待武汉行营谈判解决，8月20日前后，湘鄂赣省委刘玉堂、黄耀南等人到武汉行营谈判。8月29日，在中共代表董必武的支持下，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成功，湘鄂赣边区终于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湘鄂赣边区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团长傅秋涛率领，于1938年2月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任书记，留在后方坚持斗争，公开身份是新四军上校参议、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主任。他同罗梓铭、黄耀南等人领导特委和通讯处，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救亡斗争。

他们一面迅速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教育党员在抗日救亡斗争中发挥模范作用，一面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建立和健全抗日群众团体，在平江县城组织“救亡剧团”，开设“大众书店”，创办“老百姓壁报”，广泛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涂正坤把自己的独生女儿涂丰云送去皖南抗日前线，英勇杀敌（后来在芜湖战役中壮烈牺牲）。涂正坤带头节衣缩食，筹集资金和药物，为留在嘉义的100多名伤病员治疗，使70多名伤病员伤愈康复，组成补充连开赴前线。

涂正坤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第九战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调防平江。他们强占民房，抢夺财物，乱摊捐税，群众来到通协控告他们的暴行，要求制裁“遭殃军”。涂正坤除了向杨森总部提出要严肃军纪外，还耐心地劝导乡亲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他说：“打日本鬼子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杨森部队虽坏，只要他们不公开投敌，我们还是要耐心争取它。万一日本鬼子占据了平江，共产党决不离开平江人民，一定要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组织起来打游击，抗日保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5月30日，由蒋介石亲自签署密令，发往驻长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处。密令中说：“据报：中共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涂正坤，以游击为号召……且密藏多量军火……专以平江为根据地……影响殊非浅鲜，请设法制止，以免滋蔓。事关后方军事秘密活动，相应函请查核办理。”

薛岳、杨森立即行动。嘉义国民党驻军一个营控制了对面两个山头的制高点。杨森部特务营20多人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改着便装，散在通讯处附近。涂正坤觉察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上述活动后，立即召开特委和通讯处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了应急措施：将通讯处人员精减了十人；凡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转移到新四军中或其他地方隐蔽；特委和通讯处分开；改变了特委与各县同志的接头地点；机要文件等转移到谢江一带崖洞里。但对通讯处机关的安全未采取防范措施，没有估计到会发生的惨案。

1939年6月12日下午3时，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派兵秘密包围了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杨森所部中尉侦察员张绍奇，以请涂正坤参议去嘉义区公所商议抗日紧急事宜为名，将涂正坤引到离通讯处30多米的巷口。预先埋伏在巷口的几个刽子手，对准涂正坤猛烈扫射。鲜血从涂正坤的胸口涌出。他忍着疼痛，硬撑着身躯往回走，

朝通讯处方向呼喊：“杨森下毒手了，同志们，快走！”他牺牲时仅 42 岁。

枪响后，杨森部特务连冲进通讯处，将财物抢劫一空，并将通讯处秘书长吴渊枪杀。是夜，又将特委和通讯处于部罗梓铭、曾金声、吴贺全、赵绿吟等 4 人，押往嘉义镇旁的虎形岭活埋。涂正坤烈士的家乡，听到涂正坤被害的消息，当晚有十多名老赤卫队员，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将涂正坤的遗体运回河包洲，含着悲痛，安葬了自己的亲人。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凌辉撰写）

英雄血洒西周村 ——记丁思林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编印了一本《烈士传》，刘伯承师长在序言中写道：“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周年。在这三年里，我们一二九师经过了3156次大小战斗……消灭与击伤的日伪军有134678名……这些成绩是由我们共产党人和非党布尔什维克的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我们的丁思林同志……等，他们都是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们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只有伟大的革命者才有的，有了它可以战胜一切……”丁思林1915年4月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丁家岗。他1932年5月参加工农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历任战士、班排连长，团参谋长、团长。善于指挥打夜战，参加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挺进川陕、长征路上，打了很多胜仗，先后六次负伤，总是不下火线。

1937年8月，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丁思林所在的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一营，他由团长改任一营营长。在抗日前线，无论是神头岭、响堂铺，还是长乐村、香城固等著名的战斗中，都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

1938年8月1日，三八六旅组建新一团。9月3日，丁思林就任新一团团长。

1939年2月上旬，日寇占据了束鹿、钜鹿、广宗、威县、临清、武邑等城镇，并继续向冀县、南宫、枣强地区合击。刚刚建立的冀南根据地处于两面夹击之中。

为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在陈赓旅长指挥下，三八六旅乘敌立足未稳，多次向广平、肥乡、曲周、鸡泽、威县等据点进行袭击。

在袭扰曲周驻敌时，丁思林巧妙地施行“隐身术”、“化装术”，组织新一团官兵混在出城种地的农民中，进入城内。等到夜深人静，便炸毁敌人的弹药库，烧掉敌人的给养，向敌司令部大院投掷手榴弹，每次行动时，丁思林都嘱咐战士们：“带上布告，贴到小日本的鼻子底下，让他们吃不香，睡不着。”对此，鬼子们惶惶不可终日，连做梦都在想布告上的字：八路军将在不日攻城。

新一团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冀南人，对本地地形、风土人情都很熟，混入群众中，敌人哪里发现得了？丁思林根据这一特点，连续三夜发动战士组织周围群众，虚张声势，架起土枪土炮、“地地嘣”等，佯装攻城。开始，城里的敌人一直认为是八路军的小股部队，不予理睬。结果上城一看，四面是枪声，便连夜调遣邱城、肥乡两县之敌，火速增援。敌来我走，新一团又化整为零，变成了周围各村群众。这样，搞得日寇动不能动，睡不能睡，有时连饭也吃不成。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要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

陈赓旅长想：敌人有出城报复的特点，现在诱敌于伏击阵地歼灭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就拟定了布置圈套、引狼就范于曲周县香城固的伏击战方案，并下达到了各团。

2月初，根据旅的统一部署，丁思林带领新一团，连续袭击威县、曲周等城，以短促火力杀伤敌人，千方百计诱敌出笼。

2月10日，被激怒了的威县之敌果然中计，抽调第十师团四十联队一部，派出汽车9辆，运载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向威县以南进犯。12时许，这股敌

人进至南草厂附近，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骑兵连的突然袭击。骑兵连随即向后撤退，敌人紧追不舍，其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钻进了“口袋”。

当日军9辆汽车全部到达香城固村北街口伏击圈时，埋伏在那里的六八八团立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击毁了头一辆汽车。日军安田中队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东、西、北三面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有正南面在阻击，就命令部队突围。这时，新一团和南、东三面各参战部队一齐开火，猛烈堵击、侧击敌人。敌人掉头向威县逃窜。

这一面正是伏击圈的入口，地势低，无法预先构筑隐蔽工事，也无法事先设伏，旅部命令新一团立即向北运动，扎住这个袋口。丁思林把手一挥，喊道：“同志们，我们一定堵住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全团勇士冒着密集的子弹，如一只只猛虎，从西北冲上坡冈，向敌人猛烈射击，截断了敌人的唯一退路，将其围在凹形洼地。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鬼子的汽车大部分陷入沙窝，车轮空转，越陷越深，前进不得；几辆开得动的汽车，也被丁思林指挥部队用集束手榴弹炸坏，日军安田中队长组织兵力向新一团阵地冲击。丁思林勉励大家：“沉住气，人在胜利在！坚决消灭敌人！”

新一团的子弹不多了。这时数百名日寇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丁思林命令战士们上刺刀，大声喊道：“拿出一点杀气来，打出新一团的威风！大家拼啊！”硬是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退了下去。

从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敌人发起4次冲锋，都未能前进一步。灭绝人性的日军向新一团阵地投毒瓦斯弹，很多人中毒。丁思林团长立即组织战士们将集束手榴弹投向毒瓦斯，炸散了毒气，打退了敌人又一次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这时，敌人在“口袋”内乱蹦乱跳。聚歼的时机成熟了。指挥所的冲锋号一响，丁思林率先跃出阵地，端着刺刀，冲向敌人。沙滩上，到处是鬼子的尸体和绝望的嚎叫，一辆辆被毁的汽车，燃烧着烈火。到深夜12时，安田中队和四十联队补充大队被全部歼灭，共打死安田中队长以下官兵250余名，生俘8名，毁掉汽车9辆，缴获各种火炮3门，长短枪百余支，弹药一批。从而粉碎了敌寇东西夹击南官，破坏冀南根据地的阴谋。

在这次战斗中，新一团被朱德同志赞誉为“模范青年团”，后又被八路军前方总部授予“朱德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1939年7月初，敌抽调5万余人，对晋冀豫区进行大“扫荡”。为了粉碎敌人分割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丁思林率新一团对太谷至分水岭一带敌军进行了连续的袭击。

太谷县黄挂村是驻太原敌寇后方交通的总枢纽。也是训练伪军高等顾问的所在地。敌人用三道铁丝网和三道交通沟紧紧地把自己缠裹在小村子里。7月4日午夜，鬼子们已经沉沉入睡。丁思林悄声对战士们说：“我们要把黄挂村的敌人都消灭，用我们的胜利来纪念‘七·七’抗日战争两周年！”他指挥突击队先打死敌人的哨兵，尔后敏捷地越过三道铁丝网，跳过三道交通沟，抢先夺占了敌人的两个高楼庭院。

丁思林向后续部队一挥手：“上！”突然，枪声大作，手榴弹在黑屋里爆炸。在浓密的枪声和爆炸声里，鬼子们赤脚四处鼠窜。

战斗干净利索地结束了。仅缴获的文件就整理四五天。丁思林兴奋地说：“让敌人认识认识八路军的厉害！”实际上，深入敌占区去袭击敌人，是丁

思林和新一团的拿手戏，夜袭黄挂，不过是其中的一次。

1939年7月5日，敌一九师团一七联队300多人，由南关分水岭、来远镇分路来犯，当晚该敌会合于石盘镇，6日进至榆社云簇镇。

为了给敌人以沉重打击，7月6日，丁思林和新一团的勇士们夜袭云簇。当夜23时发起战斗。

敌遭袭击后全力反扑，7日与新一团在云簇附近的新庄、高庄、桃阳、乔家沟一带激战。

8日上午8点至12点，暴雨倾盆，弹雨横飞。丁思林带新一团在西周村的高山上，没有休息，没有吃饭，同敌人激战了两天，杀伤敌人上百名。战斗快要结束了，大家请求：“团长，这次你先撤，我们掩护！”丁思林瞥了一眼：“老规矩，你们先下去，我和一连一班留下掩护。”

正在这时，日军猛攻了上来。他从战士手中夺过机枪，一边射击一边说：“狠狠地打，不要让小鬼子占半点便宜！”

敌人被雨点般的子弹压退了。丁思林高大的身子立起来。就在这时，敌人集中轻机枪扫射过来，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年轻的丁思林倒在了血泊中……

当天夜里，在山西榆社县南社村，三八六旅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追悼丁思林的大会。

为表达对丁思林的哀思，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写了《悼丁思林同志》一文。

按照陈赓的意见，丁思林的遗体安葬在武乡县。这年8月，黎城、辽县、榆社、武乡等县的群众，在长乐村为丁思林团长和先一年牺牲的叶成焕团长建立了一个纪念碑。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阳撰写）

潞龙河上留忠魂 ——记刘亦珂烈士

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冀中大地。1937年8月的一天深夜，白洋淀南端的北冯村一间农舍里还亮着灯，窗户纸上，映出一个来回走动的人影，他就是冀中老党员、年方24岁的刘亦珂。两年前，冀中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到了严重破坏，除了被捕牺牲的同志，其他党员有的外出投亲靠友，有的暂时停止了活动。最近一段时间，党组织正在开始恢复，但力量单薄的活动与突然爆发的抗战危急形势又是多么不适应啊……正在这时，窗棂上发出轻微的“嘭、嘭”敲击声，刘亦珂压低声音：“谁？”“是我。”窗外传来一句熟悉的答话。中共保东特委军委负责人侯玉田来了。他还领来老红军战士孟庆山同志。孟庆山同志原是红一方面军教导四团团长、红一军团补充第一师三团团团长，毛主席刚从延安派来冀中组织河北游击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今天晚上找到刘亦珂家来了。刘亦珂是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人，1913年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在本村完小读书时，受地下党员王志影响，1930年秋加入了共产党，进行秘密工作。他与王文波、王宪周几位党员曾领导白洋淀渔民和农民抗捐抗税，大闹安新县城。孟庆山来后，刘亦珂几乎白天黑夜都和孟庆山在一起，商量组织河北游击军的事。经孟庆山提议，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北冯、孟仲峰、东刘各庄、关城等基础好的村子办起了抗日干部游一9、击战争短期训练班。孟庆山吃、住在刘亦珂家，每天由刘亦珂骑着自行车驮着孟庆山去各村讲课。训练班首先训练了1932年9月参加过高(阳)蠡(县)农民暴动的老党员，作为河北游击军的营、连、排干部，接着又训练了3期，共培训了几百名党员骨干，这些骨干从训练班出来，即奔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和做组织队伍的工作。刘亦珂白天跟着孟庆山四处去上课，晚上则积极组织北冯村一带抗日基本力量，很快拉起了四五十人的队伍。

10月，按照上级指示，成立中共保属特委，统一领导冀中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孟庆山任军事委员。此时，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如蠡县的华北抗日自卫军第一大队，定县的晋察冀抗日义勇军第八支队等。这时孟庆山盯住了驻扎在高阳县城的保安队，这支200多人的队伍随国民党政府南逃时到了高阳县城就没有再走，打起抗日旗号，自称“暂编第一师第一团”，该团团长尹松山想当“高阳王”，发“国难财”。根据这种情况，孟庆山、侯玉田、刘亦珂通过关系，首先争取这个队伍的二营长王春芳真心抗日，尔后派人进高阳城同尹松山谈判抗日之事。谈判破裂，便在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军队配合下，将尹松山部队消灭，占领了高阳城，成立了河北游击军，逐步建立了司、政，后机关。

刘亦珂带领队伍，进驻保属特委活动的中心地区高阳城后，在孟庆山的指挥下整顿了队伍，扩充了兵员。11月初，根据形势发展，孟庆山任命刘亦珂为河北游击军新安游击师师长。

一天，有人报告：今天早上有两辆日军的汽车驶到新安镇，车上共5个日本人，为首的一个叫铃布五郎，是什么指导官。刘亦珂和大家分析，这5个日本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敢孤立闯入冀中腹地，正为我们提供了歼敌的机会，经周密计划，趁中午日本人喝酒时，刘亦珂率队伍一拥而上，缴了日本人的枪，将其捆绑起来。这一事件，在新安引起了极大震动，很多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农民、学生纷纷前来报名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了3000多人。

1937年12月底，河北游击军发展到下辖十二路军另3个游击师、3个独立团。刘亦珂担任河北游击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群众喜称“小八路”。

日寇妄想扑灭冀中抗日火焰。抽调部分日军和伪军向抗日军队进犯。1938年初日伪军5000多人刚从新城、雄县进攻到白河，就遭到刘亦珂、刘可忠率领的游击军第八路军的阻击。当时天寒地冻，游击军给养不足，对面的敌人从数量到装备都强于我军。为了给河北游击军主力北调争取时间，刘亦珂率部利用白沟河作屏障，爬在冰凉的河堤上用汉阳造、独撅、火枪等简陋武器向敌人射击，阻止敌人过河，与此同时，孟庆山率河北游击军6个团1万余人，从左、右两翼迂回而上将敌人包围，立刻发起总攻。在白沟河一带经过近一天的战斗，打死敌人300余名，俘虏500余名，击溃大部，打垮了敌人的北路进犯。

从南面进攻的敌人有日军1000多，伪军2000多，还有飞机、坦克配合，气焰非常嚣张，河北游击军第二师在藏家桥进行阻击，只守了一天，防线就被敌人突破，敌军长驱直入，我党政机关所在地河间城直接受到威胁。

河北游击军主力于次日凌晨陆续赶到河间。刘亦珂指挥的第八路军较早进入了八里桥阵地。前面是一道刚刚化冰的小河，徒步涉水困难，刘亦珂立即指挥部队找来几只小船，船上放上引火物，放在桥下将桥燃着，阻止敌人过河。上午10点多，敌人开始进攻，先是用猛烈的炮水向我阵地轰击。刘亦珂指挥战士接连打退敌人进攻。敌人几辆坦克冲到河边，因为没有了桥，空打转转。下午，敌人四架飞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刘亦珂领导战士边隐蔽边阻击，坚持到下午五时。河间城里我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了，刘亦珂才指挥部队带着杀伤日伪军300多人的胜利转移。

河北游击军乘敌人在河间城立足未稳，组织部队围攻河间城。3月初的一个深夜，1.5万人的攻城部队到了进攻出发地。午夜1点，四面八方土炮齐鸣，全城立即变成一片火海，打得敌人懵头转向，分不清是什么武器。枪炮声、喊声震得大地发颤，敌人被吓破了胆，有的趴在地上，有的钻入民房。随着冲锋号的响声，刘亦珂首先指挥该部利用云梯攻上北城墙。其他几面的城墙上，也被兄弟部队攻占，接着展开激战。敌人见大势已去，只得打开南门，用坦克开路，仓皇逃走。这一仗，又毙敌人300多，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刘亦珂和他指挥的八路军游击军因作战勇敢、灵活，受到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的通令表彰。

1938年4月21日，冀中党组织在安平县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由北方局派黄敬来主持，讨论了统一战线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及建军卫作。会议决定，将吕正操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辖第七、八、九、十支队（分别兼一、二、三、四分区）。之后，部队开始整编，由于是由大编小，很多师长当团长，各路军总指挥编成了团长或大队长。合编中，刘亦珂所在的八路军编为三十大队，他被任命为大队长，归冀中军区九分区领导。刘亦珂愉快服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打了好几次胜仗。

1939年6月，日本鬼子在高阳县旧城镇设了据点，8月6日，刘亦珂奉命率部去攻打旧城镇据点。当夜12点，刘亦珂率四营开始正面进攻，一、二、三营从三面攻打。清晨，800多敌军溃败，弃城而逃。追击途中，为将逃跑之敌截住，刘亦珂率部分部队急忙找来船只渡潞龙河，在船上他大声招呼大家：“同志们，快点，抄近道堵住敌人！”这时，没料到从高阳城赶来支援

的日军已到了河边，他们看到船上我八路军队伍，架上机枪疯狂扫射。刘亦珂也发现了敌人，命令：“掉转船头撤退！”话未说完，几颗子弹打中他前胸，血水染红了小船，溶入清清的潞龙河。刘亦珂说：“赶紧撤退，以后再收拾他们！”说罢，停止了呼吸。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明撰写）

青春热血铸丰碑

——记郭征烈士

他仅度过了 25 个春秋，便在烽火弥漫的抗日战场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是八路军第一二 师独立第一旅参谋长。在他壮烈牺牲的河北省行唐县秦台乡秦台村西南黄土地上，竖立着一块汉白玉墓碑，正面用正楷镌刻着“民族英雄郭辉勉之墓”9 个耀眼的大字。

郭征，又名郭辉勉，1914 年出生于江西省泰和县冠朝乡楼居村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代参加儿童团，1930 年 7 月参加红军，这年 10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红军历任传令兵、侦察通信科参谋和科长，长征中几经苦战恶战，立了大功。

1937 年 1 月，郭征被选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成为第二期学员。在抗大里，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征肩负着党给予的重任，来到八路军第一二 师任司令部作战科长。9 月 3 日，第一二 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挥师东渡黄河，向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挺进，开赴抗日前线。随后第一二 师转至晋西北，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这一带有滔滔黄河水，高高黄土坡，到处是沉甸甸的红高粱，低矮的窑洞。这里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的践踏，无数父老乡亲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郭征和许多来自南方的抗日将士悲愤交加。在晋西北，他随师部组织的地方工作团在五寨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 年冬，一二 师主力部队的指战员踏着冰雪，向冀中挺进。次年 1 月 25 日，到达冀中河间西北惠伯口，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师。2 月，郭征等 7 名干部奉令到冀中地方武装高士一的五路军参加改编。临行前，他兴奋地说：“伙计们，我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这次组织上派我到五路军去改编，又要进行新长征了，要前进，我就干脆改名为郭征吧。”站在一旁的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听后高兴地说：“好！有勇气，我赞成，下令文时就把他郭辉勉改为郭征。”

高士一的五路军改编为独立四支队后，郭征任第二团团团长。1939 年 4 月，独立第四支队和七一五团合编为一二 师独立第一旅，郭征任参谋长。年仅 24 岁的郭征，血气方刚，身材高大，魁梧健壮，四方脸膛，眉宇间给人以乐观而又坚毅的印象。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五次反围攻的战斗中，郭征与旅的其他领导人率领部队与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以“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使敌人连连扑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

1939 年 4 月 22 日，第一二 师在河间东北的大朱村召开庆祝反五次围攻胜利大会，贺龙师长正在台上讲话，侦察人员报告说，河间县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 800 余人，伪军约 600 余人正向我开进。贺师长听后笑着说：“好吧，敌人送上门来，我们就打。”接着，庆祝会变成了战

前动员大会。

23日上午9时许，日军开始炮击河间县齐会村，随后步兵发起进攻，将八路军第七一六团第三营包围在村内。郭征亲临前线，指挥所辖七一五团一部突入齐会村，与外面担负反包围任务的部队一起，对敌人实施夹击。日军遭受沉重的打击，并不甘心失败，疯狂地向大、小朱村发射毒气弹，企图向南突围。八路军英勇地向敌反击。翌日拂晓，日军退至南留路、找子营之间的树林坟地中，继续负隅顽抗，等待援兵。郭征率领所属部队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25日，在我军沉重的打击下，日军大部被歼，只有80余人乘着黄昏夜暗、风沙骤起之机逃回河间县城。是役，歼敌700余人，取得齐会村战斗的重大胜利，创造了平原歼灭战的成功范例。战后，贺龙师长对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要给郭征这个江西伢子记功。”

郭征在冀中参加指挥和直接指挥大小战斗116次，每打一场胜仗，总喜欢用口琴吹上几首乐曲，表达内心的欢乐。

1939年8月上旬，第一二师由冀中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山区转移。9月，主力进至河北省行唐县西北日头镇、程家庄等地整训待命。25日上午，驻石家庄和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以及灵寿、正定等4县伪军共1500余人，由灵寿出动，采取“牛刀子战术”奔袭晋察冀边区重镇陈庄，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与八路军主力决战。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首长决心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之敌。27日，敌军占领陈庄。郭征和独立第一旅政委朱辉照、副旅长王尚荣等，带领旅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冯沟里地段。28日，敌焚毁陈庄后向东撤退，全部进至冯沟里、破门口等八路军待机地域，向独立第二团阵地猛烈进攻。郭征在旅前沿指挥所里指挥第二团顽强坚守阵地，打退了敌人6次攻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行动，使友邻各部队完成了对敌人的四面包围。黄昏时分，八路军各部队开始对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将敌军分割包围于冯沟里、破门口两个村内。夜里，敌残部如困兽犹斗，抢占了鲁柏山两侧的高地，企图拼死突围，但在八路军强大的攻势下，终未得逞。

战斗进行到29日黄昏，被围困的敌人大部被歼灭。独立第一旅正面，只剩下被敌200余人占据的最后一个高地。为了迅速解决战斗，郭征站在仅距敌300多米的前沿阵地上，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最后的猛烈进攻。他拿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不断地观察着前方情况，脸上渐渐露出了胜利的笑容。他激动地朝冲击的战士们大声喊道：“我们就要胜利了，同志们，冲啊！”然而就在这即将胜利的时刻，从敌军阵地打来一排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和头部，战士们把他抬下阵地，战斗到30日下午，共歼敌1100余人，取得了八路军山区歼灭战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郭征被抬到前方包扎所，由于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战后，第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独立第一旅的广大指战员们，在行唐县秦台乡秦台村西南山坡上，为郭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战友们给他穿上一套崭新的军服，将他平时心爱的口琴、钢笔等遗物放在棺木内遗体旁。

1983年9月，郭征烈士的骨灰迁回江西省泰和县安葬。

（南京军区政治部、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张小乐撰写）

林海雪原写春秋 ——记杨靖宇烈士

20世纪30年代，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活跃着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名显赫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他的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就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又名顺清，字骥生。因革命工作需要，他曾用张贯一、乃超、周敏等化名。“杨靖宇”这个化名，是1932年他赴南满工作后开始使用的。1905年农历正月初十，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他7岁进本村私塾读书，13岁时考入确山县高等小学，19岁时考入河南省开封纺染工业学校。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杨靖宇参加了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秋天，他参加了河南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协社，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0月，杨靖宇受党的指示，回到家乡确山县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2月15日，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会长。

这年4月4日清晨，杨靖宇等根据中共确山县特别支部关于组织农民暴动、攻占县城、声援北伐的决定，带领万余名手持大刀、长矛、锄头、鸟枪的农民武装，向确山县城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昼夜浴血奋战，歼敌200多人，活捉伪县长，暴动成功了！

5月5日，杨靖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了11月1日的豫南暴动。起义武装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确山支队，杨靖宇任总指挥。11月22日，他与党代表李鸣歧等指挥工农革命军突袭明港，歼灭了民团；次日在明港击溃地主武装。

1928年春，杨靖宇率部队转战到大别山区的四望山，与其他农民起义军会合，共同创立了四望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春杨靖宇奉党中央指示，化名张贯一，到东北工作。曾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1932年4月任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这年冬天，他乘坐一列火车，来到南满烟墩山车站，进入密林。

1933年初春，磐石县抗日“工农义勇军”领导人李红光带两名战士赶到约定的地点，迎接杨靖宇到达部队。

杨靖宇经过了解情况，将磐石义勇军与其他抗日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他任政治委员。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

接着，杨靖宇去海龙县巡视工作，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不久，他听说磐石游击队受到损失，回到磐石整训部队，重振军威。磐石游击队从成立到1933年5月，经历大小战斗60余次，消灭日伪军130多人，建立了以红石砬子为中心，包括磐石、伊通、双阳、桦甸、吉林七区在内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杨靖宇积极贯彻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示精神。他6月间参加了省委的会议后，在南满认真宣传中共关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以磐石游击队名义印发了告工人、农民、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士兵等传单，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1933年7月，杨靖宇邀请在磐石北部的“毛团”、“马团”、“赵旅”、

“韩团”、“三江好”、“四季好”、“常占”、“许团”等部义勇军和山林队首领举行会议，共同协议组成“联合参谋处”，推选毛作彬（毛团首领）为总指挥，杨靖宇为政治委员长，李红光为参谋长。这种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经过杨靖宇以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伪军营垒也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整连整排地哗变，加入抗日队伍，使游击队的阵容更加壮大，战斗力也不断提高。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磐石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10月下旬，杨靖宇率独立师主力渡过辉发江南下，挺进到敌后的濛江（后改靖宇县）、辉南、金川（今辉南县金川镇附近地区）、柳河、抚松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先后进行了金川县旱龙湾碱水顶子战斗、柳河县三源浦战斗，既沉重打击了敌人，也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并争取了一些抗日军的首领。不到半年时间，在党的联合抗日的旗帜下，杨靖宇又团结了20余支抗日武装，共约4000多人。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和各路抗日军首领在濛江县城墙砬子协商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被推选为总指挥。

1934年11月5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四道江二岔召开，11月7日，大会根据杨靖宇的提议，宣布将独立师正式组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宗翰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兼政委。一军成立后，杨靖宇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指挥部队粉碎敌人的秋季“讨伐”，先后打下16个大小城镇，把游击区扩大到25个县。

1936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仍任军长兼政委。7月初，杨靖宇和魏拯民主持召开了东满、南满特委及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将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面对逐步发展起来的抗联第一路军这支抗日劲旅，杨靖宇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

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

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高悬在我们的天空中，普照着胜利军旗的红光。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1936年6月，杨靖宇以第一师远征辽西、热河、内蒙古地区，以打通与关内红军及党中央的联系，扩大游击区，自己率军部从河里出发，向南转战。

在南进途中，部队于通化大荒沟成功地伏击了日军守备队，歼敌 200 余人；紧接着又在辑安县（今集安）二道崴子打了一个痛快的歼灭战，毙敌 10 余名，俘敌 10 名。联军接连取得的重大胜利，使敌人恼羞成怒，他们调集大批部队向东扑来，其中紧紧跟在后边的敌人，正是抗日联军的死对头——伪满军东边道司令邵本良。杨靖宇多次和他交手，屡战屡胜。

1936 年 6 月底，邵本良自以为由南满日军司令三木任指挥，又有日军第十师团、奉天野炮营和空军配合，定能报仇。

杨靖宇决定利用邵本良急于决战心理，采取牵牛鼻子的战术，同敌人周旋，伺机歼敌。杨靖宇率队牵着邵本良在通化、新宾、桓仁、宽甸等县兜起了圈子。一路上，杨靖宇让战士们故意丢掉一些衣食物品，迷惑敌人。邵本良果然中计，穷追不舍。

7 月下旬，邵本良被牵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杨靖宇见战机已成熟，便集合部队进行战斗动员。他说：

“我老早给大家说过，咱们有‘四不打’，”他伸出右手示意说，“第一，地形不利不打；第二，不击中敌人要害，不能缴获武器不打；第三，要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不打；第四，对当地人民损害太大不打。现在是山高路隘，居民不多，敌人疲惫，打的时机成熟了！”

接着，杨靖宇详细部署了兵力兵器，规定了协同信号等具体事项。各部立即按规定的时间在敌人必经的梨树甸子四周埋伏下来。第二天清晨，邵本良得意洋洋地带着一个主力团和炮兵中队追了上来，很快进入了伏击圈。杨靖宇双手扬起驳壳枪，“叭！叭！”两声将敌军队伍中的两个骑兵击毙。杨靖宇的双枪一响，战士们跟着开了火，剧烈的枪弹声如山呼海啸般响彻梨树甸子，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激战，敌人惨遭失败。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杨靖宇立即组织部队在桓仁、新宾、清原、宽甸、辑安、通化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全力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关内抗战。

1938 年初，杨靖宇率领军部和教导团，由桓仁进入辑安县境内的老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回头沟一战，全歼伪宪兵三团；3 月 13 日，奇袭老岭隧道工地，使敌损失 20 万元以上；4 月，在高立河桥一举歼灭伪奉天骑兵教导队 60 多人；6 月 19 日，在通（化）辑（安）铁路土口子隧道袭击了日军守备队，生俘日本顾问小林、竹内，烧毁了工地设施、值班室及施工设备材料……

接连遭到打击的日本侵略者，十分惊慌，重新调兵遣将，还把伪军索旅调来对付杨靖宇。索旅是一个混成旅，班长以上头目全部由日本人担任。旅长索玉山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

8 月 2 日，杨靖宇带领部队刚刚从八宝沟出发，侦察员来报告：索旅从辑安县城出发后，沿公路向热闹街方向进发，由于天气炎热，山高坡陡，现在走不动了，正在长岗的埋财沟南部休息！

在茂密的树木中，杨靖宇从望远镜里看到索旅骑兵四十二团、步兵三十二团官兵，一个个敞胸露怀，有的干脆躺在树荫下，用树枝驱蚊蠓。他一边观察一边自言自语：“敌疲我打，眼下正是好时机！”

按照杨靖宇的部署，部队在一个小时内即赶到伏击地域。下午 3 时，当索旅 300 余名士兵疲惫不堪地走进伏击圈时，杨靖宇一声令下，暴雨般的枪弹倾泻过去。敌人顿时乱了营，有的往树丛里钻，有的丢弃枪支朝沟底方向抱头鼠窜。抗联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下山冈，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这一仗，

索旅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步兵上尉高冈武浩和骑兵中尉西田重隆也被击毙。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杨靖宇的正确指挥下，犹如一股铁流，在东南满的大地上滚动。他们的声威震敌胆，他们的功勋为人民所铭记。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指定杨靖宇为委员。193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向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

1938年入秋后，由于敌人加紧“讨伐”，斗争环境不断恶化，杨靖宇领导的抗联部队被迫进入长白山一带的深山丛林。他们经历了1938年冰雪严冬，又度过了1939年夏的风雨酷暑，接连不断地与日伪军作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1939年底，杨靖宇同魏拯民等在桦甸县红石砬子附近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决定以小部队分散活动。会后杨靖宇率军部警卫旅迂回转战于桦甸、辉南、濛江、抚松、通化等地，吸引正面敌人，以利分兵作战。

这时，敌人纠集7.5万多人，开始了通化、间岛、吉林三省联合“讨伐”。敌军采用“蹂躏战术”，“篦梳战术”，“狗蚊子战术”，进行“铁壁合围”。还专门组织“富森工作队”、“程挺进队”、“唐挺进队”妄图暗害杨靖宇。

1940年1月，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疯狂的“讨伐”，加紧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使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东北抗日联军处境更为艰难。1月底，抗联部队在马屁股山同大股敌人作战失利，杨靖宇同部队失去联络，身边只剩下60余人。2月1日，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决定分散突围，不想特卫排长借机携带枪支、一万元现款和机密文件叛变投敌，一部分战士逃散；2月2日，杨靖宇身边只剩20余人；2月10日，只剩下12人。杨靖宇的处境更加险恶。他们既要忍受着极度饥饿和疲乏，抵御着砭人肌骨的寒风，又要在敌兵重重包围中穿梭苦战，人员不断伤亡。

2月15日清晨，杨靖宇同身边战士聂东华，朱忠范冲破数股敌人的堵截围击，来到濛江县大北山东部的林中高地。他们稍事休息后，杨靖宇让两名战士去附近村屯搞点吃的，并约好了会合地点。他们离开以后，叛徒崔弼峰带着敌人追上来了。身患重感冒的杨靖宇抢占山头，双手持枪猛打，把敌人压在山坡下。日本军官伊藤见硬攻不成，喊道：“你的，跑不了啦，快投降吧！”杨靖宇引诱他站起身来。立即射出三颗子弹，当即将伊藤击毙。随手将叛徒击毙。他趁敌人混战之际，借着昏暗的天色撤向密林深处。

2月18日，朱忠范和聂东华在寻找食物途中，也不幸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章后，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此时，杨靖宇孤身一人，身体已极度虚弱。他渴了，抓一把雪；饿了，吞树皮、草根或棉絮……

2月23日下午4点多钟，当杨靖宇艰难辗转到濛江县保安村西南的三道崴子时，被跟踪而至的上百名敌人层层包围，距离只有20多米。杨靖宇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倚着大树双手射击，迫近之敌被毙伤20余人。敌人为了抓活的请功领赏，又拿出劝降的伎俩狂喊：“放下武器，保留生命，还能富贵！”杨靖宇轻蔑地大笑；挺身高呼：“最后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同时，他一边将机密文件烧毁，一边向偷摸上来的敌人射击。日本侵略者见劝降无效，就猛烈扫射，杨靖宇身中数弹，终于倒下了，殷红的热血洒落在濛江河畔……

伟大的人民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以后，灭绝

人性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了他的腹部“示众”。但敌人惊骇了。原来，拖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周旋了数月之久的杨靖宇，胃里除了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外，竟然没有一粒粮食！这是何等坚强不屈的英雄啊！

全国解放后，为了纪念杨靖宇，党和政府决定将濛江县改为靖宇县，并在通化市建起了雄伟肃穆的靖宇陵园。1958年2月23日，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举行了有9000多人参加的公祭安葬大会。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送了花圈。当年杨靖宇壮烈殉国的地方树立起纪念塔，塔上镌刻着朱德苍劲有力的亲笔题词：

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胡维仁、季民文、曹荣光撰写）

业绩铭刻“雨亭祠” ——记鲁雨亭烈士

巍然耸立在豫东平原上的芒砀山下，曾出了一位慷慨捐躯的抗日英雄，他就是由旧县长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雨亭。

1899年旧历三月的一天，鲁雨亭诞生于芒砀山下的河南省永城县山城集。

鲁雨亭7岁入学，12岁高小毕业，16岁时考入河南政法学堂。1919年，为御外侮、雪国耻，他弃文学武，考入河南军事学校。后来历任河南第二混成旅掌旗官，建国豫军军法处长、河北武安县县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担任河北省保安处秘书处长的鲁雨亭，积极响应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与保安处高处长一起组织八个团的民众参加抗日。不久，他接受李宗仁和河南省政府委托，回永城县任县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日寇占据了永城，他转入乡下。

鲁雨亭看到祖国的大片河山被日军占领和蹂躏，忧心如焚。他找到王卓然和陈觉民等人，商量组织抗日游击队。他提出：芒砀山遍布树木，周围有保安山、夫子山、铁脚山、僖山环绕，山峰下能藏兵养马，传说秦朝末年刘邦起兵前，就隐于芒砀山泽间，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我们完全可以以芒砀山为据点，竖起抗日大旗，大干一番！鲁雨亭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接着，他们又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决定从瓦解和争取“忽隆队”（即杂匪）和“红枪会”入手，组织抗日队伍。他们采取“争取、分化、孤立”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鲁雨亭身穿农民衫，身背大粪筐，走村串乡，深入到这两个组织中间做说服教育工作，争取好的，孤立坏的，分化瓦解其组织，使“忽隆队”和红枪会的许多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斗争。

1938年10月12日，永城县抗日游击小组成立了。24日这一天，游击小组在永城县山城集召开庆祝大会。会上，鲁雨亭宣布公审大汉奸赵春元，并根据群众的要求，宣布将赵春元处决。老百姓欢欣鼓舞，都说永城县又见到晴天了。游击小组在鲁雨亭的领导下，打击日寇，消灭汉奸，取得了20多次战斗的胜利，队伍在斗争中发展到900多人。

鲁雨亭的游击队没有正常的供给渠道，生活和军事补给十分困难。他想到自己家里还有200亩土地，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变卖，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但仍无法解决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他派人向国民党商丘专员宋克宾求援。哪知宋克宾听说他要借钱，竟说：“鲁雨亭已经红了半截了，我的钱再多，也不能救济他。”鲁雨亭听了这话，对部下说：“我鲁雨亭红半截干啥！我干脆红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共产党的人了！愿意跟我走的就给我出来！不想走的就回家去！”这样，他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决心投奔共产党。后来，国民党虽再三派人和他联系，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都被他断然拒绝。

1938年底，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进驻永城一带。鲁雨亭闻知，立即派助手陈建平前往游击支队，联系共同抗日作战问题。彭雪枫马上派人到鲁雨亭部开展工作，还派参谋长张震前去和鲁雨亭深谈，研究鲁雨亭游击队加入新四军的具体方案。鲁雨亭交给张震一份《雨亭自述》，恳切地说：“我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请党接收我吧！”他选派部分抗日青年到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游击支队首长也派一位叫杨斐

的同志到他的部队里讲授政治和军事课程。接着，游击队又为鲁雨亭办了 3 期干部训练班，培训了 300 多名干部，还发展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鲁雨亭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1939 年 8 月 7 日中午时分，鲁雨亭一行来到蒋庄，见村外大槐树下不少新四军指战员正在等候他们。鲁雨亭快步走上去。张震参谋长迎上来，紧紧地握住鲁雨亭的手说：“欢迎你，我代表游击支队的全体同志热烈地欢迎你！”鲁雨亭的眼睛湿润了，激动他说：“谢谢，谢谢你们！”

8 月 29 日，鲁雨亭所部被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他任总队长，孔石泉任政委。同时，他的入党申请也被批准了。那天晚上，他激动得一夜没有合眼，伏在油灯下给远方的父亲写信：“今与共产党同志一体抗战，数年志愿今日得遂，父训无违，儿心甚快。今上有彭司令热诚领导，又有吴（芝圃）副司令循循善诱，为儿精确导师，更有肖（望东）、张（震）两同志之多方指示，良师益友，共事共处，事业前途，希望甚多……今参加共产党，得入正途，定要专心致志，努力工作……”

1939 年 10 月 2 日，第一总队经过整训后，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开辟永（城）北、夏（邑）东、碭（山）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总队犹如一只铁拳，狠狠地打击了日军，清除了阻碍抗日、鱼肉人民的反动势力，开辟了夏、永、碭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徐州之敌。

鲁雨亭的名气越来越大。日本侵略军把一总队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多次策划，要吃掉这支抗日武装。

1940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日伪军两次集中兵力，在芒碭山地区对一总队进行“围剿”。鲁雨亭指挥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非但没有消灭一总队，反而损兵折将，一个叫佐野的联队长和 60 余名日军、数百名伪军被毙俘。

4 月 1 日早晨，数千名日、伪军在炮兵的配合下，分四路突然向一总队驻地发起报复性攻击。鲁雨亭从望远镜中看到那黑压压的敌人，意识到了形势非常严峻。他和孔石泉政委分析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决定化整为零，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鲁雨亭率领特务连迅速抢占了位于交通要道的李黑楼，掩护部队转移。

敌人集中兵力，向李黑楼扑过来。霎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鲁雨亭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在我军阵地上，有些战士被炸死炸伤。鲁雨亭发现身边的一个机枪手牺牲了，急忙抓起机枪，向敌人猛扫。一个战士见状，急忙跑过来，对他说：“总队长，这儿危险，我来打！”鲁雨亭哪听战士劝阻，继续向敌人扫射。这时，一颗流弹飞来，擦伤了鲁雨亭的鼻子，鲜血一下子染红了他那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庞。他用袖子擦了擦血，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他对大家说：“我们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死守李黑楼！”战士们齐声高喊：“我们和总队长共生死！”

残酷的战斗，在你争我夺中一直打到了傍晚。敌人仍然没有夺下李黑楼。阵地前，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反扑。就在这时，鲁雨亭不幸中弹躺在血泊里……

为了纪念这位抗日英雄，人们把他的家乡山城集改为“雨亭集”，抗大

四分校图书馆命名为“雨亭图书馆”，一总队的报纸命名为《雨亭报》。永城人民还在芒砀山南麓为他立了“雨亭祠”。50多年来，每逢清明节，人们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祭奠他。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苏鲁撰写）

为国捐躯女英雄 ——记李林烈士

1940年4月，晋绥边区洪涛山抗日根据地郭家窑村庄垦，边区的领导同志和数千名抗日战士，以及驻地群众，为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乡亲们从老远挑来清水，为烈士擦洗遗体，寄托自己的哀思；四村八邻的乡亲们赶来，拿出蒸馍、红枣，堆放在烈士面前，祭奠英灵。

中共中央妇委会从延安发来唁电。唁电里说：“20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1937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妇委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特此号召全体女共产党员同志和全国妇女同胞更加奋起抗战，为完成李林同志的未竟事业而奋斗，为李林同志及一切抗敌殉国的烈士们复仇而奋斗！”

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的唁电也送来了：“李林同志，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临阵杀敌时，骁勇异常，贺龙将军及晋绥各地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称之为民族女英雄。”

李林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华侨商人家庭里。她4岁那年随经商的父亲到南洋爪哇岛，开始海外游子生活。当时爪哇正被荷兰殖民主义者占领，帝国主义分子对印尼人和华侨百般奴役掠夺。李林从懂事起，看到这人压迫人的世道，甚感不平。

她14岁那年，在母亲陪同下回归久别的祖国，考进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学习。第二年，“九·一八”日寇侵华的炮声打碎了她宁静的学习生活。她到上海进入上海爱国女子中学学习，“一·二八”淞沪抗战，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上海随处可见日本旗，侵略者横行霸道。李林在作文中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她参加上海学联组织的暑期抗日宣传团，沿淞沪杭线到各县城和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后来她考进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结识了女共产党员吕光，不久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在吕光领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在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组织的声援“七君子”的游行活动中，她担当旗手，高举红旗，昂首挺胸，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反动军警镇压游行队伍，李林头上负伤，仍高举红旗前进。这次示威游行后，吕光通知她，党组织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底，李林根据党的指示，和许多平津的进步学生一起，奔赴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李林到了太原，中共山西工委的负责同志通知她，马上参加党领导下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从此，李林穿上军装，成为一名战士。在训练班里，李林担任党的临时组织——特委的宣传委员，兼任女兵连党支部书记。

半年的训练生活结束了。李林被分配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李林热血沸腾，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党组织派李林到临近沦陷区大同牺盟中心区工作，担任牺盟中心区委会宣传委员，同时参加党的雁北工委的工作。

1937年11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特委派李林等人建立抗日游击队。

消息一传出，远近山庄、煤窑、作坊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队伍。不久，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经过李林等人的艰苦努力，在偏关诞生了，王零余任支队长，李林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八支队在横贯左云、右玉、平鲁等县的洪涛山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李林在战场上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练就了一身骑马、打枪的硬本领。

1938年5月，八支队奉命越过长城，挺进到绥远的丰镇、凉城、厂汉营一带，开辟绥南抗日根据地。李林和王零余各带一部分战士，分两路开展活动。

一天，李林带领战士来到一个叫田成村子的附近。经过侦察，得知村口有个土碉堡，后面的大院中，住着伪军的一个中队，还有50多匹马。李林高兴地对战士们说：“送上嘴的肉，我们一定吃掉它！我们早就想建立骑兵，正缺少马匹，不能失掉这个机会！我们要打得勇猛，打得漂亮！”

入夜，李林带领队伍来到村外，干掉了敌人的哨兵。她指挥部队向敌人碉堡发起进攻。顿时，子弹、手榴弹雨点般地倾泻到碉堡上、大院里。伪军从梦中惊醒，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来不及穿衣服就向外逃。

李林一挥手中的枪，大喊：“冲啊！”战士们勇猛地冲向院内。伪军们争先恐后地向村后逃去，院子里横七竖八留下十几具尸体。

战斗胜利结束。战士们骑着骏马，背着缴获的枪支，唱着战歌，迎接新的战斗。

1938年6月，八支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王零余任营长，李林任教导员。

此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绥南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雁北特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北上绥南，恢复绥南的工作，命令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北上绥南，确保工作团完成任务后返回右玉县南山区。

行动之前，李林和王零余研究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行动计划。

李林和王零余率领骑兵营掩护工作团，经过一天行军，突破敌人封锁线，把工作团送到了二十边村。接着，他们连夜向东开进，朝日军据点长流水飞奔。午夜，长流水据点里，日本鬼子们还在饮酒作乐。骑兵营战士突然而至，向房内的鬼子猛烈开火。鬼子仓促应战，负隅顽抗。鬼子的一个小队长提着枪夺门而出，向后院逃跑。李林抬手一枪，日军小队长应声倒在地上，经过半小时激战，据点里的鬼子全部被歼灭。李林和王零余又率骑兵营向二十边村开去。

由于骑兵营的英勇作战，绥南的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向右玉县南山区返回。

在返回的途中，李林和王零余率骑兵营顺便袭击平绥线上的红砂坝车站，把鬼子的一个小队打得落花流水。

八支队和李林在雁北打了许多胜仗。李林名声越来越大，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巨款捉拿她。

上级领导对李林这位女英雄十分信任和关怀。1938年9月，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提议调她到中共晋绥边区特别委员会工作。李林是多么不愿离开部队，离开自己亲自参加创建的骑兵营啊。可是，她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到特委担任宣传部长，兼管地方武装。

1940年1月，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成立，李林担任专署秘书主任。不久，她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到兴县参加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她当选为边区行政公署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在兴县，李林见到了闻名中外的贺龙将军。贺龙满面笑容地说：“欢迎妳，我们的女英雄！听说鬼子听了你的名字都怕呢。了不起！”他亲切地询问了李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最后，他对李林说：“晋西北行署想把你留下来，搞妇女工作。你意见如何？”

李林说：“怎样都可以，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但从我个人的愿望说，愿意再返前线。”

贺龙听了发出爽朗的笑声：“好啊，我支持妳！”这样，李林又回到了雁北。

1940年春，敌人纠集12000多人，分三个方向，对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扫荡”。4月下旬，日伪4000多人向雁北专署机关和相随的六支队二、三营及专署警卫连驻地扑来，情况十分危急。专署指挥部决定，向平鲁方向突围转移，六支队在前，机关居中，李林率警卫连断后。

午夜时分，突围开始了。大队人马刚翻过一道山梁，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六支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场激烈战斗，六支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后面的队伍没有跟上，被敌人团团围住。

李林对地委武装部姜部长说：“我带骑兵排往东大沟里冲，掩护大部队向南突围！”说完，飞身上马，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率骑兵排向东大沟冲去。

一时间，杀声震天，几十匹战马掀起冲天的尘土。敌人误以为他们是主力部队，慌忙调集南北山上的日伪军全力向东增援，四面八方的敌人向东扑来。姜部长利用这个时机，指挥机关迅速向南突了出去。

东面山上，敌人发觉上了当，恼羞成怒，围住骑兵排，紧紧咬住不放。面对这极其险恶的情况，李林大声对战士们说：“敌人已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是党和人民的战士，宁死也不投降！决不能玷辱抗日战士这个伟大的称号！”

李林率领战士们边还击边撤退，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在沟沿下面，抬不起头。李林感到形势险恶，难以突围出去，她从身上取下文件包，塞进岩石的裂缝里面，用土严严实实地埋住。接着，她对通信员二和子说：“你年龄小，敌人不会注意，快沿着这条沟出去。只要碰到老乡，他们会掩护你。”她嘱咐二和子记住埋文件的地方，等战斗结束后取出来转交给地委。

二和子冲出去后，敌人猛扑了上来。李林向战士们喊道：“准备突围！”她跨上战马，率领战士们向沟口冲去。敌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李林一边挥着手中的枪，一边高声喊道：“冲啊！冲出沟口就是胜利！”几十人马在她的带领下，接连冲过了两道包围圈，这时，密集子弹又从沟前土崖上射了过来。突然，李林的坐骑中弹倒地，李林被重重地摔下马来，她的胳膊和腿上也儿处负伤。战士们要下马来扶她，她厉声喝道：“干什么？快！冲出去！”

李林忍着巨痛，扑在一个土堆旁，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一支小手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战士们突围。下一会，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敌人从四面扑上来，嚎叫着“抓活的”。李林迅速拆开驳壳枪，把零件扔进周围的草丛里。

敌人狂叫着，扑向李林。

李林忽地站起来，举起那支小手枪，将最后一颗子弹从容地射向自己的

头部。

面对这壮烈的情景，法西斯侵略者惊呆了，迟迟不敢靠前。

这一天，是 1940 年 4 月 26 日。年仅 24 岁的民族女英雄李林，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雷雨撰写）

救国灭寇愿舍生 ——记吴隆煮烈士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张发黄的3人照片，照片底端写着：“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与学友万德坤陈仁常延安留影，”照片中间那位脸庞宽阔，嘴唇丰厚，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就是吴隆煮烈士。

吴隆煮，1914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曹门湾的一个贫苦农家，1930年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参加了长征，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等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吴隆煮告别延安，日夜兼程，直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就任三营特派员。他所在的团，是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他所在的营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二七九团，以善于追击而闻名，是有名的“飞毛腿营”。

9月30日，吴隆煮所部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到达正大路南侧地区，阻击由石家庄侵入山西的日军。10月下旬，平汉线日军由石家庄沿正大路猛攻娘子关，配合同蒲路日军会攻太原。晋东形势危急。

10月25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亲率七七二团进至川口、孔氏村、王德寨一线，准备侧击沿正大路西犯之敌。26日，七七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奉命率三营，乘夜暗进入平定县七亘村设伏。

这是七七二团开赴抗日前线后的第一仗，也是吴隆煮参加抗战的第一仗。

天渐渐放亮了，趴在草丛中的战士们因初次与日军作战，神情有些紧张。细心的吴隆煮注意到这一切，便轻声向大家鼓动：“战斗中，只要出击时又快又猛，就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

上午8时，从测鱼镇方向传来阵阵马嘶声，敌辎重部队在100余名步兵护送下，由东向西开进。当敌先头部队通过了设伏区，后尾部队尚在东门口村，中间的辎重部队300多人和驮运物资的骡马，正进入伏击区时，三营即向敌辎重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紧接着吴隆煮率战士同敌展开激烈搏斗。经过两小时激战，毙敌300余人，缴获了大批骡马及一批军用物资。

三营部队执行上级命令，再接再厉，又于28日上午再次在七亘村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毙敌百余人。

首战的胜利，大挫日军的锐气，鼓舞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七亘村伏击战后，吴隆煮被任命为七七二团三营教导员。不久，又调任该团一营教导员。从1937年底到1938年4月，部队转战到晋东南地区，吴隆煮带领一营参加了长生口诱伏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村追歼战等著名战斗。

1938年5月29日，三八六旅旅部机关及所属七七二团部队，到达磁县彭城镇。吴隆煮率一营在清除日伪残敌后，担负彭城镇南面的警戒任务。

彭城镇东临冀西平原，西靠太行山，被称为磁县第一镇。昔日，此镇商业繁盛，经日寇与土匪的蹂躏，今已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景象。当晚，陈赓旅长率旅部机关及部队进驻此镇。

次日夜，在小镇的南面山坡上，用帐篷支起的三营指挥所里，营连干部在微弱的油灯灯光下，围着一张地图研究防御方案。吴隆煮穿着褪色的灰军

装，把袖子挽到胳膊上，左手叉腰，右手在地图上比划着：“为了确保旅首长和机关的安全，我二营、三营担负镇北山警戒任务，特务连担负镇西面的警戒任务。团命令我营担负镇南面的警戒任务，防敌突袭。”接着，他挥着右拳，斩钉截铁他说：“我们的决心是：在南山头高地构筑工事，占领制高点，以山头中部为界，一连、二连分别负责山头左右两侧的防御，三连为预备队，四连担任警戒。要迅速作好战斗准备。”

天刚蒙蒙亮，彭城镇被大雾笼罩，街市上行人稀少，突然，在城西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吴隆煮率营部人员直奔南山头前沿观察所，仔细观察敌之动向。

雾渐渐消散，彭城镇西面的枪声越来越紧，在一营正面隐蔽的敌人却一动不动。敌人在玩弄声东击西的花招。

吴隆煮一面向团报告，一面组织部队伪装隐蔽，将计就计。

这股敌人，果然是驻水冶镇的日军一个大队和驻漳河桥的日军，洪约 800 人。鬼子得知八路军到达彭城镇后，即倾巢出动，黑夜越过清漳河，企图在佯攻西山头时，调动南面的八路军防御兵力，待天亮雾散后，再突破南山头阵地，袭击三八六旅旅部机关。

鬼子在费心机，在西山头担任警戒任务的特务连迅速将突袭的 40 余名敌人全部歼灭。

随着枪声逐渐稀疏，隐蔽在一营阵地前方的鬼子，丢掉伪装，在炮火的掩护下，形成正面宽 200 米，纵深 500 米的 3 个梯队，往山头上爬。

吴隆煮蹲在一连的掩体内，命令通信员：“快通知二连，沉住气，听我的指挥，统一出击。”

鬼子爬到离一营阵地只有 200 米时，八路军战士仍一枪未发。

在山下督战的日军指挥官，以为八路军中了调虎离山计，便发出一阵狂笑声。爬在前头的鬼子背着枪，加快上爬速度，逼近山头。等鬼子爬近我阵地时，吴隆煮一声令下：“打！”机枪弹、手榴弹铺天盖地般向敌群倾泻。鬼子受到这突然的打击，顿时乱作一团，丢下几十具尸体，仓惶逃命。

鬼子并不甘心失败，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破二连阵地，逼近街市。

情况十分危急。吴隆煮亲率三连、四连增援，同鬼子展开肉搏战，经过 1 小时激战，又重新夺回了阵地。

到上午 10 时，一营已打退了鬼子的 6 次进攻，守住了阵地。此时，七七二团二营、三营已出现在敌东西两翼，对敌形成夹击之势。

10 时 20 分，在团统一指挥下，反击战打响了。吴隆煮这位身材魁梧的粗壮大汉，挽起衣袖，右手提着长枪，背一把大刀，跃出战壕，率先冲入敌阵。刺杀是吴隆煮的拿手好戏。他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是有名的刺杀能手，一有恶仗，必带大刀和步枪上阵，这时，只见他冲入敌群，挥舞大刀，左劈右刺，接连砍倒了 4 个鬼子，当他又往前冲时，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腹部，他一个踉跄跌倒了。

当吴隆煮醒来时，通信员已为他包扎好伤口。吴隆煮提起大刀，艰难地站起来：

“莫管我，赶快冲！”吴隆煮命令道，他脸色苍白，鲜血从捂着腹部伤口的手指间流出来……

经过一天激战，鬼子丢下 200 多具尸体，仓皇逃回据点。

陈赓旅长在日记中写道：这一仗，“沉重打击了敌人进攻彭城的企图，

胜利地保卫了彭城”。

战士们把昏迷的吴隆煮抬回营地，日夜轮流守候在他身旁。

已经3天了，吴隆煮仍未苏醒过来。战士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买了一口柏木棺材，准备安葬吴隆煮，腮部负伤的四连指导员冉光普，抱着这位同乡战友，泪加泉涌，大声呼喊：“隆煮，隆煮，你不能走啊！”

在冉光普的使劲摇晃和大声呼喊下，吴隆煮长嘘了一口气，慢慢地睁开了双眼。他急切地问营长：“仗打得怎么样，部队伤亡大不大？”营长说：“把鬼子赶回去了，部队有些伤亡，二连伤亡大一些。”他又问冉光普：“你们连呢？”冉光普答：“牺牲了7个同志。”停了一会儿，吴隆煮心情沉重地说：“革命总会有牺牲的，我们要多打胜仗，为战友报仇！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我怎么能这么早就去呢？我还要和战友们一起去战斗，赶走日本鬼子呢！”

1939年11月，吴隆烹饪三八六旅补充团政治委员。1940年，补充团改称三八六旅十六团，吴隆煮改任该团副团长。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百团大战开始，留守在太岳区的十七团与决死一纵队五十六团，担负权店至漳源段铁路破袭任务。

夜幕降临，晚风轻拂。吴隆煮率十七团一营、三营和民工共100余人，借着月光，从沁源县郭家山出发，穿过青纱帐，按时集结在铁路线上，配合五十六团展开破袭战。

与此同时，为确保3000名破路大军的安全，上级命令十七团一营一连，担负在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咽喉要道龙珠寺的警戒任务，切断通向漳源、新店的公路和铁路，阻止敌人向北增援。

晚10时，吴隆煮指挥一营部队包围敌据点，掩护部队和民工破路。

吴隆煮往返于4公里长的铁路线，指挥军民拔道钉，掀铁轨，毁路基，烧枕木。经过一夜奋战，铁路被拦腰斩断。

天刚蒙蒙亮，破路大军扛着钢轨正在顺利撤退时，突然团部通信员骑战马奔来，向吴隆煮报告：“副团长，据侦察，驻左城、西塘日军230余人，在日军第四混成旅团板津大队长指挥下，正向龙珠寺方向急进，敌企图3路合击漳源，团令一营一连在龙珠寺阻击敌人，坚持到明天早晨。”

吴隆煮眉头紧锁：龙珠寺一仗，事关我3000破路大军安全，一连虽然久经战火考验，但敌我力量悬殊，且连队指导员尚缺，我得亲至龙珠寺，一定要守住这道口子。

即刻召集几名干部作布置后，不顾一夜奋战后的饥饿与疲劳，急奔龙珠寺。

看到吴隆煮走过来了，战士们放下工具，挺挺地站着。吴隆煮示意让大家坐下后，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昨晚，我团和五十六团将权店到漳源的铁路全给掀翻了！鬼子不甘心失败，从西塘、左城两个方向扑来。如果他们跨过龙珠寺，就会直奔漳源，我3000破路大军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象钢钉一样，钉在龙珠寺！”

“誓死守住阵地！”战士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

21日上午9时，在龙珠寺西边的公路上，日军板津大队分两路，拉着小山炮向龙珠寺开来。三排战士给敌以迎头痛击，板津一看情势不妙，遂令队伍停止进攻。

吴隆煮站在一堵断墙后面，仔细观察后，对张连长说：“快修整工事，

收集弹药，恶仗还在后头！”

不一会儿，敌人的炮弹象雨点般落在高地上。吴隆煮站在一、二排的结合部，观察敌人的活动。张连长急切他说：“吴副团长，这样太危险！”吴隆煮若无其事他说：“不要紧，烟雾大，站着才看得更清楚。”他再次叮嘱张连长：“快准备集束手榴弹！”

炮声一停，吴隆煮把手一挥“打！”二排的机枪即向接近前沿的敌群扫去，集束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接连组织进攻、都被我二排打退。

这时，坚守在村南高地的一排与敌人展开了血战。一排伤亡较大。

看到敌人攻势猛烈，吴隆煮觉察到敌人是把主要兵力放在进攻村南高地上，马上命令三排从西侧夹击敌人。随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二排阵地跑去。

一群群的敌人沿着铁路路基，呈扇形队形围上来，吴隆煮摘下钢盔，脱掉外衣，拔出刺刀，向战士们喊了一声“上刺刀！”遂率领20余名战士，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敌机枪向阵地扫来，吴隆煮一把将身边的通信员推倒。

一排子弹扫过之后，通信员从地上爬起来，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吴隆煮扑倒在工事边上，头部鲜血直流，被血水染成暗红色的白布衬衣沾在背上，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望远镜。

“莫管我，快去通知……”苏醒过来的吴隆煮说了一句话，又昏过去了。

21日下午3时，躺在龙珠寺祠堂断墙后面的吴隆煮再次醒来，当张连长告诉他阵地还在我们手中时，他顽强地挣扎着坐起来，默默地看着张连长和战士们，断断续续他说：“一定要……守住阵地……”话未说完，便停止了呼吸。

“力吴副团长报仇！”战友们悲愤高举着战旗，又冲上了敌阵。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金正全撰写）

刀劈日寇显威风 ——记节振国烈士

1910年10月9日，节振国出生于山东省武城县刘堂村（今属河北省故城县），那里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节振国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们除清灭洋、扶弱抗暴的义和团精神。他10岁那年，随全家闯关东。在旅顺，听到不少关于日军在甲午战争时血腥屠城的罪行，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深植人他的心底。几经辗转，一家人来到冀东开滦赵各庄矿落了户，不到20岁他就成了井下工人。矿上为防工人往家带煤，下班出矿都要搜身，节振国偏偏用手托着一块亮闪闪的煤块，大摇大摆走出矿门，然后顺了搁在随便一家工人的锅灶边，他武功精，武德好，在工人中威信高，矿警一般不敢惹他。

当时，开滦煤矿是全国最大的煤矿，自从八国联军侵华后，就一直被英国资本家霸占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向关内蚕食，拼凑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矿区周围又逐渐飘起日本旗。英国人的剥削和日伪政权的奴役，使开滦工人倍感亡国奴之苦。

开滦共有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五个煤矿。1938年3月22日，节振国在赵各庄矿领先举行大罢工。林西矿和马家沟工人起而响应。唐家庄矿却组织起几百人的反动护矿队，不准工人罢工。节振国带领赵各庄和林西矿的工人，三打唐家庄，和唐家庄矿工人里应外合，用斧子、镐把打垮了弹压工人的矿警护矿队。

在中共唐山工委书记周文彬的直接领导下，大罢工持续到4月中旬。一天晚上，节振国把工人纠察队拉到东煤场四周布置妥当，数千工人和家属一拥而上，开始抢煤，矿警队赶来镇压，见纠察队严阵以待，未敢造次，朝天放了几枪后回去交差，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4日，迫使英国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全部条件。

开滦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国资本家，也直接影响了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罢工结束的第二天，日本人撕下“中立”的伪装，与英矿当局联手对工人领袖进行逮捕和屠杀。

三月6日早晨，一伙日本宪兵带着翻译和伪矿警，包围了离工人俱乐部不远的节振国家。节振国正在外边，有人告诉他：“鬼子宪兵抓你，把你哥捆上了！”节振国听说这话，拔腿就往家跑。

大门口已经让拿枪的鬼子宪兵和伪警挡上了。节振国把礼帽一摘，大步穿过院子进屋了。

家里被捣弄得乱七八糟。哥哥被绑着，斜倚在墙上。妻子刘玉兰的嘴角上挂着血迹，孩子吓得缩在炕角。节振国想和日本人拼命，怕连累亲人，就大声说：“住手！我是节振国，要绑就绑我吧！”

屋里的敌人一愣。他们看到一个个儿不高、挺结实的年轻人。敞着怀，拧眉立目，紧握着两只拳伸给他们。那个叫高野的矮瘦的日本军官将战刀抽出一段，上下打量英气逼人的节振国，嘴里叽哩咕噜一阵，旁边的两个鬼子上来就要用绳子捆节振国。

“振国！”节振德身子一挺站起来，“没想到你这么孬种！”节振德在矿上是个工头，但他毕竟是个中国人。

听大哥这么一叫，节振国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一个“马步分掌”，将两边的两个日本鬼子击倒，又往前一纵，夺过高野的战刀。高野慌乱中双手

握住刀刃同节振国抢夺；节振国抖腕一抹，高野的手掌立时血流如注。这个日本军官还没来得及嚎叫出声。节振国的战刀已经旋风般向他劈将下来。刀光随着节振国的身影上下左右飞闪，三五个死的伤的鬼子和矿警，躺了一地。剩下的敌人逃出院外。节振国用刀挑断哥哥身上的绳子：“大哥，快跑！”说罢冲出后门，纵身跃上丈把高的院墙。节振德由于被打伤无法翻墙，一跑出院门，就被敌人乱枪打死在门外，节振国刚想去救，有一枪打在他左腿上，他顺势滚下墙头，含恨出走。

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7月间，狂飙漫卷京东22县，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风起云涌，义旗下聚集起10万武装民众，节振国联络起30多名矿工弟兄，在滦县韩家哨结盟起事，到榛子镇警察所夺到枪枝，拉上队伍，投奔冀东抗日联军，节振国见到李运昌司令员第一句话就是：“我叫节振国，要抗日报仇，你们收不收？”李运昌对这位刀劈鬼子宪兵的英雄正是求之不得，当即把他的队伍收编为司令部直辖工人特务大队，任命节振国为大队长。7月18日，节振国奉命攻打赵各庄，配合周文彬发动开滦工人抗日暴动。他们夜袭警察所，两克赵各庄，攻占唐家庄，3000多名矿工参加了抗日队伍，节振国的工人特务大队壮大到500多人。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震动了中国大地，日寇急忙调集兵力进行扫荡，暴动部队仓促西撤，在潮白河畔受敌堵击，又遭日寇几路合击，受到很大损失。节振国带领的工人特务大队经过几场恶战，回到丰润北部。他召集失散人员，找到了一度失掉联系的上级组织。这支产业工人抗口队伍，重又活跃在冀东游击战场上。

1939年秋，经冀东地委书记周文彬介绍，节振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天，公路上出现了两辆大车。第一辆车上坐着一个蒙红布的姑娘，围着一群有说有笑的老乡。看样子像是送新娘的。新城子日寇据点的一伙鬼子见车上有“花姑娘”，就跑上前来将大车团团围住。突然，大车上的“新娘”揭开红布，甩开双枪，前边的几个鬼子应声倒地。还没轮上人人开火，十几个鬼子就“报销”了。“新娘”原来是节振国装扮的。他跳下车，命令队员们炸毁了碉堡，拔除了这个据点。

从1938年秋到1939年冬，节振国在丰润，滦县、唐山和开滦矿区，神出鬼没，几十次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们将丰润桥警察所连窝端掉，袭击双鹤岭警备队，伏击上五岭警察队，他带领工人特务大队，既打过同日寇血战一整天的下水路恶战，又打过巧设伏击，毙伤敌人十几名的李家沟战斗。他还打过杨家峪歼灭战，与孔庆同带领的队伍一起歼敌300多。

节振国在冀东一带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至于特务汉奸们打赌吵架时岸’常这么发誓：“明天叫你碰上节振国！”

1940年夏天。在延安杨家岭一孔窑洞里，毛泽东听人向他汇报河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来人讲到节振国当罢工纠察队长，刀劈鬼子，老百姓叫他“节青天”，鬼子叫他“白脸狼”时，毛泽东从长椅上坐直身子，问这个节振国多大岁数了。当他听说节振国刚30岁，打仗勇敢，会武术，总是往前冲时，说：“这是个民族英雄式的人物。”沉吟片刻，毛泽东又似乎有所虑地说：“要好好地培养他，保护他，不然他会遭不测。”

7月，节振国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返回冀东。半年多没捞着仗打，他早就憋坏了。他找到李运昌，软磨硬泡争取到了随十二团一起行动的机会。7月31日，在团长陈群指挥下，节振国率部夜袭赵各庄弹药库，

带着战利品撤至滦县尤各庄整休。8月1日下午之时，哨兵跑来报告，他们被敌人包围了，哨兵说：“鬼子来得多，大队长，咱们先撤吧。”节振国一听就火了：“怕死别来抗日！一见鬼子就跑，不嫌丢脸！”他马上指挥部队就地与敌人展开激战，相持了一阵，陈群率部压了过来，敌人仓皇溃逃。节振国带人迂回，准备断敌后路；突然，被左侧敌人机枪阵地的猛烈火力压住了。冲了几次都没拿下来，眼见自己的战友倒下了20多人，节振国心如刀绞。

敌人机枪阵地西边是一块高地，还有两棵大树。节振国窜进高粱地，兜到树后，一排盒子枪，把敌人机枪打哑了。冲进敌机枪阵地的节振国，早已杀红了眼，不管敌军投降不投降，抡开双枪挨个点名。不料，一个敌人端枪冲节振国扣动了扳机，一粒子弹贯通了节振国的左胸。

他倒下了，身下是百里煤海，是储藏着火焰的精灵……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金辉撰写）

百团大战首告捷 ——记谢家庆烈士

抗日战争初期，在冀南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他们破铁路，炸水塔，摸敌营，搅得日军胆战心惊，日夜不得安宁。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就是 1940 年 8 月开始的百团大战中打响第一枪的谢家庆。谢家庆，1912 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念了 5 年书。1927 年到 1930 年间，大别山区相继爆发黄麻、商城、霍山起义。在革命洪流的激发下，谢家庆于 1931 年参加鄂豫皖红四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交通班长、排长、交通队队长、交通团团团长。抗战爆发后，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谢家庆任一二九师教导团的教官。1937 年底，为了深入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派肖光义、孙继先、谢家庆等人，带领一二九师教导团 30 多名干部秘密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地区，开展敌后工作，谢家庆担任磁县工作团团长，在磁县中心县委书记王维刚的协助下，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谢家庆任队长。1938 年 12 月，谢家庆任一二九师抗日先遣支队三大队大队长。1940 年 5 月，他调任三八六旅十六团团团长。这年 8 月上旬，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关于以破击正大铁路为中心的《战役行动命令》。这一大规模的战役行动，被称为“百团大战”。一二九师的 8 个团及总部炮兵团一个营，受命破击正大铁路阳泉至榆次段。十六团的任务是攻击芦家庄车站。

谢家庆从旅部受领任务回来，召集干部传达上级指示，分析敌情，研究打法。谢家庆对大家说：“上级决心是：坚决摧毁寿阳、榆次间铁路，因此，我们非打下芦家庄车站不可！”据侦察员，报告：车站内除了油库、兵站外，在东北高地上有 7 个堡垒，四道铁丝网缠绕于堡垒和车站之间，西头是芦家庄铁桥，南面是条小河。守敌是原田大队吉冈中队 100 余人，有曲射炮、重机枪、掷弹筒各一个分队。经过研究，攻击部署是：三营的一个连牵制冀家埝之敌，一个连牵制榆次、长凝之敌，两个连配合自卫队、工兵破路，集中一、二营的主力，用两个连攻击堡垒群，一个排打一个堡垒，另外两个连直入芦家庄车站，采取夜间偷袭。

这次战役，八路军总部规定全线进攻的时间统一为 8 月 20 日 20 时。这天晚上 19 时左右，谢家庆带领一营走在前面，队伍从铁桥附近偷偷过去。

“轰隆隆，轰隆隆……”突然，远处驶来一列日军火车。勇士们举起了枪，可是不到规定的统一作战时间。谢家庆命令指战员隐蔽好。

谢家庆放过这列日军火车，黑夜恢复了宁静。月光下，十六团的队伍沿着河流和山谷，拉成一个黑圈，紧密地包围了驻守车站的敌人。

二营的战士拔掉第一道铁丝网的木桩，悄悄地通过了铁丝网，敌人未发觉；接着拉倒第二道铁丝网的木桩，敌人也未发觉；当拉倒第四道铁丝网时，敌哨兵被惊醒了，枪声打破了夜间的沉寂，“投手榴弹！”谢家庆见偷袭不奏效，即命令强攻。手榴弹不断在堡垒群中爆炸，战士们越过铁丝网冲了上去。

百团大战首先在谢家庆指挥的芦家庄车站战斗中打响！

在芦家庄打响战斗不到半小时，7 个堡垒全部被十六团攻占。敌人开始向西逃窜，三营向东打过去，敌人向北逃窜，二营向南给敌人迎头痛击。最后敌人被迫猬集在车站的房屋内，被十六团团团团围住。

敌人犹作困兽斗。八九十个敌人分成五六个小队，嚎叫着，实行反冲锋。

战士们端着刺刀迎上去，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连冲了五六次，都被十六团杀了回去！

谢家庆立即命令用缴获的烧夷弹、曲射炮对敌攻击。烧夷弹向敌人飞去，敌人惨叫着倒在火光下。汽油库、火药库，都被十六团的曲射炮弹击中，各种爆炸声汇成巨大的声响，火光映红了芦家庄的天空。

战斗结束了，十六团在百团大战中首开纪录，歼灭日军 80 余人，缴获枪 50 余支。控制了芦家庄车站后，有效地阻止了阳泉、榆次、太谷之敌东援，为全线部队打好“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1940 年 8 月下旬，正大铁路沿线的日军进行疯狂反扑，攻击正大铁路南侧安丰、马坊地区的我一二九师部队。我遭到榆次、寿阳、阳泉、和顺、辽县等守敌 8000 余人的 5 路合击、被迫向外线转移。

9 月 2 日 6 时许，十六团转移途中，在窑儿里的羊儿岭 1547 高地附近，与日军一个大队 500 余人遭遇。

“打！”谢家庆命令开火。在突如其来一阵急骤的弹雨下，前向的鬼子忽喇喇倒下一片，后面的鬼子被迫后退。

敌人密集的炮弹落在十六团的阵地上。阵地被炮火的烟雾笼罩，鬼子们头戴钢盔，手端刺刀，嗷嗷地乱叫着冲来。

“快甩手榴弹！”谢家庆大声吼道。战士们立即将手榴弹一次两个、三个地甩向敌群，顿时、阵地前沿响起了一连串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第二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谢家庆指挥战士们又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由于敌众我寡，1547 高地失守了。

按照上级命令，谢家庆带领十六团组织强攻，夺回 1547 高地。突上高地后，他率领战士与敌展开了白刃格斗。阵地上杀声、喊声、刺刀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喊杀声中，不时传来日本鬼子绝命前的嚎叫。

十六团在两个多小时里，与日军反复争夺 13 次，终于夺回了窑儿里和 1547 高地两个山头主阵地。这次战斗从 9 月 2 日 6 时 30 分打响，直到 21 时 30 分结束，激战持续 15 小时，毙敌 300 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合击八路军的企图，争取了时间，掩护指挥机关、刘邓首长及右翼部队安全转移了。

从 1940 年 9 月 22 日开始，八路军进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一二九师于 9 月 23 日发起以收复榆社、辽县（现名左权县）为目的的榆辽战役。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七七二团、十六团主攻榆社县城。当日晚上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经一夜激战未将榆社城攻下。24 日，谢家庆召开十六团作战会议，研究出新的打法。下午四时，他组织全团从钢炮、机枪到步枪，层层压住敌人火力，指挥部队强攻，仍未奏效。他立即组织士兵挖地道，进行坑道爆破。

9 月 25 日下午 17 时，爆破敌堡成功。谢家庆率第二营冲入敌人核心工事。日寇为挽救其失败，无耻地使用毒气。攻击部队的干部战士不少人中毒。谢家庆也中毒，但他没有倒下，高喊：“利用炸开的坑洞作掩护，消灭敌人！”十六团在他指挥下，经过 40 多分钟激战，终于将榆社城攻下。守敌除 20 余人逃窜外，其余被十六团和七七二团全歼，缴各种炮 12 门，轻重机枪 17 挺，步枪 200 余支。

1940 年 10 月 30 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在运动途中，被我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和新十旅主力，以及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包围于武乡以东

关家垴、柳树垴一带。敌在关家垴抢修工事，企图固守，以待援兵。

为了在敌援兵到来之前，歼灭该敌，十六团奉命在当天下午6时前，夺占关家垴东侧无名高地，断敌退路。

下午4时，全线攻击开始。八路军炮兵以准确的火力，摧毁了敌前沿防御工事。趁敌混乱之际，谢家庆立即命令：“突击队向无名高地冲击，吹冲锋号！”

突击队的勇士们，随着雄壮的冲锋号，趁着弥漫的硝烟，高喊着“冲啊！杀呀！”如猛虎般扑向无名高地。敌人利用残存的工事，负隅顽抗，双方伤亡很大。

下午5时40分，谢家庆亲率突击队再次发动攻击。迫击炮弹在敌人阵地上不断开花，手榴弹连续在敌人工事里爆炸。敌人的火器被八路军全部压制。谢家庆肩挎轻机枪，一边射击，一边领头向无名高地冲击！战士们看到团长率先打头，勇气倍增，端着刺刀，跃出战壕，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人。谢家庆端着机枪，对着被炮火炸开的阵地缺口一阵猛扫，随即率先突破敌前沿阵地，战士们紧随谢家庆之后，将敌压缩于狭小地带，展开白刃格斗。敌人被打得血肉横飞，嚎声四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阵地上。十六团终于夺占了无名高地。

10月31日下午4时左右，日军1500多人从黄烟洞方向赶来。

谢家庆立即命令：“通知各营坚守阵地，一定要顶住敌人的冲击！”然后他带着通讯、侦察人员跑出指挥所，靠在一块大石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突然，一发流弹飞来，正中谢家庆前额。

谢家庆光荣牺牲了，但他仍背靠在那块大石上，胸前挂着望远镜，像一棵屹立于山崖边的青松。

（成都军区政治部组稿宋勇撰写）

镜泊湖畔—青松 ——记陈翰章烈士

1940年12月8日，狂暴的西北风把一团团乌云推到镜泊湖上空，天沉重得仿佛就要坠落湖面。湖边的枯枝败叶、残雪夹着沙粒随风飘扬，打得人眼难睁。

岸边小弯弯沟老密营地，1000多名日伪军将抗联第一路军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所率领的一支20余人的小部队团团围住。

“陈翰章。投降吧，过来给你大官做！”敌人呼叫着。

“做梦，我死也不当亡国奴！”只见圆脸、浓眉、锐眼的陈翰章从硝烟里站出来，一扬右手，匣枪一抖，那喊话的汉好应声倒地。

镜泊湖畔的老一辈人这样唱着：“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

陈翰章，满族，出生于1913年6月10日，老家在吉林省敦化县半截河屯。1921年，陈翰章进入本村私塾上学。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并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之一，负责主编校刊《敖中》。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北大营的炮声，揭开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却下令东北军“坚决不抵抗”，撤到关内，使日本侵略者迅速把利爪深深插进东北三省。不久，敦化县城被日军占领。当时，正在县立民众教育馆担任讲演员的陈翰章，把教育馆当成抗日的阵地，宣传民众，秘密组织青年参加反日会，散发抗日传单。

1932年夏天，人们传说，吉林救国军前线指挥部来了一位“周司令”，打鬼子最坚决，不怕死，不爱财，带领救国军打了好几个胜仗。陈翰章闻知这一消息后，于这年9月13日前往敦化城南太平山，投奔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被任命为救国军秘书。

1933年初，关外各地的义勇军先后失败，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被迫领兵退往关内。这年夏，周保中赴宁安，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抗日义务队为核心，联合救国军柴世荣（后任抗联五军军长）旅等部队，广泛团结各抗日山林队，建立了吉东反日同盟军，年方20岁的陈翰章被提升为救国军前方总司令部秘书长。他时常利用一切机会，在派系林立、鱼龙混杂的斗争环境中，努力做好吴义成部队内的秘密工作。

1934年6月，陈翰章退出救国军，到宁安工农抗日义务队中任政治指导员，率领抗日义务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宁安、额穆、敦化、蛟河一带对日伪作战，扩大了抗日义务队的影响，团结了各种愿意抗日的队伍，敌人见动武的解决不了陈翰章的队伍，又派宪兵队将陈翰章的父亲吊在树上示众，装在麻袋里踢着满街滚；逼陈翰章的妻子改嫁。老父亲十分理解儿子的心，在敌人的威逼面前宁死不屈；妻子年轻胆小，被迫丢下公公婆婆走了。陈翰章却表示：“我决心抗日到底。为了抗日，就是全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我也决不去，坚决不当亡国奴！”

1935年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同时组成了军部和党委会，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师，陈翰章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调任第二师参谋长兼师党委书记。二师主要由反日山林队及救国军旧部

组成，人员新，匪气浓。陈翰章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以柴世荣、傅显明的老部队为基干队，在全师形成了以第四团（畜显明为团长）为核心的骨干力量，使二师的枪杆子掌握在党的手中。

1936年2月下旬，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陈翰章任该军二师参谋长。同年3月上旬，吉东安图迷魂阵会议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师，陈翰章任二师参谋长，因师长史忠恒患病，陈翰章代理师长。行军，作战，做思想工作，抓党的建设，没口没夜的辛劳，使他圆润的脸庞变得细长。战友们劝他要多注意点身体。他总是笑着说：“等打走了鬼子，咱们共同在热炕上睡3天，吃几大碗肉，不就行了吗？”

3月，二师四团在代师长陈翰章、团长侯国忠指挥下，在宁安县团山子同伪军百余人发生战斗，毙伤敌40余人。3月23日，二师五团袭击了图佳铁路三岔口车站。5月13日，该师四团与五军二师在宁安镜泊湖南部与日军佐藤部激战，击毙佐藤留次郎以下官兵十余名。部队还夜袭林口龙爪沟，巧战庙岭，智击刁翎、三道通，打得敌人防不胜防，伪军不断发生哗变，参加抗联的队伍。

1936年秋，万余名日伪军在飞机的掩护侦察下，以南湖头、东京城西南，宁安南部地区为中心目标，疯狂搜索进攻抗日联军，史称绥宁地区秋季“大讨伐”。10月，第五师师长史忠恒率部在图佳线老松岭伏击日伪军列车，战斗十分激烈。史忠恒中弹负重伤牺牲后，陈翰章接任五师师长。

1937年12月，陈翰章、侯国忠率领二军五师，与五军密切配合，活动在中东路道南镜泊湖沿岸。他们突入汪清、琿春，进出宁安、敦化，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经常袭击日伪据点，颠覆军车，破坏敌人铁路、桥梁、隧道、机场、仓库等军事设施，扰乱敌之后方。仅敦化县沙河沿一战，消灭日伪军数百名。

1938年6月，二军五师在陈翰章率领下，在敦化、额穆、宁安一带坚持游击活动。7月初，根据中共吉东省委决定，陈翰章率抗联二军五师等部，开始西征作战，由牡丹江地区南下。横道河子战斗中，面对数倍的日军“讨伐队”，陈翰章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冲过去！战士们从林中，从山里齐向“讨伐队”开火，鬼子匆匆撤出林外。当夜，陈翰章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乘胜袭击日本侵略者经营的镜泊湖瀑布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第二天拂晓，宁安县东京城西的镜泊湖北湖头建筑工地，枪声大作，火光闪闪，日军水电站守备队从睡梦中惊起，慌忙应战，混乱一片，丢下十几具尸体逃窜。抗日联军将日军工程事务所烧个精光，解放了大批劳工，还缴获大批粮食、被服与枪械弹药。

1939年春，第二军五师部队与五军二师在延吉、敦化一带活动，曾在敦化大蒲柴河苇塘沟与日伪军400余人激战，缴获步枪40支，子弹7000发，在宁安、敦化一带群众中到处传扬着这样一句话：“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翰章。”

1939年7月末，抗联一路军四师、五师，根据老岭二欢会议的决定，在政治委员魏拯民的主持下，在敦化汉阳沟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陈翰章任方面军指挥，侯国忠任副指挥，下设第十三团、十四团、十五团，共计600多人，成为当时抗联一路军中人数最多的方面军。

1939年下半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以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为目的的大“围

剿”。抗联部队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下旬，魏拯民、陈翰章和侯国忠统率三方面军全部、二方面军九团、五军陶净非部等共计900多人的主力部队，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安图县打响了著名的大沙河战斗。陈翰章受命率军主攻，战斗定于黎明时分打响。

大沙河是日伪修建的一个“集团部落”，四周筑有土墙，各角均设有炮台，内有伪警30多人，伪军约一个中队，日军一个小队，火力较强，防守严密。由于日军一士兵外出意外发现了设伏准备巧袭城门的抗联战士，迫使抗联进攻提前进行，变偷袭为强攻。陈翰章身先士卒，第一个冒着机枪弹雨，向城门口冲去。随着猛烈的爆炸声，土城门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借着浓烟的掩护，陈翰章指挥部队如虎下山扑进城去，敌人逃进建有两座炮台的警察署，凭借炮台的机枪火力作垂死挣扎。部队几次进攻失利，不少战士负伤或牺牲，陈翰章见此情景，怒睁双眼，提过一挺机枪就要上房，警卫员明基立即夺过机枪，爬上伪警察署附近的一家店铺房顶，从侧面向敌炮台实施压制射击。敢死队员趁此机会，迅速爬近敌炮台下，将一捆集束手榴弹扔进敌机枪工事内。一阵巨响后，敌人乱纷纷向外跑，均被抗联战士击倒。警察署内的敌人见炮台失守，遂向抗联战士举手投降。陈翰章攻占大沙河之后，带队急奔小沙河助战。此时，由安图开来的日军援兵已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攻占了小沙河山岭的有利地形，抗联第三方面军副总指挥侯国忠牺牲。就在这时，陈翰章率队赶来，大家喊着“为侯副指挥报仇，杀小鬼子”等口号，冒着弹雨冲上山头，将敌人赶下山，毙伤敌联队长以下官兵50多名。

大沙河连环战斗胜利后，陈翰章率军连夜向敦化寒葱岭进发。9月初，在行军中设伏歼灭蒲柴河伪军十团一个连。20天后，又在寒葱岭南坡公路旁密林中设伏，歼灭日军少将部队长松岛以下官兵80余名，击毁汽车9辆，缴获步枪100余支。

进入1940年后，东北的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陈翰章率三方面军直属部队，在镜泊湖地区坚持武装斗争，3月，部队在敦化牛心顶子遭到日伪军2000余人的包围。抗联部队苦战一天，伤亡70余人，陈翰章腿部负重伤，深夜方率军突出重围。当陈翰章带领战士们奔至牛心顶子深处的几处密营时，发现后方已被日伪军破坏，三方面军服装厂留守的女战士经过激烈抵抗，全部被杀害，缝纫机及多年储存的粮食、蔬菜等被敌洗劫一空。面对严酷的现实，陈翰章召集共产党员开会，用杨靖宇司令的英雄事迹（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殉国）教育大家。他说：“杨司令是战死了，他的死是最伟大的，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不会忘记他。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夺取胜利，这才不愧是杨司令的部下、战友、同志。”他带领全体战士宣誓：与敌人血战到底，决不回头：这支英雄的部队，从1940年5月至9月，连续作战10余次，歼敌100多名，穿梭于吉林、黑龙江两省边界，给日伪统治以狠狠的打击。这年10月，为解决部队冬季作战的给养，部队党委决定三方面军主力100余人向三江省方向突围，陈翰章亲率60余人的小支队留在镜泊湖地区牵制敌人。11月6日夜，陈翰章带领20余人的小分队，顺着鹰膀子山向镜泊湖东南方的小弯弯沟密营前进。8日，部队进至密营后，即被叛徒引来的敌人包围。陈翰章指挥战士们分散隐蔽在大树后，石砬子里，圆木边，与敌人展开血战。

激战两个小时，打退敌人四五次进攻，陈翰章身边的战士多数牺牲。敌人不惜代价，拼命地冲上来。陈翰章以人力掩护几名战士刚刚突上山坡，不

料他的胸部中弹，倒在雪地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荆南进撰写）

开拓政工新途径 ——记袁国平烈士

袁国平从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经历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长征。1938年1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牺牲于皖南事变中。他是中国共产党有才华的、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

袁国平，原名袁幻成，后改名袁裕，字醉涵，笔名最寒。1908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宝庆县袁家台村（今属邵东县）一户手工业工人家庭，家境贫寒。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在徐特立、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从一师毕业后，应田汉之邀赴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三队学习。同年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袁国平任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周逸群到贺龙部司令部，帮助贺龙改造和整顿军队，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袁国平被调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1927年5月，他随军进军鄂西，参加了平定杨森、夏斗寅部叛乱的战斗。后调任第四军五十二师七十四团一营三连指导员，率连队随十一军军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11月，袁国平奉命到广州，负责接待各地前来准备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12月11日举行广州起义时，他任教导团参谋，带领主攻部队攻占广州市公安局，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余部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称红四师），袁国平任党代表，并选为师党委委员，到海陆丰同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师，坚持武装割据的斗争。1928年10月，辗转到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他把红军政治工作的方法运用到根据地的群众政治工作中，开展了丰富多采的宣传教育活动。

1929年11月，袁国平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袁国平领导军团政治部接管了伪国民报馆，出版了《红军日报》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各项政策，1933年1月后，袁国平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他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两次入闽作战。特别是在东方军人闽作战中，领导军团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在装备低劣、物资匮乏，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战胜了优势敌人，恢复和扩展了大片苏区。陈毅曾赞扬说：“袁国平是一个好的宣传鼓动者，有才干。”1934年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8月乃日，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保卫驿前、石城战斗后，写了《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一文，着重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不间断的特点，如：使“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的口号普遍深入人心；战时政治工作，不仅政治人员努力做，许多指挥员也自动去做；战斗中指挥员伤亡时，党团员自动出来代理；当放弃或撤出阵地时，政治部预先派人到部队中做解释工作；战斗激烈时，鼓动与组织给养员抬伤员下火线来；党团员或支部负责人伤亡时，在火线上自行进行调整与补充；战斗中政治部派人到作战部队迅速收集资料，按时出火线小报；在火线阵地上撒宣传品，对敌喊话，瓦解敌军。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袁国平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

中央军委)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任红军大学下属的红军学校政治委员。同年12月,任抗日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后改步兵学校)政治委员。1937年8月,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邓子恢可为副主任”。

新四军刚刚建立不久,政治工作还处于初创阶段。为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建设,1938年5月间,项英、袁国平派军战地服务团团团长朱克靖率领演出队去茂林,进行抗日宣传,并代表军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6月17日至19日,他主持在岩寺召开了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自新四军成立以来,全军政治工作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但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远远不能满足本军任务的要求。为创造铁的新四军,他提出了关于政治工作的四条基本任务:健全党的工作,提高党支部在连队中的作用;正确执行干部政策,充分发挥干部的聪明才智;深入政治教育工作,使干部、战士具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和为理想奋斗到底的决心;确立政工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他要求建立政治工作从。上而下的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的一致;政治工作的重心要放在连队;战时政治工作要特别注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具体指导;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政治工作不间断地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

第一届政工会议后,袁国平到南京、江宁、镇江、丹阳、芜湖一带敌后战场视察,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寻工作。他通过在前线约两个月时间的视察,对坚持敌后抗战更充满了信心。他在写给亲属的信中说:“敌愈深入愈困难,兵力分散,交通延长,后方空虚,地形不利.而我则前有正规军顽抗,后有游击队积极行动,前后夹击,必使敌人之泥足越陷越深,中国抗战前途很好,最后定可战胜日本,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

1938年8月至11月,袁国平又兼任政治部宣教部部长。1939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到泽县云岭。2月7日至17日,新四军召开了第二次政工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下召开的。会上,袁国平作了题为《新四军一年来政治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和它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给政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袁国平重视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部队在新的历史时期执行新的任务所带来的新情况,及时总结政治工作适应新情况的新鲜经验。1939年2月15日,袁国平在《抗敌》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具体分析了江南敌后环境的特点,根据在江南敌后作战8个月的经验,论述了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政治工作所需完成的任务。他指出:江南水乡,地势平坦,河流交错,游击战争十分困难;江南又是有名的“温柔乡”,对军队有极大的腐蚀作用;军队分散游击在敌后,最易脱离上级掌握,助长流寇主义。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要坚持江南敌后抗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强调要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坚强的政治工作战胜困难,追求胜利,为加强军队在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政治工作,他提出:首先,要确立与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设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团以上设坚

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提高政治部主任的权力，其次，要加强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战斗热忱和严肃的纪律。第三，要加强民众运动。第四要加强敌伪工作。第五，要做好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他在论述每一项政治工作任务时，都具体分析了它的现状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做的具体方法，他这篇文章，是对敌后游击战争中新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1939年12月2日，新四军政治部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袁国平在题为《过去宣教工作的总结及今后宣教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说建军必须建人，建人必须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党的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还指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理论和实践的一致。”为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提出了下列教学原则：（1）集体学习、研究，互相帮助；（2）中国化，通俗化；（3）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4）教、学、做的完全一致；（5）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6）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7）循循善诱，循序渐进；（8）批判精神，科学态度；（9）基本教育与宣传鼓动相联系；（10）计划切实、检查深入；（11）博而又约，约而又博；（12）形成学习空气。

袁国平长于宣传鼓动，重视思想教育，善于及时总结经验。他的许多报告、讲话、文章以及他亲手起草的文件、材料，都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但是，在此期间，由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我军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的工作，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工作中过多地迁就国民党，把国民党首领的言论、宣言编入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教育，给新四军政治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1941年元月，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新四军奉命北移，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有预谋的重兵围歼。

在优势敌军的强大攻击下，袁国平率领直属纵队奋起自卫，多次打退潮水般涌来的敌军。

突围中、大部人员牺牲，小部人员随袁国平从重围中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此时，他身负重伤，倒在地下，昏迷不醒，待苏醒过来后，他对守卫在身边的卫士连战士们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

战士们在副连长李有的带领下，轮流背着他，连夜继续突围，天大亮时，他们赶到章家渡口。大家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手托头顶，抬着他渡河。这时，被敌人发现，敌军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好几个战士中弹倒在河水里，剩下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抬着他过了河。

上岸后，他们在一座古庙前休息，袁国平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眼神凝滞。他吃力地挣开眼睛，看了看围在身边的战士，用极度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他说：“你们走你们的……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向组织上……替我……汇……报……”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战士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摸出别在腰部的勃郎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响了扳机。他安详地躺在地上，眼睛定定地眺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和喷薄而出的红日。

1955年6月，袁国平烈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贺兆瑞、田华洲、魏蒲撰

写)

血沃幽燕“小白龙” ——记白乙化烈士

“革命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团长、平北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白乙化生前的豪语。他身体魁梧，络腮胡须，行走如飞，打起仗来，总是亲临火线：身先士卒，人们常叫他“小白龙”、“白大胡子”。1941年2月，他为保卫平北根据地牺牲在密云县境内的绦蓬山。

白乙化，字野鹤，满族，1911年6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石场圩村。他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少年上私塾就读时，即能够书写一手好字，也会写；日体诗，以“白才子”名闻乡间。1924年，白乙化在亲友们的资助下，考入了辽阳县立中学。

1928年，立志武装救国的白乙化，考入了沈阳东北军教导队，后又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军事，成为东北军的一位初级军官。1929年秋，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预科攻读政治经济学，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白乙化义愤满腔，夜不成眠，向中国大学当局提出抗战杀敌的申请书，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

1932年，白乙化返回故乡——辽阳石场峪，以教书为名，联系四方志士，宣传抗日救亡，秘密积蓄力量。次年，他便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转战于热北、辽西，连战连捷，从此，“平东洋”成了这支队伍的司令——白乙化的绰号，也成了这支队伍的称号，人民群众和爱国志士，纷纷挥戈而从，义勇军队伍发展到3000余人，到1933年春，该义勇军粮弹不继，退入关内时，国民党三十二军以援助为名，将他们骗到冷口，缴械遣散。白乙化悲愤地又回到北平中国大学学习。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企图使华北政权特殊化”，进而灭亡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命令军队“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民族危急日益加深，因而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白乙化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爱国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被称为运动中的“虎将”。

1936年夏，白乙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以东北流亡学生的身份，到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绥远省西部河套地区和硕公中垦区）工作，先后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垦区工委书记、垦区特委书记等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纷纷投入抗战之中。白乙化为核心的绥西垦区特委审时度势，决定举行武装起义。遂以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夺取了垦区的全部枪械，组成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

这年年底，抗日先锋队决定开赴抗日前线。渡过黄河后，这支队伍在晋西北河曲的煤窑沟打了第一个大胜仗。部队在河曲经过整编和严格训练，成为一支军政素质较好的队伍，白乙化担任了抗日先锋队总队长，配合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粉碎了日伪对雁北抗日根据地的围攻。

1939年4月，抗日先锋队由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的王震

介绍，挺进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同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抗日联军，王仲华（董毓华）任司令，白乙化任副司令。不久，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军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

平西足晋察冀根据地北向的屏障，又是八路‘不向冀东和平北发展的前进阵地。1939年夏，十团在白乙化的领导和指挥下，初战雁翅（北平门头沟西部、永定河北岸）告捷。夏秋之交，十团在平西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沿河城猪窝（珠窝）战斗，首创一次歼敌一个中队的战例。

1939年11月，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和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这样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并确定对平北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

同月，平西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冀热察挺进军第广、仁、九、十、十二仍十三团，白乙化任第十团团长。1940年3月。余寒犹厉，敌人从北平近郊各据点及张家口调集了9000余名日伪军，分10路向平西地区发动大“扫荡”，企图围歼挺进军于永定河南岸。3月9日，平西军民反“扫荡”战斗打响，十团首先同永定河北岸一股约6000人的敌军展开激战，在门头沟地区给敌重大杀伤；又在青白口、碣石两处伏击和截击敌人，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迟滞了敌人行动。

4月底，正是平北山区杨柳吐鹅黄，粉白的杏花、丹霞般的桃花、洁白如霜的梨花竞相开放，争奇斗妍的时节。白乙化奉命率十团赴平北，创建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北平郊区，潮河、白河两岸，其中长城要隘白马关、古北口，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伪满洲国的南大门。白乙化深知，此时，冀热察区党委派钟辉垠所率领的20多名党政干部和第九团八连，已在昌平、延庆、怀柔、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基本站住了脚，但丰滦密地区是伪满洲国、伪蒙疆政府统治较久，并建成一套较严密的统治机构的地区，又紧靠伪华北政府统治中心北平及日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张家口、承德，且抗战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增强了对后方的统治。白乙化认识到要开辟平北，不仅要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还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他根据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确定的采取波浪式的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和以小部队多点渗透，发动群众，隐蔽开辟，站稳一点，再找一个新点，逐次展开的战术，制定了“梯次进兵”的方案，由团参谋长才山、政治处主任吴涛、三营营长翟飞、教导员王波率领三营及团部部分工作人员作为先遣队，直捣敌后方心腹地区古北口、白马关一带。5月20日，白乙化率团直属队和一营，突破以“锁钥北门天设险，壮哉峻岭走长龙”著称的长城名塞居庸关，闪电般穿过平绥路，在昌平县沙塘沟对来犯的伪满洲军第三十五团第二营进行猛烈反击，毙伤敌营长以下40余人；又于南天门全歼伪满洲军1个排，并攻克密云县境的玻璃庙据点，俘伪警察40余人。5月底，十团1000余人都进入密云县境内，展开了丰滦密地区的游击战争。

密云县境，是燕山的主脉，群峰环峙，山势陡峭，明长城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白河从山谷中蜿蜒奔流，地形险要。全团在密云赶河厂会合后，白乙化对敌情、民情和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调查，把林深草密，沟壑纵横，东临平原，横跨长城内外的云蒙山区定为根据地中心区；依据当地政治、经济状况，提出“集中主力于外线打破敌人，掩护内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他从团的机关和连队抽调了40余名干部，与上级党委的工作组一道，

分头发动群众，建立和巩固县、区抗日政权，组织地方游击队。还把群众中的抗日救国积极分子集中起来，举办了干部训练班。这些抗日骨干走上新的岗位后，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将丰滦密山区和平原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建立起8个行政区，各区都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白河、白马关、古北口、四海等地游击队也发展起来，一部分成为十团主力部队（如二营）。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形成了。

从1940年夏以来，白乙化紧紧抓住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环节，率十团主力北出长城，向敌伪展开游击战争，为了吸引敌人，减轻内线压力，白乙化率领部队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牵着敌人鼻子团团转。有一次，他们甩掉了前来追击的300多名日伪军，一举捣毁五道营据点，旋即东进小白旗，重创敌军，然后挥戈南下袭破司营子据点，继而北上攻克滦平县西虎什哈据点。当敌人觉得十团销声匿迹时，他们又突袭大草坪，歼敌1个营。

1940年7月，白乙化率十团主力返回长城内。

怀柔火车站是当时平北敌人战备物资聚集地，从东北经平古铁路运来的军人，堆积在怀柔火车站至吊台之间，有的装车随时准备运出。白乙化等领导同志决定，抢在敌人运出之前，将这批军火物资炸毁，命令七连执行此项任务。白乙化率十团一部，在怀柔县城西北的四海冶、勃海所等敌伪据点附近加强活动，以调动敌人，转移敌之注意力。敌守备队长山本，果然从怀柔抽调兵力增援。就在此时，十团七连隐蔽在怀柔城北于家坟，晚9时直奔火车站。站内铁路工人即把火车上的炸药点燃，投入敌军火库。当山本听到爆炸的巨响后，领着一队日军奔赴车站时，即遭到十团七连的痛击。这一胜利喜讯，很快传遍华北各地，抗日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1940年9月23日，日伪调集4000余兵力，对丰滦密地区进行了长达78天的大“扫荡”。白乙化等制定了“敌进我进，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开辟新地区”的反“扫荡”方针。命令三营留守根据地，在内线分散游击，集中歼敌；自己则率一营到外线，在长城外潮河以东打击敌人，在大峪、土门全歼日军1个小队。当敌人将要结束“扫荡”时，十团一营返回内线，于冯家峪南弯子设伏，给撤退的日军“常胜部队”哲田中队以歼灭性打击，使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反“扫荡”斗争胜利后，已是秋风劲吹，黄叶翻飞的时节，天气逐渐寒冷起来。敌人到处散布谣言：“树叶落，八路军走！”但是，白乙化对过冬御寒已有准备。他让部队拿出棉花，动员根据地的妇女昼夜赶制棉军衣；同时又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从北平买来毡帽盔。他高大的身躯站在战士队列前，自豪他说：“我们，棉衣穿上了，新式‘钢盔’戴上了！敌人靠‘扫荡’不能赶走我们，靠老天爷更休想赶走我们！”

冬去春来。1941年春，白乙化在马营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把以云蒙山为基地的丰滦密根据地，向伪满统治区扩展，北向云雾山区发展，把战争推向敌占区。会议刚结束，2月4日，伪满滦平县警务科长关直雄指挥“讨伐”大队，向白河十团防地马营偷袭。十团在白乙化的指挥下，布下口袋阵，在马营西山与敌展开激战。战斗从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3时许，毙俘敌117人。残敌龟缩在鹿皮关烽火台里负隅顽抗，妄图待夜幕降临后突围。

下午4时，白乙化站在绛蓬山上，手持指挥旗，命令一营营长王元：“一营冲锋！”话音刚落，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白乙化的头部。他倒下了，时年仅29岁。

同月 20 日，十团指战员、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及人民群众、爱国僧侣 300 余人，在北后城村召开追悼白乙化烈士大会。1944 年，丰滦密联合县和冀东第五地区队，为白乙化烈士建立了镌刻有“民族英雄”4 个大字的纪念碑。1984 年，密云县人民政府重建了白乙化烈士纪念碑，当年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的肖克将军手书碑文：“血沃幽燕，名垂千古”。白乙化所创建的业绩和他的革命精神，将与巍巍燕山共千秋！

（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稿石魁撰写）

“药王”誉满晋察冀 ——记杜伯华烈士

杜伯华，原名维汉，字华昌，1904年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幼年随父从河北省逃荒到吉林省榆树县夏宝屯落户，其父杜万贵靠行医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杜伯华从小读书勤奋好学，但因家境清贫，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随父外出采药，串乡行医。天长日久，学会了识别草药，掌握了采药，制药技术和摸脉看病。1931年，到榆树县城开办了建中医社，次年，改办华昌药房。这时，他不仅继续钻研中医，还自修西医，医术不断精进，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

1932年8月，杜伯华在前来榆树县开展抗日宣传的姑表内弟李向之的影响下，决心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李向之在华昌药房建立了中共榆树县地下交通联络站，杜伯华被任命为联络站负责人，以行医为掩护，接送过往干部，搜集日伪情报，筹集和转送抗日物资。他将药房盈利的绝大部分捐献给了东北义勇军作抗日斗争的经费，或者直接购买胶鞋、棉衣、枪弹、药品等物资，转送义勇军官兵。1935年春，他还巧妙地掩护遭伪警察通缉的抗日联军五团副团长李士英出城脱险。当他得知敌人将要逮捕他，查封华昌药房时，他及时转告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变卖了药房，辗转到了北平，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由李向之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夏秋之间，他由党的组织派到陕西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东北军，在孙铭久旅下辖的学兵队任连指导员。西安事变时，他参加了活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1937年初，杜伯华根据党的指示，带一些学兵队队员返回北平，在西城粉子胡同25号煤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下属的社会支部所在地）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炮轰卢沟桥，中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平津相继陷落。党决定杜伯华带领一部分学兵队员参加“平西游击队”。

当时，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南逃，北平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北平地下党认为这是营救抗日战友、扩大抗日武装的极好机会，指示游击队做好准备，攻打德胜门外河北省第二模范监狱，解救难友，缴获枪支弹药。杜伯华利用力管理人员看病之机，进入监狱侦察，摸清这个监狱共关押近600人，其中20多人是共产党员，监狱有30多名看守警察，监舍的布局和通道走向等情况也熟记于心。通过数次接触，杜伯华还和一位看守狱门的老头交上了朋友。8月28日深夜，游击队员来到狱门前“叭、叭、叭”三声联络信号枪声响起，狱门大开，游击队员蜂拥而入。这时，看守人员列队站在院中，身上未带任何武器，正准备迎接日军派来的接收大员，却乖乖地当了游击队员的俘虏。游击队一枪未放，劫狱成功，缴获3挺机枪、数十条步枪及弹药，犯人全部得以解放，其中一半人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力量壮大后，被正式命名为平西抗日救国军，全军编为3个总队，杜伯华任医务处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后任二总队主任（即政治委员），率部在青白口、雁翅、门头沟以东地区活动。11月中旬，抗日救国军在阜平整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杜伯华仍任二总队主任，率部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杜伯华等带领部队参加了二道河子伏击战仍歼灭日伪军近百人，并击落敌机一架。4月下旬，杜伯华调任房（山）良（乡）联合县县

长。5月8日，联合县政府正式成立后，他迅速开展抗日宣传，加强县、区、村抗日政权建设，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组织青年参军参战，使全县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939年3月，他升任冀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为巩固和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倾注了很多心血。

杜伯华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即使是从军从政时期，也挤出时间为军民群众看病，拯救过无数伤病员的生命。

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有个小战士的腿被打成粉碎性骨折，军医要给他截肢。这个小战士流着眼泪说：“我刚16岁，没有腿怎么打鬼子呀！给我留下这条腿吧！”军医说：“已打成这个样子，我是没有办法了，你找杜专员吧，兴许他有办法，”

恰好，杜伯华来这个部队探望伤病员，他听说这个小战士的情况后，反复检查这个战士的伤情，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同志不要难过，让我再想想办法。”杜伯华立即抽出时间，亲自上山采药。配制成治伤药，让战士内服汤药，外敷膏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小战士的腿奇迹般地保住了，伤也治好了。当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流着激动的泪水，深情地向杜伯华敬了一个军礼……

一次，五支队教导员史进前得了瘟疫伤寒病，高烧昏迷，生命垂危。杜伯华看到与自己一同做地下工作，一同砸监狱，又一同在平西打游击的战友病成这个样子，既心疼又着急，立即上山采药熬好，一口一口地给教导员喂下。在他精心治疗护理下，教导员的病情有了好转。他万分欣喜他说：“哈！你死不了啦，终于把你从死神那里抢回来啦。告诉你，大家把你的墓地都准备好了。我这些日子里常常想，你不该死啊，这样年轻，才21岁……”杜伯华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抚摸着战友那双干瘦的手。为了巩固疗效，杜伯华又派人化装进城买来治瘟疫、伤寒的特效药，使教导员的病情完全得到控制，迅速恢复了健康。对这件事，史进前非常感激，至今念念不忘杜伯华的救命之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特别残酷和频繁，边区军民生活极为艰苦，尤其是药品十分缺乏。1940年，晋察冀地区瘟疫流行，疾病丛生，严重损害了边区人民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十分关心边区军民的疾苦，把制药行医出身的杜伯华调来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主管制药工作，并指示卫生部部长游胜华说：“伯华同志到卫生部工作，你们应充分发挥他的特长，特别是把制药工作搞上去，以粉碎日寇对我之经济封锁。”

杜伯华到任后，到军区各医院看望伤病员，询问病情，详细了解缺医少药的情况，决定自力更生，就地取材，亲自设计药碾和干燥器等制药的关键设备与工具，并带领边区军民上山采药；还从机关抽调几名骨干及战士办起了制药厂。在研制各种药品的过程中，他每研制一种新药，总是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观察服后痛苦大小，有无副作用，以掌握第一手资料，绝对安全后，才给伤病员服用。为此，他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胃里也痛得火烧火燎，浑身冒汗，有一次，他喝下自己配制的汤药后，开始喉咙干燥，胃往下坠，接着昏迷了4个多小时，幸亏被同志们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以后，在大家的督促下，他每次试服新药，都事先准备好解药，并有卫生员在旁守护，防止出事。制药厂经过他一次又一次地试验，改进配方，终于研制出解热、利尿，防腐，健胃、镇咳化痰、镇痛、止疟等几十种药品。药厂在

生产片剂的过程中缺乏片剂粘合剂，他就发动大家采集桃树胶来加工生产。他亲自研制手摇式压片机和石印机，改善了制片生产和包装的条件。缺少注射用的安瓶，他又领着大家建起了玻璃车间，生产安瓶。只要伤病员和医疗单位需要，药厂就千方百计地从中药代用品中提炼制成各种片、散、丹、膏。不仅克服了严重的西药来源困难，也便于野战部队携带和使用。这些药品虽然外观不够精致，但很有疗效，拯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解除了他们在伤病过程中的痛苦。晋察冀边区的药品，除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销往平津、晋冀鲁豫、晋西北等地，甚至还从敌区换取了伪钞，购进了各种西药和医疗器械，解决了边区医疗用品的困难，对粉碎敌人的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2月20日，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签发的《关于自制代用药品问题的训令》中指出：“自敌对经济封锁加紧后，西药之购买与输入日益困难，而我们边区土产原料炮制之各种药品……虽因技术设置所限，提炼尚不纯良，外观不如舶来西药之精致，但所采用之原料亦多含有西药成分之原料，或按中医验方所配成，屡次试验均极有效。”聂司令员肯定的这些成绩，与杜伯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1年的环境虽然非常艰苦，但共产党人对抗日胜利和祖国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194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纪念日。杜伯华准备在这一天，和他亲密的革命情侣松伟结为伉俪。可是对革命和人生充满乐观的杜伯华。生命的指针却永远停在了6月30日这一天。这天，他因试服606药物中毒而倒下，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着的革命事业和亲爱的战友。当时他年仅37岁。

杜伯华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遗体安葬在河北省唐县神仙山麓，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葬在一起。

（总后政治部编研室组稿任征、滕利娜撰写）

狼牙山上壮高风

——记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五壮士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在屹立华北易水河畔的狼牙山上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他们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弹尽路绝而舍身跳崖，用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谱写了壮丽的篇章。1942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为修建在山上棋盘坨的壮士纪念碑题词：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手录邓拓诗，作为题词：

北岳狼牙耸，
边疆血火红。
捐躯全大节，
断后竟奇功。
畴昔农家子，
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
战史壮高风！

抗日从军投八路

七连指导员蔡展鹏刚上任，连长刘福山借点名的机会，让他同全连指战员见面。蔡展鹏在上任前就听说过，六班长马宝玉脾气好，不太爱说话，有“大姑娘”的绰号。这回见面，着实打量了一番：马宝玉，中等个头（身高约1.7米），白皙的椭圆脸，单眼皮，小眼睛，厚嘴唇，他那老成持重的神态，使人感到是一个经历过风霜的年轻人。

马宝玉，1916年10月出生在河北省蔚县陈家洼乡下元皂村。全家三代8口人，住在一间低窄破旧的茅屋里，以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每年，打下的粮食绝大部分进了地主的粮仓，自家只留点杂粮，拌着野菜过日子。他14岁那年，洪水泛滥，爷爷和母亲得了水肿病，无钱医治，爷爷、父亲和母亲相继离开了人世。两个姐姐和年幼的妹妹被地主拉去抵债，继而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家破人亡的马宝玉，带着弟弟离开家园，过着流浪的生活。没几天，弟弟也被饿死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华北，焚掠他的家乡，马宝玉发誓：“我要是有枪，非杀了这帮狗东西不可！”当年11月，他听说有一支叫“八路”的队伍为穷人翻身解放，打日本也坚决，便四处寻找。不久，聂荣臻率领八路军一部挺进雁北，马宝玉的愿望实现了。他参军后，分配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七连，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胡德林，说话“大舌头”，还有点结巴。蔡展鹏留神望望他，总觉得不

怎么顺眼。长脸、尖腮，五官还算端正，个子和马宝玉差不多一样高。只是站在队列里，双腿靠不拢，还有点驼背。当然，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胡德林说话含糊，打仗却不含糊，平时也挺幽默。春节时，连队扭秧歌迎新春，他硬给马宝玉套上一件花褂子，扮作一对“夫妻”，扭了好一阵子，乐得大家合不拢嘴。他于1918年出生在河北省容城县一个贫苦农家，从小失去父母，12岁就给地主扛长工。他的驼背和箩圈腿，就是长期负重和推磨留下的印记。18岁那年，他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皮鞭和辱骂，把地主绑起来痛揍一顿，开始了流浪生活。

胡福才也是容城县人，个子比较矮（约1.6米），双眼皮，大眼睛，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就像熟透了的苹果。胡德林给他取个外号，叫“‘小胖墩’”。他从小流离失所，行乞度口，无法记清自己的身世。胡德林在流浪中遇见了他，把他带在身边作伴。当时的胡福才，连个姓名都没有，胡德林待他像亲兄弟一样，给他取名叫胡发财。

1938年秋，一团攻打冀中腹地——容城之前，他和胡德林3天未进食，饿昏在路旁的沟里。是一团一位战士把自己的一袋干粮送给他俩，拯救了两条苦难的命。部队打仗时，他俩帮助部队送弹药、抬伤员。战斗结束后，他俩跟在队伍后面走了10多里路，坚决要求参军。部队首长把他们分配到七连，还给胡发财改名为胡福才。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入伍后，先后参加了攻打容城、保卫阜平、激战大龙华、转攻雁宿崖、黄土岭等多次战斗，作战非常勇敢。阜平战斗中，日本鬼子施放瓦斯毒气，胡德林、胡福才都中毒昏迷，担架队把他们送下火线。但是他们苏醒后，又投入了战斗。黄土岭战斗中，马宝玉负了重伤，仍然坚持战斗，不下火线。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他们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革命道路，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1939年冬，马宝玉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六班班长。从此，马宝玉和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成了朝夕相处的战友。

1940年上半年，一团七连六班随连队南下，参加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战斗，在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宋学义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参加八路军的。同年秋，他们在平汉路东运粮战斗中负责架设桥梁，为部队和民兵运粮队伍开辟了通路。后随连队参加了著名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涞源一带痛歼日寇。

危难挺身担重任

1941年8月，华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调集10万余兵力，对晋察冀军区北岳、平西根据地实行大“扫荡”。进攻狼牙山的敌人是日军旅团长高见指挥的部队。一分区一团在狼牙山麓、易水河畔同敌人周旋，瞅准机会，狠狠打一下就走。日伪军在狼牙山一带“扫荡”一个多月。毫无所获。高见又怒又躁，驱赶日军和伪军，步步向狼牙山逼近。

狼牙山因其峰峦状似狼牙而得名。它是晋察冀边区东线的大门，有5垞36峰，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主峰莲花瓣海拔1105米。远远望去，群峰突兀连绵、壁若刀劈斧凿，大沟深壑，怪石林立，宛如一群雄狮猛兽俯卧在易县西南部（距县城45公里）。它不仅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抗日根据地的“宝库”，山上存放着我们很多弹药、被装和粮食，是敌人进攻的重

点。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分区及时将一团主力部队调到边区领导机关周围担任警卫任务。狼牙山地区只留下一团七连和部分民兵坚持斗争，掩护群众秋收，破坏敌人交通，牵制敌人进攻边区的兵力。

分区领导人考虑到七连的任务比较重，留下司令部侦察科长，携带电台，指挥狼牙山地区军民反“扫荡”，并随时报告敌情变化情况。

9月23日，团长邱蔚获悉敌人要大举进攻狼牙山的情报，当即通知驻在林泉的七连连长刘福山上山，将牵制敌人、掩护群众安全转移的任务交给他。

在敌人“扫荡”期间，易县、涞源、徐水、满城等县的抗日政府机关和数万群众，都相继转移到狼牙山地区。七连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困难很大。刘福山回来后，与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立即召开党支部大会进行研究。

会上，大家认真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敌人在兵力，装备上都占有优势，我们不能硬拼，必须发扬我们熟悉地形之长，以少胜多。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七连指战员隐蔽在山梁上严阵以待。9月24日拂晓，敌人开始行动了，整个狼牙山地区，熊熊的火龙狂舔着灰白色的云块，浓黑的烟雾腾向苍穹。扶老携幼的乡亲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行李，汇成一股长长的队伍，在民兵和政府干部的组织下，沿着蜿蜒的山沟，缓缓地向远处走去。

七连在掩护主力部队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后，在山上顽强地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9月25日天亮后，蔡展鹏带领连队向老君堂方向突围转移，留下六班掩护连队转移，阻击向棋盘坨运动的敌人。

血肉谱写悲壮歌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走！”马宝玉率领全班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击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一会儿望望主力转移的方向，一会儿望望棋盘坨。眼前有两条岔路：往右的路可通往老君堂，但敌人就在身后，我们走到哪，敌人就会跟到那，这样主力部队和转移的群众就暴露了；往左通往棋盘坨，上了棋盘坨，便无路可退，但可保证主力和乡亲们安全。马宝玉思索片刻，迅速拿定了主意：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敌人引向绝路！他提起枪，刚毅地说：“走，上棋盘坨！”

棋盘坨（因顶端一块大岩石上刻有围棋盘得名）陡峭险峻，两面悬崖绝壁。另外两面，一面连接主峰莲花瓣，上了莲花瓣，到处绝壁深渊；一面是陡坡，坡上有一条崎岖的小路。路两旁巨石半悬，令人毛骨悚然。

马宝玉带领全班沿着崎岖小路，向棋盘坨攀去。

“我们先在草丛里隐蔽起来，敌人上来，我们就打，敌人不上来，咱别理它！”葛振林说。

“对！咱们把手榴弹、子弹清一清，尽量节约，把能搬动的石头都搬到路口上来！”马宝玉吩咐完，又小声对葛振林说：“只有我俩是党员，你带宋学义守左边，我带胡德林、胡福才守右边不一会，六七十个敌人顺着山路爬上来。距离顶峰还有200米左右时，敌人停了下来。几个伪军喊道：“八路赶快缴枪，皇军优待俘虏！”敌人叫了一阵，不见动静，指挥官把刀一挥，几十个敌人哇哇地叫着往上爬。

待敌人到了跟前，马宝玉拿着一枚手榴弹说：“来吧，我用手榴弹优待

你！”随即投向了敌群。大家都先后投出了手榴弹，炸得敌人直往下滚。

激烈的战斗，使棋盘坨灰秃秃的山包弹痕累累，被打断的松枝躺倒在破碎的石块上，冒着缕缕青烟。敌人不甘心失败，在火力掩护下，再次组织进攻。

马宝玉他们都没子弹了。只有胡福才偶然在地下找到了一枚手榴弹，他刚要往下扔，马宝玉抢前一步夺了过来，别在腰里，沉着地说：“用石头砸！”

“好啊！砸呀！”胡福才高兴得叫起来，大家一个劲地把石头推下山坡。只见成串的坚石一蹦三蹿地顺着陡峭的山势，越滚越快，刹那间，鬼子夹杂着石头，哗哗啦啦向山谷里滚去…

敌人步步逼近，五壮士没有丝毫畏惧。马宝玉转过身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革命战士宁死不投降！”

宁死不投降！这是五壮士共同的心愿。他们渴求着壮丽的一生，绝不活着当俘虏。

马宝玉举起那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三八枪说：“同志们，砸吧，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砸了枪，马宝玉和葛振林交谈了几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放在膝盖上匆匆写着，写好后，向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招了招手。3人都围了过去。

“同志们！”马宝玉用激动的声音说：“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以前我们俩对你们帮助不够，没有培养你们入党。这次战斗证明，你们3个人都具备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条件。以后同志们如能找到我的尸体，就会在我的衣袋里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3人入党的信。现在，我们都用实际行动，表示我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吧！”说完，把小本装进口袋，大步向悬崖走去。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也昂首挺胸，紧跟在他的后面。

敌人爬上来了。他们见五壮士无路可走，立在悬崖，便端起刺刀喊着：“抓活的，抓活的！”扑了上来。

马宝玉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也相继跳了下去。巍巍狼牙山谷中回荡着他们气壮山河的声音：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如血的夕阳坠入了远处的山谷，落日余晖在棋盘坨上映出五壮士的身影。敌人费了一天的时间跟踪追击，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终于占领了这块土地，但看到的只是5名八路军战士舍身跳崖的壮举。

微风吹散了硝烟，暮色笼罩了苍茫大地。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永远地睡去了。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崖畔的松树托住，身负重伤，被老乡们救起。

晋察冀军区为表彰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决定在烈士牺牲的地点建立纪念碑，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1月修建，1943年被日寇用炮炸毁）；授予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烈士为一团“模范荣誉战士”，部队每逢纪念日点名，首先从这3名荣誉战士点起。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各赠“模范青年”奖章一枚。

1959年，党和政府为纪念英烈，教育人民，在狼牙山棋盘坨重建了纪念塔，塔身正面是聂荣臻元帅手书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几个大字。1986

年又加重建增修。

(广州军区政治部、53200部队政治部组稿胡支援撰写)

血洒溧阳战凶顽

——记罗忠毅烈士

1937年仲夏，闽西山区水声淙淙，绿草青青。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在这里将坚持斗争在闽西南的1200多名红军游击队整编为“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由罗忠毅任参谋长。1938年2月上旬，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

1938年3月，二支队誓师北上抗日。罗忠毅和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率司、政机关和三团、四团，于7月到达苏南横山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副司令员粟裕会合，开创横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横山地区，既是皖南新四军军部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敌心脏——南京城的一把锋利的尖刀。罗忠毅协助张鼎丞和粟裕，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在地方上发展党员，培训抗日骨干，很快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江宁、溧水和当涂县委。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团组织相继建立。还建立了3个连队的地方武装。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的同时，罗忠毅重视团结争取抗日的力量，收编了自发组织起来的朱昌鲁、刘一鸿等地方武装，引导他们参加抗日。

1938年冬，日军联队长横山大佐指挥2000余人的日、伪步骑兵（其中骑兵200多名），分路奔袭合围横山，妄图一口吞掉初进江南敌后的新四军二支队，摧毁根据地。敌人以三路会攻横山，一路袭占博望，断我后路，企图迫使二支队主力退缩于秦淮河、姑溪河、石臼湖之间的博望平原而予以聚歼。罗忠毅派两个连和侦察分队，在横山的351高地与敌周旋，破坏通向横山地区的所有桥梁。然后，趁黑夜亲率一个营，由独山李家村经华府，绕道到博望与下望塘之间设伏。翌日上午8时许，当骄横的日军进入预伏地域——下圭塘一线的土公路时，罗忠毅下达了攻击令，并亲自指挥6挺轻重机枪，首先拦腰狠打日军。激战半小时，毙敌200余人，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

积极寻找机会，主动出击敌人，是罗忠毅指挥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

1939年1月上旬，粟裕和罗忠毅决定奇袭官陡门。

官陡门位于日军战略基点——芜湖机场附近，这个小镇四周是水网稻田。敌据点设三层铁丝网，筑起了碉堡和隐蔽战壕，由300名伪军据守着。1月18日晨，浙浙沥沥地下着毛毛细雨，罗忠毅率部冒着风雨出发了。为了麻痹敌人，他指挥主力沿西岸北进，天黑后由芜湖向东打回来；一部兵力沿东岸北进，配合主力作战；侦察分队化装成赶集农民，分别潜伏在镇内。19日清晨2时，两路部队进入官陡门附近的王石桥。拂晓前发起冲击，河东北进的部队迅速冲破敌人铁丝网，与向东打回来的部队一齐夹击敌人，与敌激烈战斗的同时，化装潜入的侦察分队趁机打进敌人的司令部。从开始攻击到解决战斗仅半小时，我军仅伤战士2人，全歼守敌300多名，缴获敌一部电台和全部枪械物资。

官陡门伪军被歼，日、伪驻南京的指挥部急忙抽调外出“扫荡”的日伪部队开往官陡门。罗忠毅又成功地指挥了水阳伏击战。高淳至水阳的横溪地域，是日伪军往芜湖、官陡门的必经之地。罗忠毅要求三团一营和二营的两个连队，趁夜暗赶到横溪和小丹阳附近。他用3个连的兵力伪装成日伪军，其余部队从敌人的结合部突击。半夜里，3个连分两路，一路向驻小丹阳的

日军袭击，待日军还击时，这一路便向横溪方向且战且退，引敌追击，另一路则向横溪驻地日伪军袭击，将其引向小丹阳方向。当两路敌人快相遇时，罗忠毅指挥部队一阵猛击后，不声不响地向溧水的孔镇撤走。两路敌军战至天明，敌指挥官大喊上当。

1939年11月，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总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1940年初，罗忠毅同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率领二支队司政机关，进入苏南句容北部地区活动，并成立句北地区军政委员会，罗忠毅任书记。2月，以原二支队机关为基础，组成新二支队部，罗忠毅任司令员，廖海涛任副司令员。

二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后，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罗忠毅任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廖海涛任旅政治委员。

1941年5月21日上午，顽军四十师派出4个营的兵力，向十六旅驻地盛家村、夹子巷一带进攻。罗忠毅指挥四十六团进行反击，战斗至黄昏，将敌击退。

22日，顽军再次进犯。午后1时许，敌人1个营加1个机枪连，1个特务连，配备4门大炮，向十六旅驻地戴巷进攻。罗忠毅率部进行自卫反击，至下午3时，将顽军击溃，并追击20余里，罗忠毅估计到顽军还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于是命令以一部兵力占领黄金山地区有利地形，构筑工事，预先埋伏；以另一部兵力化装为农民，分散到田野和打麦场待命；而把主力置于黄金山侧后的沈庄、下院、下庄一带。此外，罗忠毅还安排十六旅四十六团八连、九连穿顽军服装，埋伏于戴水塘边。

24日下午，顽军四十师副师长亲率两个团和炮兵连，分两路向黄金山进攻。敌人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新四军正面阵地，然后进行集群冲击。当进攻到新四军预伏部队的火力圈时，遭到了猛烈反击。此时，罗忠毅一面率主力突然从顽军的后方和左右两侧出击，集中打击顽军要害；一面命令化装的两个连穿插进顽军的两个团之间，同时向敌二二团和一一八团开火。在田野里割麦和在场上打麦的部队听到枪声，拿起武器，一齐投入战斗。顿时，机枪步枪的吼叫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处在四面楚歌之中的敌人不知朝哪里开枪，只得丢枪弃炮溃逃。敌副师长率残部向南撤退。罗忠毅率十六旅边追边打，直追至黄昏时分，才结束战斗。

至此，黄金山反顽三战三捷，共歼敌4个营，击溃7个营，毙伤敌人400多名，生俘500多名，缴获机枪、步枪800多支，还有18门炮及10余万发子弹。新四军仅伤亡40人，这一大捷，扭转了皖南事变后茅山地区的危急局面，为后来迅速恢复溧阳地区，并以此为基地，西返溧水，北返茅山，恢复原有的地域，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1940年的春夏之交，罗忠毅奉命率二支队四团部分人员，到镇江至龙潭长江边一带驻守，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作准备，并掩护部队过江。在准备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摸清日军的巡江规律。这个任务可以派人通过江边观察来完成，但仅凭一两天的观察推测是不保险的，必须派人打进敌人内部，掌握切实可靠的情报。派谁去呢？正当罗忠毅望着滔滔长江水发愁时，在丹北作民运工作的柳肇珍用她那清脆的嗓音问道：“罗司令，又碰到什么难题了？如不保密，不妨公开公开，我们也可分忧嘛！”

柳肇珍是江苏镇江人，初中毕业时，新四军东进茅山，她参加新四军后被分配做民运工作。此时21岁的柳肇珍长得矮胖，会唱歌，大家叫她“小胖

子”。罗忠毅想到柳肇珍是镇江人，熟悉镇江情况，遂把打入敌人内部的事告诉了柳肇珍。不料，柳肇珍“毛遂自荐”：“我是在镇江长大的，又是女性，城里同学、熟人多，容易混进城弄到情报。”果然，柳肇珍进镇江半个月，就完成了任务，为罗忠毅指挥四团掩护江南主力胜利北渡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切夏的一天傍晚，罗忠毅邀柳肇珍一同散步，终于向她吐露了爱慕之情。柳肇珍一只手不停地抚弄衣角——她毕竟是首次遇到男子的求婚。她只觉得罗忠毅是司令员，自己不般配，便羞答答地说，我们彼此了解不多。幼年丧母，从小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罗忠毅却急切地说，你对我不了解没关系，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说着，便像小孩背书似地谈起了自己的身世：我1910年4月生于湖北襄阳县二郎庙街一个贫民家里。小学毕业后，到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当兵。1931年冯部被调到江西打红军，这年12月我在江西宁都参加暴动，不久加入共产党。党组织送我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担任过排、连、营、团长，1933年夏由宁化、清流、归化地方武装编成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时，还担任过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35年4月，留在龙岩、连城、宁化地区活动的红九团第三营和明光独立营成立第一作战分区，我担任司令员，在龙岩北部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至今天，一直忙于打仗，已经30岁了，还从未谈过恋爱呢！柳肇珍听到这里，噗哧一笑，轻声地说：“你不要说了，我都听你的。”

1940年7月，陈毅在北渡之前，特意将罗忠毅、柳肇珍招来，笑着对他俩说：“罗司令早就是‘285’团的成员了（当时新四军干部结婚条件为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眼下战争频繁，谈恋爱没有花前月下的幽会场所，希望你俩早点成一对烽火鸳鸯，我当你们的红娘。”

这年10月，他们在丹北战场上结成秦晋之好。

1941年深秋，苏南地区细雨霏霏，天气阴冷。11月28日拂晓，日军南浦兵团的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军800多人，分3路包围了溧阳县西北的塘马村一带。当时，在塘马附近的十几个村庄，驻着十六旅旅部和苏南党政机关，共约有1000多人。而十六旅的主力部队远在溧水一带，远水救不了近火。我塘马一带的兵力总共不足300人，与敌兵力悬殊太大。罗忠毅同廖海涛当即决定，由四十八团二营和旅部特务连在两侧顶住敌人，由参谋长王胜和组织科长王直率党政机关1000余人突围。

王胜、王直带着突围人员边走边打，出了塘马村，经戴家桥到达黄金山，在群众帮助下脱险。

罗忠毅、廖海涛指挥部队，同近4000名日伪军血战，打退了敌人8次冲锋。打到中午时分，罗忠毅说：“老廖，你赶快带一部分人先突出去，这里由我顶着。”

廖海涛回答说：“应该你先走，这里由我顶着！”

他俩都是红军老战士，经历过数百次战斗，对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推来推去，谁也不肯走。他们考虑的是：1000多人的机关队伍虽然转移出去了，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后面可能有日伪军尾追，我们在这里能多拖住敌人一分钟，就会给突围的同志增添一分钟的安全。

上午10时左右，敌人便集中火力猛攻，炮弹把一个个高坡。土坎夷平了，步枪、机枪打得像刮风，村庄的围墙被打成马蜂窝。

罗忠毅虽然患着喉炎，但仍像往常一样的沉着，香烟衔在嘴边，吐出一团团烟雾。战士们都知道他又在考虑新的战法。

突然，罗忠毅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命令机枪手：“把机枪架到村外去！”接着对大家说：“我们的子弹完了，手榴弹也光了，我们要用刺刀，用拳头，用枪托子打击敌人。”警卫员请求罗忠毅快随部队往南冲，罗忠毅却命令：“你快冲，我来掩护，向南出击！”语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罗忠毅的头部，他身躯慢慢倒下了，殷殷热血染红了身旁的泥土。

罗忠毅牺牲后，新四军通电全军悼念他。

平静的塘马，
变成了血腥的战场。
我们的罗廖首长
身先士卒，英勇顽强，
沉着指挥，驰骋疆场，
牺牲在祖国的土地上。

……

这首深沉悲壮，情真意切的挽歌，至今还回荡在英雄牺牲的土地的上空。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潘仕华撰写）

勇猛顽强震茅山 ——记廖海涛烈士

艰苦卓绝的江南3年游击战争过去了。

1938年1月，共产党员廖海涛领导的闽西上杭县双髻山红军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他任政治处主任。同年夏天任第四团政治委员。1940年2月，以原二支队机关为基础，组建新二支队，廖海涛任副司令员。

早春，苏南茅山地区菜花黄，麦儿秀，柳树青，桃花红，犹如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图画。廖海涛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的抗日健儿，活动于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宁）句（容）和两溧（溧水、溧阳）地区，直逼侵华日军的统治中心——南京。

5月间，廖海涛率部奇袭南京麒麟门，再攻雨花台、中华门，震撼了日伪军。

6月1日清晨，日军南浦旅团江本联队吉田中队，从南京近郊的湖熟镇据点出来，企图到山岔一带“扫荡”。这时，新二支队刚移到赤山，第四团第三营驻田头庄，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连驻山脚下的戴家边。廖海涛闻讯立即登上赤山一座小山坡。从望远镜中望去，有100多名日军正朝赤山方向走来。“完全可以把他们吃掉！”廖海涛果断地下达命令：“各部队立即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日军放炮进行火力侦察没有发现情况，便向赤山方向奔来。待日军来到赤山脚下时，廖海涛一声令下，三营七连、特务连机枪一起开火，日军倒下30多个。但日军倚仗着手中的大炮，向特务连阵地打了十来发炮弹，一小股日军在中队长吉田带领下，躲在拱桥下顽抗。

廖海涛指挥各连用手榴弹，消灭蛰伏在桥下的日军。他鼓励战士：“打，狠狠地打，把他们消灭干净，让南京来的日军收尸吧！”

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1点多钟。结果，毙伤日军100多名，两名受伤的被我俘虏。那两门崭新的九二式步兵炮，也成了新四军的战利品，外加3挺机关枪和几十支三八式步枪。廖海涛派人把大炮拉到戴家边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几十里外的群众跑来观看，赞扬新四军打得好。

3天之后，日军纠集3000多名日伪军，在几十辆装甲车和200多名骑兵的配合下，分成十几路，气势汹汹地向郭庄庙、邱山为中心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扑来，妄图一举摧毁苏南根据地。

那天上午11点钟，廖海涛率领一支部队隐蔽在溧水城外14公里的周家棚子，有一路日军正好朝周家棚子搜索过来。他带领部队马上向叶家棚子转移，被一路日军骑兵咬住——100多个骑兵跟踪而来。廖海涛当机立断，将部队迅速带进一片茂密的森林，沉着地与日军骑兵周旋。日军骑兵为争头功，冲进森林中搜索。廖海涛兴奋地鼓励战士说：“骑兵在森林中作战，不能发挥作用，只是死路一条。同志们，瞄准好，进来一个打一个！”日军骑兵刚闯进森林，就被战士们一阵猛烈的射击，打掉了40多个。这时，日军骑兵才发觉上了圈套，慌慌张张地退出了森林。

战斗到夜幕降临。忽然，四周被一阵信号弹照得如同白昼。紧接着，敌军炮弹、子弹呼啸着向密林深处飞来。日军从四面八方摸进密林。廖海涛凝神谛听，终于找到了两个突破口。他命令四团三营营长黄玉庭、教导员范钦洪和机关的科长，各带领一部分部队，分两路向溧水西北方向突围。借着夜

色的掩护，部队悄悄地溜出重围，迅速安全地到达郑村。

战士们一觉醒来，叶家棚子的森林里依然枪声大作。原来在廖海涛突围后，日军同伪军“首都警备部队”，对打起来而新四军早已不见踪影。至于这“掉包”魔术是怎么变成的，日军始终莫名其妙。捷报传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高兴地向第二支队发来嘉奖电报。廖海涛为《火线报》写了一首诗，记述这次战斗：

坚持江南抗敌军，
义师所向寇寒心。
赤山之战缴敌炮，
茅上烽火震南京。

1940年7月上旬，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之后，原二支队机关和直属部队在安中里村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罗忠毅任指挥，廖海涛任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三团、新四团及长溇抗日自卫团、宜（兴）武（进）锡（无锡）抗日义勇总队等地方武装约2000余人。同时，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三人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敌后抗日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处境也很险恶。从1月下旬至2月底，日军出动5000多人，汪精卫也派出1万多伪军，增设据点80多个，对根据地展开了轮番“扫荡”。为避开日伪军锋芒，廖海涛率领部队撤出茅山，转移到太（湖）溇（湖）地区活动。3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廖海涛任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下辖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及独立第二团。他率领四十六团一个营返回茅山地区，5月间接连打下蒲干、西旸、包巷等日伪大据点；争取了高庙、延陵的伪军向我投诚；又挤走了丁庄、墓东、殷桥东、北镇街等地的伪军。不久，指挥四十七团，打开了丹（阳）金（坛）武（进）地区的抗日局面，恢复了两溧（溧阳、溧水）地区。从此，茅山抗日根据地又回到新四军手里。

11月28日清晨，雾霭笼罩着沉睡的大地，住在溧阳塘马村的廖海涛，像平日一样，早早起来查哨。他刚到村口，哨兵跑来报告：日军步骑炮兵3000余人，伪军800余人，从东北、西北、西南悄悄逼进塘马。廖海涛立即命令特务连和旅直属队，抢占村前、村侧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日军的炮弹接连地在村中爆炸。廖海涛指定旅参谋长王胜和政治部副主任王直负责率旅部及苏南党政机关转移；抽调第四十八团二营六连，掩护机关撤退。他留下指挥部，阻击敌人骑兵。

当时，塘马正在召开苏南抗日根据地各县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第十六旅所辖的第四十六团、四十七团远离塘马，党政军虽有1000多人，但兵力不足300人，情势岌岌可危。

廖海涛清醒地看到，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能否安全转移，直接关系到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能否坚持的问题，也将对华中战局产生重大影响。他果断地命令部队，“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

9时许，打退敌人几次进攻后，部队收拢到王家庄一线。10时左右，日军各种炮弹向王家庄倾泻下来，日军开始轮番冲来。这时，旅长罗忠毅中弹

牺牲。指挥作战的重担压在廖海涛肩上。他镇定、沉着，指挥特务连掩护部队转移；而且自己左肩挎着两支步枪，右肩扛着机枪，边打边率领战士向东冲杀。冲杀到茅棚村时，警卫员发现廖海涛的衣裤已被鲜血染红了，喊卫生员快来抢救。卫生员一看，廖海涛小腹被打穿。但是廖海涛推开卫生员的手说：“日军上来了，不要管我，大家去战斗！”说着，他用手捂着伤口，继续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鲜血顺着手指缝汨汨地流下来，他流血过多，呼吸急促，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喃喃地说：“战场上流血不流泪，你们要同日军拼！一定不要辜负党对我们的希望……”他让警卫员把二营营长王来弟喊来，忍着剧痛对王营长当面交待：“部队由……由你指挥，保证……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天黑……突……找四十六团。”说完，他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谢辉撰写）

豪侠易帜战太行 ——记范子侠烈士

范子侠是江苏丰县人。从小学徒，长大当兵。从天津东北军随营学校毕业后，在军阀部队当军官，直至团长。1931年蒋介石逼迫范子侠所在部队到江西“剿匪”。9月的一天，士兵散出传单，上写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屠杀了我们十几万同胞。许多年轻军官也大声斥责“九·一八”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范子侠连续上书提出抗日主张，不得应允。他愤然辞去军职，在安徽蚌埠市当公安局长。1933年春，他听说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当即辞职北上参加抗日同盟军任团长，在 frontline 杀敌。

1934年，范子侠率一营官兵冲入蒙伪李守信部金宪章旅旅部，强迫金宪章及全旅通电反正抗日，将日本山滨大佐等20余人全部处死，并将驻大庙的穆克登伪军全部解决。此次行动，对抗日军民收复百灵庙、取得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曾贺电：百灵庙大捷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红格尔图大捷后，国民党当局却以思想左倾、另有图谋之名将范子侠抓捕入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子侠出狱，任国民党二十九军团副，带着部分官兵在河北省新乐、行唐一带与日寇周旋，更名为抗日义勇军。

一天，义勇军驻藁城南北龙宫村，日伪军突然扑来。日军山原大佐大叫“范子侠小小的……”。敌军距村50米远时，范子侠喊一声“打！”枪弹飞向敌人，山原大佐被打死，日伪军拖着几十具尸体逃跑了。

范子侠带义勇军在八路军帮助下，又打了不少胜仗。后率部到太行山南部，与八路军协同作战。

1939年11月20日，在八路军总部首长和一二九帅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切关怀下，范子侠率部队3000多人毅然易帜，投入八路军队伍，改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不久，经王维纲、王铁二人介绍，范子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半年后，平汉纵队于1940年5月27日在山西榆社接受刘伯承、邓小平检阅，与八路军一部分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范子侠被任命为旅长。

正太铁路横跨太行山，全长231公里、连接着平汉、同蒲两干线，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1940年夏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破坏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在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下，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8月20日晚8时整，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正太铁路沿线100多公里响起激烈的枪炮声。日军出动20余万人，飞机150架，伪军15万人，与八路军对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从东面的井陘、娘子关，到西面的寿阳、榆次，不时传来胜利的捷报，然而，新十旅与日军的桑掌车站争夺战仍然处于胶着状态。

敌军飞机不停地狂轰滥炸，与地面4座暗堡、6座明堡和地雷区形成坚固防线。战士们冲锋不下十几次都未成功。

深夜3时，范子侠焦急地从司令部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前面的地形，

只见漆黑的夜幕里，锃亮的铁轨在月光下泛着寒光，照明弹不时升向天空划出一片白光。铁丝网层层密布，几座敌堡宛如张着大口的怪兽。前方堆积着敌人横七竖八的尸体。

范子侠悄声给两个团长布置了一番。不一会，一队身穿日军黄军服，头戴猪耳帽、打着日本旗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向碉堡走去，在距碉堡六七十米处突然停下。呼啸的炮弹铺天盖地般地射向前方，敌人据点飞上了天。

埋伏在两侧的八路军战士猛虎般扑向敌人。原来这是范子侠带领尖刀排化装奇袭，导演的一幕“活剧”。翌日黎明，攻占了桑掌，全歼守敌 800 多人。

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在歼灭日寇崎崎大队的黄崖洞（位于山西省黎城县北，是八路军总部兵工厂驻地）保卫战中，范子侠身先士卒，沉着指挥，总攻命令下达后，他第一个冲向山顶。忽然手臂发麻，双枪差点掉下，他知道挂彩了，仍咬紧牙关，坚持到战斗结束。

明媚阳光从窗户一角斜射而进，撒在范子侠微笑的脸上。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对《新华日报》记者林火同志，风趣地说：“我感到无限欣慰，算是为祖国流了一点血。”

百团大战中遭到重创的日本侵略军不甘心，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时间是 1942 年 2 月。

10 日，范子侠接到一二九师师部紧急文件，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下达作战命令。会后，部队要行动，政委朱穆之劝他这次留下，他笑着说：“我是不能死在床上的，要不被敌人打死，要不被汉奸打死。”这时，民兵耿栓仓跑来说，几百名日伪军占领了赵庄，那边浓烟滚滚。

范子侠率部翻山越岭，抄近路赶到村口，所见景象惨不忍睹。他向乡亲们发誓：要记住这民族的深仇大恨，团结起来，坚决同万恶的侵略者血战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2 日下午，新十旅与日军骑兵在沙河柴关展开激战。不料一发敌弹击中范子侠，卫生员赶忙替他撕开衣领，见左肩下大动脉血流不止，赶紧包扎好送上担架。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刘伯承、邓小平撰写纪念文章，称范子侠是模范的布尔什维克，是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晋冀边区召开大会悼念这位抗日英雄。

现在，“范子侠同志之墓”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冰撰写）

智勇双全赛“诸葛” ——记包森烈士

在天津市蓟县县城西北 12 公里处，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名山——盘山。它是燕山余脉，平均海拔 500 米，主峰 864 米，历史上誉为“京东第一山”。山上亭台寺庙，奇泉怪石，美不胜收；山下烈士陵园，鲜花拥簇，松柏环绕，一座高达 30 米左右的革命纪念塔，拔地而起，雄伟壮观。塔上镌刻着聂荣臻无帅的亲笔题词，在骄阳之下闪闪发光。位于塔前墓碑主位的坟茔，就是当年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烈士的陵墓。

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胆大心细，长于谋略，被誉为盘山抗战一“诸葛”，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活剧。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11 年 7 月 21 日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三合镇义龙乡赵家村的一户农家，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泾阳、三原一带领导农民游击战争，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从事政治工作，数次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后获释，入西北军杨虎城部任特务营二连指导员，1937 年 3 月，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秋，在抗大毕业后，被派往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地方工作队，在河北省唐县、定县等地下工作。不久，又随军挺进（北）平西，任邓华部三十三大队党总支书记。他身穿灰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带领部队奋勇战斗在抗日最前线。

1938 年 7 月底，八路军第四纵队（又称邓华、宋时轮支队）主力即将入长城，包森奉命率一个连 40 多人，留在兴隆县灏河川一带活动。他率部首先歼灭佛爷来村伪警察局，开仓放粮；又设伏于罗文峪口外之药王庙，伏击自佛爷来村返回遵化之敌，俘伪军 70 多名。包森又向南到长城沿线洪山口一带活动。缴了尤山口金矿矿警的武装。所到之处，张贴布告，宣传抗战，筹粮筹衣。仅两月时间，包森所部就扩大到 200 多人，开辟了兴隆东南、遵化东北游击区。10 月，八路军第四纵队撤向平西整训，留下八路军 3 个支队在冀东坚持活动，包森部为二支队。

在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包森率领二支队英勇作战，先后以奇袭、奔袭、强攻等灵活战术，共歼灭日伪军数百人。其中以活捉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最为有名。

那是 1939 年初春，日军派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坐镇遵化城，向冀东游击区大举进攻。包森率领二支队化装成老百姓，开展地下斗争。赤本以为游击队败退了，就忘乎所以，竟想亲手活捉包森。4 月 26 日，他仅带 2 名翻译和 1 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出犯，把日军守备队远远甩在后面，进入遵化东北之孟子院村时，恰与二支队侦察员相遇。被俘队员与他们相识，急忙暗示侦察员扑上去，将赤本生擒。当后面的日军赶到时，游击队已将赤本处决，及时转移他乡。赤本被处决，日本朝野为之震惊。

1940 年 1 月，冀东军分区决定重新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并决定派副司令员包森到盘山，主持西部军事工作。

盘山屹立在冀东蓟县境内，山势雄伟险峻。

1940 年 6 月 10 日深夜，包森带领通信班 16 人，在进军盘山途中，宿营于城东南的黄台村。由于敌探告密，翌日午前敌人突然分三路包围而来，南面之敌首先到达。包森留数人在村内掩护，率 8 人向东北转移，未能冲出，

又向西突围，也被日军堵击。包森临危不惧，带领部队左冲右突，终于从黄台口子冲出重围。

黄台突围之后，包森率领近 200 人的队伍，披星戴月，从遵化南部向盘山挺进。拂晓前，部队到达田各庄。蓟县的日伪军全部出动，还从北平调来飞机助战，包围了田各庄。包森认真分析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敌人既然发觉我们要西进盘山的意图，就不只是堵截，还会在路上设置埋伏，若按原定路线前进，将会凶多吉少。他下定决心，趁敌不备，挥兵西进，夺占盘山。

夕阳西沉，夜幕初降。未等敌人包围合拢，包森带领部队从南面悄悄地撤出，渡过果河，向西南挺进，摆脱了围困之敌，到达玉田县的小王庄。这里远离县城，部队休息了一天，晚上出发，又折回向西北行进，几天之后，终于胜利地到达盘山。

包森为了巩固盘山这块根据地，及时整顿了当地的游击队，剿灭了几股土匪，处决了大恶霸田秀，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并加强了瓦解伪军的工作，成立了盘山地区八路军政治处，还建立了小规模随营学校，训练军政干部，使盘山地区的抗战局面迅速改观。6 月下旬，日军一个骑兵中队窜入盘山。包森指挥第十三支队一部，在盘山百草洼设伏，全歼日军武岛骑兵中队 70 余人，首创冀东八路军全歼整连日军的战例。这年 7 月，撤销第十三支队建制，成立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包森任副司令员，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是年秋，十三团宣告成立，包森兼任团长，包森率领十三团，在盘山南苦战经年，战斗百余次，终于打开了局面。游击区扩大到蓟县、平谷全境，南至玉田、宝坻、宁河边界，北至兴隆、密云长城沿线。冀东全区游击队达 7000 多人，根据地人口 200 余万人，成立了 7 个县政府，为把冀东地区建成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包森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当地群众中盛传包副司令员会神算，赛过当年的诸葛亮。

1940 年 8 月的一天下午，包森带领部队开到王庄子。他带领几名干部，察看公路的西端的地形后说：“今天非和敌人打一仗不可！”

“为什么？”一个干部不解地问。

“我有这个感觉。”包森神秘地笑着说。果然，不一会儿，侦察员来报告：“敌人有两个团兵力向这里扑来，离这里只有十几里了。”

“好，准备战斗！”包森一声令下。天快黑时，战斗开始，由于十三团早有准备，结果打得敌人狼狈而逃。有的干部请教包森：“你怎么知道敌人非来不可呢？”包森认真地说：“你们没有观察到公路的西端有长长的一道烟尘吗？兵书讲：远方烟尘弥漫，必有大队人马行动。眼下敌强我弱，咱们的大部队不会在白天行动，那不是敌人才怪呢？！我就是根据这一点判断的。”部队官兵心服口服，伸出大拇指说：“神了，太神了！”

在遵化县与蓟县交界的大稻地村，驻着日军一个骑兵中队，十分骄狂。包森决心消灭这支骄兵。给八路军、游击队长志气，显威风。这年夏季的一天，包森带一、三营向盘山西部果香峪一带活动，二营留守营地。敌骑兵中队得知后，以为有机可乘，便骑着大洋马，闯进盘山根据地。二营巧妙地将敌人诱进一条山沟，部队埋伏在东面山头上，准备给以沉重打击。这时，包森恰好带部队返回路经此地，也发现了这股进入山沟的敌人，遂将计就计，将部队埋伏在西山上，用军号和二营取得联系，并派出一队精兵将山口堵住，把日寇全部围在山沟，关起门来打狗！包森带领部队居高临下，两面夹击，

直打得敌军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仅仅用了4个多小时，除两名敌骑兵逃跑之外，其余全部被歼，又一次创造了冀东部队全歼整连日军的战例。

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驻守盘山地区的日军被调走，交给伪军驻防，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11月初，伪“治安军”以“清剿剔抉”的手段，向冀东根据地“扫荡”，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冀东分委、冀东军分区研究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际，给敌以迎头痛击，并在实战中提高部队战斗力，补充武器装备。

遵化城东之东双城的“治安军”，是伪第三集团第五团的一个加强营，共200余人，工事完整，能攻能守，对八路军威胁很大。包森奉命率领十三团特务连，三营和遵化游击队拔掉这个据点。

11月26日凌晨，包森带领部队发动进攻。初战开始，“治安军”倚恃坚固的工事和精良装备，拚命还击，将包森指挥的后续部队压制在村外的小河边，无法前进。包森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之后，认为：白天利敌不利我，先拖住敌人，晚上利我不利敌，再狠狠地打。

夜幕降临了，“治安军”一个个变成了睁眼瞎，恐慌地乱射击。包森率领的这些“夜老虎”们大显神通，不一会儿就冲破了“治安军”的一道道防线，冲进据点，逐屋争夺。打了多半夜，将“治安军”团团围住。不多时，大部分“治安军”被毙俘，少数“治安军”连同日军顾问，钻进了村西北角的炮楼里继续顽抗，被我冲上去的几名队员，一把火给烧了个净光。一个加强营的“治安军”，就这样被消灭了。

1942年1月12日，包森得到一个重要情报：驻防玉田县城的“治安军”第二天要进燕山口，到头道山北平安城“扫荡”。燕山口是头道山的一个山口，这里南北5里，东西10里，没有人烟，是消灭“治安军”的好战场。于是当机立断，率7个连的兵力，星夜行军15公里，于午夜时分，赶到平安城西南10公里的果河北岸的蔡老庄一带设伏。

当包森在果河北岸连夜布阵时，玉田县“治安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和两个团上千人也倾巢北犯。它的先头连很快闯进了包森十三团四连阵地，被迎头碰回。大批“治安军”聚集在果河南岸，一面打枪，一面叫骂：“天亮就消灭你们！”

包森发觉“治安军”无意在天亮前进攻，又不见有包抄的迹象，遂及时调兵遣将，死死地将敌人装进了“口袋”。

13日拂晓，“治安军”第四团便全部暴露在包森部队的火力之下。七连首先从敌人前沿部队的右后方开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治安军”阵脚大乱。包森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刹那间，各路神兵直扑敌营，前后夹击，左右堵截，“治安军”机炮连200余人被十三团俘虏，其余的“治安军”早被吓破了胆，哪儿还敢恋战，丢弃4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狼狈地逃回燕各庄。这500多名“治安军”刚到村头，就听到“缴枪不杀”的喊声。“治安军”一个个目瞪口呆，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缴枪投降还有200多名“治安军”，在几名日军教官的带领下，退到山上的别古寺里，凭借着山势天险，株守待援。

这时，包森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全部兵力，决定在敌援兵赶到之前，乘胜追击，全歼敌人。

包森来到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阵地亲自指挥，由于山高路险，强攻几次，均未成功，营长耿玉辉有点儿犹豫了。包森早就摸透了这位老战友的脾气，

故意大声问：

“老耿，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50岁了。”耿营长如实地回答。

“老了！”包森故意地叹了一口气。

这激将法果然有效。耿营长最不服气人家说他“老了”。只见他甩掉皮夹克，拔出手枪，一马当先冲了上去。“治安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哪有招架之力？便打死日军教官，举起白旗，向八路军投降。

围歼“治安军”第四团的战斗刚刚结束，战士们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敌第二集团司令部和“治安军”第三团又正向燕各庄进犯。包森命令三营迎头痛击，让特务连在果河南岸高地上架起机枪，向增援的“治安军”猛烈射击。敌人听到“治安军”第四团已被全歼，便丢下山炮溃逃。果河沿战斗全部胜利结束。

果河沿战斗是以少胜多的一个突出的战例，是在包森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长的亲自指挥下取得的，它体现了包森的勇敢精神和超人的谋略。包森以7个连的兵力，实际参战的仅有5个连，就全歼了“治安军”一个团，击溃敌集团司令部和另一个团，毙俘“治安军”官兵近千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3挺，长短枪700余支，弹药10万发以及电台、骡马等众多的战利品。

1942年2月27日，包森带领部队驻在遵化县西北20里的野户山村时，不幸遭到日军和伪“满洲队”的突然袭击。包森带领部队迅速转移到北山上，敌人穷追不舍。包森在山上用望远镜一面观察敌情，一边布阵设防，准备痛击入侵之敌。不料一股穷凶极恶的日军，从包森还未来得及设防的一条山沟里凶猛地冲上来，拼命射击。包森带领部队，将这股日军击退。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包森的胸膛，血如泉涌。包森自知伤势严重，立即指定代理人继续指挥战斗。当战士们含着泪水，要把他抬下战场时，包森这位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战将，就壮烈地牺牲了，时年32岁。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李敏杰、李学军撰写）

铁骨铮铮英雄志

——记赵尚志烈士

赵尚志，辽宁省朝阳县人，1908年10月26日生，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回到哈尔滨参加建党工作。1931年底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3年10月在北满珠河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任队长，后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素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之称。”1942年2月12日壮烈牺牲，时年33岁。

赵尚志的幼年苦难的。他的老家朝阳县地瘠民贫，11岁那年，他父亲因聚众抗捐失败，带领全家流亡哈尔滨。他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勤奋学习，追求进步。同年夏积极参加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学生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受命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6年夏，赵尚志受党的派遣，返回东北投入反帝反军阀斗争，参与成立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1927年3月赵尚志在长春被奉系军阀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以赤色嫌疑份子一再遭受严刑拷问，但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1930年4月，赵尚志再次被捕。这一次由于叛徒出卖，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尽管敌人软硬兼施，始终无法使他屈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6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组织决定将工作的重点移到农村去。赵尚志化名李育才被派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任参谋长，当时人称李先生。

张甲洲，大地主家庭出身，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派遣返回巴彦老家拉起一支约200人的抗日队伍。赵尚志看到部队成份很复杂，便劝张甲洲整顿队伍，并成立了教导队培养骨干，这些措施虽对这支部队的建设起了良好作用，但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吴福海来传达“北方会议”“左”的指导思想。要求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改编为红军。赵尚志认为条件不成熟，提出不同看法。但因吴福海坚持意见，将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后转战于呼兰、绥化一带，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转移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目标，部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又不断遭受日伪和地主武装的袭击，部队终于瓦解。在战斗中赵尚志的左眼受重伤。

巴彦游击队的失败明明是“左”倾的结果，但省委领导人却认为主要责任是赵尚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要他作出深刻检讨。赵尚志据理力争，以致许多领导人不愿照他的面；他一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且听说被“开除党籍”了。

赵尚志一度十分苦恼。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风吹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但是他很快振作起精神，毅然更名赵三，投到哈东一带反日义勇军孙朝阳部队当了一名马夫，他对朋友们说：“只要抗日，做什么都行。”

1933年秋天一个夜晚，赵尚志、李启东、姜熙善、李根植等7人，骑着7匹快马，奔驰在北满珠河一带的崇山峻岭中。他们是从义勇军孙朝阳部队

拉出来去找中共珠河县委。这时赵尚志年仅 25 岁。

9 月间，赵尚志、李启东等 7 人在珠河县三股流长万屯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赵尚志向县委书记关化新谈了组建游击队的想法。关化新非常支持，请省委巡视员张寿箴（即李兆麟）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精神，介绍了杨靖宇组织游击队的经验。

10 月 10 日，一支 13 人的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三股流长万屯后山诞生。赵尚志为游击队队长，李福林任政治指导员。游击队在三股流一带接连打了十多个胜仗，名声越来越大。人员武器都有了发展。小股日军和伪军不敢轻易进犯，又没有苛捐杂税，哈东地区老百姓称之为“红地盘”。

在珠河地区，当时除了游击队，还有数十支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赵尚志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1934 年 3 月在珠河县秋皮屯召开“爱民”“青林”等十多个队头的联合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各队头领同意在“不投敌，不卖国，反日到底”等条件下联合起来，而且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公推赵尚志为总司令。队伍扩大到 500 人，接连攻克侯林乡、黑龙宫日伪据点，使珠河县铁道南、北的游击区连成了一片。

同年 6 月，部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员。他率支队攻打宾州城，奇袭五常堡、酣战三岔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伪军大小战斗上百次，抗日联军越战越强，游击根据地从珠河县的铁南、铁北扩展到宾县、方正、延寿、五常、双城、阿城等六县的广阔地区，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拥有反日会员 1 万余人。

1935 年 1 月 12 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承认“开除赵尚志党籍是由于当时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这年 10 月 28 日，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

第三军的壮大和珠河游击根据地的扩展，使日本侵略者犹如前胸挨刀、后院失火，疼之入骨。日寇在哈尔滨召开六省“治安肃正”会议，策划消灭抗联第三军，“毁灭赵尚志的根据地”。敌人在帽儿山设立“六县”办事处，日军大佐野崎任主任。以日军讨伐队为主，集中 3000 兵力向哈东进行“讨伐”，敌军所到之处，烧杀，强迫群众搬到指定地点，妄想把抗联战士困死在深山密林之中。

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讨伐”的时候，抗联三军除留一部分继续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外，赵尚志率领主力经方正、延寿、依兰，出敌意外地北渡松花江进入汤原县境，与夏云杰领导的游击队汇合。

1935 年 11 月，赵尚志协助夏云杰将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为军长。1936 年 1 月，在汤原附近召开北满抗日部队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箴、冯治纲等，协商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随后部队统一序列，赵尚志仍兼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赵尚志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亮子河矿警队和伪军连全部缴械，又命令戴洪滨、张寿箴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汤旺河，拿下老钱柜，为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扫除了障碍。在根据地内，建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以及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赵尚志亲自兼任校长。抗联三、六、九、十一军的团级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大部分都在该校参加过学习和训练。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东北日军进一步加紧

了对抗日联军的“围攻讨伐”。日本关东军司令植田谨吉。参谋长东条英机纠集日军1个师团、伪军4个混成旅，加上靖安军、兴安军等共3万余人，妄图在3年里消灭一切抗日力量，军事镇压由吉东地区转移到三江地区，主要对象是赵尚志领导的以三军为主的抗联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北满抗日联军在赵尚志的指挥下多次击败敌人的围攻，保住了汤原游击区。可是有人无粮、有枪无弹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许多重大问题急需请示党中央作出决定。身为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的赵尚志多次派代表去找党中央，但都毫无音信。

转眼间寒冬降临了，大雪又纷纷扬扬地飘荡起来，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敌人妄想把缺衣少吃的抗联指战员冻死在荒山野林。这时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带着六军军长戴洪滨和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宾来找赵尚志。刚从苏联回来的陈绍宾说：“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海洛将军。他让我捎个信给抗联总部，叫咱们派一个重要的领导人过去和他们共同商量抗日大事！他说，他们可以武装咱们部队……”

对这件重大事情，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北满省委临时会议。陈绍宾在会上介绍了事情经过，与会者都觉得这个“口信”很重要，如真能达成协议，就很可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一定要派一位重要领导人去完成。经认真研究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派赵尚志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去苏联谈判。

赵尚志肩负着重要使命启程上路了。护送赵尚志出国境线的省委领导人有张兰生，有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六军军长戴洪斌等人。在路上，赵尚志忧心忡忡地对张兰生、张寿箴说：“如果过境后对方不承认怎么办？”张兰生说：“对方会承认的。”

1938年1月，旧历正月初五，赵尚志在戴洪斌的护送下，带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过境，走上对岸的苏联国土。

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赵尚志过境后，首先被解除了武装。接着对方又通报说：“海洛将军没有邀请任何中国抗联的代表来谈判的事，他不可能来见你。”这使赵尚志非常吃惊和迷惑，他感到受骗了，立即要求回国。对方说：无权答应。他绝食了，数天滴水不进，他的抗议，请求、绝食、意见，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境遇更加恶化。他被丢进了一间牢房似的地下室，长达一年半之久。

1939年6月，苏方才向赵尚志解释说，把他关押审查是个误会。同时向他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立即组织了一支100余人的精干部队，于同年7月回到东北，投入战斗。但由于奸细造谣挑拨。他未能行使总司令职权。12月又接苏方电报，让他与北满、吉东两省委负责人到伯力开会；于是年底，他再次率队过界去苏联。

1940年由于叛徒造谣说赵尚志要“捕杀省委”，北满省委不经调查就作出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3月。赵尚志被调到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1941年初，又被调去莫斯科学习，再次受到批判。但他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一面写下了长长的意见书，准备向党中央申诉，一面坚决要求重返抗日战场。

1941年秋，苏方允许他带5个人的侦察小组回国，他说，他要重新组织

队伍与日寇干，他死也要死在东北战场，他还要骑马到延安去汇报。

1941年冬。赵尚志等人到达汤原鹤立一带活动。敌特机关得悉赵尚志突然复出，立即搜山7天，但未发现踪迹。日寇派特务刘德山伪装猎人进山侦察，与赵尚志小分队相遇。起初赵尚志把他的枪下了，姜立新（三军警卫团团长）认识此人，便将其留在小分队内。

1942年2月12日晚11时，赵尚志在刘德山的预谋引诱下，去袭击梧桐河警察所，走到吕家菜园时，刘德山突然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腹部中弹；但他忍着剧痛回手一枪将刘德山当场击毙，他也由于伤重而牺牲。

40多年的光阴流逝了，人们不知道遗忘、淡漠、疏远、冷落了多少事，但对赵尚志，人们没有遗忘他；相反，对他的怀念、敬仰、钦佩的感情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真诚。

1985年，黑龙江萝北县宝泉岭（烈士牺牲地）农管局的青年团员自愿集资修建了赵尚志烈士纪念碑。1988年5月，黑龙江省尚志县和宝泉两处的赵尚志烈士纪念馆同时开馆

（沈阳军区政治部、黑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稿
原子明、咸宽兴撰写）

铁道游击逞英豪

——记洪振海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的枣庄、临城一带，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这群机智勇敢的游击健儿，在纵横数百里的铁路干线上，与日军斗智斗勇，创造了一个个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而这些故事，大都与他们的大队长——洪振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93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日军占领下的煤城枣庄，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汉子，穿过行人稀疏的小巷，大步流星地来到火车站西的小陈庄。这汉子便是洪振海。他在鲁南抗日义勇总队三连任排长，现在与排长王志胜一起，被总队首长派来枣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王志胜在日本人开办的“国际洋行”当搬运工，一天，他在车站帮日军装卸物资时，发现有十几个大小不等的稻草捆，放在站台上。他偷偷扒开一摸，是枪支弹药。下午装车时，便有意识地把这几个稻草捆放在车厢门旁便于搬运的地方，同时，在车皮上做了记号。他对洪振海说：“总部要求咱们搞武器，现在有武器了！”

“在哪里？”洪振海兴奋地问。王志胜把下午在车站装车遇到的情况告诉了洪振海。

“搞！”洪振海斩钉截铁他说。他1910年出生于山东滕县大北塘村，自幼随父在枣庄谋生，跟着车站附近的小伙伴学会了一手飞登火车的本领。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干上了吃“两条线”（扒火车上的煤炭等）的行当。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形成了敢想敢干、见义勇为的豪爽性格，只要他认准的事，非干成不可。

晚8点左右，洪振海带上手枪，将一把虎头钳子挂在腰间，带着曹得泉，来到枣庄火车站西的树丛里隐蔽起来。

晚9点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载着军火的那列火车缓缓开出了枣庄站。

洪振海来到铁路上，盯着飞驰而来的列车。一节、二节、三节……，眼看后面只有两节车厢了，他闪过最后一节客车车厢的首部，当车厢尾部弓形的上车把手到达身边时，他一个鱼跃扑上去紧紧抓住，身子像矫健的猴子般挂了上去。他像壁虎一样贴在车帮上向车门移动。车帮上的铁棱只有寸把宽，手抓不牢，脚踏不稳，洪振海全身重量实际都集中在十个手指上。速度不断加快的列车带起的急风像铁扫帚一样扫着他，只要手一松，就有被卷进车底或甩出去的危险。他用全力死死扒着，向前挪动，终于靠近车门，握住了门把手。

他从腰间取下钳子，“咔嚓”一下剪断了拧在铁鼻上的粗铁丝，用力将车门推向一边，低下身子钻了进去。放在车厢门口的稻草捆险些将他绊倒，他用手一摸是机枪，便迅速抓起从车门甩了出去。接着又摸到第二个稻草捆挪了出去。当他抓起第三捆时，突然听到汽笛声响了。他知道快到王沟车站了，便急忙又掀下两个稻草捆，关好车门，旋风似地跳下车。

列车开走以后，王志胜赶来了。他们迅速将扔下的枪支弹药收集在一起。数了数，一共2挺机枪，12支三八式大盖步枪和两箱子弹。

1939年初冬，洪振海和王志胜根据上级要他们抓紧扩大人员，在适当时机武装起来的要求，经过一番筹措，义合炭厂很快办起来了，由洪振海任经理，王志胜任副经理。他们吸收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曹德清

等8名同志“入股”，以烧焦炭为掩护，积极展开收集情报工作。

1940年初，洪振海认为建立抗日武装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与王志胜商量，向苏鲁支队（义勇队总部改编）写了关于成立鲁南铁道队的报告，并请求上级派领导骨干来。支队批准了他们的报告，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杜季伟为政委，王志胜为副队长。

这年秋，日军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上级指示铁道游击队积极活动，拖敌人后腿，配合山区部队反扫荡。游击队领导人，经过研究，打敌军的票车好处多：第一，票车上有乘客，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搞一下能扩大宣传；第二，票车后挂有货车，可以搞到枪和其他物资支援山里部队；第三，车上只有少量押车的敌兵，对付得了，比较容易成功。他们的具体计划是：挑选12名精明强干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混到列车上，盯住敌人；洪振海与当过火车司机的队员曹德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王志胜带12名会登车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伺机配合车上行动；其他队员由杜季伟带领，埋伏在一个四孔桥附近接应。

星期六这天，是连云港驶向济南的票车过枣庄。傍晚，12名队员化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等，分别从泥沟、峰城、枣庄站上了车。晚饭时间到了，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烟、酒、烧鸡、点心等，主动凑到押车的日军士兵身旁，请他们“共进晚餐”，日本兵以为这些乘客热情“慰劳太君”，毫无戒备，与铁道队员一起大吃大喝起来。

列车行至枣庄站西的时候，隐蔽在道旁树丛中的洪振海和曹德清、分别从两侧敏捷地跃上了车头。洪振海用短枪打死日军司机，捆了司炉（中国人），曹德清驾驶着列车，加快速度向前开进。快到四孔桥了，车速放慢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12名队员，在王志胜指挥下，熟练地跃上了列车。

洪振海看到王志胜带领的队员都上来了，便令曹德清猛然拉响汽笛。潜伏在各车箱的队员，听到信号，亮出武器，像猛虎一样扑向敌人。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战斗，车上20多个日军官兵全被消灭。

这次战斗，缴获8万多块钱，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铁道队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都上缴给了支队。

八路军袭击票车的消息很快传到津浦线上的徐州、济南等地。枣庄之敌急向进至山区“扫荡”的长官呼救。两天之后，进到山区“扫荡”的敌人仓皇地撤回部分兵力。

在枣庄火车站南侧，有一个日军开设的国际公司，当地群众都叫它“洋行”。这个洋行名义上是经营日货的商行，实际上是搞情报的特务机关。除掉它，就等于挖掉敌人的眼睛。打完票车之后，洪振海与杜季伟、王志胜商量，决定乘胜奇袭国际洋行。

一年前，洪振海与王志胜为了搞枪，曾经偷袭过一次洋行，打死、打伤洋行的3名日本“掌柜”。从那以后，敌人增兵加哨，并在洋行四周院墙上架了电网，不准中国老百姓随便进去。

1940年8月，一天夜10点多钟，洪振海带领30多名队员，分四个战斗小组，悄悄向洋行摸去。乍起的狂风把满地的煤尘卷到半空，使灰暗的夜色变得更加朦胧。铁路北日本大兵营的探照灯，不时照向阴森森的洋行大门。门口哨兵，背枪来回走动。

洪振海摸到大门旁，一个箭步冲上去，手起刀落，将日本哨兵砍倒。队员们将铁钎子用麻袋片包起来挖开院墙，从洞口鱼贯钻入洋行。洪振海在院

内跺脚为号，四个战斗小组按预定方案各自奔向自己的目标。大家一齐动手，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飞溅。不到 10 分钟，东屋、西屋及南屋的日军被全部干掉。这时，王志胜见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出来，他急忙跑到北屋，见一名日军光着膀子，正手持棍子与梁传德搏斗，便用手枪一点，结果了那家伙的性命。

就在这时，洪振海发现敌人的探照灯不时朝这里扫描。日军巡逻队向洋行包抄过来。洪振海命令队员用铁斧将洋行大门的锁砍落，带着胜利品撤了出来。

1940 年秋，铁道队奉命与活跃在临城南北的另外两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被任命为大队长。他同大队政委杜季伟、副大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指挥游击健儿同日伪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

位于津浦线与临枣线连接点的临城火车站，是日军的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活动的重要据点。伪军阎成田团的两个营和特务队也驻在临城附近的古井村。日伪军对铁道游击大队活动地区接连进行“扫荡”和“清剿”。铁道游击大队决定给敌人点厉害尝尝，教训他们一下。

10 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杜季伟带领化装成伪军巡逻队的 20 多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城火车站。在内线接应下，他们顺利地越过封锁沟，进入站内。

站台上的伪军哨兵以为是自己的巡逻队来了，向走在前头的“长官”敬礼。洪振海用匕首刺死敌哨兵，指挥队员迅速封锁道口。密切注视车站东侧日军兵营及碉堡内敌人的动静。

王志胜、刘金山摸进站房，击毙日本特务队长高岗。这时，车站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洪振海为策应车站杀敌而采取的迷惑敌人的行动。王志胜、刘金山等于掉站房内的敌人后，扛起室内的两挺机枪和 20 多支步枪，安全撤出站外。在撤出车站的途中，队员曹德清按照队长的吩咐，把一顶印有伪军阎成田团番号的帽子丢在路旁。

高岗被除掉，日军如丧考妣。第二天上午，从济南来了一位日军少将验尸，勘察现场。他们在车站戒严 3 天，全面搜查，结果除了铁道游击大队丢下的伪军帽子外，什么线索也没查到。那个少将大发雷霆，认为此地外人难以进入，肯定是内部搞的。于是，便以那顶伪军帽子为据，一怒之下收缴了阎团和伪警务段人员的枪支，把团长阎成田及副团长、参谋长等人，捆在电线杆上用刺刀活活捅死，并将他们手下的 300 多名伪军押解下了矿井。

半月之后，日军的一个头目从八路军的宣传中得知，高岗是铁道游击大队杀掉的，气得暴跳如雷，顿足大骂“飞虎队（指铁道游击大队）狡猾。”

在日军“扫荡”的枪炮声中，1941 年的冬天降临到草木凋零的鲁南大地上。

正在微山湖组织铁道游击大队休整的洪振海与杜季伟，接受一项事关重大的紧急任务。这天，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对他俩说：“今年鬼子对山区的秋季‘扫荡’很残酷。前几天，咱们军区的被服厂突然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大部分冬服被鬼子抢走或烧毁，纺纱车、织布机也被砸烂烧焦。现在已进入冬季，希望你们从鬼子那里搞一部分布匹，以解燃眉之急。”

不几日，铁道游击队通过内线得到情报，说有一列从青岛开出的票车挂有两节装布匹的车厢，当天要路过沙沟站继续南运，但到站时间是白天。

白天截车目标太大，洪振海让王志胜找车务段内线人员张云骥商量，想

办法把列车到达沙沟站的时间推迟到晚上。张云骥按照铁道游击大队的意图，赶到沙沟站北段的滕县，将沙子放进列车的油壶里，车开出不久，轴瓦起火，不得不在临城停修，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修好。

这天晚上，由杜季伟组织动员的近千名群众，集中到沙沟站以南的黄庄一带。当列车运行到姬庄以西拐弯处时，张云骥同曹德清准时拔掉了风管和插销，使两节装布的车厢脱钩，在沙沟站以南的塘湖附近停了下来。敌人毫无察觉，列车继续向前运行。

还没等装布车厢停稳，洪振海、王志胜便指挥队员撬开车厢门，将大捆大捆的布匹撂下来。杜季伟带领群众跟上来，大家争分夺秒，有的背，有的扛，有的抬，有的推，霎那间，从黄庄到微山湖畔，形成了一条运布的长龙。这时，由微山湖大队及区委动员来的上百只渔船在湖边，等待布匹上船。

快要卸完布匹时，突然从南面开来一列载有日本兵的军车。洪振海立即指挥队员埋伏好，没待列车靠近，手榴弹便在车头开了花，接着，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司机好像被打懵了，列车开得更快，等发现前面的运布车厢时，已来不及刹闸。车头与装布车厢相撞脱轨，列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顿时乱作一团。

沙沟站的日军得知丢失两节装布匹的车厢，也向机枪声响处包抄过来。

枪声越来越近，但布搬不完谁也不忍心离去，因为这是广大指战员的过冬棉装呀！说来也巧，这时突然大雾弥漫，几步之隔即看不清对面，真是“天公相助”！洪振海利用大雾这个天然屏障，故意虚张声势。他组织长短枪一齐打，造成主力部队出山的阵势。日军果真被唬住了，不敢轻易冒进。铁道游击大队掩护群众边打边撤。

这次截布战斗，共获细布1.8万余匹，日军军服800多套，还有毛毯、棉被及药品等。解决了一个军区、三个军分区和一个教导旅的冬装问题。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干线上，洪振海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带领队员们扒铁轨、炸桥梁、撞车头、截物资，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动脉血管上，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不得安宁，敌人对他们既恨又怕，发誓要“一网打尽”。

1942年4月的一天晚上，由于叛徒告密，1000多名日伪军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游击大队驻地黄埠庄，在敌众我寡的紧急关头，洪振海奋不顾身，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队员们挥泪掩埋了自己心爱的队长。他们在新任队长刘金山和政委杜季伟的带领下，继续同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回民支队好政委

——记郭陆顺烈士

1939年9月的一天，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部的干部战士纷纷报告：“上级给咱们派来了政委，还是个老红军呢！”“在东辛庄为援救咱支队负伤的那个郭主任，要给咱们当政委了！”部队列队集合在树林里，这位新来的政委在马本斋司令员的陪同下，同大家见了面，并讲了话。

这位干部，就是马本斋通过冀中军区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程子华，从八路军一二〇师请来的红军干部、回民支队第一任政治委员郭陆顺。

回民支队的前身是马本斋1937年8月组织的一支回族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被命名为回民教导队（后称教导总队），1939年7月在河北无极、藁城、新乐县一带开辟新根据地时，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

郭陆顺把红军的优良传统和工作经验，带到了回民支队。他进一步健全基层党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制度，举办党员训练班，经常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发挥他们的模范作用。对部队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统一战线政策教育、日伪军工作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帮助一些干部克服军阀作风残余和游击习气。

回民支队的大部分成员是回族。由于日伪军不断“扫荡”，回民支队战斗频繁，时有减员。只靠回族群众补充兵员，使支队的的发展颇受限制。1939年初，经冀中军区批准，回民支队吸收了许多汉族青年，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回民抗日武装的旗帜及其在回族、汉族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郭陆顺与支队政治部研究规定：部队每个成员，不论回族、汉族一律按照回民的风俗习惯生活，不准吃猪肉。郭陆顺是汉族，带头执行这个规定。他和马本斋每次到冀中军区机关参加会议，吕正操司令员、程子华政委总是热情招待。有的同志劝郭陆顺“吃顿猪肉，解解馋吧！”郭陆顺回答说：“我是回民支队政委，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遵守回民支队的纪律。我还是和本斋同志一起吃吧！”

说起打仗，回民支队的干部战士佩服郭陆顺。有件事，他们记忆犹新：1939年清明节后一天，日伪军200余人，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向回民支队驻地献县东辛庄“扫荡”。马本斋率领部队英勇抗击，但由于人少力单，被围在苇塘里，就在这时，郭陆顺率八路军部队赶来救援，将敌人打退，而郭陆顺自己却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从此，郭陆顺的名声在回民支队里传扬开来，所以欢迎他到回民支队当政委。

1941年初，冀中平原仍是冰天雪地，寒气袭人，回民支队奉命到深（县）南衡（水）北地区活动。4至8月，为了打破敌人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马本斋、郭陆顺率领回民支队，采取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麻雀战术”，先后在南花盆、鲁科庄、小羊集、张春寺、土路口、康庄、城东村、杨台、潘家庄、大张村、大安村、程家村、贡家台、榆科等地连续作战30余次，攻克敌据点两处，毙伤日伪军500余人。

5月29日的康庄战斗，是回民支队出色的围点打援伏击战。其部署是：回民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一部，佯攻安家村据点，吸引衡水之敌

出援；政委郭陆顺、参谋长冯克、政治部主任丁铁石等，率回民支队五、六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公路两侧麦田里，伏击衡水出援之敌；马本斋司令员带一大队隐蔽在离康庄一里多的邢家村，准备截击康庄溃逃之敌，阻击衡水可能再次出援之敌。烈日当头时，衡水日军中队长高田率两个口军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 80 余人，向安家村驰援，进入伏击圈。郭陆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和县大队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马本斋一看来敌数量不多，决定速战速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敌人乱成一团，慌不择路，纷纷跳进路旁丈把深的护路沟里。支队战士们居高临下，不住地往沟里甩手榴弹，激战 40 分钟，将敌全歼。这次战斗，支队无一伤亡，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日军 70 余人，俘伪军 5 人，缴获加农炮 1 门，轻重机枪 4 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赞扬回民支队“能征善战”。战士们翘起大拇指说：“嘿，别看咱郭政委人瘦小，打仗真有两下子呢！”

1941 年，马本斋、郭陆顺率领回民支队进入（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区抗日根据地，在大清河两岸配合冀中十分区军民开展交通破击战。这年 3 月，日伪军数千人向回民支队活动区域“扫荡”。马本斋、郭陆顺为避敌锋芒，保存自己，运用“推磨战术”，带领部队围着容城县打圈子，然后在夜幕掩护下，急行军 20 公里，插到雄县西槐树庄隐蔽起来，拂晓前分乘 200 多条渔船，从流通镇潜入白洋淀中，甩掉了尾追之敌。欲寻回民支队决战的日伪军，面对茫茫芦苇荡，无可奈何。

6 月间，“麦子剃了头，高粱没了牛”，冀中原野的青纱帐起来了。敌 2 万余兵力，对平津保三角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反复“清剿”。7 月，日军调集 2000 余兵力，又进行报复性“扫荡”。敌人进村，回民支队战士与敌短兵相接。敌众我寡，回民支队且战且退，敌人紧追不舍。郭陆顺和马本斋决定以一个排的兵力吸引敌人，而主力则隐蔽在大屯村外一条道沟中。摆脱敌人后，他们出敌不意地越过崔尔庄——王会头公路，插入敌占区，展开宣传攻势，搅得守敌坐卧不安。

郭陆顺与回民支队指战员亲如手足，经常谈心。大家渐渐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他生于 1914 年，是湖南省浏阳县人，家里是种地的。他参加过农民协会，当过儿童团长，1927 年蒋介石翻脸杀人那阵子，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过乡的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 年，他参加红军浏阳第一支队，后编入湘鄂赣独立第一师，再后编入红六军团，叫于啥就于啥，先后当过司号员、通讯员、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政委，1935 年调到红二军团，参加长征北上，参加战斗上百次，负伤 11 次。卢沟桥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任团政治处主任，跟着贺龙参加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9 年 1 月，八路军一二〇师挺进冀中后，马本斋相中了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那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总想“咱回民支队也跟八路军一样才好”，把郭陆顺请来当了政委。

1942 年，华北日伪军加紧了“治安强化运动”，到处壕沟纵横，公路如网，寨墙林立，三里一碉堡，五里一岗楼，给回民支队活动造成了严重困难。这年 4 月，回民支队到交河县活动，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犯。一大队在陈庄宿营，马本斋、郭陆顺率司令部机关驻在西高屯。27 日拂晓，交河、泊镇之敌千余人袭击陈庄。郭陆顺与马本斋商量，要到陈庄去指挥战斗。马本斋劝他不要去，郭陆顺开玩笑说：“这批鬼子的武器好，是送上门来的肥肉，可

不能让他跑掉！”说罢，便赶到陈庄，详细询问了战斗情况，指示一大队尽快把敌人丢弃的枪支抢过来。他来到阵地前沿的一个土墩上，拿起望远镜观察敌人动向。当时枪声不断，流弹横飞，警卫员和特派员刘世昌考虑到郭政委的安全，都催他赶快下去隐蔽。郭陆顺半认真半开玩笑他说：“抗日第一，个人安危第二嘛！”话音刚落，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头部，血流如注。马本斋闻讯赶来，见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生命垂危，悲痛地说：“陆顺同志是咱们的好政委，他为咱们回民支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最尊敬的人啊！”并深深地向郭陆顺鞠了一躬，解下自己的围巾，盖在郭陆顺的脸上。

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在一次会议上说：“回民支队不仅是党团结回民抗日的旗帜，也是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郭陆顺同志是模范政治委员”。

（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稿石魁撰写）

太行浩气传千古 ——记左权烈士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1942年6月，朱德为悼念左权将军，写下这壮烈诗篇，引人深切怀念。左权生前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是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杰出将领，是全军公认的军事家。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驰骋沙场，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诸方面，建树辉煌，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立下卓越的功勋。

左权，乳名自林，学名纪仅，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村一户佃农家庭。他7岁入塾启蒙，1914年考进黄茅岭第八中学。1921年夏又考入县立渌江中学，曾与同学蔡升熙、宋时轮等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勤奋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广州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大队学习。1925年2月，由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后来在《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中写道：“讲武堂中多三湘七泽间子弟，以湖南的革命前辈，训练湖南的革命青年于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真所谓相得盖彰。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

左权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曾任排长、连长等职，先后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925年11月，他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6月奉调回国后，即被中共中央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同年底，担任红军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6月，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属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红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办事机关兼）参谋处代理处长。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后，左权任该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2年初，率红十五军先后参加攻打赣州和漳州的战斗。1933年1月，调任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作战参谋，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制定出在黄歧设伏全歼进犯之敌的战功作战方案。同年12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并投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参与指挥乾昌桥、凤翔峰等战役。

1934年10月，左权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作为先锋部队，开始长征。1936年5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曾率部在甘肃东部的曲子镇、马岭歼敌2000余人，并一举攻克会宁县城，实现了三军大会师。接着，在11月21日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各一部，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采用“拦头、堵尾、冲腰”等战术，歼灭前来进犯的胡宗南部第一军第的一个旅另两个团。此役，

被刘伯承称之为“布署作战，细致周密”的一个范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总部改组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1937年3月，左权任总指挥部参谋长。

11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左权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从此，他协助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部队，深入敌后，转战华北。

9月间，左权路过山西洪洞县时，给久别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于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表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全军将上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到达五台县南茹村。总部机关刚安顿好，左权立即组织司令部展开工作，了解华北敌我态势。这时，担任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在日寇的疯狂进攻下，正在节节败退。左权根据侦察获悉，日寇第五师团正由广灵、灵丘向平型关进发，进而攻占太原。他立即将敌情报告朱德、彭德怀，定下在平型关伏击日寇的决心，遂令一二〇师驰援雁门关；——五师于24日冒雨向平型关急进，做好伏击准备。25日凌晨，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多人，击毁敌汽车100余辆，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一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11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十八集团军总部，简称前总）转移到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各部队领导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的左权，遵照朱德、彭德怀的意图，具体完成了部队进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会后，在左权主持下，以八路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作战、训练、建设太行等训令。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和左权率领，向太行山挺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进犯山西临汾地区。2月25日，八路军总部行至山西省安泽县（府城）与进犯的日军遭遇，当时，朱德和左权正在府城左侧山上观察地形，左权立即指挥身边仅有的两个连阻击。在敌众我寡的严重时刻，左权命令部属将朱德护送到20里外的安全地带，而他自己不顾安危，亲临前沿指挥战斗。当他察清敌情后，指挥部队从侧面出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左权与敌周旋两天，争取了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转移的时间，并掩护45个村庄的群众脱险，八路军总部顺利到达安泽县刘垣。罗瑞卿曾说：“在这次临汾遭遇战中，左权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月，日军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分进合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摧毁太行山根据地。朱德和左权详细研究了敌情，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并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左权亲临前线，指挥部队反“围攻”作战。4月16日，敌1500

余人钻进了八路军在武乡、长乐地区布下的口袋，将敌分割在河滩里，激战一天，全歼该敌。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连续收复武乡、沁源、安泽、壶关、长治等 19 座县城，把日寇赶出了晋东南，彻底粉碎了敌“九路围攻”，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 年 7 月，八路军总部转移到武乡县砖壁村。左权住在一座破庙里，只有一张旧方桌，用门板支撑的小床铺，墙上挂满了用红蓝箭头标记的军用地图。他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终日思考着如何粉碎日寇对晋察冀根据地的进犯。10 月，日军集中 2 万余人，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左权日夜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指挥部队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11 月 7 日，八路军晋察冀和一二 师部队在晋察冀军区指挥下，将日军主力一部包围于黄土岭，歼敌 900 余人，击毙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敌人悲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军屡遭打击后，被迫于 12 月全部撤出晋察冀根据地。左权写了《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地区》一文，总结了八路军冬季反“扫荡”取得胜利的经验。

1940 年 2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太北地区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兼政委。3 月初，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来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说什么要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朱德和左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向他陈述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一贯主张，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但朱怀冰仍顽固不化，回去后，又奉蒋介石的命令，进犯太行山区。左权率第二纵队南下反顽，在太南山区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军部和两个整师及其它杂牌武装万余人，控制了武，涉公路以南，临淇以北的广大地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7 月至 12 月，左权协助彭副总司令（这时朱总司令回延安）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他每天端着蜡烛，面对地图，分析敌情，考虑这次战役的部署。参加这次战役的有 105 个团，他对每个团的战斗任务都作了周密的划分，而且要求在同一段时间向敌人发起进攻。这次战役从 8 月 20 日开始，至 12 月 5 日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毙伤俘日伪 4 万余人，严重地破坏了正太路，使敌交通线瘫痪一个月之久。“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左权及时总结了作战经验，发表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1941 年 11 月，日军三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一、第四、第九混成旅团，从山西黎城疯狂地向黄崖洞、水腰地区袭击，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兵工厂。为保卫兵工厂的安全，左权亲自指挥黄崖洞保卫战。当敌人进至我防御前沿时，他命令总部警卫团抗击敌人，用“咬牛筋”的战法把敌人顶住，并指示部队“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杀敌致胜”。指挥部队先在山口处顶两天，煞住敌人进攻势头；又在第二道防线顶两天，不断杀伤敌人；最后再上高山，待增援部队赶到，对敌来个反包围。经过 8 昼夜激战，八路军 1500 余人的部队抗击 5000 多敌人的进攻，歼敌 1000 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保卫战应作为我 1941 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不仅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戎马倥偬中，抓住战争间隙，潜心研究，孜孜不倦，

广收博采，著书立说，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诸方面都有许多建树。周恩来评价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左权极为重视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明确提出：“军事是一种科学，要创造我们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正是凭着对中国军事理论的刻苦研究和顽强的毅力，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发表了40多篇军事文章。他的《战术问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等许多篇论文，成为宝贵的军事思想财富。他提出：“要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事情，并号召广大指战员不断研究敌人的战术，求得不断的进步，改善充实自己的战术。他认为，战术和其它许多事物一样，是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决定的，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条件，依据我军历史的传统和军事任务的性质作出规定，对此，他特别推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原则。他在《论军事思想原则》一文中写道：“在中日战争中，我们有防御中的进攻，有持久中的速决，有外线中的内线的多种斗争方法，这一切确是辩证法在实际战争中的运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便是把辩证法应用到中日战争中的成熟的天才佳品。”

左权长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直接领导司令部工作，对司令部建设有着重要的建树。1938年3月，他在八路军将领会议上提出，司令部工作是复杂和负责的工作，是指挥员指挥军队的机关，建立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各项制度至关重要。同年冬天，他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司令部工作经验，从当时的部队实际出发，制定了第一个司令部工作条例，即《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时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门的机构，确定了工作职责，使司令部工作有了比较正规的章程。

1942年5月，日寇纠集2.5万余人，分四路向太行腹地进行奔袭式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摧毁华北抗日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在这紧急时刻，彭德怀、左权立即召开会议。左权坚定地对大家说：“目前，我们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前方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在我们周围，保护几千同志生命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太行山压顶也决不动摇，誓死保卫总部的安全！”当天晚上，各机关乘夜暗转移到南艾铺（原属黎城县，后划偏城县，现归涉县）地区，25日，部队正在十字岭吃早饭，敌人突然从两翼包抄上来，以飞机大炮漫山轰击。左权站在山峰上，双手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情，指挥部队坚决阻击两翼敌人。因机关人员多，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彭德怀、左权决定分头突围：左权亲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沿清漳河东侧向北突围，罗瑞卿主任率政治部向东南青塔方向突围，杨立三部长率后勤部向东北羊角方向突围。左权同时派作战科长王政柱率警卫排护送彭德怀到安全地带，而彭总坚持要同机关一块突围。左权严肃地对彭德怀说：“事关重大，你安全突围出去就是胜利，我直接指挥机关突围就行了。”并让警卫员硬把彭总扶上马。时近中午，左权亲自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人几次冲锋，阻止了敌人前进，为机关突围争取了时间。当太阳偏西时，终于掩护各机关人员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这时，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要求左权离开十字岭，他始终不肯离开，决心率领部队最后冲出敌人重围。他在检查队伍时，发现担文件箱的人还没有上来，为保护党的机密，立即命令警卫员转回去找。当他带部队冲到敌人最后一个封锁点

时，一颗炮弹落在他身旁，他不幸以身殉国，时年 37 岁。

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山西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全国解放后，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有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

（总参谋部政治部组稿李宝春撰写）

马石山上十勇士 ——记王殿元等十烈士

凛凛十勇士，
扬威马石山。
往返破敌“网”，
血路开复关。”
千家脱险境，
壮士永不还。
年年朔风里，
犹闻杀声酣。

——虞棘：《对月漫咏》

1942年11月，胶东大地渐渐换上了冬装。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伪军两万多人，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开始空前残酷的大“扫荡”。11月21日，各路敌人一齐出动，采用“铁壁合围”、“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严密搜索，梳篦式进犯。白天，他们以密集的队形平推并进，步步紧逼，无山不搜，无村不梳，烧草堆，挖新坟，掘地堰，清山洞，连荒庵、山寺也不漏过；夜晚，他们野地宿营，燃起一堆堆篝火，岗哨密布，把山口、要道全都控制起来。敌人将这称作“拉网大扫荡”。被“网”进来的，有来自莱阳、海阳、文登、牟平、栖霞、福山等地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人们看到漫山遍野的日伪军，慌不择路，乱纷纷地向马石山逃命。

马石山，位于乳山县西，因有石似马而得名，东西走向，绵亘十几公里，主峰海拔467米，山岭蜿蜒曲折，松树、柞树等林木茂密，地势险要。这里正是敌人“拉网扫荡”的“收网”处，敌人企图在马石山把抗日军民一网打尽。

被围困在山前坡的群众约有2000多人。当人们听到四面敌人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时，惊慌地乱成一片，有的往山沟里跑，有的往树丛中钻，也有的坐在地上不知所措。

正当人们走投无路，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听西面传来一阵喊声：“八路军来了，咱们的八路军来了！”大家循声望去，只见10位八路军战士，头戴钢盔，腿裹绑带，身着灰色棉军衣，大都肩扛三八大盖枪，正向群众走来。这是胶东军区五旅十三团七连二排六班的10位战士。几天前，这个班去东海军分区执行一项任务，完成任务归队途中路过这里，也被兜在“网”内。他们见这里有这么多老乡被围，决定留下来带领乡亲们突围。他们已分批带领许多老乡冲了出去，现在又返回来，准备把困在马石山前的乡亲们也救出去。

人们看到亲人八路军来到面前，感到大难中有了希望，一下子把10位战士围了起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他们，争着向他们诉说周围的情况。

战士们听着乡亲们的诉说，一个个紧握双拳，抱定了誓死掩护群众突围的快心。这时，只见一位二十四五岁的战士，拨开人群，一个箭步跨上梯田的石墙，他个子不高，但长得虎头虎脑，墩实健壮，紫铜色脸，两道粗黑的浓眉下忽闪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显得格外精神，他的皮带上拴着一个搪磁碗，碗套上还绣着鲜红的五角星。他就是六班班长王殿元。他用亲切的目

光望着乡亲们，亮开铜钟般的嗓音说：“乡亲们不要怕，咱们地熟、路熟，还愁冲不出去吗？乡亲们尽管放心，我们带领你们往外冲，有我们在，就有大家在……”

王殿元的话刚讲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拉着两个孩子挤到他面前，焦急他说：“这两个孩子的爹妈，都是为打鬼子牺牲的，上级把他俩寄养在俺家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再落到鬼子手里，俺这把年纪了，死了没什么，你们想法把孩子带出去，让他们长大了给爹娘报仇吧！”

战士们个个心如刀绞。一大个子战士大步走到大娘跟前，用坚定的口气对老人说：“你老人家就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我吧，只要有我大老赵在，就一定能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这个大个子战士名叫赵亭茂，是六班的机枪射手，他和王殿元都是十三团七连的老兵。几年来，他俩参加了上百次大小战斗，在战火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六班的战斗骨干。

这时，班长王殿元再次招呼大家说：“各位父老乡亲放心，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共产党、毛主席教导出来的革命战士，生死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一定把大家带出去！”

夜幕降临，马石山隐没在苍莽的夜幕中，敌人在马石山四周燃起一堆堆篝火，端着大枪的日军士兵来回走动。王殿元同几个党员骨干一起分析了敌情，一致认为，敌人很可能天亮后在马石山“收网”，对抗日军民进行大屠杀。决定连夜带领群众突围出去。午夜前，1000多名群众在战士们的带领下，沿着3里多长的山沟开始转移。当快接近沟口时，王殿元带领李贵等3名战士，分别爬上沟两侧的山脊，向不远处山包上的两个火堆摸去。他们杀了巡逻的哨兵，接着又扑灭了路旁正在燃烧的火堆。沟口处，焦急等待了半夜的人们，在战士们的带领下，立即像潮水一般向外涌。送走了第一批突围出去的乡亲，王殿元又带领9位战士返回。

困倦的敌人一时还没有发现这个缺口，第二批群众又顺利地从这里突围出去。可是，当这批突出去的人员刚刚爬上前面的土岭时，被敌人察觉了。一小队日军咿哩哇啦地叫着追上去，机枪、步枪一齐向突围的人群扫射。

王殿元一看情势危急，立即喊道：“机枪枪吸引敌人火力，其他人跟我来坚决顶住敌人！”六班立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一些群众趁此机会，拼命向土岭下奔跑。

激战中，十几个日军向王殿元带领的几位战士包抄过来。不一会儿，几十个黑影混在一起，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白刃战以六班的胜利而告终，但六班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战士王文礼英勇牺牲，班长王殿元等几处负伤。

当六班的勇士们护送完沟内最后一批群众冲出沟口，准备转移的时候，忽然一位十几岁的小姑娘跑到大个子战士赵亭茂跟前，哭着说：“同志啊，俺全家都没出来，还在西南面那条沟里！”

原来，那里还有尚未突围的另一部分群众。

这时，东方已现出鱼肚白，天快要大亮了。王殿元明白，再返回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可是作为人民子弟兵，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敌人杀害吗？不能！于是，他以坚定的口气对战士们说：“同志们，走，咱们再冲回去！”

六班9名战士又来到马石山西侧的一条山沟里。这里，周围响起了时起时落的枪炮声，漫山遍野布满了搜山的日伪军。敌人开始“收网”了。

“乡亲们，快跟我们冲出去！”班长王殿元大声地招呼躲在沟内的群众。

晨曦中，只见六班9名战士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向敌群发起了猛烈攻击。没等敌人还击，他们端着刺刀，冲进了敌群。战斗中，又有两位年轻的战士倒下了。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被围困的群众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口子撕开了，快跑呀！”激战中，不知是哪位战士喊了一句。受惊的群众听到喊声，一齐向突破口跑去。

就在群众顺着这个口子蜂拥突围的时候，日军两个小分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围过来。王殿元当机立断，命令全班：“牵制住敌人，把鬼子引到山上去！”战士们将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后，拔腿往山上跑。日军一看八路军跑了，丢下群众追上来。战士们边打边退，一直把敌人引到半山腰。班长估计突围的群众大部跑了出去，便指挥战士们东躲西藏，登崖攀壁，上了马石山主峰。

初冬的早晨，寒气袭人。战斗了一夜的战士们，又累，又困，又饿，又冷，不停地打着寒颤。然而，没有一人叫苦。

马石山峰顶南北约40米宽，东西不足半里长。峰北是悬崖峭壁，东西两面坡陡，不易攀登。南面坡度较缓，但山路险阻。主峰上遍布鳞岬突兀的岩石，只有山顶中央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周围被断断续续的石墙围着，石墙里面，一株苍劲挺拔的平顶松，傲然屹立在山巅。

上午8时许，敌机又一次飞临马石山上空盘旋，投弹轰炸。接着，山南坡的敌人摆开一条长蛇阵，密密麻麻地向山顶扑来。当第一批敌人爬到离山顶只有五六十米的时候，王殿元一声令下，大个子战士赵亭茂的机枪首先开火。接着，大家的步枪也一齐向敌群射击。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

当敌人发起第二次冲锋时，六班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同志们，节省子弹，用石头砸！”随着王殿元的命令，一块块大石头从山顶滚滚而下，直砸得敌人东躲西藏，哇哇直叫。许多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群众，也纷纷以树棍、石头，与日军拼杀，宁死不屈。敌人又一次被打下去。

六班现存的7名战士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凭借有利地形，利用山上的石块，与数十倍的敌人拼搏了5个多小时。王殿元看了看身旁的战士，活着的只有赵亭茂和李贵二人了，而且都负了重伤。他检查了全班的弹药，只剩下两枚手榴弹了。

中午，日军调集大量兵力，从马石山南面和东西两侧，又一次向山顶发起猖狂的进攻。王殿元把两位战士召集在一起，神情严肃他说：“今天我们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全班10个同志，同地方干部、民兵一道，往返数次冲破敌人的火网，护送出大批群众，打死了七八十个鬼子，我们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现在，我们冲出去是不可能了，反合围，只剩下这两颗手榴弹，大家看该怎么办？”

战士李贵坚定他说：“我们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活不当俘虏，死不交枪支，咱们先把枪砸了吧！”

“砸枪？”赵亭茂感到惊讶。

“对！”王殿元接上说：“革命的武器，决不留给敌人！”

王殿元说着，先把自己的枪砸了，接着又同李贵把烈士们的枪支找来……

赵亭茂紧紧地抱着机枪，抚摸着那乌黑的枪筒，一句话也不说。这挺机枪，是九子峰战斗胜利后，团长亲自发给他的。几年来，他扛着这挺机枪，艰苦转战，消灭过无数的敌人，可是现在要把它毁掉，心里多么难受啊！但想到眼前的处境，他也只好狠狠心，将机枪零件小心翼翼地拆下来……

此刻，王殿元把两颗手榴弹紧紧握在手里。敌人嚎叫着向山顶冲来。王

殿元用尽全力，把一颗手榴弹扔向敌群。

英雄的六班班长王殿元、战士赵亭茂、李贵，在敌人即将冲到跟前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日军攻占马石山后，将抓捕到的500多名群众全部杀害，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

日军撤离马石山后，人们来到烈士浴血奋战的主峰，找到了王殿元、赵亭茂、李贵的遗体，只见他们怒目圆睁，躺在平顶松下。

由于诸多原因，六班10位勇士没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名单。人们虽然不全知道他们的名字，但“马石山十勇士”作为一个英雄群体，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乡亲们把他们安葬在山顶那棵平顶松附近，并为他们和所有在马石山牺牲的烈士竖立了纪念碑。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军号声声破敌胆

——记孔庆同烈士

1937年盛夏，河北省丰润县腰带山一带的潘家峪、东高庄、苏庄、大岭沟等偏僻山村，一位年轻人走村串巷，沿街叫卖：“卖篋子喽！卖篋子喽！”

吃喝声引来许多村民。他边卖边说笑，讲《三国》、说《水浒》，进而向人们讲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话到深处，他就向人们谈起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事情来。他还会拉二胡，时常拉起民间流行乐曲，当老乡们听得兴起，转而拉起抗日曲调，什么《黄河怒》、《黄河愤》、《九·一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有时，卖篋子的青年打开包袱，拿出一把系着红绸布，闪耀发亮的小军号，吹将起来，他究竟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八成是共产党吧？

不错，这位年轻人正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到冀东从事抗日武装大暴动准备工作的共产党员孔庆同，他1912年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农民家庭。1927年春，光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农民协会，组织贫苦农民，大刀长矛，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年仅15岁的孔庆同参加了农民赤卫队。时隔不久，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他当了司号员。部队领导人把染过烈士鲜血的一把小军号交给他，他总是把它擦得锃光闪亮。每当战斗中发起冲锋，战士们一听到那激越的号音，立刻精神大振，勇气倍增，像下山的猛虎扑向敌人。每次战斗结束，同志们都为他请功。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遵照中央指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抵达陕北。此时，孔庆同已经成长为红军营长了。但那把小军号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提出在日伪统治比较严密的冀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决策。中共北方局即时选派一大批军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前往冀东，孔庆同作为年轻军事指挥员，离开延安，到了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然后化装成为卖篋子的商人，跑遍冀东各县所有的联络点，宣传抗日道理，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培训军事干部，着手做抗日武装大暴动的准备工作。那把小军号随他到了冀东，在燕山、滦河地区奏起抗日的号角。

孔庆同到达冀东4个月后，中共冀热边特委在滦县多余屯召开冀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党的负责人李运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冀东举行抗日武装大暴动，建立冀东抗日联军的指示，会后，孔庆同连夜赶回丰润县腰带山区，调集党员和农民自卫会骨干300多人，集中于遵化、丰润、迁安3县交界处的茅山诸乐寺，举行誓师大会，最先组成了冀东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随后，中共冀热边特委负责人来到诸乐寺，宣布这支队伍为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孔庆同任支队长，史贞为支队政委，周志国和魏春波为支队特派员。

支队组建以后，武器和弹药的来源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孔庆同与支队领导人商量后，决定消灭茅山镇反动民团，夺取武器。尔后，他亲自带两名侦察员趁茅山镇集日，化装进入镇内摸清敌情，连夜带队伍包围民团局。孔庆同吹起小军号，指挥战士攻入敌巢，又经喊话，团丁们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不久，孔庆同与周志国、魏春波带领一支队攻入兴隆县药王庙据点，歼灭日军一个小队。

1938年7月上旬，冀东抗日大暴动全面展开，第一支队扩编为冀东抗日联军第四总队，孔庆同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共有1000多人。

一天夜间，孔庆同率领四总队，一举攻占了敌人长期盘踞的铁厂镇。丰润、遵化两县伪骑兵保安队和伪警察2300多人，在日本顾问督促下，妄图夺回铁厂镇据点，凌晨时分，分南北两路向铁厂镇扑来。

孔庆同和总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由他率领部队捷足先登，赶到铁厂镇北的玉皇庙山路两旁埋伏下来。敌人的大队人马刚到庙前，山坡后面突然响起调动部队的号音；一会儿指令，一会儿应和；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神秘莫测，变化无常。敌人一听号音，好像进了迷魂阵，停在原地，东张西望，惊慌失措。日本顾问以为进了抗日联军的包围圈，命令撤退。孔庆同见敌人开始撤退，又吹起了冲锋号。抗联战士们跃出战壕，居高临下，扑向敌人，激战两个小时，敌人狼狈而逃。共俘敌80多人，缴获枪支200多支，战马35匹，大大鼓舞了冀东抗日军民的士气。

这年深秋。孔庆同带部队东渡滦河，与节振国领导的工人特务大队会合。两支队伍团结协作，在迁安白杨峪村歼灭了伪满洲军一个营和日军一个小队，缴获的战利品装上骡马驮子，足有一公里长。

1939年秋后，孔庆同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春天，他从党校学习毕业，到冀中第八军分区任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之职，在保定一带坚持平原游击战。那把军号也一直随身携带。从山区游击区转到平原游击区指挥作战，这对孔庆同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由于他作风民主，团结同志，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很快就适应了平原游击区的环境，率领部队和当地民兵，同敌人展开了驰名中外的地道战、地雷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

1942年秋，一个雾霭弥漫的清晨，白洋淀上，水波粼粼，芦荡漫漫，几只小船穿梭般地向淀中心的芦苇茂密之处驶去。八分区党委紧急会议就在芦苇荡中召开了。孔庆同向党委成员们传达了彭德怀关于“以武装斗争为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大家共同分析形势，指出了抗日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还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斗争方式。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夜幕降临在白洋淀，趁着朦胧的月色，几只小船离开淀心，向四处疾驰而去。为了尽快把会议精神贯彻到各个县的游击大队，小船靠岸后，孔庆同率领分区手枪班连夜前往河间县。午夜时分，赶到了河间县左庄，与县大队政委杨捷率领的县游击大队会合。孔庆同连夜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上级指示和会议精神。会后，同杨捷共同分析当地斗争形势并作了重要指示，直至深夜。

次日拂晓，村外突然枪声大作。由于当地汉奸走狗通风报信，数倍于我的敌人连夜扑来，把左庄包围得水泄不通。情况十分危急，孔庆同和杨捷指挥分区手枪班和县大队向村西突围。手枪、步枪、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继而发起冲击，杀开了一条血路。没料到刚奔出村口几百米，前面又响起了重机枪声，原来敌人设置了第二道包围圈。这时，后面的敌人又追过来，县大队腹背受敌，许多战士中弹倒下。

孔庆同果断命令：向北突围！经过激烈战斗，县大队冲杀到柏桐村南，又遇上日本鬼子骑兵部队的截击，情况越来越严重！孔庆同把手枪插在腰带上，一把抓过县大队机枪射手手中的机枪，向敌人骑兵猛烈扫射。日本鬼子

纷纷落马，被压在一道大土坎后面。接着他拔出随身携带的军号，叫上机枪手和警卫员向东面的一道土坎奔去，在土坎后面吹响了冲锋的号音。号音一响，立即吸引了敌人的兵力和火力。

孔庆同向杨捷发出命令：“快！率领大队继续北撤！抓紧时机！”杨捷翻身跃起，带领队伍边打边冲，勇猛拼杀，眼看冲出重围。

敌人把所有火力集中到孔庆同所在的土坎部位。一排排子弹像雨点呼啸而来，机枪手中弹牺牲，孔庆同也身中数弹！警卫员奔上来背他，中弹牺牲了，倒在孔庆同身旁。杨捷带领四五名战士冲杀回来抢救，孔庆同高喊道：“别过来！快带同志们撤走！”

杨捷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向孔庆同靠拢：“孔司令员，我们不能丢下你！”

“少废话！快撤！服从命令。”孔庆同一边喊着，一边摘下警卫员的两颗手榴弹掖在腰里，抱着机枪继续向敌人扫射。他的身后，留下一道浓浓的血迹，染红了棵棵青草！

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孔庆同的机枪不停地吼叫，阵地前留下了日寇几十具尸体。突然；机枪声停止了，子弹全部打光。孔庆同回头一看，见杨捷已率县大队突围远去，从容地拔出那两颗手榴弹，拧去环扣，放在身旁，又摘下腰带上那把跟随他多年的军号，静静地等待临近的敌人。

好半天，敌人见土坎后面没有动静，才畏畏缩缩地围了过来。在距离十几米的时候，孔庆同翻身跃起，甩出一颗手榴弹，随着浓烟炸起，敌人又丢下几具尸体，其余的敌人趴在地上不敢动了。

孔庆同一手叉腰，一手举起那把军号，吹起冲锋的号角，那嘹亮不息的号声，在大平原上回荡，体现着中华民族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

敌人惊呆了，纷纷退步。日本指挥官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快！夺下那把军号，抓活的！”

当敌人像疯狗一样扑到土坎前面时，孔庆同拉响了第二颗手榴弹。他和他那把闪光的军号，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过后，白洋淀军民掩埋烈士遗体的时候，发现在孔庆同身旁的血泊里有一堆纸屑，那是他忍着剧痛，把身上携带的所有文件全部烧毁了。在烈士献身的地方，指战员们捡起军号的一小块碎片。手捧着这些带有血迹的碎片，大家不禁热泪盈眶，仿佛听到了孔司令员吹起的嘹亮不息的冲锋号声……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阎贵明撰写）

神秘使者传佳音 ——记张子华烈士

1985年5月，宁夏银川市八里桥革命公墓。

在阵阵悲壮的哀乐声中，张子华烈士遗像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人们在凄切中缅怀过去，挥泪祭奠这位当年曾冒着风险，深入虎穴，传递信息，协助周恩来副主席处理复杂问题，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神秘使者。

张子华，原名王绪祥，1914年4月21日出生在宁夏中宁县恩和乡一个地主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他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参加过农民抗交“鸦片税”、打土豪贪官的斗争。1930年，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姓名为陈子华。

他入党后，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领导下工作。曾到门头沟煤矿背过煤，组织工人斗争。调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秘书后，参加了天津码头、纱厂工人运动和唐山五矿工人罢工的斗争。1934年5月，在天津部署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时，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他坚贞不屈。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陈铁铮（孔原）的委托，化名黄汉，赴陕北游击区巡视工作，说服那里两个根据地领导人消除误会，加强团结，将陕北根据地的3个游击大队扩充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1935年初，他被调到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任秘书，5月又派往豫鄂陕游击队任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部参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其魔爪伸进了华北大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国民党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吁，这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先声，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受到了国民党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欢迎，他们同意停止内战，和中共举行和谈。

1936年1月，国共两党首次秘密和平谈判在上海举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张子华（化名黄汉）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名义，同陈立夫的亲信、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在这次极不寻常的会谈中，谌小岑首先向张子华介绍了国民党方面准备抗日的措施，表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意愿。张子华向中共上海党组织汇报后商定，鉴于国民党政府还有点和谈的诚意，建议国民党派代表和他一起到陕北苏区直接同中共中央面谈并汇报情况。国民党政府表示赞成，同意派出董健吾为国民党方面代表，赴陕北谈判。董健吾曾是宋子文在美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又是宋庆龄的朋友，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董健吾竟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遂同董健吾结伴而行。张子华担负起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巨使命的时候，年仅21岁。

由于有党组织的周密安排，有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国民党政府要员宋子文的帮助，董健吾又持有宋子文亲笔签发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张、董二人顺利到达了古城西安。

西安距离延安几百里地，但由于国民党重兵把守，关卡如林，使得张子华与董健吾寸步难行。为了完成此程重任，他俩冒着危险，亲自去找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借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集国难家仇于一身，

强烈要求抗日，早已考虑与共产党、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他看到董健吾的委任状后，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决定提供方便，促成好事。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电台联系好后，亲自派出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他俩于2月27日到达瓦窑堡。当天，中央组织部部长博古（秦邦宪）就亲切地接见了张子华。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又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中央决定继续和国民党联络，派遣张子华去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动向。董健吾也带着博古给宋庆龄女士的关于我党和平谈判的五条原则的密信，及时返回上海。

4月16日，张子华受命离开瓦窑堡，途经西安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张学良将军通报了国共两党联系的情况，并和张将军交上了朋友。张子华于4月底到达南京，并很快和曾养甫取得了联系。他向曾养甫坦诚说明此行两项任务：一是要详细了解南京政府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希望南京政府派人到陕北去，和中央领导直接谈判。这时，陈立夫已接替宋子文主持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向曾养甫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条答复：1.国方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3.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国民党中央采择；4.共方可选择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曾养甫当即找来谌小岑，要他抄写一份，马上交给张子华并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令人惋惜的是，这样重要的答复，谌小岑在交给张子华时却没有说明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明确答复，而说成是他本人根据国方意见归纳的，仅供中共参考。后来，曾养甫知道谌小岑办错了此事，拖延了时间，造成了误会，深表遗憾。为了弥补过失，消除误会，在国民党一时选不出合适的人员去陕北的情况下，曾养甫要张子华再回陕北给中共中央送口信，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来南京会谈。于是，张子华便以国共双方使者的身份，冒着极大的危险，常年奔波在南京与瓦窑堡之间。

1936年5月中旬，正是陕北高原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美好季节，张子华从南京回到了这片温暖的土地，不顾旅途劳顿，当即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闪着一双兴奋的剑眉，当即给谌小岑写信：希望谌小岑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还约请曾养甫、谌小岑来陕北晤面。周恩来还给张伯岑、时子周等爱国人士写信，陈述中共的主张。

张子华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再次秘密地来到南京。因为这次国共谈判是在极为秘密和情况下进行的，而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激烈，随时可能翻脸。张子华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旦有个闪失，就会有杀头的危险。果然不出所料，张子华到南京后，要求谌小岑给找一个住处，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南京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公开活动。国民党当局却深怕国共两党谈判的机密被泄露出去引起内乱，竟把张子华投入监牢。谌小岑劝曾养甫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何况我们正在讲和呢！”曾养甫这才同意释放张子华，由谌小岑陪同到上海。

到上海后，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进行联系。曾养甫害怕由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便给了一个汉口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不顾疲劳，跋涉千里，于8月27日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这是张子华为早日促成国共合作的第3次陕北之行。

中共中央对张子华带回的情况十分重视，在认真研究分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的讲话之后，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且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之中。”周恩来于8月31日给曾养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信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9月20日，张子华携带着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又风尘仆仆地南下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变，曾养甫已调任广州市长，陈立夫也到广东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了湛小岑。27日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向他口授了国民党政府的4项条件：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3.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4.立即派人具体谈判。并提出邀请周恩来来广州或香港见面，还把为周恩来准备好的护照交给张子华，请他速回陕北报告。

第2天，张子华就发电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曾养甫邀请周恩来谈判的意见，并于10月4日返回西安，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4条谈判条件。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时机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10月17日，中央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即电令张子华交涉派飞机接周恩来来西安谈判。但终因蒋介石坚持要消灭红军，致使这次交涉未获得任何结果。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张子华也于11月中旬返回保安。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尽管国共两党领导人员的直接面谈未能实现，但他在沟通关系、传递信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而被任命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2月12日，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张子华又奉命随周副主席于15日离开保安，前往西安。16日来到延安。17日，他同周恩来乘张学良的专机到西安。从此，他便以周恩来的秘书、红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他同宁夏驻西安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主动拜访了宁夏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柴成霖，会见了来西安的宁夏党政要员，还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宁夏军阀马鸿逵再次提出谈判，并委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部参谋的身份，到银川商谈成立统一战线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

1937年8月，张子华踏上了养育他的家乡大地。他连家都顾不上回，就直奔银川，同马鸿逵谈判了两次。马老奸巨猾，不解决实际问题，还阴谋扣押张子华，使谈判不欢而散。虽然谈判没有成功，张子华却利用这段时间，帮助恢复和建立了中共宁夏地下党，秘密建立了宁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小组。张子华发现马鸿逵企图扣押他的阴谋后，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银

川。

1938年1月，张子华再次南下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运部担任文化组主任。2月又被调回延安，4月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教员。

就在张子华专心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无情的灾难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39年9月，有人竟突然提出：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有叛变嫌疑，到宁夏谈判有通敌嫌疑。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不幸的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距离遥远，无法派人到天津、银川等地调查，问题一时难以澄清。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张子华始终坚信组织。在隔离期间，他亲自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写信申辩，希望能够尽快做出结论。他对前途始终充满希望。令人痛心的是，他被隔离不久就身染肺病，于1942年去世，年仅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承认其党籍。1985年5月，中共宁夏自治区常委和银川市委召开会议，为张子华烈士恢复了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李学军撰写）

刘老庄连谱壮歌

——记白思才、李云鹏等烈士

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装备精良的日军3000多人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全连82名同志，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当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敌人整整搏斗了12个小时，最后弹尽粮绝，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肉搏，全部壮烈殉国。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称：“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

四连连长白思才原是团作战参谋，16岁投入红军，从他的家乡江西长征到陕北，又渡河东征，北上抗日，曾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是一个英勇善战、沉着机智的指挥员。指导员叫李云鹏，江苏沛县人，原是个青年学生，师范毕业后，当过两年小学教员。1936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民先”组织，后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五师，担任连队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是一位优秀政工干部。副连长石学富、一排长尉庆忠、二排长蒋元连、三排长刘登甫都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的还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连队的战士大都是1939年入伍的，思想基础较好，党员、团员占三分之一以上。这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英雄连队，在白思才和李云鹏带领下，在刘老庄战斗中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烈战歌。

那是1943年3月17日，淮海敌战区所有城镇据点除留部分伪军看守外，日军全部星夜出动，开始对华中抗日根据地淮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扫荡”。敌人妄图首先合围六塘河一带的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灌云、东海之敌于当日晚上进入淮海区的腹地高沟、扬口秘密隐蔽，又乘着夜暗继续向中心区移动；泗阳（众兴）的敌人连夜赶到后庄圩子，继续向钱集方向进犯；涟水之敌已从对岸的码头偷渡盐河；守备在徐州战略要地的敌人也偷偷出来增援沭阳守军，连夜沿淮沐公路南下。同时，从淮阴城窜出一大股敌人，这是侵华日军的主力之一——六十五师团，也是他们这次“铁壁合围”的指挥中心。师团长川岛纠集3000多人马，携带大量的轻重机枪和100多门火炮，杀气腾腾向六塘河逼近。敌人洋洋得意，眼看就要占领盐河南岸的古寨镇和大槐树渡口时，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披星戴月，急行军赶在敌人的前面，到达了川岛部队北犯的必经之路——刘老庄。

刘老庄是苏北平原上一个普通村庄，人不足百户，地不足百亩，距淮阴城50多华里，离六塘河约20华里，紧靠淮沐公路右侧，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敌人大学进犯的形势下，上级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刘老庄一线阻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打乱敌人的部署，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十九团四连担当的就是这样艰险而重要的任务。

3月18日，敌人渐渐出现在全连指战员的眼前。冲在最前面的是尖兵部队，后面跟着大股的人马，其中夹杂着三四十个骑着高头大马、身挎东洋刀的家伙，看得出是敌指挥官。当敌人逼进至离四连阵地只有五六十米时，白思才率先用重机枪开了火，接着全连的火力一起猛扫。敌人尖兵应声倒地，后续部队半天回不过神来，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后撤。四连无一伤亡。

川岛挨了当头一棒，指挥各路人马从四面向刘老庄迂回，形成包围圈。白思才和李云鹏经过商讨，为了钳制敌人的重兵，同时不使刘老庄群众受大

损失，果断地将连队撤出庄子，在村北一片开阔地带利用“抗日沟”固守，而且新修了一些工事。

日军第一次冲锋被打垮后，日军又一个中队向四连发起猛攻。当日军距四连阵地尚有百米远时，四连的枪榴弹集中打向敌人机枪火力点，使其变成哑巴。进攻的敌人失去火力掩护，白连长趁势组织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伤亡一片。往回逃的敌人又被四连的神枪手当作活靶子，“报销”了一些。有20几个日本兵冒死爬到四连阵地前沿，白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跃出战壕，端起刺刀杀向敌人。不到10分钟，这些敌人全部被刺死。

四连的弹药所剩无几。李云鹏看到阵地前敌人尸体旁都有枪和子弹，便决定“武装验收”。一排长尉庆忠对指导员说：“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我的老本行，让我去吧。”指导员批准了他的请求。尉排长带着突击小组，匍匐接近敌人的尸体。敌人发觉了他们，集中火力封锁。突击小组冒着弹雨，硬是将数千发子弹抢了回来，还陆续运回二三十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但四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掩护战友，老红军战士、一排长尉庆忠在返回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午，敌人又连续发起3次冲击。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火力一次比一次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英雄的四连接连打退了敌人5次冲锋，杀伤了大量敌人。

下午2时，敌人暂时停止了冲击。四连党支部抓住空隙召开支委会，作出决议：一定要坚持战斗到天黑，待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后，再组织突围。同时向全连发出号召：英勇杀敌，争取反“扫荡”的彻底胜利！支委会议精神传达后，全连群情高涨。从营里调到四连来帮助工作的青年干事孙尊明，教战士们唱起自编的歌曲：“枪榴弹，威力大，火力点，开了花；曲射炮，不虚发，打得鬼子喊爹妈。轰啊！轰啊！……”有的战士在战壕里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党支部根据这些战士的志愿和战斗表现，接收了一批战士火线入党。新党员们在阵地上庄严宣誓：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

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没能前进一步。日军指挥官集中上百门大炮，从中午到黄昏，接连向四连阵地轰击了6个小时。四连凭借防御的一条宽5尺、深4尺的壕沟，几乎被敌人炮火摧平了，伤亡不断增加。但勇士们硬是凭着比钢铁还要硬的革命意志，死死地坚持在阵地上。敌炮击中，白思才被一发炮弹夺去了左手，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九次负伤。李云鹏也多处负伤，血迹满身。他俩忍着伤痛，坚持指挥，四连阵地始终屹立不动，像一堵炸不烂的铜墙铁壁，横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

傍晚时分，敌人停止了炮击。这时，全连只剩下30余人了，而且大部分负了伤，子弹和手榴弹几乎打光。大家一天滴水未进，个个嘴唇干裂得出血。白思才和李云鹏估计领导机关已经安全转移，便决定把剩余的子弹集中起来给机枪使用，拆毁多余的武器，埋掉拆下来的零件。这时，李云鹏向全连作了最后一次动员：“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我们要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争取杀伤更多的敌人，坚决不作敌人的俘虏！”随即，响起“坚决战斗到底，绝不当俘虏，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

天渐渐黑下来了。敌人借着夜幕掩护汹涌而来。当敌人逼近四连阵地时，四连仅剩的两挺机枪又喷吐出火舌，打倒一批批敌人。不一会儿，子弹打完了，手榴弹也投光了，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白思才猛地跃出战壕，大喊一

声：“同志们，杀！”李云鹏边冲边喊：“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和敌人拚啦！”在一片壮烈的喊杀声中，战士们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全部壮烈牺牲。

蜂拥而来的敌人提心吊胆地走进四连战壕，不但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而且连一支完整的枪也找不到。川岛这时才发现，与他的 3000 精兵殊死搏斗了一天多的仅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而就是这个连队，打退了日军 5 次冲锋，顶住了 6 个小时的炮轰，死死拖了他 12 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官兵近 600 人。

如今，这个连队仍在解放军序列之中，这就是济南军区某部四连。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王胜文撰写）

勇士殉难小沙东 ——记彭雄烈士

在赣榆西部夹谷山的南端，有一座不显眼的马鞍山，自山上建立抗日烈士纪念塔后，这座小山就由此而获盛名——抗日山。陵园中有一座巨大的烈士公墓，其中安葬着在“小沙东海战”中殉难的16位烈士，墓前竖立长碑，上题：“小沙东海战烈士冢”，背面镌刻着原滨海军区政治部撰写的《纪念小沙东海战烈士文》。每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徐徐地走到小沙东海战烈士墓前凭吊时，彭雄那光辉战斗的一生，就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彭雄原名彭文灿，1915年2月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跑到井冈山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八军第六师司令部当通讯员。由于他身材魁伟，有力气，很勇敢，在战斗中遇有比较艰苦的传达任务，领导往往派他去完成。1930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任师部通讯排长，1932年6月，任红三军团连长，1934年任营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湘江战役，娄山关战斗。1935年5月初抢渡金沙江，他是渡江勇士之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1936年11月，彭雄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彭雄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参谋长。他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作战，以第一八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9月14日拂晓，以杨勇为团长、彭雄为参谋长的六八六团，由南北偏城出发，进到离石县东南、与汾阳县交界处的薛公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薛公岭是太（原）绥（德）公路交通要隘，山岭上长满刺密灌木及幼林，不便敌军观察，利于我军隐蔽，六八六团遂以主力在公路南侧设伏，一部埋伏于公路北侧。当日10时许，敌汽车20余辆载步兵2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地域。杨勇、彭雄等即命令用八二迫击炮轰击敌，尔后南北伏兵勇猛冲杀，经一小时战斗，全歼该敌，缴获汽车20辆。

敌遭打击后，特别是汾离公路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19日开始，由离石向东撤退。八路军一一五师遂令六八六团、六八五团一部及补充团于薛公岭东南的五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六八六团团团长杨勇、参谋长彭雄察看地形，精心部署，将二营埋伏在公路南侧铁剪沟附近。20日拂晓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上午9时许，敌先头部队800余人，左顾右盼地进入我伏击地区。六八六团及兄弟部队突然对敌展开猛烈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全歼该敌，击毙日军第一八师团师团长山口少将以下800余人，缴获军马百余匹，各种枪400余支。

我军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粉碎了敌进攻黄河河防威胁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开辟了吕梁山区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到达鲁西，彭雄率领补充团进入鲁西地区，7月初与一一五师特务营、六八六团三营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旅，彭雄任副旅长。

1940年2月，由一一五师独立旅第一团、第二团与鲁西游击第八支队合并，编为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同年6月，支队奉命进入湖西地区（当时称苏鲁豫边区）。

湖西地处鲁西南，芦荡千顷，沃野百里，进可直下中原，退可隐身芦荡。这里顽固势力比较大，反动红枪会也很猖狂。6月初，湖西地方顽军趁机向黄河支队进攻。黄河支队活动地区缩小，只有终兴、张岩一带很狭小的地区。

面对困境，彭雄采用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打击顽固派，肃清土匪。14日拂晓，他带领部队对占据孙庄等地的顽军发起进攻，一举歼灭800余人，旋即攻克了丰西赵庙、刘元集，俘敌200余人。28日，国民党在单县孟新庄召开反共会议，组成联合指挥部。7月6日，顽军朱（世勤）、冯（子国）、黄（体润）部两万余人由东、西两面逼近湖西根据地。黄河支队只有3个团，不足5000人。彭雄侦察分析后认为，顽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有打算，而且倾巢出动，后方空虚，于是以主力一部正面牵制敌人，抽出一个营插到沛北冯部后方，袭击了朱王庄，歼敌700余人；让一个营深入单县西南朱世勤的老巢，又歼敌300余人，迫使冯、朱仓促撤兵。彭雄抓住战机率领主力部队迅速出击，连连告捷。通过这几场战斗，粉碎了顽军的猖狂进攻，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的指示，将挺进淮海、盐阜地区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当时，盘踞江苏省涟水县郑潭口的恶霸地主孙礼涛带领800人的伪军“挺进支队”，多次配合日寇对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

郑潭口位于涟水县城东北30公里，是我盐阜、淮海两根据地的通道，也是日伪五港、大新集、新安镇各据点互相联络的纽带。新四军三师首长决定，由彭雄指挥八旅二十二团去拔掉这颗钉子。

彭雄率领二十二团，对郑潭口周围的地形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态势作了周密的分析，指示该团团长张天云：“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从精神上压倒敌人，在战术上还要打得灵活，打得迅速。火力要集中，以猛制胜。”

9月20日凌晨2时，彭雄带领部队披着星光，向被日伪称为“模范工事”的郑潭口据点插去，5时到达一帆河东岸，隔河望去，郑潭口的炮楼隐约可见。二营、三营从五路庄、木王庄两侧通过一帆河，进到敌据点附近，一营和团特务连也前进到嵇锅甄和大陈庄一带的阻击位置，形成了对郑潭口的包围。涟水县大队也赶到汪庄一线阻击援敌。

晚上7点整，总攻开始了。部队像箭离弦冲向敌阵。霎时，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夜空。敌人抵挡不住，退缩在夹壁墙里继续顽抗。

这时，彭雄将团里几位领导召集起来，调整部署，命令二梯队投入战斗，采取两头打、逐段攻击的办法，消灭夹壁墙内的顽抗之敌。

次日凌晨，侦察参谋报告：佐滕小队长带领40多名日军，纠集涟水城伪保安队两个连，坐着汽车和马车，正向我西面一线阻击阵地急进。彭雄沉思片刻后，紧握拳头捶着桌子，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郑潭口端掉！马上通知一营和涟水县大队，要坚决顶住增援的敌人。”他与二十二团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了攻打敌炮楼的具体方案：留足兵力，巩固阵地，不让敌人突围；其他部队退到适当位置隐蔽起来；选勇敢精悍人员组成奋勇队，突击中心炮楼。

下午1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彭雄发出了“最后摧毁敌巢，争取彻底胜利”的攻击命令。火力队同时开火，压制敌火力。战士们扑向敌中心炮楼。彭雄也登上屋顶，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这时，奋勇队从地道里直冲敌炮楼下层，出现在敌人背后。同时，一部分战士登上炮楼顶层，向顽军射击。

在二十二团的夹击下，敌人像无头的蚂蚁，到处乱窜乱蹦。伪大队长王士珍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枪，少数敌人仍在巢穴中顽抗，彭雄让部队把洒了汽油的棉絮点燃，仍进敌困守的巢穴，到下午3时，敌人经不住火烧烟熏，缴械投降了。

郑潭口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全歼伪军孙礼涛、王士珍部，俘5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各种步枪800多支，手枪30余支，拔除了日伪插入淮海、盐阜区之间的一颗钉子，把盐阜、淮海两地区联成了一片。

1943年3月16日，一只化装的木制“商船”从盐河口（即新黄河口）出发，高大的桅杆鼓起篷帆，乘风破浪，向北驶去。

船上载有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八旅供给部部长伍瑞卿、师部科长席庶民、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保安处长黄国山、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等50多名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及部分家属（军队干部）。他们在彭雄的带领下，计划沿黄海北去，绕过日本鬼子的封锁区连云港，在赣榆县的柘汪口上岸，再经山东赴延安。

大木船航行了一夜。17日黎明时分，风渐渐地小了，船也驶得慢了。水手小张急忙跑进舱里报告：

“鼓参谋长，风停了！”

彭雄举着望远镜，边观察海面，边问船老大：“到了什么地方？”

“那边就是奶奶山（秦山岛），到柘汪口还有七八十海里。”

彭雄镇静地说：“同志们，不要紧，周围渔船很多，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

东方泛白，海水闪着亮光。一会儿，在茫茫海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且越来越近了，掌舵的船老大不禁大声呼叫：“那是敌人的巡逻艇，糟糕！”彭雄迅速到各舱里布置：“把子弹推上膛，准备好手榴弹，敌人不上来，我们不开枪，敌人要上船，听我的命令。”

砰！对方传来一声枪响，随即又是一枪，都是向天空放的。船老大和水手们都知道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航行“规矩”，马上把篷帆降下来。

嗡嗡的马哒声越来越响，敌艇来了，甲板上站着几个鬼子，蛮横地端着枪。巡逻艇颠簸着，靠近了木船，碰得船摇晃起来。站在前面的那个鬼子让翻译官问道：“你们上哪里去？干什么的？”

老大回答：“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

“船上有什么东西？统统的登记！”鬼子带着翻译官意欲登船。

“打！”彭雄发出了战斗命令。顿时，手榴弹、二十响驳壳枪打得不少鬼子倒在甲板上，有的跌入海里。敌艇掉头开到400米以外停下来。不一会儿，又开足马力，用机枪向木帆船扫射。卧在船上面的同志，有的中弹负伤，有的牺牲了。坐在舱里的人，有几个倒在舱板上。

彭雄的腿部中弹。警卫员把他扶回舱里，大家给他包扎伤口。他焦急地说：“别围着我，快去抵抗敌人，快去！”

下午1时许，敌人看木船上枪声停止，第三次向木船扑来。彭雄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绝不投降，绝不作俘虏，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打下去！”

阵阵驳壳枪弹，射向敌艇。敌人的机枪也不断向木船射击，彭雄胸口又中弹，倒在前舱。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起风了，木船上又扯起帆篷，向西北驶去！

船行不到半小时，从连云港方向驶来了一艘巡逻艇，追赶木船。八旅旅长田守尧改变了决心，靠岸，从陆地上到山东根据地去。彭雄听说要上岸，在昏迷的状态中说：“对，上岸去！上岸找一一五师师部。”

船行驶到小沙东附近，同志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彭雄抬上岸，找来医生给他止血、包扎，但彭雄因流血过多，停止了呼吸，这年，他才 29 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尹和平撰写）

勇士舍身炸碉堡 ——记侯登山烈士

济南军区已故副司令员杨国夫将军，在他 1983 年撰写的回忆录——《战斗在清河平原》一书中，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清河军区攻打三里庄这段历史时，热情赞扬了一位舍身炸敌堡的英雄。这位英雄，就是当年清河军区直属团爆破队队长侯登山。

侯登山是山东博兴县人，1919 年生，1940 年参加八路军，在清河军区直属团当战士。入伍一年后，他当了班长，被选送到军区爆破训练队接受培训。由于他学习用功，训练刻苦，很快掌握了爆破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爆破手。在结业后的几次战斗中，他以敏捷的动作和熟练的技术实施爆破，摧毁了敌人多个火力点。团首长见他精明强干，作战勇敢，爆破技术熟练，提升他担任了团爆破队队长。

1943 年 5 月下旬，清河军区在反敌“蚕食”、保卫麦收的斗争中，首先发起了攻打敌人三里庄据点的战斗。

三里庄位于垦利、广饶、博兴、蒲台（后并入博兴县，部分地区改划归广饶县）4 县交界处，是进出垦区根据地的咽喉要地，是靠近根据地最近、威胁最大的敌据点。早在 1941 年，与日军暗中勾结的当地土顽司令成建基，就赶走了庄里的老百姓，在这里筑工事，修据点，扩充实力，队伍聚集了 800 多人。这里工事较为坚固，兵力较多，设防严密。在庄子周围挖了两道深 5 米、宽 3 米的壕沟，并架了两道铁丝网，后又修了高 6 米、宽 3 米的双层围墙。围墙上修了走廊形双层夹道，道内暗堡密布，围墙四周各修有炮楼，配有机枪，形成交叉火力。成建基到处吹嘘三里庄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他与日军串通一气，经常袭扰抗日根据地，残酷杀害抗日军民。一年前，八路军驻鲁北部队曾三次攻打这个据点，均未得手。这年 5 月，日伪又以三里庄据点为基地，向根据地后方“蚕食”。清河军区首长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这次战斗，集中了军区直属团全部及特务营一部担任主攻，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打援，兵力占绝对优势。部队进行了爆破，登城，巷战等战术技术训练，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直属团二营营长张冲波和教导员韩万煜，到三里庄作了战地勘察。突破口选在三里庄东侧，由二营担任主攻，要求他们采用尖刀战术，连续进行爆破，并注意巩固突破口。直属团一营以史家口为依托，从三里庄南边攻击；直属团三营在三里庄西边和北边展开，随时准备歼灭突围之敌，阻击西边许家据点日军的增援。直属团团长郑大林和政治委员孙正下到连队，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根据该据点工事坚固的特点，决定加强爆破力量。

“首长，这次攻打成建基这条地头蛇的老窝，任务非同寻常，让我跟随突击队行动吧！”爆破队长侯登山向团长郑大林主动请缨。

团长叮嘱侯登山：“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突击队当好参谋，指导他们搞好爆破。”

战前，侯登山来到担任突击任务的二营五连，与连队爆破组的同志们一起，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5 月 28 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晚 9 时，战斗打响。开始，直属团从四面八方一齐向据点进攻，霎时，三里庄如同点燃的炸药库，枪炮轰鸣，火光冲天。

老奸巨猾的成建基，一时辨不清直属团的主攻方向，便下令把预先缠在铁丝上蘸有煤油的棉絮从四面墙上点亮，组织火力，拚命还击。从敌人各个炮楼和碉堡里喷出的火舌，象铁扫帚一样扫来扫去。

五连在连长王子玉的率领下冒着枪林弹雨，首先砍断敌人的铁丝网，扫清了据点外围敌人的两道障碍。但正当爆破组向围墙接近，准备实施爆破的时候，敌人发现了直属团的主攻方向，立即加强了对三里庄东围墙的火力。爆破组遇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实施爆破的两位队员还没有接近围墙，就相继牺牲了。

在弥漫的硝烟中，身负重伤的五连副连长徐纪温带着爆破组躲避着敌人的火力，翻滚腾跃，艰难地向围墙接近，实施第二次爆破。令人遗憾的是，这次爆破威力太小，围墙未能炸开，徐纪温英勇牺牲。

时间在枪声中流逝。已是 29 日凌晨 3 点多钟了，围墙仍然没有炸开缺口，主攻部队焦急地等待着冲击的时机。

这时，团长派通信员来二营，向张营长传达了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的指示：如天亮前攻不下据点，必须暂时撤出战斗。张营长心里清楚，如果不迅速攻克三里庄据点，天亮后西边许家据点的日军便会出兵前来增援，将会使直属团陷于被前后夹击的不利局面。时间刻不容缓。于是，张营长命令五连：“无论如何，也要在黎明前炸开围墙！”

五连连长王子玉和指导员程武志接到命令，心急如焚。危急时刻，他俩一齐把目光集中到爆破队队长侯登山身上。

侯登山望了王连长和程指导员一眼说：“据我观察刚才爆破，主要是支撑杆不够长，炸药包放的位置太低。因为围墙的底部最厚实，所以一包炸药不会起很大的作用。下次爆破，我们应该用两包炸药，并尽量提高放置高度。”对他的分析，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这时，五连仅有两包炸药了，又来不及找到较长的支撑杆子，形势极为严峻。此刻，侯登山深知这两包炸药能否发挥威力关系重大。他坚定地表示：“王连长，程指导员，这次爆破，由我去完成吧！”

侯登山说罢，抱起最后两包炸药，跃出阵地，去实施那关键的一次爆破。

五连长把全连的火力组织起来，掩护侯登山向三里庄东边一段单层围墙接近。

围墙上的棉絮还在燃烧着，照得四处通亮。敌人的子弹、手榴弹狂风暴雨般地从围墙上往上倾泻。经五连一阵猛打，正面敌人的火力总算被压下去了，但两侧敌人的火力还在交叉射来。侯登山夹着两包四五十斤重的炸药，在枪林弹雨中匍匐前进。子弹在他身旁“啾啾”乱叫，每前进一步，都受到敌交叉火力的拦阻。只见他利用地形，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翻滚，一步一步地向围墙抵近。

侯登山终于接近了围墙，接着一跃冲到墙脚下，进入了敌人的射击死角。

这时，只见他敏捷地从身上拔出刀子，开始在墙壁上挖窝。然后踏着挖出的脚窝，夹着炸药包，身子贴着墙面，奋力向上攀登。围墙越往上越陡，炸药包又重，如果扒不住，就有摔下去的危险。当他爬到 3 米多高的时候，侧面的敌人大概发现了他，机枪交叉火力向他射来，但立即又被五连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向他射击后，几分钟未见他动作，同志们以为他受伤了，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捏着一把汗。一会儿，看到他的右手又慢慢挥动起来，想在墙上挖个小洞，将炸药放在里面。可惜围墙土质坚硬，

挖了一阵，还是放不下炸药包。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前沿的同志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侯登山更是心急如火。他知道，时间就是胜利，每耽误一分钟，就将给部队的进攻带来一分危险。为了在天亮前打开三里庄据点，他毅然把炸药包放到胸前，用胸膛紧紧抵在围墙上，尔后一只手死死抠住挖出的洞壁，一只手用力拉着了寻火索。火花在他胸前滋滋冒着。只听他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围墙被炸开了一个3米多宽的大豁口。成建基吹嘘的“铜墙铁壁”，终于被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打破了，爆破英雄侯登山，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广大指战员高喊着“为侯登山同志报仇！”的口号，沿着侯登山用自己身躯开辟的通路，奋勇冲进了三里庄据点，经过一番血战，解放了三里庄。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善义撰写）

雁翎队中一英豪 ——记邱芝科烈士

邱芝科，1922年生，河北省安新县邱庄人，邱庄位于白洋淀中，人们世代代以捕鱼捉虾，挖藕采菱，割苇编席为生。1940年春，邱芝科捕鱼回来，刚下船就听说八路军来招兵抗日，他跑去报名。招兵的排长喜欢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问他：“你为什么当八路军？”“为啥？就为端村、郭里口、寨南的孤儿寡妇报仇！”邱芝科吼道：“腊月鬼子血染端村、郭里口、寨南三个村，杀了咱中国300多口人，这仇咋能不报？”邱芝科参军到了晋察冀军区第九军分区二十四团。他在八路军里学政治、学文化，一年多参加了十几次战斗。1940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队伍在任丘县夜行军，和日军打了个遭遇战。连长一声令下，邱芝科像小老虎一样向前冲去。打了一会儿，主力安全转移，连长命令撤退。邱芝科跟着大家猫腰向西南方向跑去，漆黑中，他一脚踩空，只觉“嗡”的一声，失去了知觉。他醒过来，找到自己的马步枪，追赶部队。跑了好多路，没见到部队影子，便回邱庄家里隐蔽，一边养伤，一边请村党支部帮助找部队。村党支部书记经过同区委联系，告诉他：“二十四团已转移到铁路西的山区，一时半时联系不上。区委决定，让你先去雁翎队，以后和二十四团联系上再说。”

邱芝科听说雁翎队只是用大抬杆（大型土枪）、土炮和火枪同敌人做斗争的水上游击队。但现在回不了部队，也只能这样了。他说：“我先去雁翎队，以后你们要把我送回二十四团。”

白洋淀，史称西淀、白羊淀，是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总面积为366平方公里，90%以上的水面在冀中平原安新县境内，其他分属任丘、雄县、容城、高阳等县，上承九河，下通津门。它是由143个淀泊和3700多条壕沟组成，大的淀泊烟波浩淼，水天一色；小的淀泊绿苇环抱，恬逸幽静，几十个水上村庄点缀其中，十几万亩苇田星罗棋布。苇田、岛庄、堤防、碧波、渔舟、飞禽、沉鱼，构成了白洋淀特有的景色。

可是，自从侵华日军在白洋淀畔的赵北口、同口等大村镇安上了据点，敌人的汽艇在淀上横冲直撞，由大沙河、潞龙河、拒马河、唐河经白洋淀、大清河，一直通向天津的千里堤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邱芝科到了雁翎队驻地淀头村，受到队长郑少臣和队员们的热烈欢迎。郑少臣还给他讲了许多打鬼子的战斗故事。比如：前年秋天，雁翎队刚成立时，只有20多个战士，十几条大抬杆和20只小船。一天，侦察员送来情报，说汉奸张德清带着鬼子、伪军乘坐汽船，到新安据点开会，老队长陈万率领雁翎队埋伏在王家寨和季庄子村之间的苇塘里。下午，敌人的汽船从新安回来，进入埋伏圈，一声令下，大抬杆、火枪一齐开火，这一伏就消灭日伪军20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多支，并打坏了一只汽船。据点里鬼子官们被吓坏了，连连说：“扫帚炮的厉害……”

邱芝科想：这支水上游击队，活跃在芦苇塘中，打鬼子包运船，端敌人炮楼，除汉奸特务，袭击日伪军据点，斗争也同样光荣、艰难。从此，他投入雁翎队里，主动担任教员，教大家练习射击、战术动作。

1941年的夏天到了。日伪军六路“扫荡”冀中地区。千里堤上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大淀里日军汽艇横冲直撞。雁翎队员纷纷请战。一天，侦察员驾小船来报告：昨天上午，有10多个鬼子、20多伪军，乘两只汽艇去淀东赵

北口，下午3点多返回。区委书记张希平要我们雁翎队和三区小队合着打个伏击，挫挫敌人的锐气……”

第二天中午，王家寨和大张庄一带的芦苇丛像往常一样寂静，谁也看不出雁翎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荷花叶下，芦苇丛中。

下午3点多钟，敌人的汽船冒着黑烟，从远处驶来，渐渐进入队员的射程之内。郑少臣喝一声“打！”邱芝科手中的马步枪响了，“砰”的一声，扶舵的敌人倒在舵旁。紧接着，20多条大抬杆以及火枪、步枪同时天崩地裂般吼叫起来，火光映红了淀水。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汽船在水里直打转。30多个敌人被打死打伤20多人，剩下的几个敌人拼命操纵船企图逃跑。

汽船上一个负伤的鬼子拼命开起破船，向新安镇方向逃去。邱芝科大吼一声：“追！”率先划着小船，向汽船追去。追出不远，郑队长喊道：“东边有汽船声，鬼子增援的汽艇来了，撤！”邱芝科侧耳一听，果然汽船声越来越远，他一挥手：“往莲花淀里转移！”这时，敌人船头上的两挺机枪怪叫着，子弹像雨点般打来。邱芝科和几个队员迅速将小般划入荷叶丛中，用脚把船蹬翻，将枪和船沉入水底，然后每人头顶一片大荷叶，踩水向远处游去，钻进茂密的苇丛中。

敌人用火将这一带封锁，又从新安、赵北口调来几十只船，将这里包围、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日军头目龟本奇怪他说：“这些八路上天钻地了不成？”

1942年“五一”，敌人对冀中举行大“扫荡”，白洋淀军民处于最艰难的时期。鬼子、伪军大量增兵，几乎天天对白洋淀“清剿”“蚕食”，大部分村庄都建起炮楼，抗日力量受到很大损失，雁翎队又由百十人减到十几个人。因为环境恶劣，有时在芦苇丛中一躲好几天，全靠老乡送吃的，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风声很紧时，群众出不来，队员们还要靠吃藕块、嚼苇根过日子。睡的是船板，没有被子，要铺地盖天枕苇把子，日子非常难捱。可邱芝科照样高高兴兴，对大家说：“咱们咬着牙，也要坚持下去，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闹腾不了多长时间。”

11月的一天，雁翎队秘密转移到了安新李庄，在那里悄悄驻下来。第二天上午，邱芝科正和队员们擦枪，忽听不远处“砰、砰、砰”响了几枪，原来郑队长带两个队员在村公所堵住两个特务，正在对打。邱芝科一挥手：“快去支援！”

雁翎队员包围了村公所，打死了两个特务。这时，村边炮楼上鸣了几枪，这表明伪军要下来抓人。郑少臣叫邱芝科带几个人去阻击。

邱芝科带着两个队员，迅速向炮楼方向跑去。刚跑进一个胡同，不料迎面遇见伪军的自行车队，大概有十几个人，邱芝科伸手一枪，一个伪军应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另一个队员也开枪打倒一个伪军。其他伪军一看情况不妙，吓得掉转车把往回鼠窜。

这时，郑队长那边已结束战斗，邱芝科带着缴获的两辆自行车与他们会合一起，划着小船，迅速离开了安新李庄。待日伪军纠集大批人马来包围时，他们早已消失在水天一色的远方。

1943年春天，抗日军民开始在各个战场进行反攻。盘踞在白洋淀地区的日伪军，在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下，不得不缩进新安、赵北口等据点。邱芝科和雁翎队的战友们一面加紧政治攻势，发动伪军家属和亲友给伪军写信，劝他们反正到八路军来；一面加紧武装活动，先后除掉了群众称之为“三害”

的伪军中队长韩恩荣等伪军头子，袭击了赵北口伪合作社……雁翎队神出鬼没，威震八方，伪军官兵胆颤心惊，而白洋淀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不少青年人积极要求参军。夏天，雁翎队发展到100余人，编为3个排，邱芝科任二排长。

八月间，雁翎队按县委指示，去攻打大淀头据点。那是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他们驾着十几只小船在大淀头村靠了岸。然后兵分两路，摸进敌人占据的朱家大院，抓了哨兵，打开大门，按计划分头歼敌。邱芝科带着两个班20多人直扑东厢房，三排长李贵带人奔北房，赵波、李向其、张牛等人到西厢房去收拾伪中队长胡风才。几乎是同时：伪军的房门被踹开，枪口对准了从睡梦中惊醒的伪军。有的伪军在被窝里就举起了手。胡风才也赶忙举起双手：“我不动，我缴枪。”

天没亮，战斗结束，俘伪军150多人，缴获长枪140多支，手枪2支，子弹20多箱。此后，邱芝科和雁翎队的战友们，又一起先后拔掉30多个炮楼据点，有力地改变了白洋淀地区的敌我态势。

1943年9月，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为了加紧对太行抗日根据地“扫荡”，除了加强平汉线的运输外，天津至保定的水路运输也开始了。

9月19日，天津日军租了100多只货船，组成包运队，满载军火沿大清河运到白洋淀赵北口码头，准备再由安新日伪军护航到保定，用以支援同八路军正规部队作战的日军。

上级指示：一定要截注敌人的军火。雁翎队接到命令，立刻派出侦察员侦察，发动“内线”获取情报。很快，敌情搞清了：敌人9月21日凌晨出发，沿大清河去保定。押包运船的是伪军河防大队120多人和日军17人，分乘3条船在后押送，第一条船上有一挺轻机枪……

雁翎队立刻召集排以上干部进行了研究。邱芝科主动请缨，要求打第一条船。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半夜，雁翎队的船队飞驰，五更时分进入伏击水域——王家寨东的横埝苇塘。

天放亮，敌人船队开过来了。前面是100多条包运船，接着是3只押运船。敌人第一只船刚一转弯，郑队长对准船桅上筐里的哨兵，“叭”地一枪，敌哨兵栽下来。枪声就是命令，邱芝科和全排一齐向第一条船开火。其它排的同志分别向第二条、第三条船开了火。敌人被打懵了，有的掉进淀里，有的往舱里钻，有的企图抵抗……邱芝科大吼一声：“不能让敌船跑掉！”冲出苇地，一个猛子向敌船扎去。其他队员也纷纷挂着手榴弹，叼着大刀，扎猛子朝敌船游去。

邱芝科潜到离敌船十几米时浮出水面，睁睛一看，船帮上有个伪军正架机枪。他眼尖手快，从脖下的兜里掏出手榴弹，一扬手就扔了出去，“轰”的一声，敌机枪手被掀了个跟头。他泅到敌船边，抓住船帮一纵上去半个身子，伸手就要抓敌机枪；这时，敌人第三条船上的重机枪响了，一颗子弹打中邱芝科头部，他用力往前伸伸手，想抓住机枪，但再也没有力量了，身子一滑，溜到淀里……后面的同志托住他送上岸。经过一小时战斗，全部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所有物资。而大家亲爱的邱芝科排长，安详地躺在白洋淀千里堤上……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明撰写）

忠勇为党炳千秋 ——记符竹庭烈士

江苏省赣榆县境内，巍峨的抗日山（原名马鞍山）烈士陵园内，有一座六角形烈士墓令人注目。墓碑前挺立的铜质烈士头像，气宇轩昂，光彩照人。他就是抗日战争中光荣殉国的原滨海区党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符竹庭烈士。

符竹庭，原名符宗仔，1910年出生于江西省广昌县头陂镇边界村。家境贫寒，父母去世，靠祖母帮人做针线活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1924年秋，符竹庭便进了一家布店当学徒。1927年秋，参加了游击队，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了工农红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任交通员，因作战勇敢，多次获得嘉奖，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担任江西红军独立二团大队政治委员。1930年10月，调任红三军特务团政治委员。1931年，先后任红三军七师十九团政治委员、二十一团政治委员。1933年6月，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十分重视对共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他常说：“没有坚强的党性，就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所带领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都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带动整个部队能攻善守，敢打硬仗。在第五次反“围剿”雪山漳、猫嘴峰守备战中，符竹庭率一师一团，打退了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该团“顽强守备”的荣誉称号。1934年2月，他亲自率领部队在黎川县三岬嶂与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师激战3日，打退敌之多次进攻。1934年8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在授奖事由中写道：“在五次战役中，一团担负着数次的重大守备任务，该员有时虽在病中，但受领任务时能以身作则，不怕艰难困苦地亲临阵地，坚决领导全体战士完成其任务……”

1934年9月，符竹庭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红二师是先头部队之一。符竹庭同其他领导一起率领部队，风餐露宿，斩关夺隘，屡建战功。1936年底，入陕北瓦窑堡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高干科学习。1937年5月，晋升为红四军政治部副主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符竹庭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8月间，一一五师奉命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太原火车站上，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不打日军，却到处抢劫骚扰群众的可恶行径，看到东北流亡学生和难民哭诉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恨不得插翅飞越黄河，横刀立马于抗日战场。

部队由太原经原平到达冉庄。上级命令抓紧平型关之战的各项准备。为了打好这一仗，符竹庭在全团大会上作了令人鼓舞的战斗动员：“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人民的子弟兵，要有中国人的骨气。要消灭日本法西斯，打出八路军的威风，为中华民族雪耻，为受苦受难的同胞报仇！”

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打响了。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六八五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设下伏击圈，主攻日军坂垣师团第十一旅团。指战员们浴血奋战，一举歼灭了日军辎重部队1000多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彻底揭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

1938年9月下旬，奉命东征的三四三旅部分部队，在冀鲁边区乐陵县城

与地方部队会师，10月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许世友任副司令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纵队政治部和部分队伍，活动在阳信、惠民、商河一带，运用游击战术，毁公路，拔据点，声东击西，搞得敌人惶惶不安。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诋毁八路军的抗日功勋，妄图赶走八路军。是年10月中旬，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受蒋介石之命，领兵窜至乐陵，造谣惑众，胡说：挺进纵队是“客军”，必须撤离山东。

一次，符竹庭发动群众，以欢迎为名将沈的汽车围住。面对势盖山东的沈鸿烈，符竹庭首先阐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和原则，驳斥了所谓“客军”的谬论。终场时，符竹庭义正辞严地说：“蒋委员长在庐山就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哪里有鬼子，我们就打到哪里，不许打鬼子不行。”

一番掷地有声的演讲，驳得沈鸿烈理屈词穷，十分窘迫。沈鸿烈深知众怒难犯，不得不领着随从灰溜溜地走了。这次斗争，不仅揭露了沈鸿烈的罪恶阴谋，而且对争取国民党杂牌军司令曹振东、宋达民等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日，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底，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盘踞在河北省盐山四区的土顽、县民团孙仲文部，不仅不抗日，还经常骚扰百姓，制造摩擦。挺进纵队曾派津南行署专员杨靖远同孙谈判。不料孙仲文却态度蛮横，无视忠告，竟然要八路军取消挺进纵队番号，并入顽军。为此，上级指示符竹庭率部，对危害抗日的孙部和土顽，务必除之。他同大家研究制订了作战方案，亲率五支队，插入盐山四区中心酥集一带，直捣孙仲文老巢。与此同时，杨靖远率六支队突袭赵村，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孙部顽军，缴获大宗武器弹药，孙仲文也被生擒。随后，符竹庭又率部乘胜歼敌，打垮了冀鲁边区五县联防反动武装，并争取了部分中间势力。至此，冀鲁边区已开辟了津南、鲁北两个专区，所辖的乐陵、盐山、沧县、庆云、新海、无棣、宁津、南皮等15个县相继建立了民主政权，抗日武装也得到空前加强。

1940年4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成立鲁西军区，由第三四三旅兼鲁西军区机关，旅政治委员肖华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旅长杨勇任副司令员，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

1941年春，升任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治委员的符竹庭，奉命率部挥戈东向，进入滨海区。

这时的赣榆、郯城、海州（今东海县）等县，土匪猖獗，伪顽横行，局势混乱不堪。为了打击这帮伪匪，是年3月，符竹庭率领二旅，在山东纵队二旅的配合下，在赣榆发起了青口战役。鏖战4日，歼敌千余，拔除了海头、兴庄、朱都集等8处日伪据点，收复了从青口至柘汪大片沿海地区，并沟通了与华中，胶东等地的联系。

敌人频繁的“扫荡”、“蚕食”，给滨海根据地军需供给带来了极大困难。部队只能以地瓜、穆子、豆饼为主食，还常常吃不饱肚子；天气热了，战士们仍无单衣；武器弹药不足，一时又补充不上。符竹庭为使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符竹庭可没少花费心血。当时，滨海区的食盐购销，全被盐霸垄断。他们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盘剥盐民，从中牟利。符竹庭积极建议，多方协调，成立了滨海区工商管理局，并颁布了包括金融、粮食、食盐在内的管理法规，取缔了盐霸操纵的收购站，调整了食盐销售和税收政策。这些

措施，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奸商，活跃了集市贸易，改善了群众生活，人们无不拍手叫好。

1943年初春，为了配合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军民反“扫荡”，粉碎敌人封锁滨海区的企图，教导二旅奉命攻克防守坚固的郯城敌伪据点。

1月19日晚，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总攻开始了。符竹庭同旅长曾国华率二旅指战员和地方武装，穿过稠密的敌伪哨卡，直扑郯城南关。

南关设有两道城门，城墙高约两丈，壕宽丈余，且工事复杂坚固。他们观察了战地情况，感到强攻不利，决定从敌人火力薄弱的城东南角大炮楼中间地段打开缺口。于是，组织突击队员们用梯子架起浮桥，冒着弹雨炸开了第一道城门。这时，敌人以密集的火力疯狂封锁，致使二旅进攻受阻，部队伤亡加重。下半夜时，凶残的敌人竟施放了毒气，部队只得暂时停止攻击。

在城外一间小屋里，旅部召开了紧急会议。有的同志主张撤退，以免遭敌人内外夹击。一阵沉默后，符竹庭站起来，坚定地对大家说：“撤，当然保险，但攻城计划就会全部落空。我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现在只有集中全部轻重武器，背水一战，突进城去，夺取胜利！”他手一扬，激昂地说：“我的意见，坚决打！”关键时刻，符竹庭的意见被采纳了。

黎明时分，一道命令传到各团。刹那间，所有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海潮般地呼啸起来，密集的弹雨刮风似地倾向敌人城头，只见突击队员乘着弥漫的烟雾，竖起云梯，爬上了城头。接着，后续部队冲进城里。敌人见势不妙，急求伪县政府增兵解围。符竹庭立即命令爆破组炸开了伪县政府的院墙，伪军和伪政府人员惊恐万状，哭爹喊娘，纷纷举起双手缴械投降。此战，创造了我军在敌占区以攻坚战夺取城池的辉煌战例，攻克敌据点18处，共毙、伤日伪军400余名，俘敌伪军600余名，日军7名，并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和生活用品。暗无天日的郯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3年3月18日，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作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4月下旬，中共滨海地委改称中共滨海区委，由原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一部、教导五旅和山东纵队二旅一部合编为滨海军区，撤销教导二旅番号。符竹庭被任命为中共滨海区委书记兼滨海军区政治委员。这年11月20日，他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部队解放了赣榆县城，歼灭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和伪保安队等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打通海（州）青（岛）公路，“蚕食”滨海根据地的计划。11月22日，滨海军区部队为避敌锋芒，主动撤离赣榆县城，转移到黑林区旦头乡一带。

11月26日，报复的敌援兵赶到，突然分兵合击滨海军区机关。符竹庭率部队奋勇反击凶恶之敌。突围时，不幸受伤落马。经抢救无效，光荣殉国。

符竹庭牺牲后，滨海军民遵照烈士生前遗愿，将他安葬在巍峨挺峻的抗日山上。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赞扬他是一名军事上、政治上都比较强，有能力的优秀干部。1944年冬，赣榆人民为纪念符竹庭烈士，曾将该县改名为“竹庭县”，并创作了题为《纪念符竹庭》的歌。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刘洪连、赵良撰写）

地道战中显身手 ——记张森林烈士

在冀中平原，有一个叫冉庄的小村，它像冀中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村庄一样，农舍鳞次栉比，老槐树影婆娑；村外是一望无际的庄稼，野花盛开。这个村虽小，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却出了名，冉庄的老人们时常向后代讲传统，讲起地道战，首先提起的就是张森林。

1921年，张森林出生在冉庄一个贫农家里。他在幼年时，只上了一年私塾，后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张森林从小爱听故事，什么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文天祥慷慨就义等，这些历史故事深深印在他脑海中。“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冀中，冉庄西边40里是平汉铁路，东边是保（定）蠡（县）公路，敌人在铁路、公路上都建立了据点，经常出来袭扰。张森林怀着满腔怒火，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春，张森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的第一名党员。不久，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即着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民兵连，抵制日伪军在本村成立村公所和派粮派款，抓夫抓丁，秋天，本村高振福因负伤从部队上复员回来，张森林立即请他当民兵连长，自己兼任指导员。过年前夕，张森林对高振福说：“鬼子不让咱过好年，咱也不能让他们痛快了，得整治他一下。”

高振福一挥粗大的拳头：“行，你说咋办吧？”

“扒铁路，不让鬼子运兵、运物资。”

“行！”

两人组织了十几个民兵，连夜出发，午夜赶到平汉路，棍子撬，大镐刨，将铁轨扒下两根来，扔到河里。此后，张森林和高振福又带着民兵去破坏张（登）保（定）公路，剪割孙庄公路两侧的电话线，弄得敌人不得安宁，黑风日据点的日伪军十分恼怒，几次到冉庄、孙庄、白团等村偷袭，搜查捕人。有一天清晨，敌人包围了冉庄抓他，因他外出开会，幸免于难。张森林回来后听家人一说，便寻思：要是让敌人堵在院里怎么办？凭着自己手里这支独搬枪突围是不容易的……想来想去，灵机一动：挖藏身洞。说干就干，他立刻揭开炕席，打开土坯炕挖洞。挖出的土趁夜暗垫进猪圈里，或打成土坯垒墙。干了七八天，藏身洞挖好了，一伪装还真看不出来。

说也凑巧，藏身洞刚挖好，就有了敌情。张森林便躲入藏身洞，家人赶紧盖上盖，铺上谷秸、炕席，又扔上些被褥。敌人来了，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哪里会想到炕席下有个洞，洞里藏着人。敌人没抓住人，打了张森林父母亲几枪托，骂骂咧咧地走了。张森林躲在又黑又暗的洞里，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但想到自己武器简陋，地势不利，只得强压怒火，捱到敌人离去。

敌人走后，张森林找到民兵连长高振福，商量说：“咱大平原一望无际，咱村子又是个小村，敌人一来，咱们就没法跑，躲都没法躲。依我看，得发动民兵们挖些藏身洞。”

两人商量定，黑夜悄悄地把民兵和党员们召集起来开了个会，布置了挖洞任务，并规定：各家的洞口各自保密，互相之间，不许问，不许说。不久，挖藏身洞逐渐发展到一些基本群众家里。到了1940年秋，全村已挖藏身洞100多个，有的把洞口挖在了水井一侧，有的挖在牲口槽下。这些藏身洞，曾有效地应付了敌人的“扫荡”和偷袭，保存了抗日力量。

1942年的一天，冉庄逢大集，驻耿庄炮楼的日伪军30多人到冉庄抢东西。晌午时，日伪军准备把抢来的东西带回炮楼。民兵李恒木找到张森林说：“咱们准备过年的东西被鬼子抢了，能让他们痛痛快快地走吗？”正说着，被派出去了解情况的民兵回来了，报告了敌人的人数和装备情况。张森林立即率民兵分两路追击刚要出村的敌人。敌人万万没想到屁股后面突然响起枪声和爆炸声，慌忙扔下抢到手的东西逃命。这次追击，击伤敌人4名。当被抢的东西送归原主时，全村一片欢腾。这次战斗，揭开了冉庄人民利用村落武装对抗日伪军的序幕。冉庄抗日武装正式向外宣布：冉庄不成立维持会，不交粮交款，不为日伪军派夫。10月，本县任王力村发生了一起事件：任王力村也挖了不少藏身洞。一天，敌人在特务带领下包围了村子，从隐藏洞里抓走了县委书记苏冀，二区区委书记苏丙川、区长刘起等9人。这段时间，各村都有藏身洞的事儿被敌人发现。张森林经过思考，和党支部其他成员商量后，挖双口洞的活动，很快在民兵和群众中秘密展开。经过一段时间，很多单口洞改成了双口洞，还有的洞口直通村边，道沟，河岸。这样，形成了地道的雏形。

到1942年11月，地里的庄稼都放倒了，抗日军民的活动范围愈发缩小。敌人加紧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张森林感到，现在的地道只能防，不能打，躲来躲去，迟早要吃亏。他同村干部和民兵连干部商定，由村政权出面，发动全村老少修筑能藏能打的地道，开展地道战，坚决粉碎敌人的“蚕食”进攻。

在张森林、村干部和民兵连的带动下，冉庄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筑地道的群众运动。全村群众不顾天寒地冻，昼夜不停，在沟通原有隐蔽洞的基础上，完成了主要干线四五里长的地道。由于宣传组织工作做得好，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发动起来了，还互相展开了竞赛，看谁挖得快，质量高。妇救会主任李桂芬动员青年妇女20多人参加挖地道，她们和男人一样猫着腰，钻进洞里干，从李银虎家胡同一直挖到大街上的双庙工事。儿童团员们也上了阵，用小筐提土，在外面放哨。主要干线完成后，根据作战需要，借助过去的地道做基础，进行沟通、扩展，又顺东西街方向延伸支线11条，这些支线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联村地道，向东通隋家坟，向西通河坡，全长约30里。

“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大家集思广益，又在地道内设立油灯和指挥路牌；在十字街总指挥部北边三岔口设了陷阱，把中间带有活动圆轴的反板盖住井口，如敌人冒然下洞走到上边，立刻翻下去。地道与附近水井沟通，既可作气眼，又可以取水；总指挥部附近有储粮室、休息室、厨房、厕所等。而地道的出口，则设在不易被敌人发觉的隐蔽处，如屋内墙根壁、牲口槽、风箱下、炕面、锅台处。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全村重要路口先后修起了工事、地堡、观察点、暗室及墙角枪眼，各工事都与地道相通，既能观察敌情，又能冷枪杀敌。工事周围还埋有地雷，引线通入地道，拉雷非常方便。这样一来，冉庄的工事就具备了三通（高房、院墙、地道相通）、三交叉（高房、地堡、墙壁火力交叉）、四好（好打、好钻、好藏、好跑）的优点，使村落战、地道战、地雷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地上地下一齐打”的战斗网。为搞好冉庄地道，张森林经常几天几夜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带着几个“能人”挨个对地道进行检查，帮助核对方向，设计伪装；对工事则一一规划，和大家一起干。他说：“别看四处都是鬼子的炮楼，咱冉庄

的红旗不能倒，咱的红旗不倒，这方圆几十里的乡亲就有抗日信心。”

张森林的心血没有白费。

不久，白团据点从保定增兵 500 多人，企图袭击冉庄。冉庄民兵和群众进行了积极的战前准备。这天清晨，敌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冉庄。枪声一响，村民们从容地钻入地道，老弱病残在村干部和民兵的指挥下向外村转移，民兵们则纷纷进入战斗位置。民兵刘大雨和李恒标从十字街进入地道，向东急进，进入村头的五道庙地堡，从枪眼里一看，只见一股敌人已经扒着堵塞尔街口的墙头向村内张望。敌人见没有动静，胆子大起来，有个戴钢盔的鬼子开始爬墙头，刘大雨瞄准戴钢盔的鬼子开了一枪，鬼子应声掉到墙外。敌人向地堡猛烈扫射。刘大雨和李恒标见火力很猛，很快返回地道，敌人对着地堡又是射击，又是扔手榴弹，折腾了好一会儿，见地堡没动静，估计里面的人八成是打死了，鬼子命令几个伪军去刨地堡。伪军正在刨，刘大雨和李恒标又悄悄钻回来，从枪眼向外一看，见穿黄裤子的腿走来走去，赶紧找着地雷绳，用力一拉，“轰隆”一声，地雷爆炸了。敌人扔下几个死尸和伤兵，慌乱地跑开了。

当敌人从村北口、村西口闯进村内时，梁连恒、赵金刚在十字街东北角工事内拉响了地雷，正在老槐树下东张西望的敌人当时就被炸倒三四个；与此同时，民兵李明贵在村十字街西南角拉雷炸死敌人 2 名；民兵高连水在村南大车店门口柜台下拉响地雷炸伤敌人 3 名。敌人本想中午在村里抢些东西做午饭，这时都吓得龟缩在一起不敢动了。午后，张森林率领区小队和附近的民兵前来助战，在村外打冷枪，放鞭炮，呐喊，使村里的敌人胆战心惊，再不敢待下去了，拖着死尸，抬着伤兵，逃出冉庄。

3 个月后，伪绥靖军集团司令齐靖宇伙同伪县长丛殿墀，率领伪绥靖军十六团和一部分日军又来报复。这时，冉庄的地道、工事愈加完善，面对 1000 多强敌和 30 多挺机枪、两门大炮，冉庄民兵充分发挥了地道的优势，将敌人放进村后再打。敌人只见地雷炸，只听子弹飞，不见一个人影。到了下午，敌人越打越怕，终于狼狈逃窜。

张森林领导创建的冉庄地道战，为这一带抗日村民树立了光辉范例，附近很多村子也都开始挖地道；小股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到冉庄附近活动了。他们对张森林恨之入骨，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1943 年秋末，上级来了命令，调张森林任清苑县大队政治委员。临上任前，张森林听说耿庄的敌军工作出了点问题，决定到耿庄，和有关人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傍晚，当张森林正在耿庄一个“堡垒户”家吃饭时，不料被义和庄、段庄、耿庄三个炮楼的敌人包围。当他突围时，腿部负伤被俘，活埋在段庄村南。

冉庄人民凭借地道和仇恨，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用一串串消灭敌人的数字告慰了张森林的忠魂。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金明撰写）

爆炸大王震渤海

——记陈宝凤烈士

陈宝凤爆炸真有名，
他那个爆炸弹渤海都闻名。
武代大会上啊，
追认为英雄，万古留美名。

……

这是当年流传在鲁北清西区抗日根据地的一首民谣。歌中赞颂的陈宝凤，乳名大安子，是山东省高青县寨子乡丁家村人。1925年生，1941年冬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丁家村民兵飞行爆炸组组长。1944年1月在保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是远近闻名的民兵英雄。

1941年腊月的一个晚上，陈宝凤的伙伴陈孝敬来找他，神秘地低声说：“哎，咱老百姓的队伍过来了，杨国夫的三支队派二团常驻在咱们这一带，领头的政委叫李曼村，参谋长叫韩子衡。他们说要在这里组织民兵联防，要建立广北至邹（平）长（山）的交通线，叫‘红色走廊’。咱们苑三区是这条交通线上的咽喉。李政委他们夜里常常到咱村北的寨子村去。”

“咱也去！”宝凤高兴地拉着孝敬就要走。

“别慌！”孝敬说：“你愿意当民兵就行，不一定要到队伍上去。”

“那咋打鬼子？”宝凤急切地问。

孝敬说：“咱三区已建立了三中队，马指导员找过我，让我在咱村组织民兵队，你算一个还不行？”

宝凤明白了：“中，你是当头的，咱听你的。”

从此，陈宝凤走上了抗日的路。

陈宝凤被选派到三支队二团去学习。他在鲁南，在胶东，学习各种地雷的特点、埋法，地形、地物的利用，就连各种不同地雷的重量，他都记得烂熟。正是收麦子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家乡。

“以丁家民兵为主，咱也成立爆炸组，你任组长。”二团政治委员李曼村听了陈宝凤到外地学习的汇报后，郑重地对他说：“眼下敌人搞‘蚕食’，妄图卡断我们的交通线，使我断绝联系。你们三区南北只有七八里长的根据地，又处在交通线要点，正是我们‘红色走廊’交通线上咽喉之地。敌人要在魏家堡安据点、修炮楼，这给我们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你们爆炸组要设法牵制敌人，使魏家堡的炮楼晚修，慢修，修不成。如果修起来，也要炸掉它，确保我们的交通线畅通无阻。”

宝凤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他坚决地表示：“李政委，我明白了，你放心，有我大安子在，魏家堡炮楼修不成，咱们的交通线断不了！”

陈宝凤带上地雷，回到丁家村，找到陈孝敬，把民兵叫齐，传达上级的指示。大家都很高兴，决定连夜埋雷，炸掉日军的运粮汽车，打响头一仗。

天刚破晓，宝凤的爆炸组已经在高城通往魏家堡的碎石公路上挖了条一人多深、五尺多宽的沟，埋了6个地雷。当太阳一竿子高时，从南边驶来一辆运料的汽车，车上坐着日军、伪军各3人，载着满满的一车木头。汽车来到魏家堡北，刚要往东拐，司机突然发现公路上挖了条大沟，急忙刹车到沟

边观察，“轰隆”一声巨响，尸体飞上了天。母雷一响，汽车跟前的子雷也响了。轰隆隆连声爆炸，日军和伪军随着木料车飞了起来，又重重地甩在路旁的深沟里，汽车和木料着了火，押车的6个敌人当场死了4人，剩下的两个往高城跑去。

胜利和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爆炸组的全体民兵。陈宝凤严肃地说：“这次鬼子吃了亏，必定会来报复。我们要针对敌人活动的规律，再狠狠地给他一下子！”大伙一合计，当天夜里又在公路两侧的一个破窑是埋下了子母连环雷。

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出动了。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两个小队，从高城沿着公路往魏家堡扑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扑到了破窑前。日军小队队长习惯地跳下洋马，走上窑顶，举起望远镜四下搜寻可疑的目标。两个伪军小队队长也跟着上了破窑。日军小队队长正在四下观望时，突然“轰隆”一声响，不知谁踩响了母雷，紧跟着窑上的子雷也响了，日军小队队长和一个伪军小队队长都被炸飞了，23个敌人死伤近半，剩下的残敌慌忙抬着尸体往高城逃去。

陈宝凤和战友们又研究了下一步的计划。他们分析，敌人连吃两次亏，当天不会出来活动。于是便在当天夜里带着地雷，来到魏家堡修炮楼用的木料场前。

快到半夜了，天黑得像锅底一般，村里除了时而传出狗叫声外，没有一点动静。木料场由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小队看守。敌人用层层铁丝网把木料场封住，又在旁边盖了岗棚，认为“万无一失”，放松警戒，在屋里呼呼地睡大觉。

大家在木料场外观察了一会儿，宝凤便带上嘉吉、嘉兴，悄悄摸到木料堆下，挖了坑，埋了3个雷，又往木头上浇些煤油，划了根火柴一扔，大火着起来，守护木料的值班敌人，从睡梦中被惊醒，赶忙鸣枪报警。其他敌人提着水来救火，慌手慌脚地一拥，“轰”地一声响，3个日本倒下了，剩下的再也不敢往前凑，眼睁睁地看着木料被烧光。

眼看着魏家堡的炮楼一天天高起来，陈宝凤焦急得火烧火燎。夜里，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不吸烟的人，也拿起了旱烟袋，刚抽一口，便呛得直咳嗽。他几夜没睡好觉。眼睛布满了血丝，眼皮也有点红肿了。这天中午，娘喊他吃饭，他心不在焉地往凳子上一坐，一下子坐歪了，摔了个跟头。他从地上爬起来，猛然悟出了一点道理，顺手拿起筷子，在碗沿上压来压去……

一种试制夹子二起雷炸敌人的方案，考虑成熟了。他找来了皮条和竹子，很快制成了二起雷，在高城据点的敌人出来抢粮前，在公路上埋了这种地雷。

龟田学了酋野的办法，5头牲口拖着碌碡和平整土地用的一种农具，呼呼隆隆从南往北扫来。敌人见一路没有地雷爆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突然二起雷爆炸了，几个日伪军肚子开了花，脑袋搬了家。敌人四处狂奔，牲口、车辆横冲直撞，又触发了沟边、路旁的连环雷，刹那间雷声四起，把敌人炸得稀里哗啦，龟田捂着炸伤的左眼，猛踢马肚，带着几个残兵往据点逃去。这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扫荡”了。

“鬼子不出门，咱把他请出来！”宝凤向战友们提出了自己的新打算。

这天擦黑，嘉兴、孝敬二人拿着枪，提着桶，悄悄走到离魏家堡不远的抗日沟里隐蔽起来。天黑了，两人朝炮楼里“叭叭”打了几枪。炮楼还未修完，却已驻上了敌人。敌人听到枪声，便用机枪扫射。嘉兴、孝敬照宝凤的

意见，又转到炮楼西面、南面，点着鞭炮放在铁筒里劈里啪啦一个劲儿地响，敌人以为被八路军主力包围了，机枪、小炮闹腾了一夜。

这时，宝凤和嘉兴，已经带爆炸组摸到十六里堡村西头的汉奸办公处前。这里离高城7里，离魏家堡8里，敌人路过这里时总要休息休息。办公处的汉奸白天在这里值班，夜里都回家。宝凤和嘉兴跳墙进院里，见此屋门上挂着一把牛鼻子锁，嘉兴搬起石头正要砸，宝凤忙说：“慢，咱不能留下痕迹。”他轻轻一推门，门扇错开，把手伸进门缝里，使劲往上一端，把一扇门卸下来。进屋后，宝凤打量了一下屋里的陈设，便把两个地雷埋在办公室椅子的跟前。

魏家堡的敌人打了一夜枪炮，弹药差不多打光了。第二天一大早，高城据点里两个小队的日军赶忙扛着子弹箱往魏家堡送去。他们来到十六里堡，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便进汉奸办公处的屋里休息。两个日军小队队长走到椅子的跟前，霎时，两个地雷一起响，子弹箱也跟着爆炸，连屋顶都炸飞了，20多个日军死伤大半。

转眼到了1944年1月。陈宝凤经过几次大的飞行爆炸，搞得敌人坐卧不宁，心神不安。敌人挖空心思，四处侦察搜捕陈宝凤。

陈宝凤得知这个消息后说：“我每天要埋雷三到五处，一定叫他们有来无回！”可是，连续一个月艰苦紧张的战斗、劳累，病魔向这个铁汉子袭来。

这天晚上，宝凤和区中队驻在谢家庄。连续高烧5天的陈宝凤在夜深人静时对陈嘉兴、陈孝敬说：“走，到魏家堡去，给敌人送点礼。”嘉兴、孝敬劝他：“你的病还没好，待一两天再去吧。”宝凤一拍大腿说：“咱又不是泥捏的，能顶得住，走！”

到了魏家堡炮楼下，宝凤对嘉兴、孝敬说：“我看咱把‘西瓜’埋到吊桥头上，等明早敌人一出来，给他个窝里炸。”说罢，提起地雷便要走。嘉兴、孝敬拦住他：“不，这次你光看着我们就行了。”宝凤说：“我是党员，还是我去，你们做好警戒。”说完，迅速摸到敌人吊桥边，放下“万宝囊”，取出小锹开始挖坑。寒冬腊月，地冻得棒硬，在敌人眼皮底下埋雷，又不能弄出响声。他吃力地一下一下地挖着，终于挖好了坑，放上雷，盖上土……突然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直冒金星，猛地歪倒在地。就在这同时，地雷爆炸了，年仅18岁的陈宝凤，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宝凤牺牲后，渤海军区领导机关授予他“民兵英雄”、“特等爆炸大王”荣誉称号；他所领导的爆炸队被命名为“大安子爆炸队”。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明科、春禄撰写）

回民支队垂青史 ——记马本斋烈士

河北省献县东辛庄是冀中平原上一个有 700 多户回族农民聚居的村庄。马本斋 1902 年出生在这里。他上了两年多的私塾，在张家口一家饭馆当了 3 年学徒，以后又到内蒙多伦替牧主放马。1921 年流落到东北，参加了东北军。先当了 3 年兵，后被送进东北“讲武堂”学习，期满后任排长，随奉军入关，相继提升为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目睹日寇在关外的暴行，目睹东北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亡国奴”生活惨景，愤然要求率部抗日，遭到上司“攘外必先安内”的训令的拒绝。马本斋感慨良多，夜不能眠。1932 年 10 月，他毅然弃官离队，回到久别的故乡。回家后，他奋笔疾书：

风云多变山河愁，
雁叫霜天又一秋。
男儿空有凌云志，
不尽苍江付东流。

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 月间，日寇的铁蹄踏到了马本斋的家乡。一天，日军在东辛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马本斋眼看着被敌人践踏的村庄，心如刀绞。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唤他：

“二哥，出事啦！”这是三弟马进坡的声音。

“怎么啦！”他猛然怔住。

“咱大哥和许多乡亲，让鬼子当活靶子打死啦！”

马本斋撒腿向村东跑去。面对倒在血泊中的一具具亲人的尸体，他望着大伙，斩钉截铁地喊道：“血债要用血来还！”

1937 年 8 月 30 日上午，东辛庄的清真寺里，锣鼓喧天，笙笛齐奏，男女老少，蜂拥而来。马本斋走上大殿台阶。阳光下，他浓眉亮眼，高鼻梁，厚嘴唇，脸膛枣红；身穿粗布裤褂，头罩羊肚子手巾，袖挽过时。他挥动两支粗壮有力的大手，高声说道：“乡亲们！日本鬼子想消灭咱们中华民族，灭绝人性，无恶不作。咱们要活下去，要抱起团儿跟鬼子干！愿意跟我马本斋拉队伍、打日本的，到那边报名去！”他手指着东墙边，顺着他指的方向，东墙根忽啦啦站起了一溜青壮汉子：“我报名！”“我参加！”“我愿同本斋哥一起打鬼子！”喊声、叫声在清真寺里回荡。

接着，马本斋把他从东北军带回来的一把匣子枪亮出来。报名的小伙子们，也把家中珍藏多年的长矛、单刀、拐子、流星、火枪拿出来了。马本斋集合队伍宣布：“咱们按回族的规矩，向真主宣誓！”众人“哗”地一声跪倒在地，齐声宣誓：“国难当头，日寇杀我父老，穆斯林大义大勇，为国为民，讨还血债，报仇雪恨，死而无怨！”由 70 名回族兄弟组成的回民义勇队从此成立了，马本斋是带头人。

深秋的一天早晨，日军驻河间的三本联队，有一辆军用卡车，明天拂晓要往沧州方向开。马本斋听到消息高兴极了。第二天早晨，当敌人汽车拐入两边长满灌木林的路面时，埋伏好的回民义勇队员们一跃而出，向汽车冲去，用大刀长矛狠砍猛扎，一举消灭了车上的 6 名敌人，缴获“三八”大盖 18

支，盒子枪 5 支，子弹几百发，手榴弹几十枚。

马本斋又带领队员们将前清时期淹没在子牙河里的一口千斤大钟打捞起来，造了 16 支火枪，20 门“大抬杆儿”（土炮）。这种“大抬杆儿”，在日寇的《东亚圣战》报上被称为“扫地炮”。炮长一丈多，炮口如大茶杯，里面装满火药、铁砂子、碎铁片。点火后，铁砂、铁片随火舌喷出，硝烟弥漫，声震如雷，覆盖一片，在近距离有很大杀伤力。

一天，驻在东辛庄下游 20 里沙河镇的日军，汉奸 50 多人乘汽艇向东辛庄开来。马本斋盯着鬼子进入伏击火力网内，喊声“打！”“大抬杆儿”一齐轰鸣，敌人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消灭了。

日军联队长山本气得吐哇直叫，意欲报复。1938 年春，日寇万余众向冀中平原进行残酷“扫荡”。马本斋率回民义勇军守卫村庄，浴血苦战，抗击 200 多日寇的进攻。但由于人少力单，被围困在苇塘中，陷入绝境，多亏八路军某团政治处主任郭陆顺率部来援，才得以脱险。他想，今后要开展更大规模的抗日斗争，靠我们单枪匹马恐怕不行。眼下，在冀中声名最响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跟他们走是正道。他派出人员去寻找共产党、八路军。

1938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冀中回民抗日建国会主任刘文正来到东辛庄，马本斋拍手欢迎。接着，他率部开到河间县城，正式参加了八路军，改称回民教导队，马本斋被任命为队长，全队 200 多人，7 月，又与安平县的另一支回民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被任命为总队长，全总队 500 余人。

马本斋带领这支回民武装，活动在河间、献县、青县、沧州一带，在 3 个月中，作战 30 多次，打死打伤日伪军 500 多人；破路战斗 70 余次，颠覆鬼子军车 20 余列。回民弟兄闻讯响应，回民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 1500 多人。1938 年 10 月，马本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 年 7 月，党中央决定将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改名为八路军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任政治委员。马本斋与郭陆顺亲密合作，带领回民支队，开辟了无极、藁城抗日根据地，收复了白洋淀周围大片失地，打遍了整个冀中平原。1940 年春，他又奉命打入深县南部。

深南地区南面是沧（州）石（家庄）公路，西面是平汉铁路，成为联结冀、晋、鲁、豫广大地区的枢纽，是日寇侵华战争的战略要地。原在此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南下执行任务去了，驻此地区的日寇猖獗起来。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回民支队这支劲旅，以闪电之势，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到了深南地区。

一天早上 7 点钟，敌人发现衡水与安家村的电话线被掐断，估计康庄一带有八路军部队活动，派出 100 多日本鬼子和 200 多伪军，向康庄方向进行拉网“扫荡”。

敌人冲到距康庄 200 米远时，突然，鬼子的战马惨叫起来，纷纷四蹄腾空，乱蹦乱跳，倒在地上断了气儿。一看马肚子，不知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个血洞。鬼子目瞪口呆，惊慌失措，还没见到八路军人影，不少鬼子已被摔伤，或被惊马踩死，一下子乱了营。

这是马司令的计中计。他预先布置三中队 4 个班，上好刺刀，埋伏在交通沟里，敌人马队一过，便给马肚子来个刺刀见红。

马本斋趁敌人惊魂未定，把手一挥“上！”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回民支队健儿们迅速将敌人团团围住。刀光闪闪，短兵相接，肉搏战才几个

回合，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100多鬼子，只有一个活着逃了出去。

1941年夏，回民支队奉命东进，再次回到子牙河两岸。他们一会儿出入于青纱帐里伏击敌人；一会儿又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出其不意地送鬼子回“老家”；一会儿则大摆迷魂阵、推磨阵、麻雀阵，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临死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他们围景和，拿佛庄，打泊镇，攻大城，作战27次，再次歼敌500余人。敌人曾集结4000多人，对子牙河三角地带反复“扫荡”，回民支队战斗一个半月，把敌人弄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乖乖地撤回去。

日本联队长山本不服输，气急败坏地给马本斋写了恫吓信：“有你马本斋就没有我山本；有我山本就没有你马本斋……。”马本斋针锋相对，回敬他一封信说：“有你山本就没我马本斋；有我马本斋，就没你山本……”

狡黠的敌人用武力不能战胜马本斋，便抓马本斋亲属作人质，逼降马本斋。他们派出一批批特务，到东辛庄侦察马本斋母亲及爱人、孩子的行踪。

1941年农历七月初五的早晨，东方初露曙光，日军和伪军500多人，从河间、献县、沙河镇出发，分三路包围了东辛庄。一部分群众来不及转移，被围在村里。敌人一进村，就直奔马本斋家，屋内空无一人。敌军把来不及转移的乡亲赶到清真寺里。然后通过汉奸传话，说是特来请马老太太进城，要大家说出马老太太在什么地方，“金票子大大的有”。乡亲们个个横眉冷对，缄口不言。

日本鬼子残忍地把一个一个乡亲拉出来拷问，当场拷问打死了三名群众。马老太太不顾个人安危生死，挺身而出，保护了群众。敌人将马老太太拉到河间城，威逼她写信给本斋劝降，马老太太严词痛斥日寇，后绝食7日而牺牲。

1942年初夏，日本鬼子对冀中地区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带领回民支队跳出包围圈，奉命转移到范（县）观（城）濮（阳）地区，战斗在鲁西抗日根据地，配合山东根据地军民，取得了1943年夏季战役的重大胜利。这年秋天，回民支队又参加了冀鲁豫军区为粉碎敌人“蚕食”政策而发起的八公桥战斗。

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不幸，1944年春天他脖子后面长毒疮，手术无效，病情恶化，随部队转移到山东莘县张鲁集，与世长辞了……

1944年3月17日，党中央在延安隆重召开马本斋烈士追悼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叶剑英参谋长致悼词。

毛泽东主席挥笔疾书：

“马本斋同志不死！”

周恩来副主席郑重题词：

“民族英雄，吾党战士！”

朱德总司令挥泪撰挽联：

“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刘贤齐撰写）

英雄血染大泉山 ——记何万祥烈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广为流传着《我们的连长何万祥》这样一首歌曲：

我们记得在西北高原上，
你离别了你的牛羊，
走进毛泽东队伍，
从此一生在战场。
革命是你的家。
党把你养成了英雄榜样。
还记得黄河激流里，
你射击在小船上，
穿过千军万马般波涛，
虎一样地冲到吕梁山岗。
……
你这战士的旗帜，
不幸牺牲在大泉山上。
可是你永远活在咱心上，
我们的连长啊何万祥！

何万祥 1931 年出生于甘肃省东部宁县。他 16 岁时投奔陕甘边的红军，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二月，何万祥所在部队东渡黄河东征。他参加突击队，抢渡黄河成功了。上级赞扬突击队的勇敢精神，称赞何万祥是“渡河英雄”。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万祥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队伍很快到达晋西抗日战场。一天，何万祥所在连队同敌人争夺山头。眼看山头就要被敌人占领，情势十分危急！上级要求立即对敌人发起攻击。只见何万祥带领一班战士跳出阵地，迅速向山顶冲击。敌人被何万祥他们一阵手榴弹打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何万祥带领战友冲上山头，紧接着又是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遭到致命的一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八路军很快占领了山头。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何万祥立了大功！”大家看何万祥时，只见他手中有一大束手榴弹弦。

1940 年 1 月，何万祥在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二连当连长。这年 2 月，何万祥随部队来到山东滨海根据地。这一带，人民经常遭受日伪军的抢掠，生活非常艰难，部队天天吃地瓜干。眼看春节就要到了，侦察员跑来报告：日本鬼子抢了大批肥猪，在乔町集中了五六百头，准备明天从阿湖车站装火车运走。乔町，是陇海路北的一个小庄子，驻有一个翻译官和 20 多个伪军。庄子当中十字街口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大炮楼，伪军们据守在炮楼里。团首长决定何万祥带领二连去打掉炮楼，把肥猪抢回来给老乡过个好年。夜黑得很，何万祥带连队赶到乔町。战士们靠据点围墙搭人梯跳了进去。突然一颗照明弹打上天空，这是伪军给阿湖据点的日军发出的求援信号。何万祥一面布置

火力压制炮楼上的敌人，一边组织战士登木梯爬到炮楼两个枪眼之间利用死角喊话。

炮楼里的伪军负隅顽抗，拖延时间，像是等阿湖鬼子赶来增援。何万祥火了，拔出腰间的手榴弹，顺枪眼向炮楼里接连塞进几颗。翻译官被炸死，几个伪军被炸伤，其余的敌人乖乖地缴枪投降。

何万祥带领战士们冲进去，收缴了敌人的武器，赶着 500 多头肥猪和俘虏的伪军向根据地撤去。前后不到 20 分钟，便结束了这场战斗。阿湖的鬼子赶到乔町时，何万祥他们早已离去。鬼子胡乱地放了一阵枪，悻悻离去。

1943 年 1 月 16 日，山东军区决定由何万祥所在的教导二旅趁敌人倾巢出犯，后方空虚之机，远距离奔袭郟城，歼灭守城敌人，19 日深夜，部队经过 40 公里急行军，突破敌人封锁线，直逼郟城。六团先机抢占南关，猛扑到南关城门下。20 日上午，南城门之敌向城里败退，北城墙也被八路军突破。城内日军龟缩在两座炮楼内顽抗。这时，驻守在离郟城 9 公里的马头镇的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 400 余人，向郟城扑来，企图解围。

何万祥接受了阻击敌人援兵的任务后，带领全连战士跑步出城，选择有利地形，构筑阵地，严阵以待。他对战士们说：“城里只剩下炮楼了，我们要死守住这里，不让敌人靠近郟城一步，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城里敌人！”

敌人离他们只有几十米远时，何万祥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队形大乱，狼狈地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敌人再次组织冲锋，先是用炮轰一阵，接着“哇哇”叫着冲了上来。何万祥率领几十名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沉着应战，从早到晚，敌人组织了 4 次冲锋，始终不能靠前一步。直到郟城内的炮楼被炸毁，城楼上日本旗没了踪影，敌人援兵才气急败坏地退回马头镇。

石沟崖是莒县与日照县之间的一个山庄。这个庄子坐落在一片山凹里，地势十分险要。鬼子在这里设了据点，构筑了坚固工事。

1944 年 1 月底，八路军滨海军区指挥部决定拔掉石沟崖这个钉子。任务下达后，几个连队先后攻击都未能得手。第 3 天，何万祥接受了由东南角突入围子的命令，他带领连队迅速赶到了冲锋出发地。

双方炮火在不到 50 米宽的地带展开了轰击，迫击炮、掷弹筒、重机枪、轻机枪一齐开火。几个战士利用烟雾作掩护，刚冲到外壕前，就被一阵枪弹打倒。

过了几分钟，又有几个战士跳进去了，还是不见爬上沟沿。何万祥一看急红了眼，身上往上一跃，冲进了壕内。八班的战士们紧跟着连长跳进了壕沟。何万祥跳进壕底站定，看清了壕沿。突然一枚冒着白烟的手榴弹落到他的脚边。他用力一脚，踢出十几米远。他紧紧贴在两个掩体工事当中的积土上，躲开敌人的射击。八班战士照他的样子也做好了准备，这时，何万祥敏捷地举起驳壳枪，看准掩体枪眼就是一枪，紧接着又甩进去一枚手榴弹。掩体内传出一声惨叫，没了动静。何万祥带领战士，往敌人一个个掩体里投弹，一口气占领了几个掩体工事。

敌人坚固的防线被突破了。我后续部队不断地攻入，消灭了敌人。何万祥连在这次攻坚战中贡献很大，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颁发命令，正式批准何万祥为军区战斗英雄，授予甲等奖品。

1944 年 3 月，鲁中军区决定歼灭伪军吴化文部。一营担任歼灭驻在大泉山（今万祥山）吴伪军一个营的任务，伪军在山顶上修有两米高的围墙，内

有三层高的炮楼，外有暗堡，铁丝网。3月25日夜里，开始攻夺大泉山。三连担任主攻，何万祥带领二连在阵地上待命。

战斗打得很残酷。三连迟迟不能攻下敌人据守的围寨。营长命令二连，坚决攻进山顶围寨。何万祥一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三排向大泉山上奔去。在炮火掩护下、何万祥带领部队突到围寨跟前，搭起人梯向围墙上爬去。高排长上去了，何万祥也上去了，跟着上去的是连通信员王进东。3人刚从围墙上落地，敌人的重机枪就地从地堡里扫射过来，突破口被封锁了。

高排长第一个冲上去，想炸掉敌人的重机枪，在离敌人只有5米时，突然中弹倒地。何万祥提起两颗手榴弹，从侧面绕过去直奔地堡，刚跑出几步，从北面炮楼上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喉部，他倒在地上。通信员王进东一看连长倒下了，大喊：“为连长报仇！”全连战士喊着：“消灭敌人！”一鼓作气，拿下了大泉山主峰。敌人除少数逃脱，全部被歼。

为了表彰和纪念何万祥这位英勇善战的连长，山东军区把大泉山缴来的重机枪命名为“何万祥重机枪”，把他生前带领的连队。命名为“何万祥连”。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雷德虎、姚仁隽撰写）

全心全意为人民 ——记张思德烈士

1944年9月8日，是延安金秋季节一个普通而又很不平常的日子。这天清晨、枣园后沟的西山脚下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共中央社会部在这里为一个普通士兵——张思德同志举行追悼大会。与会者有枣园机关的干部、学校学员和警卫团的指战员。简朴庄重的追悼大会开始了。毛泽东主席缓步登上会场的土墩，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作为对张思德同志的纪念和哀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一位普通战士，为何得到党的高度赞扬，成为亿万军民学习的楷模？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回溯，看看他成长的足迹吧！

1915年农历三月初六这天，是谷雨节，四川仪陇县六合乡韩家湾的佃农张行品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妈妈望着这个瘦弱孩子，给他取名“谷娃子”。谷娃子生下才7个月，妈妈就连病带累，含泪离开了人间。临死前，她把谷娃子托给了他的叔叔张行忠和婶娘刘光友收养。大哥给地主干活，累死在水田里；二哥沿街乞讨，饿死在猪市场的戏台旁；生父张行品外出谋生，流落他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谷娃子很小就下地干活了。养母上坡种豆，他跟在后边点种；养母下田割谷，他跟在后边捡穗。七八岁，正是上学念书的年纪，可他却成了割草、挖菜的劳力。尽管养父母终日辛苦，一家人仍然难得过上温饱的日子。

1933年中秋，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二师部队开到了六合场，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六合乡苏维埃政府。六合场的青年后生们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平时在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查奸防特的少先队副队长谷娃子，头一回向红军干部郑重地说出自己的大名——张思德。从此，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增添了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

张思德入伍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明白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心胸开阔了，斗志更旺了。不久，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1933年至1934年粉碎国民党对川陕根据地的两次大规模围攻的战斗中，张思德英勇杀敌，屡立战功，被战友们称赞为“小老虎”。在攻打关口梁的战斗中，他参加尖刀班，冒着弹雨枪林，和战友搭成人梯，攀上寨顶，炸开寨门，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接着，他带领6个战友，扼守一个山包，粉碎了敌军两个排的多次进攻。在另一次战斗中，他迎着道道火光，冒着子弹飞鸣，跑进深谷，攀崖绕行，插入敌后，接近敌阵，扔出手榴弹，炸死了敌人，趁着浓烟，扑上高坡，夺来了机枪一挺，然后，他端起机枪，向另外一群敌人猛烈扫射，打得敌人倒地丧魂，又夺来了一挺机枪，他接着高呼一声：“冲啊！”战友们一齐冲上去，歼灭了敌人。他虽负了伤，却满脸笑容。在又一次战斗中，他迎着浓烟烈火，在水田、小兵、深沟里，持续与敌拼搏。子弹打光了，敌人扑上来，他就用手榴弹炸死敌人。后面敌人又上来了，他在田坎上同敌人白刃格斗。一个敌人学枪向他刺来，他猛挥大刀，将枪拨开，一脚把敌人踢进水田里，再在敌人脖子上连砍两刀。接着，又有两个敌人向

他扑过来，他用脚猛击田水，使敌人的头上溅满了水，两眼都迷住了。当敌人急着摇头擦眼时，他用全力扑上去，举起大刀，风快地把他们劈死了。这时，飞来一颗子弹，打伤他的右臂，连长叫他下火线，他倔强地说：“不，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战斗！”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后，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沿草地北上。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当时，张思德在通信营任排长。由于他过去在战斗中曾3次负伤，没有完全康复，加上艰难的长途跋涉转战，体质十分虚弱。但进入草地后，每次有了通信任务，他总是抢先一步，拔腿就走，以便让战友们多休息一会儿。

进入草地半月之后，部队断粮了。首长乘骑的骡马被宰了充饥，战士们的皮带也被煮着吃了。饥饿无情地威胁着张思德和战友们生命。为了战胜困难，走出草地，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寻觅野菜充饥。

一天中午，部队来到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地上。休息号刚刚吹过，张思德就和一位小战士去寻找野菜。当他来到一个死水塘边时，那个小战士惊喜地叫起来：“班长，瞧！水萝卜。”说着，就要弯腰采摘。张思德急忙制止。他抢上前，摘下一片叶子放在嘴里嚼了嚼，味道甜甜的，便又采了一些。

没过一会儿，张思德突然感到肚子疼痛，直想呕吐，接着就吐出一口口清水。他只觉得天旋地转，急忙说：“这草有毒，快告诉大家别采！”话刚说完，他就失去了知觉。小战士着急地大喊：“班长！班长！”

战友们听到喊声，急忙赶来。只见张思德脸色发青，神志昏迷，便知道他中了毒。他们急忙到卫生所，找来解毒药，给张思德服下。过了好一阵，张思德才苏醒过来，战友们都松了一口气。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思德所在部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部队中的老弱病残人员被留下来，编成一个警卫连，负责警卫关中云阳八路军留守处和残废军人医院（即荣誉军人学校）。当时，张思德身体患病，被编入警卫连，任一排三班副班长。

警卫连刚成立那阵，班里好几位同志病重，卧床休息。张思德端吃端喝，像亲兄弟一样侍候患病的同志。晚上站岗，他经常连站两班、让患病的同志多休息一会。他是副班长，负责班里的内务卫生，可他很少命令其他同志做这做那，而是自己动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班里的水用完了，他就去打水；地脏了，他就去扫地。他的手巧，补衣服、打草鞋都很在行，一有空就帮同志们缝缝补补，一天到晚总是闲不住。在班务会上，大家表扬他时，他却说：“我的病轻，多干点没啥。”

1939年春天，云阳的国民党军队背信弃义，开始制造摩擦事件。为了顾全大局，留守处和残废军人医院于秋初开始长途行军、向旬邑土桥一带转移。

有一天行平时，张思德在路边发现了一片马兰草，就用刺刀割下来，捆成一捆，背在身后。晚上宿营后，他就赶着打草鞋，等他一口气打完3双草鞋，已是鸡叫头遍了。第二天，他把这3双草鞋送给鞋子最烂的3位同志穿。留守处和残废军人医院的同志到达土桥之后，天气开始变冷了。为了解决冬季取暖问题，上级决定烧木炭3个月。张思德懂得烧炭技术，于是他和班长带领战士们上山烧木炭。每次炭窑点火后，张思德就守在窑边，累了打一会儿盹，再接着干。等到窑烧好，他的眼睛也熬红了，人也累瘦了。烧炭结束后，他被评为劳动模范，留守处奖给他一条毛巾和一个笔记本。

1940年春天，张思德随警卫连回到了延安。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警卫营担任通信班长，在通信班期间，他去南泥湾开过荒，种过地，也进山

烧过木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秋，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成立中央警备团，吴烈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上级决定张思德由班长改当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到一连二排四班当了战士。四班的班长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年龄也比张思德小，可是张思德很尊重班长，积极完成班长交给的工作，维护班长的威信，帮助班长抓好班上的工作。为此，他受到领导的表扬。

1943年初春，组织选派张思德到毛泽东身边的内卫班当警卫战士。

一次，张思德接受了将毛泽东起草的紧急公文立即送交有关部门的任务，当时雷声隆隆，暴雨倾泻，延河水涨，无法徒涉。怎么办？他说：“就是天上下刀子，河水万丈深，我也要把毛主席的公文送过河去。”于是他手拿一根长绳来到河边，将绳的一头绑在树上，又在绳上套上个环，环上拴细绳，把公文牢牢绑在环上，随后牵着绳子的另一头，跳进了激流。他奋力拼搏，终于过了河，他将绳于拴在树上，然后拉动细绳，把拴在环上的公文拉过来，及时把毛泽东的指示送到了有关部门。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距城有十多里。那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常常要去延安城里开会。毛泽东每次外出，内卫班便跟着他前往。

毛泽东乘坐的黑色轿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赠送的。车身宽大，可以乘坐10个人。车后有一个专供警卫人员站立的踏板。当时国共合作，国统区有很多人到延安参观访问，这些人难免鱼龙混杂。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每次出车时，总是有一个同志站在车后担任警戒，以防万一。

站在车后担任警戒，要比坐在车里辛苦得多。夏天，车后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车后寒风凛冽，冻得手脚发麻。但是大家都把站在车后值勤看成是一种光荣，争着担任警戒。张思德到内卫班后，每逢毛泽东外出，汽车刚一发动，他就站在车后：抢占警戒位置。几乎每次都如此。大家要换他，可无论怎么说，他都不肯，说：“我喜欢冷风吹。”大家对他没有办法。

1943年冬，几场大雪之后，延安的天气非常寒冷。毛泽东外出时，十之八九由张思德担任警戒。内卫班的同志们过意不去，一再要替换他，他执意不肯，还是那句话：“我喜欢冷风吹。”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大举“扫荡”，我根据地日益缩小，陕甘宁边区也处于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封锁之中，财政拮据，粮弹匮乏，形势十分严峻。中共中央、毛主席号召一切机关，学校和部队，必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大搞生产运动，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胜利地度过抗日战争的难关。

1944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中央警卫团为了保证中央机关和部队度过严冬，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到延安北部的安塞去烧木炭。大家都争着要去，领导知道张思德烧过木炭，就指派他带领4位同志去执行这项艰苦任务。

7月的一天，张思德带领警卫战士背着行李，带着锯子、斧头到达安塞石峡峪村。这里傍山依林，只有百十户人家。进山五六里地，就有青冈树林。山中林区的景色美丽，初升的阳光洒在苍翠的青冈林上，泛起绿色的光晕，一簇簇山丹花红得象一团团火。张思德他们扛着锄头跑上跑下，根据山势和青冈林的大小，选择烧炭窑的地点。

为了加快烧炭进度，张思德把同志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挖炭窑，一组

砍伐青冈树备料。他说：“你们进山后，家里的同志可就忙了。我们要加油干，争取多烧木炭，早日完成任务，向毛主席报喜。”他的话不多，却送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大家都决心好好干，创造出优异成绩，让毛主席高兴。

烧窑是个技术活儿，火要烧得均匀，压火要恰到好处。压火早了，烧出来的是“生头”，劳而无功；压火迟了，木炭会变成灰烬，前功尽弃。为了掌握火候，张思德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起来几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判断火候。当时，没有照明工具，他就山林里采来一种叫作“牛条条梗”的小灌木，放在窑里烘干，晚上用它来照明。这种“牛条条梗”有油性，点燃后着得很旺，也不怕风。同志们都很佩服张思德经验丰富，肯动脑筋。

当地群众烧一窑木炭，一般要10天左右。为了抢时间多烧几窑，张思德和大家就在压火后木炭尚未完全冷却时出窑，把烧炭周期缩短为7天。出窑时窑内温度很高，有的木炭上还有火星儿，烤得人脸皮发痛，大汗淋漓。每次出窑，张思德就双手包上破布，站到窑的最里边拣木炭。在他的带动下，同志们废寝忘食，日夜苦战，一个多月就烧了5万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了任务。

木炭烧好后，张思德又带领大伙，用榆树条把木炭打成一个一个捆，背到石峡峪村。5万多斤炭放在村头，象一座小山。张思德到安塞打电话给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张思德暂时留在石峡峪村看守木炭，等候马车前来装运，其他同志回枣园执勤。

张思德住在村头一位老大娘家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给老大娘担水，扫院，还上山打了几捆柴。后来，他想起山上烧炭的地方还留有一些砍伐的青冈，便想赶在马车来运炭之前再烧一些木炭。他和大娘商量说：“大娘，我整天坐着看木炭，也闷得慌。你和孩子替我照看一下，我进山再烧一些，晚上回来时我给你捎一捆柴火，你也就有烧的了。”这样，张思德每天早晨带着干粮进山，一人伐木，装窑，起火。每天晚上回来，总要给大娘背一捆柴人。老大娘天天都做好晚饭等他回来，晚上又给他准备好第二天进山吃的干粮。

9月5日，天还没亮，张思德又进山了。他走时告诉大娘，晚上回来给她背一些碎木炭，以备冬天取暖，可是到了晚上，大娘把晚饭先后热了几次，仍不见张思德回来，鸡叫了头遍，也没见张思德的影子。

当村长带人进山来到张思德烧炭的地方时，只见窑前整齐地堆放着木炭，炭窑已经坍塌。

坍塌的焦土挖开了，只见张思德站立着，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截青冈木，脚下有一堆青冈木。看样子，他正在装窑时，炭窑忽然坍塌，将他埋住了……

张思德不幸牺牲的消息，由警卫团团团长吴烈、政治委员张廷桢向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当即向往在枣园的毛主席反映了情况。毛主席说，张思德为我站过岗，你们要在枣园机关里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我要去参加。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稿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到各解放区报纸和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新华日报》，成为教育、培养一代又一代革命者的不朽名篇。1994年9月8日，为纪念毛泽东的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发表和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牺牲5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题词：“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也分别题词，号召全党、全国

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之代代相传。

张思德作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楷模，永远地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他的崇高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成都军区组稿
陈绪生、刘洪、刘孚珍撰写）

“天下文明第一军”

——记彭雪枫烈士

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
你留下的功绩辉煌：
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
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
雪山草地，百炼成钢。
在豫东燃起抗日烽火；
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
对党忠贞，对民赴汤；
英勇善战，机智顽强，
是我们的榜样。

……

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率部收复河南省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英勇殉国。继任该师师长兼淮北司令员的张爱萍，所作的《彭雪枫同志挽歌》，概括了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彭雪枫一生的英雄功业和高尚品质。

彭雪枫，原名彭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1918年至1925年，先后在镇平县高等小学、天津南开中学、冯玉祥创办的陆军第十六混战旅军官子弟学校、北京育德中学就读。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推举为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1926年夏，彭雪枫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往来于北平、天津、烟台、开封、上海等地，秘密从事学运、兵运、农运工作。

1930年5月，彭雪枫奉中共中央军委之命，到达鄂东南，参加工农红军，先后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三大队政治委员、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红八军第六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四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亦称郝西史大学）政治委员、中革军委作战局第一局局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十三团团团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过1930年7月中旬的长沙战役、1932年2月初至3月上旬的赣州战役。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敌赣闽边“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组织左右两个纵队，对宜黄地区红军实施两翼攻击。敌罗卓英纵队肖乾第十一师攻占二都，周至柔第十四师围攻宜黄城。当时分驻宜黄各地的红二师未及集中，即被敌隔断。在这严重关头，红二师师长郭炳生阴谋拖第五团叛变投敌。彭雪枫率师直属队和第七团于转战途中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带15名战士连续行军，终于在崇仁县境内找到第五团。他向指战员们揭露了郭炳生的叛变阴谋，动员大家南返。旋即又同红二师参谋长郑庭辉、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一起率全师突出重围，保存了主力，挽救了二师部队，中革军委为表彰他这一功绩，特颁发给他一枚红星奖章。1933年11月11日，红七军团在向江西金溪西浒湾镇之敌发起攻击时，在抚州（今临川市）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和金溪、琅琊出击之敌的夹击。次日，红三军团即调红四师向八角亭之敌发起攻击，但数次进攻均未奏效。13日，

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同师长张锡龙、副师长黄昉日等果断决定，将红四师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彭雪枫亲率一个通信排，打垮了数十倍之敌的进攻。当激战至拂晓时，敌以优势火力——自动火器向四师密集射击，进行反冲锋，红四师于8时撤出战斗。在此次战斗中，彭雪枫腿部负伤。

1935年2月18日至28日，红军在二渡赤水、强攻娄山关、再占遵义城的战略行动中，彭雪枫指挥的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硬仗的先锋团之。

1936年11月下旬，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联络局书记的彭雪枫抵太原，与阎锡山晤谈商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为便于工作，彭雪枫化名彭玉峰，公开身份为上海某公司的副经理。

在西安事变期间，彭雪枫向阎锡山转交了毛泽东关于希望阎在“宁军（指国民党中央军）攻陕甚急时，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的信件，并针对阎力求自保的心理，建议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同意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主张。由于中共的努力争取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阎锡山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保持中立立场，对红军准备迎击亲日派何应钦进攻的行动不予干预，使红军在三原、西安等地顺利集结。

1937年8月，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正式改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党支部书记。彭雪枫向阎锡山及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有关方面交涉、协商了八路军出师入晋的路线、渡河日期、地点、船只、粮食、运输列车等事宜。党中央同意按彭雪枫所提意见行动，从8月31日开始，八路军主力由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陆续开赴山西，顺利到达指定地点。9月21日，朱德亲率八路军总部到太原，圆满地实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彭雪枫被誉为八路军的“先行官”、“好参谋”。

1938年2月，中共驻武汉代表、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赋予彭雪枫新的任务：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积蓄力量，训练干部，组建部队，发展与扩大党的力量。彭雪枫在党内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对外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名义开展统战工作。他到达竹沟后，为组建抗日武装与开展地方党的工作，日夜忙碌。

1938年9月2日，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把你们的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9月27日，彭雪枫等将在竹沟创建的两个新兵连，编为第二大队，加上由延安派来的一批干部，共373人，装备4挺机枪，190支短枪，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

这年10月11日，东征部队在西华县北的杜岗镇，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及肖望东率领的抗日先遣大队会师，合编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辖3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共计1020人。

10月27日，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后，且战且进，在淮阳东北的襄楼镇击退日军第十四师团骑兵百余人的进攻，击毙日军骑兵少尉林津。1939年1月10日晨，攻击占领亳县东北芦家庙的伪豫东“剿共”第一路曹大中部大队长崔华山部队，歼灭其300余人，生俘其参谋长崔学善。1939年春，游击支队在豫皖苏边界的亳（县）东、永（城）东、宿（县）西站住了脚跟。到这

年6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支队主力向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之宿县、蒙城，风台地区发展。

游击支队东进9个月，进行较大的战斗30次，毙敌700余人，俘敌1165人，支队由进入豫东皖北时的3个大队，发展成为拥有3个团和一个随营学校的一大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

1940年2月1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游击支队正式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1940年3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出指示：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彭雪枫等根据指示，对根据地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建设，改组充实和调整了原有的县委，先后成立了淮上地委、陇海路南地委、皖北地委、豫皖地委和两个中心县委、5个县委和1个县工委，在皖东北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建立了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抽调大批干部充实了永城、夏邑、萧县、宿西、亳北5个县政权机构；巩固和扩大地方武装，维护地方治安；补充主力部队；成立了边区参议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各级群众组织；以随营学校为基础，扩建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彭雪枫兼任校长），将边区党委党训班扩建为党校，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兴修水利，减租减息，创办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根据地内外志士仁人共同抗日。这样，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均获得显著成绩。

1940年6月，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缺六八七团）及新二旅共5个团到达涡阳县北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率部活动在豫皖苏（包括睢杞太）地区。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这年春，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集团在进占新四军四师所在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后，又妄图继续东犯苏北抗日根据地。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接应汤部东进，于7月间乘日军“扫荡”盐阜地区时，派保安第三纵队两个团，占领泗阳县西北之陈道口，并企图控制运河两岸，进而构成一条横贯淮北、淮海根据地的东西走廊。为挽救华中全局这种危险形势，10月15日，新四军四师同二、三师及独立旅，在代军长陈毅的指挥下，发起程道口战役，于21日攻克陈道口。在这次战役中，彭雪枫率四师之一部进军途中，17日，遇韩德勤保安第七旅旅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王光夏的第一支队孙玉波部，彭雪枫冒险进入孙部，利用孙与王光夏之矛盾，晓以抗日救国的大义，终于争取孙玉波与新四军里应外合，于19日上午在洋河镇南全歼王光夏的第二支队，俘虏了支队长李守宽及其副官长以下1000余人，对保证全面夺回陈道口起了重要作用。陈道口战役全胜，挫败了顽军东西对进，夹击新四军的计划，巩固和扩大了淮海、淮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淮海、淮北、盐阜四大根据地的联系和北上山东的通路，使苏皖边区形势为之改观。

淮北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这年11月，建立中共淮北区委、淮北军区，邓子恢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彭雪枫任区党委常委兼军区司令员，共同担负华中敌后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领导工作。

11月14日，驻徐州日军第十七师团、独立第十三混成旅团各一部及伪

军第十五、二十八师等部共 6000 余人，由泗县、宿迁、淮阴、盱眙、五河等地出动，向淮北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彭雪枫等指挥根据地机关分别转移，跳出敌之包围圈；地方党政干部带领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大部在外线向敌伪侧翼和后方进攻，袭击、调动敌人，先后三打青阳镇，四打马公店，袭击金锁镇、归仁集、屠园圩、老韩围子等据点。12月9日，驻宿迁南朱家岗的四师九旅二十六团，同日军精锐平林第十七师团清水旅团千余人激战，经反复肉搏，将敌击溃。四师即乘胜扩大战果，拔敌据点，收复失地。至此，粉碎了日伪军历时 33 天的大“扫荡”计划。

1943 年 3 月 14 日，苏北韩德勤竟无视新四军的劝告，率部在林公渡等地偷渡运河，进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心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地区，并派部接应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东进淮北，妄图东西夹击新四军，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第四师九旅、十一旅，二师五旅，三师七旅，远途奔袭，于 3 月 17 日夜，冒着风雨对韩部发起自卫还击，战至 18 日 14 时，全歼韩总指挥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生俘韩德勤以下千余人。这次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了顽军夹击的态势，铲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在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反共堡垒。

1944 年 8 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发河南，控制中原的指示，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率四师主力 5 个团进军津浦路西，恢复了萧县、永城县、宿西县和 15 个区的民主政权，发展了千余地方武装，初步打开了局面。

9 月 2 日，顽军汤恩伯调动 34 个团的兵力，分 4 路对四师西进部队进行围攻。9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决定：路东路西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11 日凌晨 2 时，四师主力继续西进，于夏邑县东八里庄包围了顽、伪、匪三位一体的第二十八纵队二支队李光明部 1000 余人，拂晓时分，向大围子发起攻击，残顽突围逃窜时，被四师骑兵团拦截砍杀，死伤甚众。该部第三营 500 人自动反正，俘顽军支队长李光明、副支队长李良玉等以下官兵 500 余人。当彭雪枫登上大围子南门围墙，居高临下，直接指挥这场即将胜利结束的战斗时，不幸胸部中弹，以身殉国。时年仅 37 岁。

彭雪枫是我党我军一位军政双全、文武兼备的英才。其言其行，凝聚着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勤奋好学，常说：“要工作必须学习，学习也是为了工作”，“知识之在我，向来是如饥似渴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特别认真精读，即使在戎马倥偬之中，也常常手不释卷。他视百姓如父母，爱人民同手足。他经常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对敌人如猛虎，对群众如绵羊”，并写对联云：“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他善于倾听群众意见，体念民瘼。每年春天，抽出大批骡马帮助群众春耕；麦子黄熟，帮助农民收麦打场；冬季协助地方训练民兵，举办冬学。他重视水利。1939 年秋，1943 年 8 月采用军民合作的办法，发动群众，调集兵力，在涡阳新兴集开挖了“新新沟”，抢修了泗南县大柳巷淮河大堤，淮北人民称赞四师是“天下文明第一军”。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枵腹从公。

在驻晋办事处工作期间；手过千金，却一尘不染，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开创豫皖苏边区时，他因环境艰苦，工作繁重，饮食失调，患有胃病、低血糖症，但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同干部战士一起吃发霉红薯、谷糠窝头、盐拌辣椒、清水稀汤，他一生襟怀坦白，唯真理是从，以真理服人。早在红军中，

他以“讲道理”闻名全军。工作中出现失误，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认真地作自我批评，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上作。

彭雪枫注重钻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对古今中外的兵书，搜寻所至，莫不攻读、并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1936年，他写了《娄山关前后》的回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长征路上他率红十三团参加二郎滩背水战、攻守娄山关和二战遵义的经过。1937年10月5日，他致范长江信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作了精辟论述，他在临汾创办了八路军学兵队，在竹沟创办了随营学校，并亲自讲授《游击战术》。1939年6月25日，1940年8月25日，他先后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游击战术法则》等军事论著，从豫皖苏边抗日斗争实践，论述了平原游击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阐明了平原游击战的指导法则，总结了游击支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战术经验。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淮北殉名将，中原丧栋梁。1945年2月2日，淮北军民7000余人前往洪泽湖畔，恭迎彭雪枫灵柩；沿途群众，设案致架。2月7日上午，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彭雪枫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挽联云：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寇，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淮北区党委为纪念彭雪枫，在泗县洪泽湖畔半城镇修建了雪枫陵园，后又在涡北曹市集附近的“辉山烈士陵园”内为彭雪枫立了纪念碑。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石魁，晓音撰写）

上天入地歼敌寇

——记刘傻子烈士

刘傻子其实是很机灵的小伙子。但他爹妈叫他“傻子”，辈数大的叫他“傻子侄儿”，同辈的称他“傻子哥”，辈数小的喊他“傻子叔”。“傻子”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大号。

刘傻子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这里往西离灵寿县城 15 里地，往东离正定县城有 30 多里地，往南离正灵公路只有 5 里。

刘傻子从 1916 年 9 月 27 日呱呱落地，就没离开过高平这块土地。他像他的祖辈一样，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着“土里刨食”的营生。除了到韩家楼赶赶集，到正灵公路上抬点粪，也曾到正定城，买了 7 尺花布，给妻子娇娇做花衣裳。

栗娇娇 16 岁从韩家楼嫁到刘家，图的就是刘傻子人好。傻子对地里的活——耨、锄、耙、种，样样在行。傻子的人品好，平时不喝不抽，不赌不嫖，还有一副菩萨心肠，谁家有了难事，都乐意喊他帮帮手。傻子长相也不赖，高个子，宽肩膀，长圆脸儿，高鼻梁，两只大大的眼睛，粗糙黝黑的脸颊，剃得溜光的脑袋，一副庄稼打扮，天热时，他干脆把红布腰带煞紧，赤裸背膀，露出晒得黝黑的脊梁和硬梆梆的“疙瘩肉”。寻了这样一个男人，娇娇很知足，唯一让她不放心的是傻子傻大胆儿。牲口惊了，他敢赤手空拳拽住它；谁家孩子掉井里，他“扑通”跳下去捞上来；赶集时，看到“税狗子”们收税不公道，他也敢上前打抱不平。

娇娇担心归担心，刘傻子还是刘傻子。

1937 年秋，村里人们都在吵吵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东洋鬼子要侵占中国的地盘。转眼间杨树叶落，地里落霜，小鬼子跟二鬼子一起。在高平西的韩家楼、同下村，西北的后塔底，东南的上曲阳，东北傅家村，接连建起了据点和炮楼。南面的正灵公路成了鬼子的重要交通补给线。小鬼子杀中国人像割高粱茬子一样随便。十里八村断炊烟，三家五户起新坟，那日子像黄连一般苦。乡亲们心里都窝着复仇的火。刘傻子不言不语，天天霍霍地磨镰刀。

正在这时，褚凤阁回来了。他走家串户，建立基层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冀中区三区区区长张新永就住在刘傻子家。正是冬闲季节，傻子不是坐在炕头上听老张、老褚拉家常，就是跟着他们四处跑，动员大伙儿“减租减息”，动员男女老少参军支前。傻子心里豁亮多了，明白了一条道理：光磨亮一把镰刀不行，得大伙儿都拿起刀把子，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几次报名参军，老张都拒绝了，说：“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你做地方工作也是抗日，也一样做贡献。”

当村里组织游击小组时，刘傻子头一个报名，还动员、串联村里几个青年一起干。大家赞赏他劲头足，佩服他胆子大，便推选他当游击小组长。

高平成了当时冀中有名的抗日模范村，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人员往来，都要在这里落脚，刘傻子家也成了地道的“堡垒户”。

游击小组出手不凡，连“游”带“击”，刘傻子这个小组长算是当活了。

先说割电线。1940 年秋，为配合八路军百团大战，游击小组领受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的任务，白日里，傻子把粪筐子一背，粪叉子一拿，到正（定）灵（寿）公路上溜一圈儿，心里就有了底数。天傍黑儿，他带着游击小组上

公路，见杆就砍，见线就割。鬼子派兵“扫荡”到北，南面电线被割，“扫荡”到南，北面又断线。

挖“陷坑”，也是刘傻子的拿手活儿。坑挖得不深不浅，不大不小，不离车辙印，还要伪装好，这还真有学问哩！正灵公路上，有好几次满载鬼子战略物资的大汽车，一头栽到陷坑里，成了“大趴窝”。后来，上级又下发一些地雷，他们就用地雷炸。前前后后破坏鬼子的汽车6辆，马车70多辆，正灵公路成了名副其实的“鬼见愁”。

炸铁路，扒铁轨，刘傻子也常干。平汉铁路这条南北大动脉贯穿正定，鬼子的军列、货车每天来来往往不下百十次，一天夜间，傻子率领30多名队员，潜入正定新安站附近，扒了12条铁轨，又炸毁一孔桥梁，这条铁路因此瘫痪了几天。

到1941年3月，村里的青壮年差不多都发动起来了，高平村游击小组扩大为游击中队，刘傻子改任中队长。1942年2月，刘傻子山村里的党员褚凤阁、孙文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6月，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腰，平原上一片金黄。鬼子为了保障对华北“铁壁合围”大“扫荡”的后勤供给，盯上了冀中这个华北的粮仓。刘傻子和大伙儿商定了对付日伪军抢粮的几个办法：

——在敌人抢粮前，先“堵鳖窝”。“麦熟一晌”的时候，头天夜里，刘傻子一面动员乡亲们快收快打，一面把游击队员们分别派往周围日军炮楼去埋地雷。

——当敌人抢到粮食后，就“敲狗腿儿”。万一“堵鳖窝”堵不住，就伏击日伪军，把粮食夺回来。

——当敌人把粮食运到炮楼时，就“拔钉子”。

从1942年到1944年三次夏收，敌人没能从三区一带抢走一粒麦子，高平村每年还向抗日民主政府交支前粮17万斤。到1944年冬，刘傻子已立了3次战功，先后被评为正定县第三区民兵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冀中四分区特等（级）战斗英雄，出席了在河北阜平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会后，刘傻子还领回来奖给他的毛驴1头，撅枪1支。

高平出了名儿的是地道，刘傻子最拿手的是打地道战。

地道的雏形是“蛤蟆蹲”。开头，刘傻子和村里几个骨干，先在离村庄道路较远的野外，利用坡坎挖地坑存身，或在自己家里挖几个藏身洞，俗称“蛤蟆蹲”。可是这样的小洞子，只能藏身，不能打鬼子，有一年，鬼子闯进高平，从“蛤蟆蹲”里抓走了20多名干部和群众。刘傻子为这件事，几天几夜没吃好、睡好，苦苦思索着改造“蛤蟆蹲”的事。后来大伙儿集思广益琢磨出挖通“蛤蟆蹲”，开展地道战的新办法。从1942年冬天起，刘傻子带大家开始扩挖地道，一个冬天就挖了3条通往村外的干线。干线和各家各户的支线相连通，总长约30里，地道口的伪装多种多样，村内的地道口，有的藏在锅灶底，有的设在碾盘下，有的设在牲口槽下，有的隐在水井中、炕头上。村外的洞口，利用坡坎、沟渠、树丛、井壁、坟墓，或做成假坟堆。各个地道口还有“三防”（防烟，防毒气、防水）设备，采用翻口，安装了“特号道口雷”。随后，他们又把地道和地面上的房屋、街巷、墙壁、树木、庙宇相接通，挖了排气孔、瞭望孔、拉雷孔、射击孔。一旦需要，天上地下可以一齐开火，如同布下了天罗地网。

鬼子早把高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想荡平高平村。从1943

年初对 1945 年 5 月，他们向高平发动了多次进攻。其中 200 人以上的 2 次，300 人以上的 1 次，500 人以上的 1 次，1000 人以上的 1 次，都被刘傻子的游击中队利用地道彻底粉碎。

1945 年 5 月 4 日，鬼子调集正定、灵寿、新乐、行唐 4 个县的兵力 1500 多人，在半夜里突然把高平围了个水泄不通。

听到凄厉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高平，惯于在战火中生存的乡亲们快速地转移到地道里，游击队员们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

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刘傻子和支书孙文喜、游击队员刘三、孙货子、刘歪尿等人守在村北口。他们站在屋顶上，用集束手榴弹砸向鬼子，接连打退了四五次进攻，傻子的母亲房秀姐（一个思想开朗、不信神鬼的人）也带着一帮妇女，帮着送地雷，递手榴弹。

当鬼子退到村北口地雷区时，下到地道里的刘傻子猛然拉响了“线雷”，只听“轰轰轰”几声爆炸，炸死炸伤七八个鬼子。鬼子趴在麦地里好半天不敢动弹。刘傻子借机转移到别的村口指挥战斗。

在东南村口，刘傻子从地道瞭望孔里看见伪军中队长肖秋来正指手划脚地吆喝伪军向前冲，就从地道口爬出来，绕到孙末河家茅房里，甩出 3 颗手榴弹，把肖秋来炸死。

在西北村门，枪炮声响成一团，鬼子的火炮轰塌了十几间房屋。刘傻子带领大伙撤下高房工事，钻入地道，从墙壁射孔里朝鬼子射击。他还故意留下一个未加封闭的地道口，诱敌上钩。鬼子发现了地道口，果然下令伪军去挖。刚挖了 3 锹，一声巨响，“看洞雷”突然爆炸，炸得这帮家伙心惊胆颤、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近前。闯进村的鬼子发疯似地抢东西，可窜到东家，一推门，门上吊的手榴弹炸响了；闯到西家，一翻簸箕，“发火雷”炸响了。鬼子步步受阻，处处挨打，又见不到人影，气得嗷嗷乱叫，只好放火烧村以泄愤。这时，许香、塔底、韩家楼等村的游击队也在村外配合战斗，切断了鬼子的后路，迫使鬼子不得不后，撤。战斗从凌晨直打到下午 3 点，鬼子不但没捞到一点便宜，还抬回几十具日伪军尸体和 100 多伤兵，垂头丧气地撤到村外。

鬼子一走，刘傻子第一个走出地道。整整一天，滴水粒米没进的刘傻子嘶哑着嗓子大声喊着：“乡亲们，小鬼子让我们打跑了，快出来救火呀！”

他脱下身上的汗衫，光着脊梁，扑打火焰，村里的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抬水，压火，搬东西，很快压住了火势。

跑到正灵公路上的鬼子，回头一瞅村里的大火已熄灭，恼羞成怒，又不敢回村报复，就接连向村里发射了几十发山炮弹。

一发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向村中飞来，正在给伤员们绑担架的刘傻子听弹道声从头顶掠过，没加理会。可这发炮弹撞在一棵大树上爆响，刘傻子的腹部被炸伤多处，血流不止，重重摔倒在地。

两个小伙子要用担架抬他，他一把拦住：“我没事，你们先抬重伤员吧！”说着，他吃力地迈动脚步，随着担架队朝村外走去。这时，天色已近黄昏。

出村不远，大家见他脸色蜡黄，脑门淌着冷汗，马上把他扶上担架。刚刚躺上担架，刘傻子就喘息着大声说：“中国人死不绝！告诉孩子们，长大了替他爹打鬼子……”话没说完，他骤然停止了呼吸。这一年，刘傻子才 29 岁。

经区、县领导批准，高平人民集资，在村的十字街头建起了一座高大的

革命烈士纪念馆，刘傻子以及同他一起牺牲的 16 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塔上。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传颂着傻子的故事。一些老干部回村去扫墓，望着烈士塔，情不自禁地哼起刘傻子游击中队当年自编的队歌：

埋好了地雷端好枪，
你钻地道我上房，
制高点，堵街墙，
构成一片火力网。
别看我们是庄稼汉，
打得鬼子不敢再进我村庄。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高国庆撰写）

能文亦武双英才

——记陈辉烈士

在河北省涿县楼桑庙村的北侧，高高耸立着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6个大字：“陈辉烈士之墓”。这位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年轻抗日英雄的事迹，在房山、涑水、涿县和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

陈辉，原名吴盛晖，湖南常德县双桥坪乡牟家桥村人，1920年9月出生。

1927年春，正当常德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盛晖进小学读书。1932年秋考入省立常德中学初中部。1935年冬，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大大激发了盛晖的爱国热忱。他善诗能文，开始向报刊投寄文章。第二年春，他撰写题为《向前》的文章说：作为青年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应该唤起人们挺胸向前，救亡图存。他还用笔名“成辉”，发表了一些新体诗。

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帅孟奇到常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建立了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不久，经周文雄、向光源介绍，吴盛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辉”成了他的化名。陈辉入党后，积极发动青年学生抗日救亡斗争。同时，他几次向党组织请求到华北抗日前线去杀敌。

一天凌晨2时，他背上小行李包，带着大姐为他筹措的20块银元，将党组织写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缝在衣角里，启程了。

这年夏天，陈辉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的紧张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39年5月。陈辉在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华通讯社记者。同时，他与田间、邵子南、魏巍等同志都是晋察冀诗会会员。晋察冀边区领导人原想将他留在《晋察冀日报》编辑部，但他坚决要求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领导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他星夜奔赴北平西部地区。他目睹遭日寇烧杀的情景，满腔的怒火在燃烧，发誓要“举起诗的枪刺，同敌人拼死搏斗”。在平西前线，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报道，创作出100多首感人肺腑的新诗。

1940年冬，晋察冀边区党委调陈辉到房（山）涑（水）涿（州）3县联合政府工作，担任青年救国会的负责人。

房涑涿位于平西地区和冀中地区之间，东临北平，南接保定，平汉铁路从中贯穿，是日寇的所谓“强化治安区”，并以此作为它控制北平乃至华北的重要据点，是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陈辉接受任务后，虎着胆来到日伪军经常骚扰的拒马河西岸，仍然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发动和武装青年投入抗日救国的战斗。在两个多月里，他深入到几十个村庄，发动青年千余名。组成若干个“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白天从事农业生产，夜间进行军事操练，并带领群众挖掘地道，抗粮抗夫，处决汉奸走狗，搞得日伪军惶恐不安。

1941年夏，他在县委的领导下，举办了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发展抗日青年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为动员全民抗日，陈辉创作了十多首抗日歌曲，《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歌中写道：“日本鬼子像一只狗，狗来啃中国人的骨，八路军就是打狗的大石头。老乡们啊，咱们要跟着共产党向前走。”

1941年秋，日寇调动大批兵力，准备对平西地区进行大“扫荡”。石亭是涿西北连接山区的重镇，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共300多人

枪，筑有炮楼，阻碍着八路军和游击队的通道。为保存实力，房涑涑联县政府决定提前转移。陈辉主动承担牵制石亭守敌，配合八路军主力反“扫荡”的任务。他指挥由60余名青救会骨干组成的游击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同石亭的敌人周旋。

一天，陈辉带领这支队伍，穿过青纱帐，闯入石亭附近的山坡诱敌。果然200多名日伪军向他们扑过来。他指挥截击，且战且退，时而分散同敌人捉迷藏，时而集中猛击敌人一翼，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边转了5天。敌人被拖得精疲力竭，还丢下30多具尸体。黄昏时刻，陈辉带着一个小分队，神速地绕过敌群，闯进石亭，同留守炮楼的几十名日伪军展开激战。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十几颗手榴弹同时开花，敌炮楼炸塌了！回防的日伪军反扑来时，游击队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了。

1942年冬，日寇在平西和冀中地区实行的“拉网武扫荡”刚刚过去，又到处抓人挖沟修路，扩建据点，“强化治安”。中共房涑涑县委派陈辉、肖炳林等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武装工作队，陈辉任武工队政治委员，深入涑涑平原，打击敌人。武工队在敌后的敌后，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处决汉奸，使涑涑平原成了抗日游击区。

1943年春，陈辉被选为中共房涑涑联县县委执行委员（常委），兼第四区区委书记和新组建的敌后武工队政委。四区位于平汉铁路以西的涑涑平原。是敌我犬牙交错的地方，敌伪军的炮楼岗哨星罗棋布，而且涑县县城有敌军重兵把守，松林店车站驻有一支200多人的日本特务队。在这里同敌人展开战斗，时刻都有牺牲的可能。陈辉时刻准备为祖国、为人民献出一切，他在《为祖国而歌》的诗篇中写道：

祖国啊，
你的爱情的乳浆养育了我，
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守卫着您。
也许明天我会倒下……
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
我高兴，因为啊——
你的守卫者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
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他和队长陈琳带领武工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拒马河下游，白天隐藏在地道或山洞里，发动群众，组建游击小队；晚上出没在敌军炮楼哨所间，除特锄奸，筹集军粮，劝说伪军倒戈反正。他和陈琳还率武工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敌人据点，先后拔掉孙庄、横歧和常村等3处敌军炮楼，消灭敌军7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使得城里的日伪军不敢轻易踏进拒马河西岸。尽管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到处搜索，清查户口，结果连武工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当地群众称他们是“神八路”。

离拒马河下游四五公里的宁岗，驻有一支300多人的伪军队伍，头目是当地大恶霸曾汉章。陈辉决意用“引蛇出洞”战术除掉他。寒冬一个夜晚，陈辉和陈琳带5名神枪手，埋伏在宁岗镇外，尔后通过内部关系诱骗曾汉章带一个中队到镇上客栈捉拿“二陈”。曾汉章被骗到客栈，陈辉和陈琳从大门两侧跃出，左右开弓，撂倒了曾汉章和几个伪军士兵后，越窗飞走了。埋

伏在镇口的队员向敌人炮楼一阵扫射，闪身钻进树林与陈辉会合。只听见炮楼里面的敌人向镇里开枪，镇里的敌人以为武工队围了炮楼，向炮楼四周开枪射击。敌人相互对打了一阵后才知道中了陈辉的计谋。武工队夜闯宁岗处决大汉奸曾汉章，像神话在晋察冀边区流传。

1944年冬，大雪裹住了平西房涞涿大地，冰层封住了拒马河面。联县县委集中全县军政干部进山整训，部署解冻后的对敌斗争。各区只留下少数干部坚守工作岗位。

11月11日，数百名日伪军乘虚而入，由汉奸张得祥和王治仁引路，将四区区长陈琳和几十名武装人员围困在马踏营河套。经过一天的激战，陈琳、张文雅等3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许多老百姓也惨遭杀害，大片房屋被烧成灰烬。

陈辉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山区赶到马踏营，望着烈士的遗体，悲愤地写下壮烈的《祭诗》：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作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他在山区再也耽不下去了，向县委请缨，要求率武工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敌占区去，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县委了解陈辉的倔强性格，便批准由他带领一个小分队深入敌后，并向他交代任务：把铁路以东的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开展锄奸活动，搅乱敌人的阵脚。

一天晚上，陈辉带着一支30多人的武工队，踩着残雪，穿过平汉铁路，来到日本特务中队和伪军王凤岗的“联防地带”。

1945年7月，陈辉到各村布置工作，准备反攻敌人。他和通讯员小王来到范庄、韩村一带，不料被叛徒告密。8日凌晨，松林店车站的日本特务队倾巢出动，包围了韩村。

陈辉带通讯员小王7日到韩村堡垒户王德成家，突然腹泄不止，没有及时转移。现在被日伪军包围在村中，而且被特务堵住了屋门。他拿起手枪“叭叭”打死两个特务，关上了大门。日本特务队长荒谷川见大门关闭，率队疯狂地发起攻击，步枪、机枪、手榴弹同时开火。陈辉和小王各守一端，英勇还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忽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从窗户飞进，陈辉的左眼挂了花。

战斗持续约半小时，敌人越来越多。陈辉对小王说：“我们不能被动挨打，冲出去，越过墙头就是树林。”小王随手扔出两颗手榴弹，掀起浓浓硝烟，两人冲出西屋，来到院子里，怎奈敌人两挺机关枪封锁墙头，只得又返回屋子，力求多打死几个敌人。小王从窗口射出一梭子弹，打死几个敌人，自己却中弹牺牲。

敌人想活捉陈辉，掀开屋顶，仍进燃着的高粱秆子，想把他逼出屋来。陈辉自知为国捐躯的时刻到了，便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拖着一条滴血的腿、从屋里走出来，两眼冒出仇恨的火花。十几个敌人看到他，连忙跑了过来。当他们来到跟前时，陈辉拉响了手榴弹，好几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人民

的忠诚战士、富有才华的革命诗人，就这样英勇地与敌人同归于尽，倒在硝烟血泊之中了……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出版社从陈辉的战友戈枫等同志手中，收集到陈辉的上万行诗的遗作，出版了一本诗集，题为《十月的歌》。著名诗人田间为这本诗集写了序言，热烈地赞扬说：“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下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

（广州军区政治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彭正湘撰写）

打仗生产双英模

——记陈宗尧烈士

当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奇迹，也涌现了众多英雄人物。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就是七一八团团团长陈宗尧。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亲切地接见了这位屯垦英雄，赞誉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从1939年至1941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碰到了极大的困难。肩负着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重任的三五九旅指战员，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于1941年3月，由绥德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陈宗尧率领着七一八团来到南泥湾。部队一住下，他就带领全团排以上干部爬山越沟，观察地形，分配任务。陈宗尧望着茂密的山林和宽旷的荒草地，高兴地对大家说：“有把握！能长出树，也一定能长出庄稼！”开荒的战斗打响了。战士们唱着：“南泥湾好风光，红红的太阳照山岗革命战士不怕苦。扛起锄头去开荒。生产自给反封锁，气死光头贼老蒋。”陈宗尧扛着锄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初春的陕北高原，一早一晚仍是寒风刺骨，开荒的健儿们布满了南泥湾的山头田野，起伏的丘陵上长满了荆棘，还有不少碗口粗的树木。在这里开荒困难很大。但指战员们在陈团长的带动下，个个斗志昂扬，呈现出“春天里来春风吹，满山遍野锄头挥”的动人景象。

陈宗尧号召全团开展大竞赛。他规定，每人每天开荒一亩，任何人不得例外。他还把团部的参谋长、通信员、警卫员、司号员等8个人组成一个开荒小组，由他任组长。每天，陈宗尧起早贪黑，到各营连布置、检查工作。他撅头不离手，走到哪个连，就在哪个连边干边了解情况。其他时间，他就带着他的开荒小组，抡起锄头，弯腰挥汗，不停地挖。树枝戳破了他的手，狼牙刺划破了他的脸，手上磨出了一个个血泡，他只在双手上缠上纱布，毫不在乎，越干越猛。有时，大家都休息了，他还在一个劲地挖地。战士们从他手里夺过锄头，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却笑了笑说：“同志，你没有看这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在杨家岭种地，周副主席还亲手纺线，朱总司令还挑着筐子拾粪，我休息得下吗？”

大片的荒坡，变成了耕地，种子很快播进了泥土。然而，部队却面临缺粮的困难。上级给七一八团调拨了一部分粮食，要求他们到百里之外的延长县去背。陈宗尧亲自带领背粮队出发了。

初春的陕北，下了一场大雪，原野一片银白色，陈宗尧和战士们一样，背起60斤小米，踩着积雪往回赶。他一边背着沉甸甸的口袋快步走着，一边向在路旁休息的同志喊“加油”。当队伍来到延河边时，由于冰雪消融，河水猛涨，冲垮了木桥，河水中还漂着冰块。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犹豫着不知怎么办。陈宗尧从后面赶上来，见此情景，挽起裤腿，挥手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就向河对岸趟去。战士们都学着团长的样子，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里。队伍刚过河，河水陡然又涨。要不是陈冬尧当机立断，背粮队伍就要被阻隔在对岸了。

1941年，三五九旅共开垦荒地1.1万亩，平均每人种地5亩。他们种植了粮食、棉花和蔬菜，供应了自己的需要，节约了公家的开支，减轻了群众的负担。1942年，该旅开荒2.5万多亩，种植了粮、棉、麻和蔬菜，收细粮5451石，蔬菜10万斤，南瓜5万个，养猪1819头，还有一大群鸡鸭，每连

都备下大量的过冬木炭和柴禾。部队的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每人每月吃到 2 斤多肉，每天 1 斤半菜，会餐时常吃到鸡鸭、大米。全旅战士穿上新衣服和鞋袜。陈宗尧带领全团指战员，年年超额完成开荒、生产任务，到 1944 年，他们做到全部自给，而且粮食可以积余一年，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贡献。七一八团被评为“生产练兵模范团”，陈宗尧被评为边区生产劳动英雄。

陈宗尧的名字，在三五九旅是人们很熟悉的。说起这名字，还有一段来历呢。

他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给他取名冬苟。他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后给地主当长工。

1927 年秋，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土地革命斗争在湖南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茶陵县委书记谭思聪等人在茶陵拉起了工农赤卫队，搞武装斗争。这年，18 岁的冬苟在尧水参加了游击队。

冬苟在游击队表现很突出，打了几次仗，都很勇敢。他在斗争的烈火中很快成长起来。这年冬，谭思聪要介绍他入党，并任命他当班长。填表时，冬苟问谭恩聪：“我这苟字，怎么解释？”谭思聪说：“这要看怎么用：苟且，是妥协，没有斗志；苟延，是拖……”冬苟沉思一阵后，便将“苟”字改成了“尧”字。他说：“我是冬天在尧水加入赤卫队的，取‘冬尧’是为了做个纪念。”从此，他的名字就成了陈冬尧。

陈宗尧入党后，随游击队活动于尧水、严塘、桃坑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先后担任过严尧区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中共桃坑、湖口区委书记。1930 年秋，陈宗尧进入湘赣边红军学校学习。第二年毕业后，担任了莲花县工农兵政府军事部长。

1932 年，陈宗尧担任独立营政治委员。1933 年 6 月后，先后担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政治处主任、红八军二十四师某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十七师五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斗争。1934 年 5 月，湘赣主力红军攻打沙市、里田，陈宗尧率领部队伏击敌人，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就在这时，陈宗尧被调到红六军团十七师野战医院当政治委员，随部突围西征。10 月，调任红六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1935 年 11 月，他随部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六军团四十九团团团长、政治委员，红六军团模范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1936 年 10 月，被选送到保安（今志丹县）红军大学第二期第六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六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陈宗尧任七一七团副团长，奉命率领少数部队和干部，到华北平汉路侧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陈宗尧到华北后，依靠地方党组织，很快组建了一支抗日队伍——三五九旅平山独立团，他任团长。陈宗尧率领平山团，活跃在滹沱河畔、井陘矿场、平山以东的平原上，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一带的男女老幼都知道陈宗尧的名字，一提起他，谁都说：“他打仗真勇敢，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1938 年 1 月，平山独立团改编为三五九旅新七一八团，陈宗尧仍任团长。这时，日本侵略军正沿同蒲铁路南下，妄图消灭抗日力量。七一八团奉命在原平县田庄一带寻机歼敌。

一天早晨，陈宗尧和团里其他领导及各营干部正在开会研究作战计划

时，作战参谋刘仁跑来向他报告：“鬼子一个中队，拂晓前乘车向崞县（今原平县）开进。进到田家庄附近时，下车搜索，没有前进，三营正监视着敌人……”

陈宗尧一听，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并下令：“出发！揍他狗养的！”

部队立刻开始行动。陈宗尧背上望远镜，跨上战马，向敌人的方向飞奔。他的身后跟着刘参谋和政治处李主任等几个人。当他们奔上一个小山头时，只见三营的一个连已经同敌人接火。

“打得正好，要把敌人抓住不放！”陈宗尧大声地说着，回头命令刘参谋：“快去告诉三营，再加一个连上去！”刘仁知道，三营新兵多，许多人还没有枪，便提醒陈宗尧：“他们的枪少……”

“上去，上去！新兵靠在战斗中锻炼。没有枪，到敌人手里去夺！”陈宗尧说。

刘仁正要走，李主任叫住他说：“我去三营，你跟陈团长在这里。”陈宗尧说：“那好，刘仁去二营，叫他们抄敌人的后路，让八连从定凤庄南面插到忻崞公路上去，把敌人尾巴斩断。”陈宗尧很了解自己的部队：八连是个老连队，连长顾英洲是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这任务他们保证能完成。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陈宗尧的指挥所又前移了，离三营阵地只隔一条山沟。这时，敌人把炮也搬来了，三营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声震耳欲聋，子弹嗖嗖地从陈宗尧的头顶飞过，山坡上的土块被打得飞溅。

陈宗尧观察着战场的情况，胸有成竹地说：“敌人跑不掉了！”遂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叫司号长吹号，命令三营后撤。

不一会儿，二营方向的忻崞公路上响起了枪声，三营方向的枪声也由稀疏转为密集。陈宗尧猛地站起来：“司号长，快吹号，全线出击！”

随着冲锋号声，全团指战员猛向敌人扑过去。日军受到前后夹攻，死的死，伤的伤。战斗很快就胜利结束。旅政治部的捷报上写着：“八团首战田家庄，歼灭日寇一个中队，缴九二式重机枪4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余支，短枪12支，其他胜利品一大批。”

194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三五九旅挺进湘南、北，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敌后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七一八团3个营组成支队第二大队，陈宗尧任大队长，罗章任政治委员。

部队出发前，陈宗尧的妻子田英杰无限深情地叮嘱他要多保重。他抚摸着妻子的肩膀，劝慰道：“你不要因为我走了难受。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党了。如果我牺牲了，你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教育他们不要忘记父辈们的流血牺牲……”

部队渡过黄河到达太岳区，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时，陈宗尧带着侦察班走在全军最前面。一天夜里，部队行军，陈宗尧和罗章走在前面。当部队来到洛水河边时，天快亮了。侦察员在河边寻找渡河点。突然，出现了敌情，情况紧急。陈宗尧和罗章当机立断，脱下棉裤，踏进冰河，向对岸趟去。战士们见了，也纷纷脱掉棉裤棉袜跳下水，徒涉到对岸。

部队一路斩关夺隘，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线，于1945年3月在大幕山、大源镇歼灭积极反共的顽军一部，解放了湘北重镇平江。部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陈宗尧任该部第二支队支队长。

就在这时，蒋介石不打日军，却调集6万人马，企图在平（江）浏（阳）地区夹击南下支队。6月7日黄昏，部队集结在岳阳相似山中准备夜行军，二支队为全军的前卫。天刚黑，救国军即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陷入了包围之中。前卫连边战斗，边向跟随前卫连行动的陈宗尧和罗章请示。陈宗尧紧握拳头，用力一挥：“打过去！”他亲自指挥部队，在黑夜为部队打开了一条通路。第二天拂晓，部队冲出了包围。

天亮了，敌人又尾追上来。这时，二支队由前卫变成了后卫。陈宗尧指挥二支队抗击敌人，掩护全军行进。他带领部队抢占了一座小桥，接着又占领了一个小山头，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集中火力向小山头射击，密集的弹雨打得人抬不起头。敌人还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妄图夺下山头。救国军趁机迅速摆脱了敌人。

陈宗尧指挥部队打垮了敌人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冲锋之后，突然一颗子弹从他的腹部穿过，顿时，鲜血和肠子一起流出来。他被抬进一片竹林中的一个小院，还未来得及做手术，敌人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大家抬起担架进入一个村庄。陈宗尧呕吐不止，伤势恶化，生命垂危。这时，王震司令员赶来了。

“宗尧！”王震急切地呼唤着，“你伤重了，有什么话，就给我说……”

“王司令，”陈宗尧吃力地说：“请你告诉毛主席，说我再不能为革命继续奋斗了……”话未说完，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他死得慷慨！”王震泪流满面，大声说：“宗尧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我们，将永远活在你的事业中！”

（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稿赵长寿，李敏杰撰写）

“爆破大王”威名扬 ——记马立训烈士

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辞海》、《中国革命史辞典》、《中外军事人物辞典》等史传文著，便清楚地看到马立训这个名字，同古今中外诸多的著名人物排列在一起。这位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善于爆破，先后革新和创造了偷爆、巧爆和强爆技术，直接炸死侵华日军和伪军 500 多人。为此，山东军民叫他“爆破大王”。1944 年 7 月，八路军山东军区授予他“特等爆破英雄”称号。

马立训，1920 年生于山东省淄川县（现淄博市淄川区）一个矿工家庭。他从小失去母亲，在煤窑里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也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惨死。为求生计，他被迫下煤窑做童工。18 岁那年，一位姓郝的大叔帮他逃出煤窑。1940 年 4 月，他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山东纵队四支队十二连。

马立训勤学苦练，终于练出一手好功夫：投弹、射击、刺杀门门通，样样会。后来，领导上选派他学了半年多的工兵技术，为他以后全面掌握和熟练地运用爆破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打山东莱芜吴家洼敌人据点，他和两名战友一起实施爆破成功，使 30 多名日伪军在两丈多高的黄土坯炮楼下进了坟墓。

1942 年春，马立训所在的连队整编为山东纵队一旅三团一连。夏初，第三团重返鲁南，担负坚持天宝山、尼山地区抗日斗争的任务。当时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为几小块，日伪军时常进行“扫荡”、“清剿”。为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三团指战员许多人学会了爆破技术。自 1941 年底起，多次采用爆破攻克敌据点，积累了攻坚作战经验。马立训使用炸药爆破的技术，在全团最好，在多次战斗中，他创造了屡爆屡胜的“神炮”奇迹。

这年 8 月 8 日，三团和尼山支队奉令奔袭孙徐据点，歼灭伪军张显荣部。孙徐是泗水县城南较大的村落，分南北两个围寨，北孙徐围墙四角有突出的炮楼，村中有中心炮楼。这天傍晚，马立训身背 50 多斤重的几个炸药包，跟随部队走在前卫排的行列中。突击连绕村避店，选择小道，长途奔袭 50 余里，悄悄地摸到北孙徐庄外。这时，马立训挟着一个炸药包，巧妙地由一个草垛进到另一草垛，摸到敌人的围墙脚，迅速放好炸药包，点燃了导火索。他回到原处，炸药包“轰”的一声响了，顿时，敌人枪声大作。突击连连长指挥两挺机枪和步枪火力掩护，马立训又背起一包约 30 斤重的炸药，急速跃进到第一次爆破处，把炸药包稳稳当地放在刚炸出的坑里，进行彻底摧毁敌围墙和炮楼的爆破。他刚返回出发地，“轰隆”一声震天响，敌人围墙的东南角被撕开两丈多宽的一个口子，炮楼被震垮。在突击连迅速冲入围寨时，三营也从围墙的西北角突了进去，对敌人形成了夹攻，很快歼灭和俘虏了一部分敌人。可是，敌人仍在中心碉堡顽抗。为了全歼守敌，马立训在一个断墙犄角处仔细观察，发现敌中心碉堡西南背面是个死角。马立训在指导员指挥火力掩护下，立刻把两个炸药包送到中心碉堡，点燃了导火索。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碉堡变成了一堆破砖烂土。在碉堡底层的敌人被埋葬在里边，碉堡土层的敌人被炸得骨飞肉散，60 余名敌人全报销了。此役，由于马立训及时准确的爆破，八路军以负伤二人的代价，取得歼俘 40 余名敌人的胜利。

打下孙徐后，三团又以爆破突击手段，先后攻克费县西高村，滕县的马山头、上庄，邹县的后五村等日伪军据点多处。八路军使用的炸药包赛过“神

炮”，老三团有一个“爆破大王”马立训—327—的传说，使敌人闻风声胆。在1943年11月进行的柱子村战斗中，马立训又一次显示了神威。

费县城南40里的柱子村及其周围据点，为日伪军刘桂棠部所盘踞。1943年11月15日攻打东柱子的这天夜间，马立训的爆破组随突击连经过50里长途疾进，在东柱村外困一片洼地里停下来。不一会儿，通信员跑来，传达王吉文团长发起战斗的命令。连长立刻对马立训说：“开始！”马立训扛起炸药包，“嗖”地跃出掩体，箭似地向前冲去。

朦胧的月光下，正在接敌运动的马立训，被内墙炮楼里的敌人发现，密集的火力压得他不能抬头。连长令机枪掩护。但封住了敌人这个枪眼，敌人另一个枪眼又打开了。这时，马立训心里十分焦急，暗暗下定决心：就是俺牺牲，也要想办法炸开困墙，为突击部队打开通路！正巧，身边有一条小水沟，他一个滚翻到了沟里，绕过小土堆往前爬到副手刘炳坤跟前。他俩正商量如何把敌人的火力引开，突然，一发子弹从他帽子上擦过。他心里一亮，忙脱下帽子，把白帽里翻在外面，用树枝顶上，插到右边几十步的地方，晃了几下，然后迅速离开。这一招果然见效，敌人的步枪、机枪一起朝着这顶帽子打来。一霎时，马立训已冲到围墙根，把绑缚炸药包的木棒往地下一插，迅速点燃导火索。他顺左墙根刚跑了几十步，“轰隆”一声，一团火光夹杂着敌人的尸体飞上半空，炮楼不见了。紧接着一声巨响，内墙又被掀掉一个缺口。连续爆破成功，主攻部队冲进围寨内，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敌人企图抢占和封锁突破口，马立训率爆破组，一齐把特制的炸药包、手榴弹掷过去；一包炸药投入了马棚，成群的战马受惊，挣脱缰绳狂奔嘶叫，敌人的企图被打破。进攻部队如潮水一般涌进东柱子，枪声、喊声交织在一起，敌人迅速瓦解，纷纷缴械投降。此役，共毙敌224名，俘敌1000名。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战马70余匹，军用物资一大批。

1944年春，山东八路军发起了拔除平邑至城后公路上的庞庄据点的战斗。马立训这时已升任排长，他带一名侦察员化装潜入庞庄，事先对敌人工事情况作了侦察。

庞庄有伪军180余人据守，一道困墙，墙外挖了一道护城壕，壕内全是水，壕外有铁丝网、鹿砦，形成天然屏障，只有一条向南的道路。在护城壕上面架了座吊桥。

马立训将侦察到的情况与爆破方法经过一番研究以后，带领爆破组在一片坟地里进行战前演练。他们在炸药包里放上铁砂，增强爆破厚围墙的爆炸力。他们演练了爆破过程的时间如何缩短，还试验了燃烧完五寸、一尺、一尺半、二尺长的导火索的时间。马立训说：“庞庄敌人工事由一层变成了几层，必须连续强爆。”他想出“快送快炸”的打法，用爆破掩护爆破，连续炸开几道几层敌人工事。经过演练，爆破组员有了底。

1944年5月24日夜，马立训和爆破组战士们随着先头小分队，疾速而隐蔽地接近庞庄南门，按预订方案开始战斗，先由一名爆破手把一包炸药塞入鹿砦，点燃导火索，迅速离开。马立训见敌人吊桥未收起，听到“轰”地一声响，不等上级命令，趁浓浓烟雾将第二个炸药包送到围门上返回，连长下令爆门时，靠在围门上的炸药包已经响了。

轰隆隆的爆破声惊醒了敌人。据点里的伪军们心惊肉跳，乱喊乱叫。“铁打的庞庄”顿时变成了烂豆腐。敌人有的被震死，有的被埋在土里，有的被炸得魂飞魄散。勇士们冲进去迅速消灭了敌人。第二天，由城后据点来援的

日军一个小队，也被打援的二、三连消灭，俘日军 2 名，击毙 20 余人。

马立训经过血与火的锤炼，于 1944 年 4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天，他出席八路军山东军区召开的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特等爆破英雄”的称号。山东军区还发出开展向马立训学习的决定。之后，在鲁南八路军攻打东湖、泗水城等战斗中，马立训参与执行爆破任务，不断为战斗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不幸的是 1945 年 8 月 5 日，在攻打滕县阎村战斗中，马立训胸部中弹而壮烈牺牲。

为纪念这位人民英雄，八路军鲁南军区命名他所在的排为“马立训排”，阎村被命名为“马立训村”。

（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魏学诚、罗明寿撰写）

江南一叶留英名 ——记叶挺烈士

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是著名的军事家。周恩来在悼念“四八”烈士的文章中说：“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这些话，准确地概括了叶挺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一生。

叶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出生在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会水楼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这毗邻港澳的沿海山村，叶挺目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欺凌，立志“强兵寓国”，走军事救国的道路。1912年入黄埔岛广东陆军小学。1914年12月，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即武汉南湖陆军中学）。1916年底，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攻读工兵科。这时候的叶挺，已有了自觉探求革命真理，救国救民的迫切愿望。他曾给进步刊物《新青年》写了一封长信，力陈“欲振污世，起衰溺”，关键在“自身先有觉悟之机”。1919年元旦，他在保定军校第六期工兵科毕业后，奔赴福建漳州，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粤军，任一支队少校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随粤军回师广东，在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的黄皮径一役中，他率部一举击溃四倍于己之敌，威名大震。10月，粤军攻克广州后，任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少校参谋，后又任师直属工兵营副营长。1921年4月，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4月，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洪兆麟等部阴谋叛乱，叶挺及时向警卫团长作了汇报，使孙中山转移到永丰舰避难。6月16日，叛军围攻总统府，叶挺率部英勇击退叛军的3次冲锋，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突围脱险。

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组成称为“大元帅府”的革命政府。不久，国民党改组，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革命主张，使叶挺深受鼓舞。但他目睹革命阵线内军阀政客尔虞我诈，明争暗夺，部队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因而甚感痛心，遂萌发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思想。1924年7月，他决然辞去军中职务，奔赴苏联，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12月，由中共旅莫支部接收为中共候补党员，1925年2月，他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他在后来回忆往事时说：“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25年9月中旬，叶挺回到广州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11月，被调到肇庆市，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次年1月，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亦称叶挺独立团），并任团长。团建立了党支部干事会（支委会）。叶挺亲自主持制定了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在他带领下，独立团经常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参加当地各项社会活动，支持工农运动，协助维持社会治安，打击反动势力。

1926年，在广东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北方的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加紧联合起来，向

革命力量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建议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命令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遣团，先期入湘，粉碎吴佩孚的南犯计划。

这年5月1日，独立团从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前线挺进。5月20日，独立团进入湖南汝城县城，与投靠吴佩孚的粤军谢文炳部前卫部千余人发生激战。叶挺指挥部队彻夜冒雨拼杀，毙伤俘敌200余人，打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哨战。6月4日，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唐生智第八军，在黄茅铺将敌击溃，旋即趁胜追击，于翌日攻占攸县县城，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攻醴陵，占浏阳，8月，克平江后，东进北上，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攻占鄂南通向武汉的要冲汀泗桥和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10月10日，胜利占领了武昌。

叶挺在北伐战争中，多谋善断，他带领的独立团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屡破强敌，功勋卓著，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被人民群众誉为“北伐名将”。独立团所开创的当尖刀，打头阵，善于长途奔袭，出奇制胜的优良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人民军队的传统作风和传统战法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叶挺先后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晋升为少将军衔。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叶挺率部在东进讨蒋途中，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25日前往南昌。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叶挺指挥所属部队按既定计划发起攻击。随后，他与周恩来一起，在战斗最激烈的松柏巷指挥部队，消灭了驻守巷内天主教堂的国民党第六军第五十七团。其余各部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起义获得成功。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国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胜利后，叶挺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军委会）委员，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并兼第二十四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失利。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事先，中共广东省委已预定由叶挺担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鉴于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搜捕的重要人物，省委为了保护他，仍暂留香港。直到起义前几小时——12月10日晚才赶到广州，了解情况，协同张太雷等指挥部队作战，很快占领广州，13日，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向广州城起义军疯狂反扑，形势十分险恶。叶挺建议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或向北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或向东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部队会合。但这一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起义军遂陷入敌之重围。叶挺和聂荣臻观察战斗情况后，即组织部队撤退。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乘船到达香港。广东省委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时，指责叶挺对起义“消极”、“动摇”，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这种做法，不久即被中共中央否决，但已产生恶劣影响。为使组织上能正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叶挺于1928年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写了

书面报告，但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抱着对中国革命失败的不满成见，对叶挺的意见置之不理。叶挺投诉无门，独自离开莫斯科，与党脱离关系，先后到德国、奥地利、法国、新加坡、澳门等地，度过了10年流亡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0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成为一支抗日部队，请叶挺出任这支队伍改编后的军事领导工作。叶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团结，想对于国内团结与抗战，尽自己的力量”，毅然接受了这一使命。10月，他到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组建新四军的事宜。他在毛泽东主持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8年春夏间，叶挺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实际是政治委员）等，在皖南岩寺（今黄山市南）完成对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整编工作。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9个团。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共同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他根据当时沪、宁一带城市与交通要道已被日军占领，广大农村日寇尚无力顾及的情况，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积极支持各支队向敌后发展。为统一和加强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叶挺于1939年4月末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分途开赴皖东敌后，建立津浦路西和路东游击根据地；同时沟通与活动于皖北的新四军游击队的联系，筹划将其编为第六支队。叶挺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订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打开新的局面。

在叶挺等人指挥下，3年中，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4000余次，歼灭敌人10万余人，创建了苏南、苏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淮海等大片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2日，日军步骑炮兵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攻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叶挺提出：鉴于敌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拥进，我军应在敌人前进路中设纵深阵地，以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劳、战胜敌人。经项英同意，叶挺亲赴前线，全权指挥作战。

部队出发前，叶挺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他操着浓重的客家乡音，先向到会的指战员发了几问。一问：“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引来一声“战斗动员大会”的回应。二问：“我们开会做什么？”又引来一声“准备打鬼子”的响亮回答。三问：“打鬼子要流血牺牲，你们怕不怕？”再引来一声“不怕”的吼喊。接着叶挺高声提议：“不怕死的举起手来！”随着叶挺的举手动作，全体官兵齐刷刷地把手举了起来。“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我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怕死，就能打败敌人的进攻！”叶挺就此结束了讲话，总共只用了几分钟。

叶挺驱马赶赴前线，亲自检查指点加修掩体，配置火力，指导部队埋设地雷。日军企图凭借其飞机大炮和精锐骑兵的优势，直扑新四军军部云岭，妄图速战速决。叶挺则指挥部队据险设伏，节节抵抗。他派出轻便小分队，

夜以继日地阻击、袭扰敌人，使日军装备、兵力上的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在不到 20 里的路途中整整走了 6 昼夜。

10 月 7 日，敌人竭尽全力冲进我军主动让出的汀潭，已经伤亡惨重，疲劳不堪。他们在汀潭呆了几小时，叶挺便于 8 日凌晨指挥部队发动猛烈攻击，把敌人赶了出去。此地离云岭虽只 10 余里，但敌人可望而不可及，便且战且走退住泾县。叶挺立即命令部队猛烈追击。追到泾县南门和西门，便发起攻城。敌人奔出北门，向东北方向逃跑了。泾县战役，显示叶挺用兵的巧妙果断，叶挺在战斗中，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拍摄记录敌军罪行的镜头，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1940 年 11 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叶挺担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北上就职之前，由陈毅代行其职权。

叶挺在新四军任职的 3 年中，针对国民党在兵员、防区、装备、给养等方面限制新四军发展的反动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和斗争，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向爱国人士、海外华侨、国际人士和国民党内的朋友等，募集物资枪支款项，并动员一批学者、故旧、亲属参加新四军，壮大抗日力量。

1940 年 10 月 19 日，国民党发“皓电”，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限令在 1 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11 月 9 日，中共中央回电驳斥这一恶意诬蔑和荒谬要求，但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愿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撤到长江以北。由于蒋介石调集大军阴谋消灭新四军，中共中央多次指示皖南部队迅速北撤。但项英犹豫不决，贻误了北移时机。1941 年 1 月 4 日晚，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和教导团及第三支队共 9000 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转移。次日，行经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 7 个师 8 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陷入困境。叶挺向中共中央发电，表示“上下一致，决心打到最后一人一枪”。他动员部队分散突围，说：“革命的烈火是永远扑不灭的，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这样，新四军在 7 昼夜浴血奋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除 2000 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牺牲和被俘。叶挺受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委托，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国民党顽固派非法扣押。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在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此后，他被押往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囚禁达 5 年零 2 个月。蒋介石、陈诚、顾祝同多次对他劝降，要他发表反共声明，就任国民党高级军职，都被叶挺拒绝了。在上饶李村牢房的墙壁上，他写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名句。他还给蒋介石寄了一分快邮代电，提出三项要求：“（一）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二）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首恶，公布全国；（三）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度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由于叶挺不听蒋介石的劝降，被关进重庆军统局中美合作所的黑暗囚室里。1942 年 11 月 21 日，他在这里吟成《囚歌》以明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中共中央在两党和平谈判中坚决斗争，失去自由长达5年的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出狱，回到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出狱的第二天，他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终生志愿：“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给他发了由毛泽东亲笔润色的回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忧。”

叶挺回到党的怀抱之后，即要求党给他分配工作。党中央派他跟随周恩来作为共产党军队代表，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3人军事会议，并内定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中共军事代表。4月8日，他和王若飞、邓发、博古（秦邦宪）等领导人，同乘专机赴延安述职，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叶挺的殉职是我党我军的巨大损失。毛泽东发表悼念文章，赞扬叶挺等“四八”烈士数十年间“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其长诗《哭叶军长希夷同志》中写道：“……沉默寡立，深沉不露，令我忆君之丰采。勇迈绝伦，倜傥不群，令我忆君之将才。胸无城府，光风霁月，令我忆君之天真有如提孩。我佩君忠贞不屈，服务人民，不愧革命家气概。”

（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稿段雨生、赵酬、李杞华撰写）

潜龙出海战东江 ——记刘黑仔烈士

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香港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陆续派出武装小分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组成港九大队，紧密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就在日本占领军的眼皮下，曾涌现出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及汉奸、特务闻风丧胆的短枪队（或称手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农历八月三十日诞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东北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在本村小学毕业后，在堂兄开办的药店帮工。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政权特殊化”，进而灭亡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挥军队继续“围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爱国学生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这一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南海之滨大鹏湾、大亚湾沿岸地区的爱国知识青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也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满腔热血的青年刘黑仔积极投入到救国的洪流之中。他参加海湾爱国知识青年组成的“海岸流动剧团”，经常流动演出宣传抗日爱国话剧，揭露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残暴，汉奸走狗的卑鄙无耻；歌颂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和普通百姓的爱国热情，借以唤起当地群众的民族自尊和奋起斗争的意识。他身材壮实，皮肤偏黑，两眼闪光，聪明伶俐，人们因此亲切地称呼他“刘黑仔”。他平时喜爱武术，是乡间武打队的活跃分子，参加剧团后，成为出色的演员，经常在舞台上扮演智勇双全、克敌制胜的游击队长。谁也没料到，他后来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成为大灭日寇威风，大长人民志气的抗日英雄！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大亚湾登陆，当地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东江沿海一带沦为敌占区。刘黑仔目睹日军的凶残，国民党军的腐败和人民群众的苦难，满怀民族恨，阶级仇，更积极地从事地下的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上半年，他由中共大鹏城支部书记赖仲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组织批准，他到惠阳坪山（今属深圳）参加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公开番号是第四战区第三游击总队新编大队）。当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弱小的游击队遭受优势的国民党顽军的围攻，在东移海陆丰途中受挫，部分人员失散。他又回到家乡，继续跟随赖仲元（时任惠阳县葵涌区竞新小学校长、中共区委书记）开展地下斗争，收集日军情报，打击汉奸走狗，保护群众利益。他曾亲手处决了卖国求荣、作恶多端的王母乡维持会会长袁德和其他两名汉奸，大快民心。1940年9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和惠（阳）、东（莞）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保留下来的骨干队伍重返东莞、宝安敌后，整顿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再次燃起抗日武装斗争的烈火。1941年，刘黑仔被调回部队，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活动于龙岗、坪山，葵涌一带，主要任务是收税，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汉奸特务；有时也汇合主力，完成突袭任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发起对香港英国驻军

的进攻，至 25 日完全占领了香港。这期间，广东人—341—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包括以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的短枪队，最早开赴新界，当控制了各条路线之后，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占领香港初期，其野战部队和宪兵部队驻扎在市区和交通要点，对于新界无暇顾及。新界所有乡村，土匪猖獗，趁火打劫。大股的百数十人，小股的三五人，有土生土长的“梅花马”，有从内地窜过来的“大大二”，有属于国民党组织的，也有属于黑社会流氓集团的。他们多数投靠敌伪，占据地盘，奸淫妇女，抢劫财物，危害人民。黄、刘率领的短枪队共 10 多人，进入九龙西贡地区后，首先是肃清土匪，保护群众，创建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他们探得周围有大小土匪 10 多股，其中以李观姐一股势力最大，匪众 60 多人，经常打村劫舍，为非作歹。刘黑仔分析敌情，认为只能智取，以少胜多，不可硬打。他以灰色面目出现，对李匪声称有“发财路数”，愿“同堡共捞”。李匪贪财上钩，在荔枝窝村摆宴相邀。黄冠芳，刘黑仔带领 8 名队员赴宴，席间谈论“投机”。正当李观姐和其他匪众开怀痛饮、醉意朦胧之时，刘黑仔给黄冠芳递个眼色，突然跳上桌面，右手拔出驳壳枪，左手举起手榴弹，大声喝道：“都不许动！缴枪不杀！”在旁的黄冠芳快手夺过李观姐怀中的手枪，其他队员也相继动手，一枪未发，生俘 60 多名土匪，缴获长短枪 60 余支。此后，还肃清其他土匪 10 多股，近 300 人，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建立起抗日根据地。从此，商旅往来，难民疏散，堪称方便。

1942 年元旦后，刘黑仔等遵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参加了营救被困在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士工作。营救有多条路线。在东江游击队保护范围内的，主要有两条秘密交通线护送出来，一条是蔡国梁负责，由黄冠芳、刘黑仔、肖华奎、黄青控制的经西贡坐船，到大小梅沙、上洞，人坪山、淡水、惠阳的路线；一条是黄高扬负责，由曾鸿文、江水、林冲等开辟的由元朗到宝安沙鱼涌的路线。从 1 月至 3 月，他们经营救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共有七八百人。这次营救行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2 年 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大队下属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犹如潜龙出海，忽东忽西，时隐时现，机智地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还曾率队员扮成敌探，闯进九龙金棠酒家，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分队，生擒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送假情报，引诱敌军 6 名密探进入山洞，然后用手榴弹把他们炸死。短枪队在刘黑仔的组织指挥下，就是这样巧妙地袭扰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大队的行动。因此，刘黑仔的名字使日军汉奸闻之丧胆，几次重金悬赏，欲取他的人头。

1944 年 2 月 11 日，盟军美国中尉飞行员克尔在袭击香港启德机场时，座机被日军炮火击中，被迫跳伞，经港九大队援救脱险。日军出动一个多团兵力，陆海空军配合，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将大队主力一网打尽。港九大队为粉碎日军的“扫荡”，留下西贡中队在内线坚持山地麻雀战，军民协同，巧妙地与敌周旋；派出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开展外线作战，以丰制“扫荡”的日军。短枪队在市区广撒传单，张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更从虎口拔牙，智除日本宪兵司

司令部汉奸陆通译（翻译）。一天深夜，刘黑仔率几名队员，化装成日本军官和士兵，直奔陆通译居住的洋楼，佯称宪兵司令部有急事会商，将陆“护送”到偏僻处，刘黑仔摘下黑眼镜突然宣布：“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处决你这个民族败类！”连击三枪，将陆当场枪毙。日军因此惊慌地在市区加强岗哨，实行宵禁。但“扫荡”西贡、沙田的日军主力仍未动摇、撤回，短枪队决心进一步袭击日军要害——启德机场。刘黑仔率短枪队，利用细雨迷濛的夜晚，摸进机场，先由两名队员隐蔽地接近并突然地撂倒守门哨兵，然后换上敌装，负责掩护，再由刘黑仔带领两名队员潜入机场深处，刺杀了看守飞机场的一名日军，分别在机库和油库放置两颗定时炸弹。短枪队安全撤离后，接连两声巨响，机场顿成火海，日军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市区中队也成功地爆炸了九龙窝打志街四号铁路桥。国攻游击队基地的日军主力终于被迫撤回九龙市区，“扫荡”遂告失败。

1944年秋，刘黑仔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尔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向北挺进，准备与南下的八路军王震、王首道支队会师。刘黑仔被抽调到西北支队任支队部参谋兼短枪队队长。1945年2月，西北支队西渡北江，开辟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由于受到国民党顽军的堵截和封锁，支队供给困难，领导指示短枪队向顽军要“给养”，从反击顽军的缴获中解决支队的经费和给养问题。

1945年7月，支队决定派出短枪队奔袭国民党顽军的重要据点——清远县龙颈圩。这里存放着大批武器和药品，建有炮楼，配置一个连兵力把守。龙颈圩位于三叉河畔，于凌晨4时发起进攻。顽军连长在炮楼上被枪声惊醒，惶恐之中从楼梯跌下毙命，活着的敌兵四散逃窜。不到半小时就结束战斗，活捉国民党副区长，缴获各种枪枝，约品五六担和一批白银、现钞，解决了北上部队的急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东江纵队命令西北支队向粤北挺进。

8月24日，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进抵南雄，统一指挥北上各部队。短枪队直属指挥部领导，刘黑仔任队长，苏光任政治委员，下设3个小分队，共30多人，在南雄、始兴一带活动。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军事冲突协定，颁发停战令。根据两党协议，东江纵队准备北撤山东解放区。但国民党反动派表面接受停战，暗地发动内战。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也千方百计地破坏东江纵队的北撤计划。5月1日，刘黑仔队长和苏光政委带领10多名短枪队员到达南雄与江西交界的界址圩，突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连的围攻。当时，刘黑仔、苏光等正在圩内一间屋里开会，苏光和另一队员从屋内冲出时牺牲，刘黑仔带领其他队员突围时右大腿中弹负伤，回撤途中因染上破伤风菌，经抢救无效，于5月3日牺牲。一代抗日英雄，竟遭国民党顽军的暗算而告别人间。东江纵队的同志把他的遗体埋葬在江西省全南县正和乡鹤子坑村，用红砖刻了一块墓碑，上写“东江纵队英雄刘黑仔烈士之墓”。1990年，宝安县人民政府派专人将其遗骨迁回刘黑仔的家乡大鹏镇烈士陵园安葬，并立碑永志，上写着“抗日英雄刘黑仔”五个大字，以供后代瞻仰。

（广州军区政治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组稿孙志彦整理）

地雷威震平汉线

——记李混子烈士

抗日战争的火焰，锤炼了无数英雄，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的李混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1924年4月25日，混子出生在河北省新乐县北李家庄一个贫农家庭里，全家4口人，依靠自家一亩脊薄坟地和租种地为生，每年除交地租外，剩下的粮食用野菜掺着吃。父亲、母亲都是勤劳的庄家人，从不闲着，可是全家还不得温饱。儿子生下一年多也没个名，孩子娘一催再催，父亲李洛凯随便说了一句：“饭都吃不饱，有名顶啥用？混着过吧！”“混子”由此叫开。人长大了没钱进学堂，只是混子前加个姓，也就成了大名。

混子从小就有股嘎劲儿，倔强顽皮，聪明伶俐，能干活，也会玩。下地干活，背着小筐割单，随身带着兔子套、打鸟夹、弹弓子，和村里一般大的李玉彬、李寅卯等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割草，拾粪，打柴。

“七·七”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岳、冀中地区成了抗日前线。还不到成年的李混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活动，站岗放哨，捉拿奸细，学习文化，宣传抗日，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村青年抗日先锋队指导员，和队长李文祥组织领导着百多名青年抗日队伍。在战斗中，他们先锋队队员用“土撅”、“自拉火”对付洋枪、洋炮的鬼子经常吃亏：“自拉火”只能伤人不能致死，“土撅”没膛线，打不远，打不准。他开始对地雷发生了兴趣，雷埋暗处，敌人看不见，能够杀敌，于是他开始摸索试制地雷。我旧酒瓶做雷体，买纸炮剥开作火药，改造“自拉火”机关作发火器，利用“小枪炸膛”的原理将瓶塞紧，经过几次试炸，果然成功了。青年抗日队员们得知后，情绪高涨，都积极要求参加制雷活动。李混子和队长李文祥选了几个手巧的队员，组织了制雷班，到邻近村找做炮铳的火药，请小炉匠化废铁做雷壳，没用上两个月，就制出了七个土地雷，并在打击汉奸二鬼子的实战中得到了检验。

深秋的夜里，星星亮晶晶，空气湿漉漉，微风凉嗖嗖，蚰蚰儿，蝈蝈儿，螞蚱姑……用不同音响在演奏交响乐。李混子带着青年队员们设雷伏击下乡催粮的伪军，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混子枯摸着：伪军回城关镇，该路过这里了。

“驾！驾！喔！喔！”吆喝牲口声听到了。

“大伙注意！拉雷时看着，别伤了老乡。”混子小声叮嘱。

十多辆拉粮车，由伪军押着，混子见车队后边的伪军多，就将前边的放过，等后边的伪军走进雷区。

“拉！”一声令下。

“轰！轰！轰！”

“打！”又一声令。

“砰！砰！砰！”一阵枪响。

顿时，牛马的嘶叫声，老乡的吆喝声、伪军的嘶喊声，混成一团。接着，僻里啪啦，枪声阵起，伪军开始向路两旁乱打。只听一片庄稼叶子响，抗日队员们退出了战斗。

这一仗，炸伤了几个伪军，受到区长的表扬。混子却不满意：地雷在敌群里爆炸，怎么就炸不死？他发现一个雷只能炸成三两片，有个雷还未炸。

琢磨来琢磨去，终于找到了症结：雷壳厚，药力小，炸不开。于是他找铁匠王大爷商量，改进造雷。

随着日寇入侵的深入，抗日战线再延伸，战场再扩大，斗争更加尖锐残酷。军分区为了配合八路军作战，阻止日军入侵和“扫荡”，要组织当地民兵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平汉铁路线大沙河地段是重点，北李家庄位于铁路上的城关镇东北十来里，自然要担负炸路任务。1943年，上级指示县委组织爆炸培训班，袭击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李混子造雷已小有名气，被县里选调参加了训练班。混子经过训练，不仅学到了更多的造地雷、炸弹的技术，更知道了不少炸药、炸弹的性能、作用等，杀敌本事又大了。

混子回村后，日寇头子黄井指挥五六万日伪军，开始“扫荡”冀中地区。日寇为了保证运输安全，强化铁路沿线治安，建岗楼，修碉堡，挖护路沟；对村庄实行大“清乡”，烧杀抢掠，折腾得人们没法活。而铁路上一列列火车南运北调，拉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物资，运来了杀害人民的军火。县里批准李混子为北李家庄敌工委员，要充实扩大爆炸组，集中力量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李混子、李文祥和党支部一班人开会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分头准备。有造炸火车地雷的，有到铁路沿线了解敌情的。有组织队员准备袭扰掩护的。

因为有了造雷经验，没用十几天混子就在原来的基础上，造了两颗炸火车的雷。

一天晚上，混子来到利于隐蔽的地段来埋设雷。他用手扒开路基石子，放进雷再埋上；还未等雷全埋好，听得轰隆轰隆的响声越来越近，一束灯光射过来，他们知道是火车来了，赶紧扯起绳子，滚到路边。混子握着拉绳，屏住呼吸，趴在地上，缓缓收紧拉绳，没等绳收紧，火车就到了，他使劲儿把绳子向后一拉，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抬头一看，火车从腾起的浓烟中蹿跑了。

火车没炸成，大家又恨又泄气。混子闷着不吭气，围着大家转来转去，低头琢磨问题，半天才粗声粗气地对大家说：“头一次不成就泄气！火车还炸不炸？鬼子还打不打？哪象抗日队员。”混子这一诈唬还真灵，队员们的话匣子炸开了。有的说：“用炸人的雷炸火车力量小。”有的提议：“轨太牢不好炸。”

李混子总结了三条：一是雷的药力小，要换炸药；二是要松动道钉，增大炸力；三是控制雷的炸点，要对准火车头蒸气机。

混子知道黄色炸药比黑炮药炸力大，遂找来敌人丢弃的两枚未炸的炮弹，冒着生命危险，将它卸开，取出黄色炸药，装成了两个大地雷。一个雾气蒙蒙，对面不见人的夜晚，他带着爆炸组队员们，摸到铁路线，将两个地雷埋在枕木中间，靠近一根铁轨的内侧，用石子伪装好，并用铁杆将枕木两头的道钉撬开。设好雷后他们隐蔽在路旁。

一会儿，蒙胧的车灯渐渐明亮起来，轰隆轰隆的车轮声越来越近。队员你看我，我瞧你，只有混子瞪着两眼，紧握拉绳，等敌火车驶近。当车头驶至地雷跟前时，他猛一拉绳，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车头炸开花，车身像条砸碎头的巨蛇，翻滚了两滚，躺倒不动了，几个押车鬼子哇哇叫了两声，也都一命归天。

炸车成功，区里、县里都更加重视，从铁路支队拨给了几箱黄色炸药，带来一些制式雷壳、雷管、寻火索等。混子乐的合不上嘴，真像个得胜的将

军。

火车被炸，引起敌人的恐慌，特别是 1944 年以后，八路军反“扫荡”接连取得胜利，迫使敌人把兵力集中到重要城镇和铁路线上。敌人对铁路运输又加强了控制，路两边挖了护路沟，设路岗楼，哨兵不停地巡查，装甲车来回巡逻，混子他们感到用拉线雷炸车很难了，有两次被敌人发现，差点出危险。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混子针对敌人变化的新情况，又研究制造出几种新雷。一种叫“硫酸雷”，用一个小瓶，装满硫酸安装在雷壳的寻火口，当雷受震颠簸或歪斜，硫酸溢进火药里雷就爆炸，爆炸组用这种新雷炸火车，炸鬼子。一种雷叫“弹簧雷”。混子利用打弹子和鸟夹的道理，用钢丝缠成簧，簧的两端系上线。一头拴在铁轨上，另一头拴在小木棍上，木棍再系一截线，系在雷导火索上，布雷是将弹簧拉开，棍固定住；当木棍被挂倒时，弹簧一紧把雷拉响。这个法很巧妙，敌人又不易发现，有一次炸火车，巡逻兵检查了几遍也未发现，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货车被炸翻了。

李混子的爆炸组，就是用这些“新雷”，接连得手，炸毁 3 个火车头，十七八节车皮，炸死炸伤日、伪军 73 名，使敌人的铁路运输受到了很大破坏和损失，震动了平汉线。1945 年 8 月，在第七军分区召开的爆炸展览会上，李混子被评选为爆炸英雄，军区领导给他戴红花，奖给一面大锦旗。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平汉线解放区不断遭到侵犯，李混子他们的民兵爆炸组，以雷战为主、以枪战为辅，以枪战配合雷战，协同主力部队和县队作战，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炸死敌人 105 名，炸翻机车头 7 个，车厢 29 节，使国民党军的这段运输线经常中断。人们为北李家庄编了一首歌：

北李家庄真排场，
枣儿树上挂“铃铛”，
村里村外种“铁瓜”，
专给敌人备“干粮”。
城里敌人来赴宴，
吃饱喝足棺材装。

1946 年 12 月 8 日，李混子在检查民兵备战情况时，不慎棉袍衣角挂住雷的导火线爆炸，腹部受重伤，12 月 10 日牺牲。1947 年初，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通令授予李混子“民兵爆炸英雄”的荣誉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遗骸转迁到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李玉长撰写）

剖腹明志醒国人 ——记续范亭烈士

1935年冬，在南京中山陵发生了一位爱国志士为抗日救国而剖腹明志的悲壮行动。

这位志士，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驱逐北洋军阀，坚决抗日救国，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续范亭。

1893年11月27日，续范亭出生在山西省崞县西社村。高小毕业后，考入太原陆军学校。当他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时，便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秘密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策划革命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忻（州）代（州）宁（武）公团镇远队队长，率部参加占领雁北军事重镇大同的战役，驱逐了清朝统治者。可是，辛亥革命果实落到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手里，山西封建军阀阎锡山也背叛革命，投靠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续范亭坚持革命，奋起反对袁世凯和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他遭到通缉后，到陕西参加了著名的“华山聚义”、护国军及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是北方民主革命武装——国民军的组织者之一。他曾担任国民联军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及国民军联军政治学校校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一面积极反共，“围剿”红军，镇压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续范亭应杨虎城邀约，协助邓宝珊成立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筹建新编第一军，开拓西北，可是被蒋—351—介石免去行署参谋长职务。他忧国忧民，愤恨不已，于1935年冬前往南京呼吁团结抗日。他到南京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五中全会。续范亭愤于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投降，身为军将，报国无门，誓以一死震醒国人，到中山陵前用匕首剖腹明志。他在《哭陵》一诗中写道：“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靦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续范亭的这一悲壮行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政治影响。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新闻，但一些报纸还是冲破禁令，发表了这一震动全国的新闻，并刊登了续范亭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和五首绝命诗的手迹。许多人到医院看望他、慰问他，全国各地纷纷发来慰问函电。

续范亭在疗养创伤期间，念念不忘的不是个人今后的依归，而是“何时擒海寇，献捷祭灵台”；“东海狂潮响霹雳，而今谁是岳家军”，“倭寇由来多猖獗，何人继起振家邦”。

在养病的日子里，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

1936年11月底，续范亭应杨虎城邀请，从南方回到西安。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中，他积极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出谋献策。这时，他的好友南汉宸来到西安，看望了他。南汉宸和续范亭同是山西人，早年相识，交往甚密。这次会面，南汉宸向他解答了为什么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且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不记前仇、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还给他带来了毛泽东著作和延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不久，续范亭在南汉宸陪同下会见了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十分敬佩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伟大。这使他相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有前途。他决心把平生的理想同共产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1937年春，续范亭以杨虎城将军代表的身份，回到故乡山西，宣传团结

抗日和共产党的主张，同阎锡山及其将领、政客、官僚们周旋，尽力争取他们做一些抗日的的事情，以扩大和发展抗日力量。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太原向阎锡山提出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地总会）的建议，取得阎锡山的同意。

战动总会成立时，续范亭被推举为主任委员。中国共产党派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等参加领导战动总会工作。各群众团体、抗日武装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加入战动总会。

太原沦陷后，续范亭率领战动总会工作人员和一部分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当中，晋西北各县都成立了战动总会，发展了1万多人的抗日部队。续范亭指挥战动总会所属武装部队和敌人英勇作战，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的围攻。

后来，续范亭当选为晋两北行政公署主任。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和团结晋绥军民，进行抗日战争，不断地反击蒋介石、阎锡山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1941年夏，续范亭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中共中央安排他到延安治疗、休养。他在延安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和尊重。续范亭在病中十分关心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势，注视着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政治变化。他热情地支持和歌颂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他坚信：“真止中国之命运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支持，有毛泽东政策路线的指导。”1945年抗战胜利，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主任，续范亭和林伯渠、邢肇棠、李鼎铭当选为副主任。

续范亭在病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延安整风学习。他通过时整风文件的学习和研究，回顾和检查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在《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中感慨地说：“十年前，我还是个颇信佛学的人，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我多少读了些，认为世界任何的坏人都能感化而转变的。我的陵园自杀和又回到山西的做事，满想拿我区区的个人影响你们。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个观念是错了，不但收效甚微，而且自苦太甚。”他还诚恳地对同志们说：“如果我早找到共产党，早认识马列主义，也就不会去自杀了。”续范亭开始并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是经过不断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经过长期的奋斗之后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续范亭还写了许多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诗篇和文章。他的作品朴素真实地表达出他为祖国、为人民的满腔忠烈和忧愤。他的诗文充满了战斗精神，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几乎每一篇政论、每一首诗都有金石之音，义正词严，给人们以勇气和希望。

1947年9月12日，续范亭在山西省临县病逝，终年54岁。他在临终前遗书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续范亭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悼念续范亭的挽联写道：“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稿南新宙、高向明撰写）

